

译者的话

丹尼森·拉西诺博士是美国大学调查部的副主任，专门从事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研究。他从1963年起，旅居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长达十年左右。本书即作者旅居南斯拉夫期间所著。他广泛接触了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和科技界人士，也接触了南斯拉夫普通的工农群众。这使作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给本书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书是一部描述南斯拉夫“不断变革以求现代化的社会史话”。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和政治改革、民族问题以及党内斗争。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民族问题和党内斗争常常由改革所引起，并且围绕着改革展开。作者着重分析南斯拉夫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方式同现代化过程的设计者及其指导机构间复杂的双轨关系。本书所指南斯拉夫的实验包括：“将市场结构引入并逐步代替指令式的经济；将作出决策的权力分散开来；实施比较广泛的个人自由；推行群众参与政治的新形式；开放边界以及‘参加国际分工’”等等。

作者以大量材料论述了改革的起因、发展和曲折，并评述了改革的得失，探索了今后改革的方向。他在书中说：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实验绝非出之于偶然。它既是由于南一苏争论日益激烈，共产党情报局加强了经济封锁和政治、军

事压力，也是由于国内指令式的经济结构陷于崩溃，为了生存才走上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现在正“以一党但是多民族专政旗帜下的联邦制度和文化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发展问题；通过急忙而有效地否定掉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必然软弱无能的逻辑来解决独立问题”。

但作者认为：“一种折衷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从来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归根到底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纽约时报书评》1978年7月在一篇题为“年青的古国”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拉西诺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示了极高的崇敬……但他……也得出了纯西方的结论”。应当指出，作者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这一点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所必须注意的。

拉西诺在概括自己所作的研究的意义时曾说过，“南斯拉夫的这段历史，确实提出了一些可能值得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一些正在迅速推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加以实验的结论或假设”。从某种参考借鉴意义来说，这也就是本书的翻译动机。

由于原书行文比较晦涩，加上译者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之处一定不少，希读者不吝指正。

1979年5月

序

三十多年来，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只有二千万人口、僻处一隅的巴尔干国家，却一直引起国际上的兴趣，这同它的幅员大小和经济、军事地位是颇不相称的。这种兴趣，首先是因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的抗击轴心国占领的斗争产生的，1948年以后又集中于它的一种引人注目而尚未完成的探索性航行，亦即本书主题“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宣告的目的地，可能根本不在他们已探索过的任何航向上；这条船或其领航者，最终可能对这项冒险事业是不够格的；如果真的登陆了，那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平常、甚至很遗憾地不过是一个大家熟知的小岛，离共产主义理想之岸还异常遥远。但是，从其戏剧性的内容和普遍意义来说，人们对这个伟大尝试的关注依然是值得的。

1948年，南斯拉夫成为第一个敢于违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由此也成为第一个、并且多年来还是唯一的一个敢于脱离苏联的模式进行实验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实验是：将市场结构引入并逐步代替指令式的经济；将作出决策的权力分散开来；实施比较广泛的个人自由；推行群众参与政治的新形式；开放边界以及“参加国际分工”等。它在实验过程中，大胆而富于想象地对付一系列当今世界的重要难题，虽然并没有解决多少。这些难题有：怎样在制度和社会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高速现代化；怎样解决自由和发

展的关系以及国家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怎样理解当今世界上小国的独立和作用的性质与界限；怎样估量一场革命自上而下地创造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并加以肯定的能力，以及创造一种大众接受的价值观念并加以肯定的能力，这种价值观念要有助于广大群众参与对公共事务作出合理有效的抉择，从而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推进现代化。同时，南斯拉夫所存在的欧洲最尖锐的多民族问题，有时对这种实验起促进作用，有时则起干扰破坏作用，因而也使南斯拉夫的实验在当代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当今世界所以到处遇到麻烦，正是由于一般称之为“建立共同体”这样的时髦问题，以及种族差异和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冲突。

当南斯拉夫的冒险性远航进入第四个十年的时候，它已经以一部新宪法和一种政治上的新规定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显然标志着历史新篇章的开始；而且它还有一个长寿的领导，他的长寿早已超过了人们通常的期望，因此现在来对以往三十年的意义作一个初步和尝试性的分析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我们主要分析南斯拉夫的政治史，着重历史发展的动力，亦即精心创设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方式同现代化过程的设计者及其指导机构间的复杂的双轨关系。

本书的中心和大部分篇幅，放在1961年以后这段时期，也有较少篇幅是关于1949年到1953年的。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这两个时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发生过能使新政权和南斯拉夫社会起变化的重大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斯拉夫战后历史的其他时期只不过是一些前奏、插曲和尾声而已。当然，这些时期无疑也是重要的，而且应该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但限于篇幅和作者的个人爱好，只能遗憾地放在一

个比较不重要的地位概略地叙述一下。其次，上述两个时期中的后一个时期，即从1963年到1973年，笔者旅居南斯拉夫，因而能更直接地观察南斯拉夫的现实，这样也就必然对这个时期要多说一些，至少在一些档案公开之前是这样。一旦某些档案公开，目前对过去形势的看法（以及现有的研究），当然就要在学术上作一些修改。

回想起作为本书写作基础的那旅居、观察和研究的十年，我由衷地感到要对无数南斯拉夫人深表谢忱。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看法，往往还有友情慷慨地贡献给我。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在事实上和判断上一定比现在错误更多。然而，即便想把主要的一些人的姓名列出来，那也是不可能的，不是篇幅过长，就会选择不当。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公务经常来看我，但耽搁的时间远比公事所需的时间多；有些人同我一起工作和生活，我们有共同的发自内心的想法和希望。我相信，这些人会理解我所以不提名道姓是因为一列名单反而会抬高我自己而不是真正感谢他们了。何况，这种名单偶然也会考虑欠周的。这些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熟人以及很多其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他们的职位有高有低，都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里耶卡的学术、新闻、政治和专业界工作。这些人也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农民，笔者荣幸地经常同他们在彼此的家里共享面包和白酒。

象感谢南斯拉夫人一样，我也要深深感谢一些外国的观察家。特别要提到的是W·迪金爵士，最初是他激发了我的兴趣，并不断给我鼓励；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富有见地的巴尔干记者，如D·宾德和P·伦德瓦伊；以及某些卓越的学者兼外交官，他们在T·加维爵士和B·埃尔布里克两位大使任内在英

美大使馆供职。就这本书本身来说,我要感谢M·拉西诺、D·比耶尔纳和K·劳滕斯特劳赫,没有他们,本书的准备就无法就绪;此外要感谢L·希克曼为本书制图,以及“查塔姆大厦”^①的H·奥利弗极其耐心而细致的编辑工作。

我也得很好地感谢美国大学调查部的同事。自1963年起,他们给了我担任美国大学调查部东南欧联络员的机会,同意我广泛地使用我从南斯拉夫发回的研究报告,并且宽容我利用工作时间来写作。有赖这些支持,本书才得以写成问世。在上述同事中,我特别要感谢美国大学调查部设在罗马的地中海研究中心主任E·A·贝恩,他曾对书稿提过有益的和鼓励性的意见。当然,我也要感谢不领美国大学调查部薪金的同事——我的爱人,她比我更了解南斯拉夫,她的了解是如此之深广,以致可以说,本书最精采的部分,她才是真正的作者。

D·拉西诺

1975年4月

^① 查塔姆大厦指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因设在伦敦查塔姆大厦,故称。——译者

前 言

南斯拉夫国家发端于一个世纪以来渴望实现的一种理想：南方斯拉夫人应该统一于一个国家之中。这是一种自由和现代化的设想，主张民族解放和民族国家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企图把十九世纪流行的观念和东南欧种族地图的现实调和起来。这种想法对生活在国外政权压迫下的贫困的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作为一些既有差异又有关联的弱小民族，生活在种族杂处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交错的地区，要争取生存，就只有联合起来。统一南斯拉夫这个想法最强烈、最生动的象征，莫过于按贾科沃的斯特罗斯迈尔主教的意旨所绘的一张壁画；这位主教是宣传上述理想最早和最伟大的克罗地亚人之一。那幅画绘在他为斯拉沃尼亚教区所建的新哥特式大教堂南袖廊的墙上。画上绘着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所代表的南方斯拉夫民族前来奉献主显节贡品的情景。这些南方斯拉夫农民的简单的农产品，由于地区不同而品种各异，合起来却满足了圣婴的一切需求。这所教堂的地理位置也是这种设想合乎情理的标志。因为斯拉沃尼亚历史上是克罗地亚人的土地，近代则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杂居。在斯特罗斯迈尔主教建立教堂的时候，他们已经交替在马扎儿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外来统治下共同度过了七百年。

1918年建立的南斯拉夫国家，是由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

罗两个原来独立的王国以及以前哈布斯堡、奥斯曼和威尼斯三个帝国所辖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合并而成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在表面上几乎圆满地实现了原来的理想。只是独立建国的保加利亚人和另外五个邻邦内少数聚居或分散的其他南方斯拉夫少数民族留在国境之外。然而，它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一部南斯拉夫的理想同无法驾驭的现实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个现实就是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联合过的南方斯拉夫人，除去具有统一的热望、相似的语言、相似的历史起源的神话以及多少世纪来在外国统治下的相似遭遇（这些都是热望统一的基础）以外，很少共同之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作为实现南斯拉夫理想这一斗争中一个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在南斯拉夫土地上触发的。尔后的六十年中，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也都与上述历史问题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关联。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 1918 年以前一般都处在各种外国统治之下，但情况与 1860 年以前的意大利和十八世纪瓜分以后的波兰不尽相同。南斯拉夫人实际上好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是欧洲的政权，也是欧洲文化的著名中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具有完全不同传统的亚洲专制主义。如果亚洲并不正好开始于维也纳东门的大道上（据说梅特涅曾这样说过），那末迟至十九世纪中叶则还肯定是以萨瓦河和多瑙河一线为界的。早在玛丽亚·塞雷莎的时代，这里就是世界上第一条实实在在的“防疫线”：实行严格隔离，保护欧洲，预防亚洲的瘟疫。土耳其和巴尔干在这条线以外，所以这些名字在日常谈话中都曾是愚昧、腐败、混乱和暴戾的同义词。

就这个地区的地理条件来说，从外部几乎四面八方都能接近，而内部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活动则为一些欧洲最难于通行的地形所阻碍，因此有利于侵袭，而不便于贸易和内部聚合。这就是本地居民通常以战士著称而很少作商人的原因，也是顽固保持异常复杂的种族杂居的原因，这种种族杂居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外部入侵和移民所造成的。这个地区历来还是个地处前沿的征战之地，冲突迭起，战乱频仍，如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争夺，天主教和正教之间的争夺，基督教的欧洲和伊斯兰教的亚洲之间的争夺，日耳曼东进和泛斯拉夫向暖海推进之间的争夺，东欧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争夺。正如铁托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记录了这个悲惨的事实：在我们国土上，五十代人中几乎没有一代不遭到战争的蹂躏和惨重的损失”。^①

独立的政权只能作为缓冲国生存于敌对的帝国之间，或者建立在那些衰亡的帝国边缘的废墟上。这样，对于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帝国，早期的克罗地亚王国和后来的波斯尼亚王国，拉哥萨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十九世纪的塞尔维亚公国和门的内哥罗公国的建立和扩张，以及今天独立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成立，就不难说明其原委了。

然而，全部或者说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民是经常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之下。远在西北方的斯洛文尼亚人，从来没有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自查理大帝时期到1918年是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一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

^① 对芬兰国事访问时的一次讲话，发表在1964年6月2日的《战斗报》（贝尔格莱德）上。

治之下。克罗地亚人自 1102 年至 1918 年同马扎儿人联合，他们先为匈牙利所统治，1526 年以后又为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此外一大部分人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过了将近两个世纪。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从匈牙利之手转到威尼斯以及奥斯曼帝国，而后再转归哈布斯堡王朝。其余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马其顿人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古塞尔维亚”非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十四或十五世纪时开始为土耳其所统治，一直到十九世纪才逐渐变为独立的缓冲国或者（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况）转归哈布斯堡王朝。南斯拉夫余下的一些领土如马其顿、科索沃和新帕扎尔州，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后于 1912—1913 年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只有小小的门的内哥罗和拉哥萨几乎始终保持了微妙的独立；前者是得益于它无法征服的地形，后者则是通过熟练的外交手段以及表面上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但即便是拉哥萨共和国，由于拿破仑的坚持，也于塞尔维亚复国前几年从地图上消失了。

这种经历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之中有些人长期处于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影响和统治之下，继承了希腊正教或伊斯兰教的传统，可以说是地道的“巴尔干”。而他们在西部和北部的同胞从罗马接受了基督教，从维也纳、布达佩斯或威尼斯接受了宗主统治，属于天主教的中欧或地中海欧洲。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有人就认为他们在起源上是同一种人；他们比邻而居，但社会体制和价值系统以及政治素养却有迥然不同的发展。这种差别的标志是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字母来书写共同的语言；信仰天主

教的克罗地亚人用拉丁字母，信仰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则用西里尔字母。来源于这种共同语言的克罗地亚书面语，反倒接近大多数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口语，而与绝大多数克罗地亚口语相去较远。在两个民族杂居的共同国家和许多地区中，这种差异的潜在分裂倾向可以进一步由一个基于 1918 年以后的经验而来的南斯拉夫谚语表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彼此寻衅。”另外，塞尔维亚还有一句自诩的老话：同当权者发生冲突时，“塞尔维亚人拔剑，而克罗地亚人拿笔”。这个比喻集中地反映了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传统政治风格。塞尔维亚人的风格念念不忘哈伊杜克^①的传统，这些啸聚山林的爱国者给了奥斯曼帝国最后两个世纪的疯狂压迫唯一可能的回答；而克罗地亚人的风格则反映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从民族和个人自由所受的侵犯中获得的教益，那些侵犯是高度合法化的，而通常也是可以从法律上加以反驳的。

南斯拉夫人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终于在 1918 年得到了统一，但却由于民族、宗教以及哈布斯堡、奥斯曼和威尼斯的各种不同影响而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些不同的影响涉及城市形式、乡村分布、土地占有方式、法律制度、社会 and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思想方法等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这样统一的国家虽然合乎逻辑，充满希望，而且可能正是人们所切望建立的一种联盟，但在此时，即以 1918 年据以建国的民族国家观的胜利为特征的时期，这种联盟仍是一种不合时代的多民族的凑合。直到 1929 年，这个国家的正式

^① 这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群众性武装组织。——译者

名称还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就是明证。在当时全国大约一千四百万人口中，没有一个民族能占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最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其次是克罗地亚人，占百分之二十四；斯洛文尼亚人占百分之八点五。马其顿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门的内哥罗人，使这个南方斯拉夫国家总人口中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三。^①其余是少数民族，数目约二十个出头一点。其中，日耳曼人有五十多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逃亡或被逐出），马扎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接近此数。这三种人的人口数量和政治潜力在少数民族中都占极重要的地位。由于意大利、奥地利及其他地方也居住着日耳曼人、马扎儿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未能收复故土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便使人们无法划定东南欧种族地图的边界线，也使这个新国家更加脆弱。因为国内外的领土收复主义分子，对南斯拉夫同所有七个邻国中的六个邻国的边界线提出异议。

这种形势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而进一步复杂化。这个国家不仅地理上而且种族上不同的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各自往两极分化，就使得社会和政治形势更为险恶。基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北部和西部前哈布斯堡王朝领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他们拥有现存那一点点工业、工业传统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大部分，有较高的文化和较低的出生率，并且有比巴尔干和前奥斯曼帝国诸省的各族人民更为复杂的社会

^① 1921年新王国的第一次人口调查，除把斯洛文尼亚人合并登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外，登录了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因此，超过这个百分比的统计数字，则是根据1945年以后的人口调查倒推的一种估数。

阶层。那些省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直到1918年还是依靠自耕自给的农业经济维持生计。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统治集团却利用本民族人口上所占的优势，以及在战争和建立新国家过程中塞尔维亚王国所起作用的政治和心理影响，成功地把自己以及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民族。而那些民族的领导者，特别是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喜欢联邦制度的。

因此，在经济权力集中于较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同时，政治权力几乎完全为塞尔维亚人所独占。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南部和北部其他非塞尔维亚族的人，他们的人口合起来虽占多数，但发现自己好象处在一个真正的“大塞尔维亚”之中：国王是塞尔维亚人，首都也在塞尔维亚，两次大战之间（除1928年少数几个月以外）内阁总理都是塞尔维亚人，而且政府机构和军官集团也为塞尔维亚族人所霸占。

在这种形势下，所有重要的政党都是种族性质的党，只有共产党开始是泛南斯拉夫性质的。它在1921年以后被迫成为不合法的组织，削弱了活动能力；以后若干年里由于奉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它主张分解南斯拉夫。以这样一些党派为基础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不是摇摆不定就是处于停滞状态，终致失败——1929年1月，强制实行了塞尔维亚王室独裁。王室独裁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王国”，并重新规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内早已包括了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为同一“南斯拉夫民族”的“部族”。但是这种“南斯拉夫民族”，就其显著的文化特点而言，绝大多数同塞尔维亚民族似无二致。这种独裁和逐步塞尔维亚化的思想，反而激发了好斗的有时

也是法西斯的分裂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中，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和恐怖分子组织——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①共同策划于1934年10月在马赛暗杀了亚力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国王。外国的扩张主义势力——先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后来是希特勒的德国——耍了种种手腕，混水摸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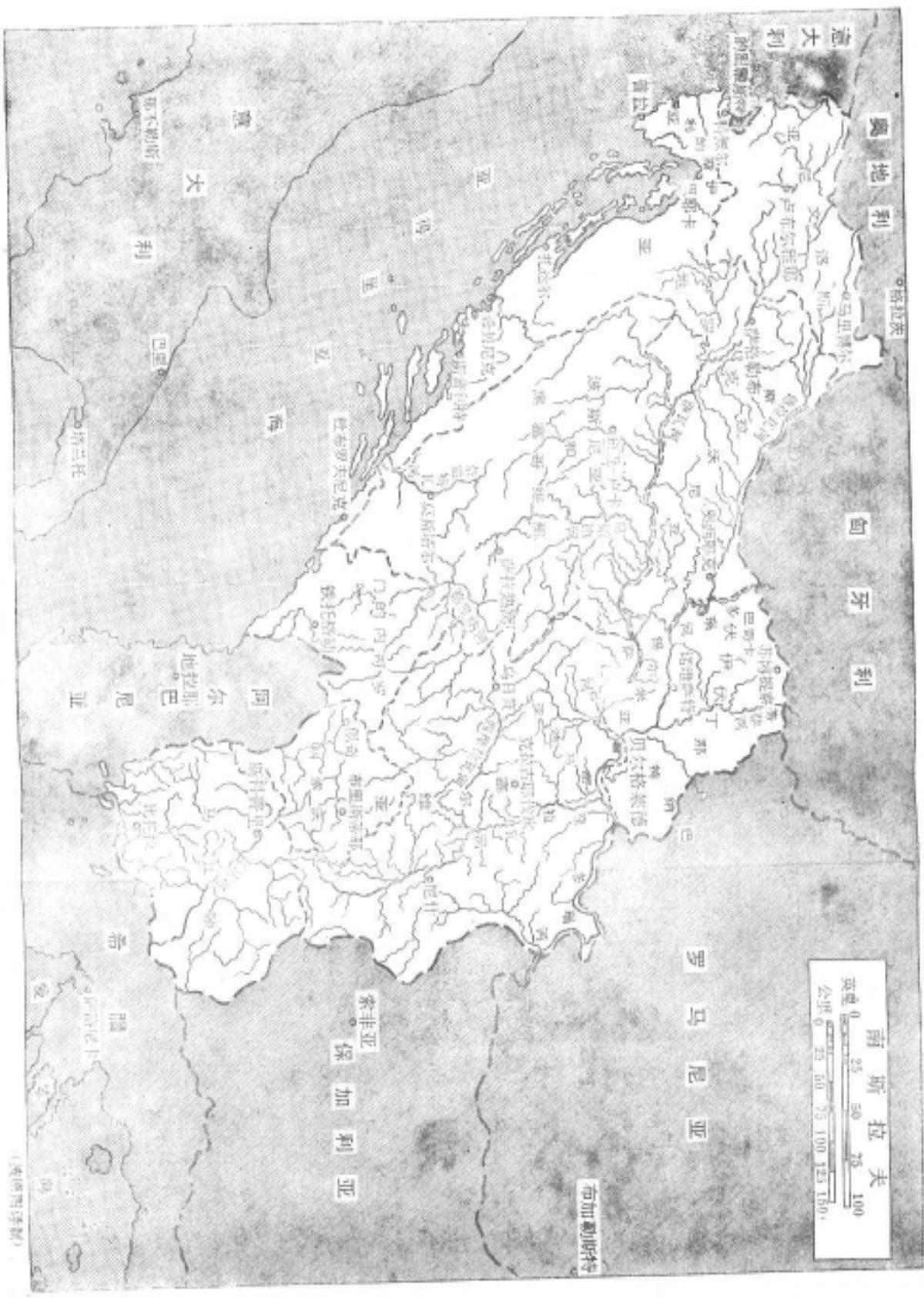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历史，同它的大多数邻邦的情况一样。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兴旺时期，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并且前途颇有希望。但这种发展主要依靠外国资本，因此南斯拉夫绝大部分提炼和制造工业属外国所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照例也给南斯拉夫带来经济的以至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因而它虽然勉强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纳粹德国的经济依赖。当时唯有纳粹德国有能力并准备购买巴尔干的农产品和原料，借以日益扩大影响，单方面控制贸易条件，从而使这些国家永远保持依赖状态。这种做法就是日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南斯拉夫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38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据各方估计是在六十至七十美元之间。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水平相比：美国是五百二十一美元，德国是三百三十七美元，法国是二百三十六美元。制造业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自1923年以来增长了百分之六。农业人口还

^① 乌斯塔沙于宣告王室独裁后不久成立，以匈牙利和意大利为基地展开活动，领导人是巴维利奇博士。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瓦达马其顿开始唤起反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和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时期。它一直包括亲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自治主义者和原始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两个派别。而后者的很多成员在南共宣布赞成马其顿独立或自治以后成为南共党员，并为1945年以后斯科普里的新政权提供了不少领导人。

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几乎全部是小自耕农。由于人与地的比例愈来愈失调，农民问题比过去更加尖锐；1921年每一百公顷可耕地有一百三十一一个农民，到战前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四个。只有百分之三十点一的适龄儿童能够入学，而百分之四十四点六的人是文盲。

南斯拉夫这艘脆弱的航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礁石上撞得粉碎。这个国家在1941年4月轴心国入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被征服者分割成不同的傀儡国和占领区，它们的地域是根据种族差异和便于挑起相互冲突的原则划定的。

然而正是从这个废墟中，从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史诗般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内种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的战火中，飞出来一只新南斯拉夫的金凤凰，一只戴上了共产主义红星的金凤凰。旧南斯拉夫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处于敏感地区的小国家如何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一个贫穷的国家怎样高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几乎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结构，缺少资本和熟练工人，各地区的落后程度差距极大，而且这种差距是同相互猜疑的各种族聚居区的划分一致的）；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如何建立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和团结统一。现在，一批巴尔干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谋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们缺乏经验，受过教条主义的训练，但热情而聪明，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是这些人表明自己至少象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鼓舞一样，也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原则上，他们用在一党但是多民族专政旗帜下的联邦制度和文化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发展问题；通过急忙而有效地否定掉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必然软弱无能的逻辑来解决独立问题。



南斯拉夫
 英里 0 25 50 75 100
 公里 0 25 50 75 100 125 150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

索非亚
 保加利亚

希腊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目 录

序	1
前 言	5
第一章 新南斯拉夫的诞生	1
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义	18
与斯大林破裂	30
第二章 同斯大林主义决裂	43
在共产党情报局和西方之间	57
走“南斯拉夫道路”	64
“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	83
宪法和代表大会	95
第三章 巩固和发展	109
德热拉斯危机	109
铁托和赫鲁晓夫	118
经济发展和政治停顿	127
党的“七大”	141
第四章 大辩论重新开始	147
改革和倒退	147

为老利益大声疾呼的新活动家·····	152
经济学家的辩论·····	164
辩论公开化·····	172
对立的论点和民族问题·····	178
第五章 自由社会主义·····	188
发展的辩证法·····	188
从宪法到党代会·····	203
党的“八大”·····	226
1965年的改革·····	238
后果：抵制和兰科维奇·····	247
布里俄尼：八届四中全会·····	254
第六章 自由主义的上升·····	266
新的多中心政治·····	266
1966—1967年党的改革·····	273
改革后的经济·····	280
在新帝国主义和新共产党情报局之间·····	290
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辩论·····	297
异议和反响·····	308
关于经济学家、学生和“地下政治力量”·····	319
学生造反·····	322
捷克斯洛伐克的冲击·····	333
第七章 多元化的代价·····	342
不同政见的复活和克罗地亚的策略·····	342

权力真空所造成的瘫痪·····	350
1968—1969年的党代会·····	356
自由化的困境和1969年的选举·····	364
现代化的危机·····	372
克罗地亚的新策略·····	383
朝着邦联发展·····	391
通向卡拉乔尔杰沃之路·····	402
第八章 统率一切的核心 ·····	430
卡拉乔尔杰沃及以后·····	430
十月的塞尔维亚·····	445
1974年的宪法·····	457
党的“十大”·····	466
第九章 结论 ·····	481

第一章 新南斯拉夫的诞生

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入侵，从1941年4月6日野蛮轰炸贝尔格莱德开始，以同月17日南斯拉夫签订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的停战协定结束。国王彼得二世的政府系当年3月27日通过军事政变和一系列反轴心国的示威游行建立起来的，因而加速了希特勒作出进攻的决定。此刻彼得二世及其政府业已逃亡国外，并先后在伦敦和开罗建立了流亡政府。这次政府垮台比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影响更其深远（当然，考虑到轴心国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是“统治系统的彻底瓦解，这次瓦解以后，看来南斯拉夫国家就不复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南斯拉夫实际上已不存在。意、德保护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萨格勒布宣告成立，由安特·巴维利奇的狂热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行使权力。独立国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是“大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久已追求的梦想，但不包括大部分达尔马提亚和亚得里亚诸岛，这些地方为意大利所并吞。乌斯塔沙政权把在它的统治区内进行种族和宗教的大清洗视为头等重要的任务。这就意味着要使用强迫改宗和屠杀的手段，消灭占克罗地亚人口百分之十五和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从地图上消失了，占三分之二的南部地区为意大利所侵吞，余下的三分之一即经济上较重要的北部地区则由德国霸占。门的内哥

罗再度宣告成立一个公国，它的君王与其占领者意大利的国王合而为一；阿尔巴尼亚族占大多数的科索沃地区，也成为1939年复活节后由意大利直接统治的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保加利亚占领并打算兼并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匈牙利人吞并了普雷科穆列、梅久穆列、巴兰尼亚和巴奇卡。伏伊伏丁那所剩的部分——南斯拉夫的巴纳特，一开始就由德国通过它为数众多的德裔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直接管理。塞尔维亚的残余部分，实际上落到1878年公国的境地，由德国占领，交给受德国监护的当地合作者管理。他们的头头奈迪奇将军是个巴尔干的贝当，同萨格勒布的吉斯林巴维利奇不同。在整个欧洲占领区中，他是那些所谓希望拯民于水火而向敌国屈膝投降的人的典型代表。

1943年11月29日，即全面崩溃后不到三十一个月的时候，南斯拉夫在抵抗、报复和种族间内战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中，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中世纪波斯尼亚的首都亚伊策再生了。南斯拉夫是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再生的。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人民解放运动”正式的最高政治机构，“人民解放运动”则为南共所建立和领导，人们一般称之为“游击队”。

反法西斯委员会建立于一年以前。当时除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以外，所有地区的游击队运动的五十四位代表在波斯尼亚的另一城镇比哈奇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以建立负责行政管理政治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游击队在每个暂时或永久控制的“解放区”早已设立了这种委员会。在1941年10月，它们曾被称为“临时政府机构”，如今转而成了正在旧国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机器的核心。当初，这些委员

会也提出了迅即作出解放战争应转变为社会革命的决定已日趋成熟的问题，这场社会革命将由共产党领导并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但这些在比哈奇会上并没有谈到，部分原因是由于听从了苏联的指示。

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尽管依然矢口否认有强制实行苏联式制度的意图，但它在亚伊策还是自行宣称具有全南斯拉夫临时政府的合法身分。会议当着英国军官和美国派往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的面，建立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而且使它具有作为一个政府的特性。委员会以约瑟普·布罗兹为首，人们称他为铁托，51岁，是带有部分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克罗地亚农民。他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司令官，也是南共的总书记。反法西斯委员会还宣布他为南斯拉夫元帅。

第二次会议进一步宣告新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联邦国家，承认南方斯拉夫人的自主权利以及兄弟关系和团结统一，并规定南方斯拉夫人由五个不同的民族组成：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他们将各自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斯拉夫人杂居，只是一个历史的而不是一个种族的单位，也将建立一个(第六个)共和国。会议还确认了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和克罗地亚地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即全部或部分占领根据1920年和1924年条约属于意大利的南斯拉夫人居住区(伊斯的利亚、里耶卡、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扎达尔以及一些亚得里亚的岛屿)。会议禁止国王彼得二世回国，直到战后由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命运，并且不承

认流亡的王国政府有代表南斯拉夫或以它的名义签订任何国际协定的权力。

经过复杂斗争和流血牺牲，终于导致了亚伊策会议的召开，并进而把自行宣布的临时政府变为国际公认的革命政权，且在遭到破坏又复重建并得到扩大的南斯拉夫具有绝对权威，这无异于一首史诗。有关史实通过各种文章和回忆录反复阐述，而且用长短格六音步的韵体写成荷马风的民谣，由古斯尔^①艺人演唱，他们有时还漫游于那些发生过激战的群山之中。这类传说就其最初和最简单的内容来说，是一个人民抵抗和游击战争的故事。它展示了战争的灵活机动和命运的突变；尤其是在巴尔干，它所展示的个别英雄主义的或骗人的大胆行动以及种种最卑鄙的阴谋，都远远超过了现代战争的绝大多数形式。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异常复杂，因为各方力量——抵抗运动、占领者以及同这两方的合作者——都由怀抱不同目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目的）的人所组成。事实上同时发生了三种战争，在战争中个人和集团的联合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一种是反对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两种为国内战争：一是南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是复旧派和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和政治经济体制的革新派之间的战争。于是这个故事就包含了各种成分：既有荷马式的巴尔干史诗，又有战争各方的一些领导人的希腊式的悲剧，而且它还是一本研究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教科书。

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和时机的选择，不仅标志着复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具有更重大的意

^① 古斯尔是巴尔干的一种乐器。——译者

义，尽管当时在亚伊策所发表的宣言看来非常狂妄，并近乎一种疯狂的赌博。因为德国人当时依然有效而且无可争辩地控制着整个南斯拉夫的城市，大部分主要城镇，所有重要的交通线以及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他们依然随时能把铁托和他的司令部赶回到森林里去，事实上在这次会议召开后六个星期德国人就把他赶出了亚伊策。而反共势力继续在全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塞尔维亚普遍地获得人民和武装部队的支持。最后，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所有盟国，包括苏联在内，依然承认流亡中的王国政府及其“国内的军队”，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保皇的“切特尼克”，它是游击队国内的主要对手。英国在苏联的默认下就在不久之前对游击队和切特尼克的合作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铁托对于苏联对流亡政府的态度以及对他本人的政治抱负的态度显然是很敏感的，这从他故意不把亚伊策的计划通知莫斯科（这是违反共产主义纪律的）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亚伊策会议实际上是在斗争的一个阶段结束时召开的，这场斗争使反法西斯委员会所预期的政权在战后当权已成定局——除非想象德国人能消灭铁托及其参谋部，这种“偶然事件”六个月以后在德瓦尔还真的几乎成为现实。其他的设想就是假定德国人能取得胜利，这显然已不可能；或者按照英美的意愿武力入侵巴尔干，去同刚被承认是盟军的游击队军队作战，甚至还可能同俄国人作战。这种抉择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些人一直在想象或希望它有实现的可能。这个想法在军事上、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而且按照盟国的公众舆论和参谋人员的观点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连丘吉尔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他曾受到错误的谴责，说他鼓吹过

希望这么干)。当丘吉尔派往游击队的代表团负责人向他直率地报告铁托要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苏联式的制度时，他出于特有的现实主义和某种预见，表现出一副人们后来一再引述的心安理得的神气。这同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力量的扩张通常所持有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此，英国首相只限于对游击队不断地增加援助，并且鼓励罗斯福和斯大林也这么做，还迫使国王彼得二世承认游击队并让他们加入政府。这些政策主要是想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德统一战线，但也有其他附带的作用。它们也可能为西方在战后对未来的南斯拉夫政权享有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信誉打下基础。这个动机由于后来丘吉尔探得斯大林对巴尔干的企图就更加坚定了。当时丘吉尔对斯大林提出过一个著名而又“玩世不恭”的建议：解放后，苏联和西方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应该对半开。事实上，英国 1943 年年中以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的主要成果就是有力地帮助了游击队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军事援助尽管受人珍重，但很有限。然而，丘吉尔对游击队的鼓吹和国王的勉强默认，却给了这个新生政权极为需要的国际承认和合法地位。这一政策也削弱了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迫使国王否认了同他们的关系，而且盟国还公布了他们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合作关系。对丘吉尔来说，更重要的其他目的未能实现。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统一，只是在除游击队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信誉扫地或被消灭以后才得以实现；而英国同未来政权互相信任的愿望日后许久才被接受，并且还是由于其他一些事件令人注目地改变了游击队政权的前途。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所掌握的游击队政权的建立已越来越

越不可避免，部分原因是由于世界大战的发展和游击队所取得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胜利。游击队在1941年7月除了参谋本部以外，几乎没有军队，后来日益壮大，到同年年底大约有八万人的兵力。到1943年秋，它已发展为一支编为“师”和“军”的大约二十三万人的军队（不包括较小的游击部队）。游击队避免了敌人以不断增加的巨大兵力对他们主力的联合围剿。如1943年春在所谓“白色行动”和“黑色行动”的围剿中，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他们的各种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勾结者的联合兵力约十一万七千人，一起来对付大约一万九千人的游击队，但游击队终于坚持下来，他们携带伤员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跋涉，然后又重新集合起来，继续战斗。游击队利用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的机会缴获武器，夺占地方（有时又再失去），在所控制的“解放区”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亚伊策会议时，“解放区”已包括从斯洛文尼亚、伊斯的利亚到新帕扎尔州的阿尔卑斯和狄那里克高地的大部分地方。1944年中，游击队大概已拥有三十五万人以上的兵力。

这些胜利的基础，一方面是由于铁托及其党内同志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英明的战略战术以及他们所抱有的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国内对手不断地犯错误，那些对手一开始就各有不同甚至矛盾的动机和目标，因而只能号召一部分人。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可以说明游击队为什么士气旺盛，迅速成长，从而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也能说明他们的对手为什么士气低落，日益削弱，终致孤立而不得不依赖注定要失败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占领者。

游击队除了军事才能外，还有三个比较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具有一个比较好和比较有纪律的组织系统，把严密有

序的各级领导环节同留有余地和灵活发挥地方的主动积极性结合了起来。所以能有这样一种结构，那是由一些可靠的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人也是党的领导核心。他们受过在这种上下关系的环境中工作的训练，一般来说彼此熟识，互相信任，通常还都有忠于领袖的个人纽带——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由领袖选拔出来的。虽然当时游击队还没有军队，但根据 1941 年 6 月的决定把党的中央机关改为最高司令部，并把这些干部分散到全国各条比较混乱的游击战线上去，信任他们各自的行动和决定能符合司令部的战略并促进其实现。其次，游击队明确了敌人就是所有占领者和同游击队作战的南斯拉夫人，而且不顾敌人对老百姓的报复，始终执行到处不断打击敌人的决定（虽然不象后来说的那么神：游击队始终寸步不让地战斗）。第三是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标以“兄弟关系和团结统一”的口号，许以建立联邦国家的保证，并表现于国家领导将由所有各族南斯拉夫人所组成。

这最后一点，也是三点中最重要的一点，使游击队成为唯一能动员全国各民族人民的组织。然而，“兄弟关系和团结统一”这样的号召还是需要解释的。因为旧的“南斯拉夫理想”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惨痛经验中显然已经破灭了，留下来的只是劣迹昭彰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冒牌货。正是战争本身逐渐复活了这种理想，而这个理想现在是以保证在联邦组织中的民族平等和自主的形式出现的。分裂导致外国统治和国内种族战争这种可怕的兄弟残杀。我们不妨借用大西洋彼岸早期革命的一个口号的说法来总结这个教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如果不团结一致，结果必彼此残杀。随着战争的

不断发展，愿意为建立一个具有新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而战的人，在各民族中也日益增多。游击队的共产主义领导者部分出于权谋，部分由于深刻的信念，向人民宣传民族团结和以联邦制度、平等和彼此谅解为基础的新体制。这是一种希望的信息，是南斯拉夫三位一体战争中其他任何政党所没有发出过的信息。

这样，游击队就在士气上和政治上得到了武装。由于1943年9月缴获大量意大利武器和以后的几个月里得到了西方更多的军事援助，所以游击队在军事意义上也确实得到了更好的武装。因此，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自认可以向所有国内对手挑战，进行最后摊牌了。作出这种挑战，包括进一步向同盟的大国挑战，要求承认他们军事上以至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就是亚伊策会议的要旨和目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能起这样的作用的确很不简单。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由于臭名昭著的宗派活动和大多数领导者的软弱无力，使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深感失望，而且也成了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警察极易攻击的目标。三十年代初，党员数目下降到五百人左右，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和大多数党员都长期处于流亡之中，同国内的发展脱离了接触。即使1935年后由于反法西斯情绪高涨而使党成为团结人民的中心，党员的发展也很缓慢，到1937年只有一千五百人。1932年以来当总书记的戈尔基奇，在1937年7月从巴黎被召到莫斯科，以后就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消失了。这次大清洗还涉及共产国际和流亡党有关机构中的其他一百名南斯拉夫党员。此后十五个月都没有指定新书记。1938年，情报局显然考虑过解散南共，就象同年解散波兰共产党一样。只是由于莫斯科长期犹

豫不决和意见不一，才决定批准约瑟普·布罗兹当总书记。他在 1936 年曾被指定为组织书记，第二年夏天戈尔基奇被清洗以后他一直是党的领袖。人们一般只知道他的党内化名，如“瓦尔特”、“铁托”。尽管在共产国际眼里他还有很多缺点，但他所以被指定为总书记，不仅是由于他没有卷入过去的宗派活动，为人谨慎小心，忠实可靠，而且是由于他可靠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出身，因为当时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内的知识分子是极端不信任的。另外，也由于他在当组织书记时所表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才干。

铁托最初接触布尔什维主义，是在俄国作一名奥匈帝国来的战俘的时候，那时正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后来的国内战争时期。他回故乡克罗地亚以后不久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起初在那里当机工，并作为党的工作者鼓动组织工会。由于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从 1928 年底到 1934 年 3 月坐了五年多牢。出狱后萨格勒布的党组织把他送往国外，起初只是准备同流亡中的党的领导机关接上关系。他能在较高级的领导者中引起重视，只是因为他既有干劲，又很热诚，而且愿意承担重新组织和恢复在国内处于非法地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一危险的任务。当时大多数党的领导者是不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他被指定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担任组织书记后，于 1936 年 10 月被派往巴黎作输送南斯拉夫志愿军参加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的组织工作。但他设法把 1937 年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国内进行他自己认为应该完成的基本任务。在此期间，他亲自选择了一些人，这些人后来组成了他的政治局和扩大的核心集团。他们除去在战争中牺牲的以外，其余的在战后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有卡德尔，他是斯洛文尼亚的教员，父

亲是个看门的；德热拉斯，一个门的内哥罗的激进的年轻人，贝尔格莱德大学中的共产主义鼓动家；兰科维奇，农民出身，是一个裁缝的学徒，来自塞尔维亚中心地带舒马迪亚。当时铁托建立或重新接上关系的还有：斯洛文尼亚人基德里奇、集海尔、马林科，克罗地亚的巴卡里奇和塞尔维亚的伊凡-洛拉·里巴尔。里巴尔是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作为恢复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候选人介绍给铁托的。他在1943年被杀，受到铁托宠信和可能作为继承者的锦绣前程也就此了结。皮雅杰是铁托的朋友，也是他在狱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后来又是战后最早的政治局中唯一的犹太人，当时还在监狱里。在这个将来的核心集团中，只有铁托、卡德尔和门的内哥罗的弗拉霍维奇曾去过苏联。弗拉霍维奇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一条腿后来去莫斯科的，在那里，他担任战时南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

铁托、德热拉斯、卡德尔、兰科维奇和莱斯科舍克(另一个斯洛文尼亚人，直到1964年退休，他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一直是个不显眼的角色)以及两个后来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昆查尔，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米卢廷诺维奇，门的内哥罗人)组成新的政治局，并提请秘密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会议审批。这次代表会议是1940年10月在萨格勒布市郊召开的。会议毅然在王国政府警察的鼻子底下举行，表明了党的恢复以及新领导的产生。这时党员人数比1937年增加了三倍，达到六千四百五十五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一万七千八百人，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政治运动中占优势。1941年7月宣布起义抗击法西斯时，党员数字是八千到一万二千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为三万人。这两个机构的干部被派去充实人

民解放军，成为部队政治和战斗的核心。他们中还包括三百多个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具有极为宝贵的军事经验；其中有一个叫K·波波维奇的，是贝尔格莱德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以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他指挥游击队最引以为荣的一支部队——第一无产阶级师。1941年春的党员，在战后幸存的只有三千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都来自这“41俱乐部”，这个政权后来虽有新人参加，但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达二十多年之久。

从1937年以来，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所以依然能得到适当的发展，新领导的干劲、士气和组织能力只是部分原因。南斯拉夫很多青年人参加组织或者成为“同路人”，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坚决而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政党，也是目前唯一赞成统一的南斯拉夫而不搞什么大塞尔维亚冒牌货的政党。这样一种参加革命的动力，当然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认真学习和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正是这种动力在1948年以后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此外，入党的原因以及作为一个党员所承担的义务和需冒的风险，都表明为什么南共虽然党员还很少，但却奇特地包括了一大批极有才干、在政治和种族上目标明确、大胆而且通常比较激进的青年人。这无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极为重要的。

当时，这些就是共产党人带给游击队运动的力量和潜在的有利条件。但游击队所以能取得胜利也是由于其国内对手的错误，这些错误大大地增强了游击队相对的有利条件。在游击队的对手中，象乌斯塔沙这样的组织可以不当一回事。他们由于一开始就狂热地宣布自己同这次广泛的世界大战中

将要失败的一方的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所以是注定要垮台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有希望取胜的对手是切特尼克，他们指靠着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此人系战前王国政府军队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米哈伊洛维奇及其伙伴事实上是1941年4月王国政府倒台后最早起来继续抗击德寇和意军的南斯拉夫人。起初，他们是一小群拒绝投降、逃进山里的政府军的官兵，后来则有意识地仿效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的古老传统。当年的“切特尼克”是一支非正规的军队，曾不断袭击早先侵入他们国家的土耳其掠夺者。此刻，类似的游击战士的队伍也自发地在全国涌现出来。在南共根据德国入侵苏联时共产国际所发出的命令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战斗以前，那些小股分散的游击队伍往往不能互相配合地打击占领者。几个月以来，这两个抵抗运动之间尽管发生过个别的冲突，但通过零星的协作，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当时，英国和苏联迫切希望促成整个欧洲占领区抵抗运动的统一战线。因此在英、苏的敦促之下，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于1941年9月和10月两次会晤。在10月份的会上，铁托提出他的军队在军事上可由米哈伊洛维奇指挥，但坚持必须保留原编制和政治结构。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这两个抵抗运动之间的斗争不久就超过了对共同敌人的战斗。

切特尼克实质上是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反轴心国的抵抗力量。它热望重建旧南斯拉夫，但又要以更严格的塞尔维亚统治来防止1941年克罗地亚“背叛”的重演。因此，他们几乎是一种排外的塞尔维亚组织。他们的领导，包括米哈伊洛维奇在内，很快就发觉：从长远来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他们的南斯拉夫概念的威胁，要比占领者的威胁大得多。他

们并且认为：如果过早过多地激怒德国人，德国人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就会威胁塞尔维亚民族的生存。因而切特尼克对占领者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他们总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且决定在同占领者作战的同时摧毁游击队。这第一种政策使他们脱离反轴心国的火线，第二种政策则使他们同占领者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两种政策加在一起就象一个滑坡使得切特尼克一点一点地逐渐滑下去，几乎总带些勉强地先成为意大利人、后成为德国人打击游击队的实际合作者。

切特尼克采取这种方针，说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理解是错误的；尽管最初的动机是无懈可击的，但给他们事业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当时他们这种消极态度受到大多数切望战乱平息和个人安全的塞尔维亚人的欢迎，却挫伤了切特尼克部队的士气，而且也阻碍了队伍的发展。因为这种态度对那些希望参军打击外国侵略者的人，其中包括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塞尔维亚人，没有吸引力。这种人不难理解地仇恨侵略者，宁可同他们决一死战，而不愿坐以待毙。由于切特尼克同轴心国合作，就慢慢地失去了国内的支持；当国外知道以后，又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种族观念：公然宣布的反克罗地亚主义以及恢复旧南斯拉夫的目标。旧南斯拉夫不仅是塞尔维亚统治，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毫无成绩。它只能号召数量上微不足道的非塞尔维亚人，不能号召那些觉悟起来期望改变现状和主张社会改革的人，而这种变革的愿望通常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一种副作用。

南斯拉夫国内所有其他非共产党领导但本质上也是反轴心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基本上都有上述同样的缺点，遇到了

同样的困难。这些社会势力如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的民粹党人；如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梦想变成了披着乌斯塔沙这块兽皮的恶梦时，一个个都被弄得思想混乱，不知所措；还有某些其他党派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他们战前曾经既反对王室独裁也反对轴心国，因此有可能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要求合法的地位和人民的支持。但是，他们全都是自己历史的奴隶，没有提出一个能越过他们各自的种族界限的号召，所奉行的纲领不是企图永远维持南斯拉夫的分裂，就是保证新国家将同旧国家一样；他们也都没有能摆脱种族间的争端，而这种争端对今天面临互相残杀的人们来说意义已经不同了。

在国内战争中，特别是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多元而全面展开的内战中，多数人可能都非常愿意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他们又感到不站一边是越来越困难了。在1943—1944年冬这个时期，站一边就是站在以下三派中的一派：第一派由于与撤退中的占领者共命运而受到了致命的伤害；第二派是想复辟旧南斯拉夫而且也受到连累的切特尼克；第三派是游击队，它是盟国的伙伴，也是一个新的、联邦制的、但显然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南斯拉夫的倡导者。个人、家庭和团体为了保险起见，曾经采取多方接触或各派都参加的态度。如门的内哥罗的部族同游击队和切特尼克的人都有联系；再如塞尔维亚奈迪奇的一些部队、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左翼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民粹党也都是这样。不过，他们逐渐都在探求作出越来越明确的选择，并对各派寄予不同程度的信任。至少大多数人都能模糊地感到：能否站准一边，其结果对个人或团体是多么严重。它不仅关系到战后

短期的浮沉，是分享富贵还是身陷囹圄，而且影响到更为深远的将来。二十五年之后，人们还能很容易地区别出哪些是游击队的、哪些是切特尼克或乌斯塔沙的城镇和村庄；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这些地区，甚至农民个人的家园也判然分明。如果你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也总是有人会热心地给你指出来。战利品、后代的特权以及地方特惠当然理应属于胜利者。

当时，游击队继续从亚伊策向贝尔格莱德推进。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除去更为频繁的战斗外，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与亚伊策会议同一个星期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正式承认游击队是一支盟军；英国最后地抛弃了切特尼克；1944年2月，苏联继英美之后也派遣代表团常驻铁托的司令部；同年5月，铁托在德瓦尔的司令部遭到德军伞兵的袭击和俯冲轰炸，他幸免于难。这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王国流亡政府，是丘吉尔迫使国王及其顾问们建立的，由舒巴希奇（南斯拉夫王国第一个克罗地亚人首相）领导，并准备承认铁托和进行接触。新流亡政府建立之后，铁托同丘吉尔于1944年8月在那不勒斯会谈，9月又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同斯大林会谈是准备由游击队和红军采取联合行动解放塞尔维亚，这个联合作战行动以10月20日攻克贝尔格莱德告终。只是到了进攻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游击队才重新控制了摩拉瓦河流域及其支流一带的地区。1941年，游击队的最高司令部正是从这里首先发难，但从11月铁托被逐出乌日策以后，这一带大规模的游击队活动曾使人不安地显著沉寂下来。然而这时，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已迅速瓦解了。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再次会

暗，迫使铁托和舒巴希奇执行和扩大去年夏天的协议，于是3月7日一个新的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铁托是最后一届王国政府的总理和国防部长，并接受了舒巴希奇和另两个原流亡政府的成员进入内阁。南斯拉夫自亚伊策以后第一次又复有了自己的唯一的政府。游击队政权得到了国际上的合法地位，这点铁托在十五个月以来一直是极为关心的。1945年8月，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扩大了代表的范围，把战前最后一届议会的六十八名未“与敌人合作而名誉受损”的议员也包括了进去，但这只是铁托有限的妥协。他的政府在当时仍然是王国政府，是经游击队同意以国王名义任命了一个三人摄政小组而正式建立的。然而，国民议会在1945年11月29日经仔细安排召集会议，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宣布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人民共和国。三个非共产党的部长早已辞职，那是为了抗议不让他们参与重大决策。所有不包括在共产党控制的人民阵线（这是人民解放阵线在和平时期的形式）内的战前的党派，都以不可能自由竞选为理由抵制国民议会的选举。南斯拉夫七百四十万人参加选举，百分之九十的人投票赞同人民阵线所提出的那份唯一的候选人名单。

塞顿-沃森曾阐述东欧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个阶段，南共完全跳过了所谓“真联合”的第一阶段，对所谓“假联合”的第二阶段也是敷衍了事，不过是为了争取国际承认和正式的合法地位。由于消灭或削弱了人民阵线内部合法的反对派，以及在新的联邦议会中暂时容纳了几个新的非共产党代表，南斯拉夫终于完全属于游击队。他们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非同寻常的努力。

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义

从新政权自己的眼光来看，它之所以合法有四个根据，其中三个根据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承认的。第一，战争结束以前权力已几乎全部落在共产党手中，并且战后第二年政治上已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第二，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并且是旧政权的因而也就是旧南斯拉夫王国的合法的继续，这是通过对盟国和流亡政府的一些微小而短暂的妥协取得的。第三，对整整一代人来说，新政权所以深入人心和受到人民欢迎，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游击队的战斗。它是政治基础的化身，也是两种团结的化身：一种是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他们曾团结起来打击敌人，重建共同的国家；一种是游击队老战士的团结，他们都参加了实际的战斗。第四，这点只与共产主义者有关，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所赋予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身上，它将加速实现历史固有辩证法下一次的、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变革。这个历史使命还具有一个深孚众望的因素，因为其中包括保证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对“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定义的发展，以便适用于不发达的国家。

这些合法性的第三个和第一个根据——因为这种根据是以南斯拉夫党和军队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苏联的力量和红军的胜利为基础的——使南斯拉夫新政权在战后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中处于独特的地位。同样独特的情况是，南共在战争结束时的十四万一千零六十六名党员，就象游击队的大多数队员一样，大部分是农民，而且不到三十岁，因

为几乎全部党员都是从游击队里吸收的。同样重要的还有，领导者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独特之处，意识到他们领导手无寸铁、没有文化的农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终于创建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伟大功绩。这种意识使大多还只有三十来岁的领导核心的成员变得鲁莽、傲慢，盲目自信，他们不顾国家对他们将要作的事情还显然毫无准备，也看不到自己除了密谋策划、搞组织和进行战争以外，对国家管理、经济和其他各方面几乎一窍不通。虽然很矛盾，这种情况也使他们对指出他们可能并不象自己所想象的那么与众不同的任何看法都神经过敏。

一个政权自认合法的根据如何强化这个政权并为它规定任务，关键在于合法性的性质。如果这些根据具有法治精神的话，那末举例来说，一个政府过于经常和公开地违背自己制订的法律，它就会在民众的重要阶层和自己的官员中丧失其合法性。就南斯拉夫来说，它的合法性的体现方式和领导人的个性为新政权规定了四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第一是独立性。这是绝大多数领导者在1948年以后才明显地意识到的，即尽管南斯拉夫在当时的冷战中无论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很容易遭到攻击的边缘地位，但这个政权有决定南斯拉夫走自己道路的权利，而不管这条道路正确与否。第二是“兄弟关系和团结统一”。这要把具有不同经历和传统而又经常敌对的民族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第三是现代化。即把一个基本上依靠农业为生的古老社会改造成一个具有发达的工业和文化的社会。第四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以及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这是新政权完成其他一切任务的方式。南斯拉夫人民将以这种方式，通过社会

主义民主而进入共产主义。

新的统治者被这样武装起来并被赋予这样的历史重任，于是他们面临着一系列更直接而必然会产生问题：实施并推行他们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案；养活人民，恢复经济活力和医治战争创伤；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由国家控制的指令式的经济结构和形态，以便通过对人力、自然资源和财政采取强制使用和中央控制的方式高速实现工业化。除这些以外，还有两件附带而又必须立即解决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战后的意大利政权对亚伊策会议上公布并入南斯拉夫的西部边界提出异议，而西方盟国则对的里雅斯特地区提出异议。第二件事是，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或可能存在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社会改造方案。

这后一件事是很容易完成的，因为所有的对手在政治上都已被摧毁、瓦解和削弱了。这首先是由于四年的战争进程，其次是由于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的性质和彻底性，以致这些对手已根本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抗。这方面干得坚决彻底、冷酷残暴。这是出于战争中所积聚起来的怨恨以及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所造成的结果，当然也是出于一种真正的担心：唯恐反对派因西方反共军事力量的暗中支持或公开干涉而东山再起并重新组织起来。于是就开展了政治运动，攻击和逮捕那些仍被假定起着独立政治作用的非共产党政治家；攻击和逮捕“通敌叛国分子”，其中有真正同敌人勾结的，也有新政权想没收他们财产或希望他们沉默的那种人；还攻击和逮捕“帝国主义代理人”，这一类人的定义同前一类人一样，也很不具体。上述这三种人中有很数量的一批人（具体多少尚有争议），常常只经军事法庭戏剧性的审判后

就被处决，成千上万人被监禁或送进劳改营。铁托曾谨慎地向南斯拉夫教会递过橄榄枝，被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及其主教即萨格勒布的斯特皮纳茨大主教拒绝，他觉得铁托是口蜜腹剑。这样，对罗马天主教的（也包括少量反对新秩序的正教的和穆斯林的）神职人员的零星的攻击和逮捕，便发展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1946年10月，斯特皮纳茨大主教本人也因战时在克罗地亚地区同乌斯塔沙政权合作而受到审判，被判十六年徒刑。

这一切都是由保安部门领导着干的。南斯拉夫的保安部门，1944年由兰科维奇所组织，称“人民保卫部”，后来改名为“国家保安部”。它的任务，正如铁托所规定的，是“让那些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南斯拉夫的人吓得发抖！”他们也确实按照铁托所说的做了。1951年，在一系列“严守法纪”的运动开始时，兰科维奇自己承认在过去一年里（当时主要打击对象早已变为“情报局分子”，对其他人和缓了），百分之四十七的逮捕是“无理的”，百分之二十三的人罪行“无关重要”。他说整个司法系统是有罪的，他们“把一般罪行当作政治犯罪”，不分青红皂白错误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①

1945年5、6月间在西部边境与英美就的里雅斯特问题发生的争端，是新南斯拉夫第一次同西方盟国发生严重冲突。从上一年9月以来，南斯拉夫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已日趋冷淡，而在后来的三年中，关系更趋恶化。南斯拉夫比从威尼斯东进的新西兰部队抢先一日解放的里雅斯特，实际上当地的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抵抗运动已在竞先解放这个城市。后来事态越来越紧张，僵局持续四十五天，以致英美发出了最后通

^① 《共产主义者周报》，1951年第2期。

牒，南斯拉夫终于从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半岛顶端的普拉和索查河谷往北撤退。他们继续占领着所要求的其余地区，一直到1947年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得到承认为止。但弗留利东部的一些地区和不幸的的里雅斯特自由区未划归南斯拉夫，尽管他们一直控制着这些地方，但未能正式占领伊斯的利亚西北角的“B区”。这次冲突基于那种政治和领土问题所固有的重要性，使南斯拉夫在1954年伦敦协定之前（之后有时也）同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此外还影响到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是自作主张想抗拒英国和美国的，这是他们独立采取鲁莽行动而惹怒苏联的又一个例子。因为苏联怕西方认为：南斯拉夫提出的对的里雅斯特所有权的的要求和进行武力威胁是苏联出的主意，是苏联对西方作何反应的一种试探。苏联的忧虑是对的，西方的确认为的里雅斯特问题是日益发展的冷战中的第一次军事对抗。同时，在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眼中，苏联对南斯拉夫立场的支持是很不积极的。这也是一个坏兆头，加深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所谓大国势力范围和“利益均沾”的怀疑。

民族问题是南斯拉夫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其中只有一些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纯就效果来说，这只是战后南斯拉夫“在矛盾中统一”的许多事中的第一例。“在矛盾中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极为重视的道理，但它有时在巴尔干的实践中倒也差强人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使相互对立的各方联合起来，多年来成功地抑制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联邦制是南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正式办法。1937年自治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组织和后来塞尔维亚、科索沃

和其他地区的省或地方党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其预兆。战时“解放阵线”的组织机构和亚伊策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此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经1946年1月31日国民议会批准通过，在联邦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是以苏联1936年的宪法为蓝本），根据亚伊策会议的决议正式确定建立六个共和国的国体。同时在最大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建立一个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以及一个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一般简称科斯梅特。建立这些低一级的单位，表明承认潘诺尼亚平原东南角有少数“发达的”马扎儿人杂居和聚居的情况，承认“古塞尔维亚”“不发达”的阿尔巴尼亚族在数量上的优势。这两个自治单位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尽管这点不是尽人皆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建立一个包括巴奇卡、南斯拉夫巴纳特和锡尔米亚在内的自治的伏伊伏丁那，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塞尔维亚对所有这些地区提出了要求，理由是这些地区的居民中部分或大部分都是塞尔维亚人，而克罗地亚又以历史和种族为理由，对锡尔米亚提出要求。共产党内部的争论导致了这一妥协，当然在报刊上只是模模糊糊透露一点。^①但这却提醒人们，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反映到谅必受过国际主义教育的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拿科斯梅特来说，这个建立在塞尔维亚内的自治区，有朝一日很可能成为一个扩大了联邦（包括现在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另一个共和国的核心。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胡思乱想。霍查领导的新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政权产生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这是南斯拉夫秘密派人帮助组织

^① 引自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纽约，1968年版），第117页，还有有关各共和国建立时期所发生的一些很少为人所知的领土争议。

的。所以从很多方面看，阿尔巴尼亚政权早就依附于贝尔格莱德了。

新南斯拉夫宪法同苏联蓝本的一个不同点是：赋予六个共和国比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稍大的财政权，现在看起来虽不重要，但将来总有一日会导致邦联制。南斯拉夫象苏联一样，在中央各部中包括联邦部和联邦一共和国部。一直到1948年，各共和国还有自己的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最高层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8年党代大会以前，由1940年萨格勒布代表会议的二十六个幸存者和战时指定的新成员组成。这是一个经仔细安排然而不考虑比例的南方斯拉夫各民族（但不包括少数民族）代表的混合物。联邦政府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国家和党实际都是中央集权和等级森严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部分是由宪法批准的。宪法一方面规定各共和国可以独立自主地占有国家集中以外的一切权力，但另一方面却把绝大多数重要的权力授予联邦政府。两院制的联邦议会中，虽然有一个院是由来自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代表组成的，但最重要的立法和执行权仍为议会主席团和政府所掌握。在关键性的党内，主要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途径不太正式地将权力集中起来的。

此外，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门的内哥罗人和塞尔维亚人按其总人口来说，其代表数是超过比例的。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权是建立于游击队运动和党的基础上的，而在这两种组织内，门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同样在比例上占多数。上述情况部分原因是由于门的内哥罗是一个传统上出战士的民族，而塞尔维亚人如果不愿坐以待毙而起来战斗时，除了参加游击队是无处可

去的；另一部分原因只是因为直到战争后期，游击队的作战和招募新兵都集中在狄那里克高地，而狄那里克高地的绝大多数居民则是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穆斯林。由于基本上同样的原因，这些民族在部队的军官团和保安警察（包括人民保卫部和后来的国家保安部）中也占优势。^①因此，这本质上代表了高地人对低地人的统治。同时，这种代表比例不均的种族内容，在实际上或人民的信念中，构成了一种可能恢复“大塞尔维亚”统治的潜在因素。

最后，既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有其实际重要性的情况是：在人民的意识中与旧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依旧作为这个新联邦国家的首都。一些党的领导人对这种选择所引起的麻烦非常敏感，所以提议把萨拉热窝定为首都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它在地理上接近全国中心，在种族上则处于中立的波斯尼亚境内。但结果还是传统胜利了。人们认识到不能超过已采取的措施更进一步地压塞尔维亚人，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萨拉热窝在地理上比较孤立，并缺乏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

在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国家保安部中，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占优势，这在今后会产生很多问题。然而，由于各共和国和全南斯拉夫统治机构正式建立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心理上的影响，再加上在残酷的国内战争后人民对种族国家制度态度的急速变化，暂时缓和了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些影响还起不了作用的地方，执行自

^① 党政军警各部门成员种族上的不均衡现象，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存在着。因为吸收青年干部时，一方面考虑“老熟人关系”，偏向朋友、亲戚和同乡中的年青人；一方面由于南斯拉夫象其他社会一样，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工作无门，发迹机会很少，因而愿意把较多的子女送到行政部门或军队中去。

己的原则和宣言的新政权对其认为不属可接受的“民族感情”而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则加以残酷镇压。与此同时，这个多民族政权不分种族普遍地进行的折磨、监禁、国有化、强迫劳动、强制农民上缴产品以及其他各种压迫措施，使那些身受其害的人的精神集中在各自的痛苦境遇上，从而至少暂时忘掉了民族的问题。因此在一个阶段里，使得国外的观察家和很多南斯拉夫人都认为，民族问题真正解决了。

这个政权还有另一些当务之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把破坏了的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建立一种斯大林式的有计划地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结构。这些工作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进行的，因为这些充满热情和信心的新领导不愿意浪费时间按顺序来完成这些任务。

南斯拉夫在 1941—1945 年间的大屠杀中死亡一百七十七万人，占战前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它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比例仅次于波兰。受打击特别严重的是生产上正当年的人，以及有技术、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二岁，其中大概包括九万熟练工人和四万“知识分子”。约八十二万二千幢房屋被毁，三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估计损失了战前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业，二十八万九千所农民住宅，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的各类牲畜，还有百分之八十的犁和收割工具被毁坏得无法使用或已丢失。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铁路，百分之七十的机车和百分之八十四的货车都被破坏了。1945 年和 1946 年所以能避免了大饥荒，主要是由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最初恢复的工厂和铁路靠的是大都没有技术的志愿劳动者和强迫劳动者，以及战败国赔偿的现金和设备。但到 1946 年底，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已恢复使用，工业生产指标

达到低水平的 1939 年的百分之七十九。1947 年，按官方统计工业生产量已达 1939 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六，农业生产恢复到 1939 年的水平。这些成就正如后来南斯拉夫官员所宣称的那样，在战后恢复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记录，因而起了增强新政权自信心的作用。

战前，南斯拉夫绝大部分工厂和矿山，大部分商业和银行均为外国资本所有；到战争结束时又全落到德国人手里，包括原来就归德国所有和战时没收或购得的。大部分余下的工矿企业为南斯拉夫人所有，这些人绝大多数可以程度不同地被控为战时“通敌”，只因为他们的工厂当时继续生产，供应占领者。根据 1944 年 11 月公布的法令，这两类财产一律应予没收，并普遍执行了。结果，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工业、许多银行以及整个批发业，在第一次国有化法令公布以前事实上已经国有化了。第一个国有化法令是 1946 年 12 月通过的，包括“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银行业务和批发商业。第二个国有化法令是 1948 年 4 月颁布的，涉及余下的工业、零售商业、保险公司和文化保健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对一些早已采取的措施事后加以合法化罢了。因为“所有对联邦或各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百分之七十的地方工业……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以及百分之九十的零售商业”早在 1947 年年中即已掌握在国家手中。

随着生产达到战前水平以及除农业以外整个经济的国有化，新政权准备按苏联电气化和工业化的老套子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了。

早在 1946 年初，就已作出决定：要按照苏联的方式，通过五年计划全面而高速地实现工业化。但在领导集团内，遭到

好争论的赫布朗的反对。他曾因“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战争后期被免去克罗地亚地区党的书记的职务，但由于出色的行政才干，又被委任为工业部长以及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如果不先通过集体化和机械化解决农业生产问题，速成的工业化肯定是冒险的，至少是不成熟的。他的意见得到财政部长(后为交通部长)茹约维奇的支持。赫布朗的意见被压下去了。他被逐出政治局，并撤去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工业部长的职务，但保留了计委主席和中央委员的身分。他被免除的职务的继承者是基德里奇，此人极有才干，但缺乏经济方面的实际经验，因此在起草南斯拉夫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被送往莫斯科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南斯拉夫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47年4月正式公布。基德里奇一直保持着他作为南斯拉夫经济政策主要设计人的地位，直到1953年过早地去世。

基德里奇的计划雄心勃勃甚至异想天开，因而遭到南斯拉夫一些领导人(显然又会包括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以及苏联顾问的批评。这个计划以1939年水平为基础，提出工业总产量增长五倍，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发电量增长四倍，并要求生产大量过去从未生产过的尖端产品。五年计划的投资要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七。^①根据苏联的先例，这个计划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象钢铁这样的基础工业、大工厂、水力和热力电站等一些初始投资大而建设期长的项目上。该计划还把大量拟建的新厂安排在不太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安

^① 《五年计划法》(1947)。社会主义国家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方法以及本文使用这个术语时，都不包括“非生产性”的保健事业、行政活动和很多服务行业。因此同西方的计算方法相比，社会主义国家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要低百分之十。

排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这样，就既接受了苏联在经济上合理布局的理论，也可开始实现游击队关于各地区繁荣机会均等的诺言，并能为边远地区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地区曾为游击队和新政权提供了大量人力。计划是如此雄心勃勃，德热拉斯曾认为十年之内就能使南斯拉夫的商品生产按人口计算赶上英国，这突出地说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过于天真和“沉醉于伟大的理想和目标”。计划的完成光凭热情和新政权自夸的群众支持的“义务劳动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庞大而实行集权制的机构，以便在生产少投资多、无法提供物质刺激而热情衰退时，加强计划、控制和采取强制性措施。

同时，政治局决定在农业战线上继续放慢速度，这是与赫布朗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第二点。1945年的土地改革限制个人占有可耕地不得超过三十五至四十五公顷，但1918年后在原匈牙利人所占地区中进行了改革以后，占有多于上述数字的土地的人不多。1945年土改后国家所得土地总数，包括没收逃亡或逐出的德裔居民的土地在内，才一百五十万公顷多一点。大约半数分给无地农民，主要是分给那些从狄那里克高地迁往伏伊伏丁那德裔居民遗弃的村庄的游击队老战士。剩余部分则归入国营农场和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南斯拉夫相当于苏联集体农庄的组织。这些组织又可分为四类，只有第四类也就是最高级的那类，才相当于真正的集体农庄。此外，土地甚至还没有正式国有化；到1948年整个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只占全国可耕地的百分之六点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考虑到他们的革命最初是农民发起的，而且一半以上的党员出身于农民，因此在土地问题上只能这样做。他们在

与斯大林的通信中,如实反映了这个问题,从而导致了1948年的破裂。而过了不久他们又暂时忘记了这个教训。当时,南斯拉夫大多数农民忍受但也抵制了强迫他们以固定的低价将部分劳动果实交售给新国家的这种做法。他们把剩余的农产品拿到匈牙利城市去高价出售,并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不公平的高额税收。一般来说,这些意味着退回到纯粹自耕自给的农业生产。

联邦、共和国和地方一级的政府进行了改组,以适应五年计划的需要,于是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更加接近其苏联蓝本,并成为单一、巨大而全国性的垄断托拉斯。用当代一位南斯拉夫学者比兰季奇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综合社会制度”,是一个“严密无缝的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或附属系统,建立在包罗一切的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国家所有制垄断一切生产资料以及按其命令生产资料发挥作用而取得的一切成果”。统辖这个整体的那些人,也就是主持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那些人,犹如神秘地藏身于浓云之间,常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由于南共特别喜爱秘密活动,即使在行使权力上也是这样,因此在1948年“五大”选出新政治局以前,原政治局成员的名字从未公布过。直到今天,大家对南共战后第一批领导人的名单的看法尚不一致,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人连自己也弄不清他们当时参加会议算是固定成员还是特邀成员。

与斯大林破裂

写南斯拉夫问题的南斯拉夫人和外国人都象办理离婚手

续的律师，总想寻找南一苏从新婚第一天起就感情不和的证据。他们自 1948 年以来就把南一苏争论的起源追溯到两党过去的历史，或者至少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与南共之间的龃龉。这类研究，特别是他们极力探求战争年代南、苏双方互相厌恶的原因，不无用处。然而，就象大多数爱人之间的争吵一样，尽管互相厌恶的感情很可能是以后关系永远疙瘩的前兆，但只要彼此心不变情未移，并不至于离婚。南、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安定下来后，如果没有发生一些新的情况，也不至于破裂。1948 年以后公诸于世的那些战时的分歧和失望，至多只是 1948 年大破裂和南共被逐出情报局的一个背景情况。在南共领导集团的心头早就勉强压抑着一系列的猜疑和积怨，显然不可能长久忍耐下去；而克里姆林宫对南斯拉夫的讨厌和南共的不顺从也久已记录在案，一旦时机成熟就抛了出来。

战后南、苏矛盾的发展有三点，这三点使双方的领袖们都把眼睛盯住早些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危机，造成严重后果。从年代顺序说，第一点（在某些方面同其他两点有着因果关系）是南斯拉夫越来越强调自己革命的独特性，而苏联不同意，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彼此的态度包含着什么意思。第二点是铁托在国际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表明他希望成为在苏联这个宗主国保护下的东南欧的一个自主的总督，也许他要对越来越老而且疑心日重的莫斯科的素丹斯大林扮演一个穆罕默德·阿里的角色。第三点是斯大林决定将东欧人民民主制度一体化，建立一个在苏联牢固控制下的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集团。这个决定是 1947 年作出的，很可能事先并无计划，因为它既可能是对日益升级的冷战

的反应,也可能是斯大林的一种老年偏执性的反映,或者兼而有之。

破裂的过程和背景已成老生常谈。眼下我们要说的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涉及到的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或出于想象而产生的不满,以及双方日积月累而耿耿于怀的种种猜疑的根由。

例如,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对苏联在战争初期不给他们物质援助啧有怨言,这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但却说明了他们技术上的无知和对苏联力量的盲目信任。游击队抱怨还有更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苏联一再反对他们的不成熟的政治要求,反对他们对切特尼克和流亡政府的态度,甚至怕引起反感而反对游击队帽子上所缀的红星。铁托也抱怨斯大林背着南斯拉夫专横地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一次是在莫斯科同丘吉尔(这件事铁托战后才知道),一次是在雅尔塔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给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信以及其他有关证据中都清楚地记载着苏联越来越讨厌铁托,那是由于铁托一再故意违反他们的旨意和追求一些与苏联政策不符的政治目标。当时,苏联亟求避免欧洲占领区中抵抗运动的分裂,亟求避免由于显露出共产党人企图利用这次战争达到其革命目的而破坏盟国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当时以及后来都可能认为南斯拉夫决不只是自负和无礼的问题,因为铁托居然坚持以下原则:即欢迎红军帮助游击队解放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但一解放就必须立即撤离。1944年9月铁托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会晤时即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由于这次会晤是在铁托以独立的姿态在那不勒斯积极主动地同丘吉尔谈判之后,又恰恰是在丘吉尔提出西方和苏联战后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应该“对半开”之前,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性多疑的斯大林的

猜忌。

战后最初几年里苏、南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本来是正常而又可以预料到的，然而却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时或表明双方各自根据自身重大利益所制订的政策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而这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种不可设想的情况。这些情况中首先是铁托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政策，俄国人起先是在秘密交换意见时反对，后来又威胁要公开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冒同西方发生冲突的风险；再如铁托支持希腊共产党暴动的政策，这由于上述同样的理由使俄国人警觉起来。这些情况中也包括铁托到其他新的人民民主国家去访问，受到热情接待，一直发展到越来越明显地想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合并起来，甚至进行谈判想建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一些人则声言要组织一个巴尔干联邦或东欧邦联。斯大林自己虽然曾经发起过，或者说赞成过这类计划，但南斯拉夫人和季米特洛夫又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因为当时美国军事上占优势，并且从美国干涉希腊的情况来看是准备对东南欧进行干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慎重行事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领导者太缺乏经验，又狂妄自大，不能体会斯大林提出要谨慎小心的道理，就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对推进社会主义集团边界线是一种贡献，原指望得到斯大林的积极支持。南斯拉夫领导人还“发现”，苏联的种种做法往往很象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大国，而不象一个同志式的共产党国家。如稍后一个时期中，红军和苏联军事、技术顾问无形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作风，以及在建立苏—南联合股份公司（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早已建立）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还有

苏联采用安插代理人的方法企图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国家保安部和党政机关进行渗透。

这些不满和猜疑日益发展所不断造成的影响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在心理上的重要性要比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得多。至少就南斯拉夫方面来说是如此。铁托一直保持着根据他自己在苏联大清洗时期的亲身体会所形成的对苏联的看法和结论，但至少领导集团中有一些成员以及接近领导集团的其他一些人——年纪轻得多的人，往往是“真正的信徒”，考虑双方争论之点时特别“易于尝到理想境界破灭的苦果”——是由于卷入了 1948 年以前这样那样的事件，各自经过一个怀疑和丢掉幻想的阶段以后才觉悟过来的。比如韦莱比特是参加了建立苏—南联合股份公司的谈判才觉悟过来的。他所以敢于中止谈判，是因为发现这些条件完全是对作为同志的和独立的南斯拉夫进行无法容忍的残酷剥削。因此，他在斯大林两年后谴责南斯拉夫的信件中被特别指斥为“英国特务”。再如德热拉斯，他是在作为访苏代表团成员以后觉悟的。重要的是，虽然俄国人认为对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机构的渗透是正常的，并且假定铁托也是同意的，但是南共党内其他一些高级干部看来却是不满的。起初，他们只认为这是对他们忠于苏联的一种毫无根据的怀疑，后来才把这种渗透看成是对南斯拉夫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正常的和必要的，因而发现南斯拉夫反对和抵制这种渗透是不祥之兆。

1948 年大争论的基本问题极为简单。到底谁该是南斯拉夫的独裁者：铁托及其政治局还是斯大林。妨碍斯大林的是铁托和南斯拉夫政权的自主力量。其基础是东欧独一无二的、

南斯拉夫式的独立自主的做法和武装的共产主义革命及其成果：一个巨大的党和人民军队（这个军队一开始是以爱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是以社会主义口号建立起来的），以及南共取得权力和合法地位的独特根源，即作为政治基础的游击队的光辉业绩。

因此，1948年春加在南斯拉夫头上的一些不相干或不重要的罪状之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谴责他们极其荒唐而狂妄地吹嘘党和游击队军队在解放南斯拉夫和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按照苏联1948年5月4日信件的说法，南斯拉夫领导人极其放肆地自吹自擂，无视兄弟党的功劳，否认实际上是红军解放南斯拉夫的事实，因为德瓦尔事件以后是红军来挽救游击队的。

看来最有可能的是，南斯拉夫激怒俄国人的自吹自擂、双方在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的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开始不过是胜利后的一种欢欣鼓舞的表现，也是个人和国家为各自的军队所取得的出色成就而产生的不甘人下的自豪之情。但斯大林却立即抓住了这种自我夸耀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意义。于是南斯拉夫象铁托和德热拉斯这样的人就恍然大悟，也跟着他这种思想逻辑行事。如他们对1948年6月被逐出情报局的最初公开反应中，强调苏联对游击队的英雄主义横加污蔑，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样强调使人无法区分它是正当的义愤还是政治手段。但斯大林对于游击队的污蔑之词，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多么正确，实际上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给铁托提供了一个动员国内支持的武器，并给南斯拉夫领导者中愿意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人造成了困难。

这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很难捉摸的，以致几乎绝大

多数当事人和后来的分析者都没有注意到。南斯拉夫最初对“人民民主”的看法与1945—1946年东欧各国和苏联学术界人士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几年中，扬言“通过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是南斯拉夫，倒是其他东欧国家，因为当时这实际上也是苏联的路线。但是到1947年下半年，南共在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及其以游击队战争为根基的独立性，还有它后来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独特地位的看法上，逐渐同苏联新出现的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条路线企图从理论上阐明从外部强加于东欧其余各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合理的——这种可能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企图证明人民民主制度“一体化”是正确的，他们应该安于既成事实的卫星国地位。但是这条路线当时并未明确形成，所以就这个具体情况而言并不能谴责南斯拉夫没有紧跟。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越来越强调苏联和红军在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过程中所起的重大或决定作用，强调这些国家在没有完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缺点，言下之意这些国家必须依靠和附属于苏联，按照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办事。苏联这条路线的标志是1947年秋由苏联、东欧、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组成了共产党情报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创建者之中，除苏联以外，唯有南斯拉夫对这个新组织真正满怀热情，而且根据斯大林个人的建议把情报局的领导机关设在贝尔格莱德。但不出一年，就是这个情报局成了将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

1948年2月初，南斯拉夫第一次预感到他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严重危机。当时，斯大林突然召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其意图后来证明是在克

里姆林宫里进行一场恫吓。季米特洛夫亲自去了，但铁托显然预感到会有麻烦，就派卡德尔、巴卡里奇和德热拉斯去参加。德热拉斯因参加讨论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和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问题已先在莫斯科(与他一起的还有K·波波维奇和伏克曼诺维奇)。在会上，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尖锐地指责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所实行的政策“从党和国家的观点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并指责他们的外交政策上不同苏联协商。除开南斯拉夫最近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以外，莫洛托夫也被迫承认，这后一点与事实不符。但卡德尔在离开莫斯科以前还是被迫签署一项正式协议，同意今后在外交政策上事先同苏联协商。斯大林大发雷霆，主要原因有两点：一点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对泛巴尔干联邦过分积极，一点是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另一方面，斯大林显然反复无常，他自己就曾要求建立一个“直接的”南—保联邦，这点后来的研究者一直没作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几天以前，他也曾怂恿南斯拉夫去“并吞阿尔巴尼亚”而使严肃方正的德热拉斯大吃一惊，斯大林在提出这个建议时还比比划划，说得颇为形象生动。)迹象表明，这两点的后面还包含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季米特洛夫低声下气地承认犯了一些错误时，斯大林说：“你们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你们正在执行一条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路线。”①

当在震惊状态中还没有醒过来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仍在归国途中的时候，铁托的相片在罗马尼亚已被摘除，苏联驻地拉那代办还公开侮辱铁托。从此，事态急剧恶化。俄国人把重新签订苏—南贸易协定的谈判拖到12月，这个协定对南斯拉夫五年计划的完成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在这时，铁托于3月

1日召开中央委员会把争论提到会上讨论。这次中央委员会是第一次在铁托的面很窄的领导集团的范围以外讨论南—苏关系问题，也是1940年萨格勒布选举中央委员会以来所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表们拥护政治局拒绝苏联的要求，其中包括建立南—保联邦的要求。虽然代表们宣誓保守秘密，但苏联大使馆收到了一个详尽的报告，这显然是茹约维奇提供的，他于5月同赫布朗一起被开除出党并遭逮捕。3月18日南斯拉夫接到通知：所有苏联军事顾问和教练奉召回国，“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极不友好的气氛之中，并受到敌视”。民政方面的顾问和专家在第二天召回。3月20日铁托发出了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信件往来中的第一封信。后来，南斯拉夫公布了这个信件。

斯大林信中对南斯拉夫的许多具体指责是确凿无疑的：阻碍苏联在南斯拉夫内部安插代理人；阻碍在正式渠道以外向苏联代表提供情报；不实现土地国有化和不推行农业集体化而在其他一些领域里实行“极左”的政策；将党“掩藏”在人民阵线之后，继续使它象不合法的密谋组织那样进行活动；党内没有民主，一切决定皆由不公开的和不经选举而自行增补

①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伦敦，1962年版），第128—133页，第154—168页。书中承认，在贝尔格莱德和地拉那筹划南—保联合的事情是确实的。但南斯拉夫认为：斯大林怂恿“并吞阿尔巴尼亚”是一种挑拨；他坚持组成一个直接的南—保联邦，是尽力想把南斯拉夫同早已苏联化的保加利亚联合起来，以便对南斯拉夫的机构进行渗透。要不然，就是企图以这种直接联邦来造成南—保危机。前一年夏天，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曾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南斯拉夫坚持保加利亚只能组成南斯拉夫原有联邦中的第七个共和国，遂使谈判陷于停顿。保加利亚则不难理解地主张组成包括两个独立成员国的联邦。

的政治局作出；贬低苏联经验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重新训练人民军队的问题；不断吹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为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奠定基础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但这些指责一般来说是不相干的，大多轻率而伪善，当然这要除掉涉及根本问题的那几点：拒绝服从苏联的命令，拒绝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用来更直接和有效地传递命令和作为命令根据的情报，一味坚持南斯拉夫政权的独特性、合法性和自主的传统。南斯拉夫的回答一般是有克制而谨慎小心的，只是详细地否认每个新的指责，所以基本上也是没有击中要害的，顶多说敢于大胆拒绝和在某一点上敢于大胆否认罢了。南斯拉夫终于要作出拒绝向苏联屈服的关键性的回答，这种拒绝必然关系到这个政权的存亡。因此，这个回答被提交到4月12日—13日新召开的为期两天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并经中央委员会修正。在这封很长的复信中有一句话极为突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真理，也是南斯拉夫群众和党抵制斯大林压迫的积怨的一个集中反映：“不管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决不能因此不热爱自己的祖国”。^①

但是，虽然铁托知道有关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早已准备在4月初“说清楚两国关系发生冲突的真相”，他仍然正确地虑及包括中央委员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不了解情况和在俄国人压力下”会认真对待这些指责。当冲突的消息和苏联指责的某些细节扩散到党外时，很多人的反应是根据过去长期所灌输的假定作出的，他们认为斯大林不会错，所以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医治南斯拉夫的“毛病”。结果就匆忙地草拟了

^① 见《苏南论争集》，南斯拉夫1948年4月14日给苏联的信（由铁托和卡德尔签署）。

1948年4月发布的第二个国有化法律。戴迪耶尔在谈到这件事的后果时说：

这些措施是由各家旅馆、商人、小贩、酒店和咖啡馆来帮助完成的。一夜之间全部实行国有化！我在游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现在是一位高级干部，在他家乡舒马迪亚发表了一个演说，指责农民说：“全是你们这些富农使我们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我事后对他说：“我们可不能挖自己的墙脚。……”

在采取上述这类措施的同时，为了进行动员和表示对政府的支持，还采取了一个更大胆的行动，即由5月25日的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党代会。戴迪耶尔记述道：“这意味着接受斯大林的挑战”，因为斯大林指责南共藏头露尾和没有民主议事程序，暗示要在南共党内增加“健全分子”以便撤换原先的领导。

这时南共与斯大林的冲突按着既定方向发展。中央委员会在铁托4月14日的信稿中增加了一个内容，即邀请苏共派代表来看看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以向他们证明过去有关南斯拉夫的种种传闻都是错误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回信中进行了新的指责，说南共在党内实行“军国主义”，还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托洛茨基，并拒绝南共的邀请，扬言南共的问题要由情报局来处理。事实上，他们早已把前一封信的副本发给情报局的各有关党组织。于是，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情报局的会议。铁托和卡德尔在代表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说，他们并不是想“逃避批判”，而是“感到这个问题的处理太不公平，因而我们无法同意由情报局裁决”。他们也断然拒绝苏联

派人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审判的要求，这种要求使皮雅杰想起1914年7月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情报局在南斯拉夫缺席的情况下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与会各党一致谴责南共，并宣布由于南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已使它自己“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重复了苏联所列举的罪状，并增加了新内容，指责最近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措施是“左倾的”、“冒险的”、“笼络人心的”和“无法实现的”。它号召南共党员中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健全分子”迫使领导改正错误，如果他们拒不悔改，就“撤换他们，并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南共存在和发展的利害关系，要求结束这个政权”。

动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颗炸弹终于爆炸了。这天是1948年6月28日宪法节。在这一天，南方斯拉夫人民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可怕的重大事件。如1389年这一天发生了科索沃画眉坪之战，^①开始了奥斯曼帝国五个世纪的统治；1914年这一天斐迪南大公被暗杀，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个月以后，由五月份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的党代大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这是南共自1928年在德累斯顿召开“四大”以后第一次用这个名义开会。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与其他“情报局分子”一起被捕入狱，这种“情报局分子”最后达到一万四千人。铁托的前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在越境逃往罗马尼亚时被边防军击毙。其他人或者叛逃成功或者在国外

^① 这次战争实际发生在6月15日，传统上在6月28日宪法节进行纪念。——译者

叛变。除这少数人以外，你要问起南斯拉夫人，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会一致同意党代大会对铁托以及被情报局称为“叛徒集团”的那些人的热烈拥护。由于铁托及其政权蔑视苏联和保卫南斯拉夫的独立，终于赢得了三年来丧失的大部分民心，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非党群众。

然而，同情情报局的争论在大会上只是偶然顺便地提到，而且始终是与斯大林本人区别开来的。铁托和其他发言者声称，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同苏联的道路并无二致。同苏联党和情报局的争论是由于情报局的讹传，从攻击南斯拉夫的罪状纯属捏造这一点即可证明；还认为问题很好解决，只要兄弟党派个代表团亲自来看看真实情况即可。7月21日开幕式，政治局成员进入会场时，大家高呼口号：“铁托同志万岁！”“伟大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兄弟的苏联万岁！”“进步人类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最后还高呼：“英勇的南斯拉夫军队及其最高统帅铁托同志万岁！”八天后，铁托在高呼“以天才的斯大林为首的伟大的苏联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了第五届党代大会。在一小时以前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热烈欢呼拒绝苏共和其他情报局成员对南共的一切谴责的决议，并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其职权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消除与各兄弟党的误会。

南共对苏联的对抗是逐步公开化的：当时还没有公开针对斯大林，也坚决认为争论是个尚可补救的错误。在各与会者的讲话中和南共自1920年以来所采用的第一个纲领中并一再肯定不可动摇的斯大林主义。但南斯拉夫及其共产党政权毕竟从此开始了新的一章，即在当今这个互相敌对的世界中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一章。

第二章 同斯大林主义决裂

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验，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出于信念。1948年6月及其以后的一年中，党的核心集团根本无法想象、也不打算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实质上离开他们理解的苏联模式。甚至同斯大林破裂一事，他们起初也不认为是无可挽回的。当他们最终被迫重新估价自己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时，他们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环境使然。当时南斯拉夫已孤立于苏联集团之外，由于共产党情报局施加更严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因而同苏联集团的争论日趋激烈；国内斯大林式的经济结构，也由于受到封锁，雄心勃勃而又计划不周，以及缺乏资源、基础结构和技术干部等三重影响而陷于崩溃。同时，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西方的援助和贸易，结果同西方的思想、技术和制度发生了广泛接触，而作为一共产党政权，没有苏联的支持，要想生存下去，还必须得到国内更广泛的支持。此外，又一项当务之急则是批判苏联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同苏联的先例区别开来，以便向国内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证明他们跟斯大林和苏联对抗是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都是1949—1950年间逐渐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连续发生的。这就使核心集团的成员们在心理上和思想上有时间逐步适应这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

时间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

托本人，事后宣称：他们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愿批评斯大林本人和整个苏联，诸如在1948年7月的第五次党代大会上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赞颂，在演说词里还充斥斯大林的语录，那都是有意安排的有预见性的策略决定，是为了照顾普通党员多年来精心培育起来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爱戴心情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我们不得不有节制地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和批驳苏联所散布的全部谎言和诽谤。”铁托1952年对其传记作者戴迪耶尔说，“需要给斯大林时间，让他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继续表演，以便人民自己来说：‘打倒斯大林’，免得我们首先喊出这种口号而脱离群众。……”这种说法是一种事后想出来的合理解释，至少部分如此。如果说南斯拉夫普通党员要了解事件真相、学会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必须有一段时间先破除对斯大林这个仁慈的上帝的迷信和忘却对苏联的感情，那末对于他们的领导人来说，也不例外。因为他们同这个事业、它的基本原理、它的成就与罪恶牵连时间更久，程度更深。这些人“不仅要同一个古往今来最强大的国家相对抗，而且要同自己的过去，同自己大半生当作唯一宗教和职业的信仰相对抗”。唯有铁托可算一个例外。他本人基本上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由于同莫斯科打交道的经历，经常怀有一种“对危险的本能的警觉”。因此他推迟对斯大林及其制度的攻击，可能是深谋远虑的。不过对多数人来说，则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过去的导师长期咄咄逼人而日益恶毒地攻击下才被迫奋起反击。而批判的必然结果以及国内出现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们从批判国外的敌人中总结国内的教训。

关于这次冲突，戴迪耶尔是一个最敏锐的见证人。他后来在书中追忆过当时的痛苦、混乱、个人创伤、长期存在的“我

们大家或多或少沾染上的教条主义”以及程度不同地得到克服的情况。据二十年后他自己的回顾，在1948年7月第五次党代大会上他本人的反应，可能是党的核心和外围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那时我认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制止冲突。……但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了？还有回旋余地吗？”铁托、基德里奇等人当时在身心上受到的摧残，也反映出心灵的创伤严重到何种程度。1949年上半年，阿达米克曾同政治局多数成员多次畅谈而留下同样的印象。这些人当时都充满孤立感和不安全感，对政治上、经济上的形势缺乏冷静分析，一味追求同苏联妥协与和解。铁托在4月份告诉他：“事情一无进展，但我们一些同志仍然希望——哪怕是一线希望——这场梦魇终将过去。”阿达米克补充说：此后几个月，“我又多次会晤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德热拉斯、基德里奇等人，我不时感到他们对和解仍抱有一线希望。铁托和卡德尔一直到6月底还未断念。”阿达米克是一个十分敏锐的观察家，但这次对铁托可能估计错了。

争吵迟早要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因为斯大林成功地坚持了这一观点：基本分歧从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分歧，南斯拉夫党曲解和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铁托立即意识到这种说法的不恰当及其危险性。在1948年4月12日关键的中央全会上，他告诫中央委员会：“目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他们正在利用意识形态问题来证明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施加压力是有道理的。……”铁托给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答复苏共中央3月20日来信的文件，最后一段显然也包含同样的论点。但是，后来全会在审订铁托的草稿时把这一段话删掉了，

代之以邀请苏共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团亲自来看看：南斯拉夫人是多么地道的斯大林主义者。

尽管铁托顾虑重重，南斯拉夫人还是接受了斯大林所选择的战场，从而对争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两种最终互相矛盾的影响。从长远的观点看，不但要使运动顺理成章地从攻击斯大林转为攻击斯大林主义，而且要转得比原先设想的更快。从眼前的观点看，只要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还希望某种形式的和解，就会日益感到压力，以致不得不采取纠正的措施来证明苏联的种种（基本上是不相干的）指责纯系无稽之谈，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党有时就变得“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主义”。

俄国人曾指责南斯拉夫党继续向人民隐藏其面目，还在采用“搞阴谋”的工作方式，这种作法只适合于一个不合法的革命运动，而不适合于一个执政党。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部分目的，就是企图证明事情并非如此。弗雷德·尼尔恰当地评论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南斯拉夫党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南斯拉夫人还被指责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听任党被融化于人民阵线。为了回答这一指责，南共于1949年4月在人民阵线第三届代表会议上明确重申：人民阵线只是党的辅助工具和传送带。而且，就象卡德尔曾在党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反驳的那样：事情一贯如此。

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继续追随苏联路线。因而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联合国和7月30日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多瑙河会议（此时五届党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上的表现，给西方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苏一南争吵纯属虚构，不过是共产党的狡诈阴谋。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9年1月南共五届二中全会所采取的路线。这时经济形势日趋严重。1948年农业歉收，同时

共产党情报局开始实行经济封锁，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而未能完成。1948年12月同苏联谈判新的贸易协定，交易额锐减至1948年的八分之一，答应提供的装备也停止供应。过去总以为封锁不会是全面的和持久的，现在连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但中央委员会的反应却完全是老一套。全会号召加强纪律性，作出更大努力和牺牲，来完成“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特别提到要厉行节约，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劳务、粮食和原料，支持社会主义竞赛以及自力更生等问题。至于党本身，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机器”。全会规定的一项任务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在经济等工作上更加步调一致，并加强党对国家机关工作的控制。”

虽然有的与会者提醒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早已失调，但经济制度未作任何变动。用来对付生产落后和情绪低落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党的集中控制以及多作“宣传鼓动”。

更为严重的是，二中全会采取了一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新方针。全会压制了巴卡里奇，大约还有卡德尔的明显异议^①后，同意农业集体化要“更加放手、更加快速地”进行下去。他们这样干的依据是：南斯拉夫农业落后，食品供应极端匮乏，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地区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现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难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供市场消费的农产品。这一切促使他们采取迅速集体化这个符合共产党教义的“唯一解决办法”。然而后来的南斯拉夫作家和外国作家却一致认为，当时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想以尽快而大力地推行

^① 巴卡里奇私人的怀疑在1948年12月告诉了克罗地亚的议会代表。1949年5月，他在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又强烈批评强迫命令和不合理的集体化。参看巴卡里奇：《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88—93页，第107—114页。

苏联发展农业的办法来回答苏联对其早期农业政策的批判。他们还认为：二中全会在共产党情报局公开咒骂以及南斯拉夫同斯大林破裂整整七个月之后做出这样的决定，表明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项决定的直接后果十分严重。从单纯追求合作社数量、农民反抗的规模和方式，以及党和政府机构所施加的压力等方面来看，都与苏联斯大林集体化运动初期的情况不相上下。在此以前，南斯拉夫集体农庄（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总数增长缓慢：1946年四百五十四个，1947年七百七十九个，到1948年才一千三百一十八个。二中全会以后，1949年数目猛增四倍，达到六千六百二十六个；1950年在开始后退之前，总数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七个，拥有二百万合作社社员，二百三十万公顷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农民入社的动机各色各样：有的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个人的或党员亲属的影响）或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无地或少地农民）这样一些偶然因素，也有的企图逃避强迫交售制度、歧视性的税收制度，以及其他故意刁难惩处个体农户的经济和行政措施，包括在政治上甚至人身上施加直接的压力与威胁。

农民的反抗随处可见，表现为生产下降，屠宰牲畜，逃避强迫交售等等。再加上1950年的特大旱灾，形势更趋恶化。（当时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外交官对一位西方观察家说：旱灾证明“上帝是站在情报局一边的”。）大农场未能通过迅速机械化和改进耕作技术充分发挥潜力，以便对克服困难起应有的作用。谷物生产下降到战前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一，整个农业产量只及战前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三。饥饿威胁着城市。

与此同时，五年计划由于情报局的封锁而困难重重，在二中全会期间虽曾引起关注，却未促使政治局高度警觉。在全会开幕前两星期，基德里奇告诉阿达米克（又是“严禁引用”），封锁确实“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困难”，五年计划已经、并仍将不得不相应地作“一些小变动”。但是，整个计划自当继续执行，“不会作重大改变，至少眼下我看是这样”。

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同斯大林破裂、经济封锁开始以后，党的领导人被一些暂时的令人鼓舞的成就蒙住了眼睛，看不清经济形势。他们声称，根治战争破坏的恢复速度创造了战后重建的世界记录。共产党奉为神明的基础工业的许多新型大工厂正在兴建，还有十几处新的水力发电设施也在建设中。1948年工业产量已经达到1939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社会主义部门的职工总数从1945年四十六万一千人和1946年七十二万二千人增加到1948年一百五十万人和1949年将近二百万人。国民收入1939年为二千六百四十二亿第纳尔，1948年超过此数达到四千四百一十一亿第纳尔。尽管提高生活水平无望，人们依然不太勉强地接受了艰苦的工作。这对支持1947—1949年占国民总产值百分之三十二的总投资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建设巨大的工厂和电气化计划，这些都是长期之后才能赢利的建设项目。

游击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代后的南斯拉夫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根据后来已经改变了的思想观点（谴责斯大林体制所固有的腐朽无能）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就想主要以革命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暂时保留下来的革命干劲来解释他们早期的成功。当然，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具体政策，对人们的态度和努力也一定起过积极的作用。例如：战后第一次土地改革及其

给农民的希望；对产业工人的一些特殊待遇（保证低价和起码的定量口粮等等）；采取一种低工资级差（头几年的比率是1比3.5）的近乎“平均社会主义”的措施等。同时，由于迅速的恢复；广泛的工业化，从而大大增加了非农业劳动的就业人数，便使新政权的吹嘘暂时显得信而有征。政府夸口说：两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即可全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全面收益；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得以改善的平等而无限广阔的机会就在眼前。最后，战时游击队运动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权力分散、地方作主，下级官员甘冒高度风险，勇挑重担的特色，在战后还保留了一段时间，只是由于新政权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转向等级森严的集权制领导，并日益加强了中央控制，才逐渐丧失掉的。

地方党政机关经常普遍地使用专横粗暴的强制手段来动员那些没有革命干劲、对未来缺乏信心的人，这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铺设当时引为骄傲的一项工程即贝尔格莱德到萨格勒布的交通干线时，不仅有大肆宣传的“志愿青年队”参加，而且还使用了大量的劳改犯，特别是那些过去的资产阶级中的“阶级敌人”（这可能是公路修得很差的一个原因）。同样，在重建被战争摧毁了的城市和工厂以及早期兴建新城市如新贝尔格莱德时，大部分体力劳动确实是普通公民不取报酬的“义务”劳动，但是这种义务制通常是靠老一套的军队的办法来维持的。尽管如此，这套办法对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起了明显的作用的。总之，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还处于“建造金字塔”阶段，因此当时的强迫劳动同其他方法一样有效；经济发展则处于“生产总比不生产强”的阶段，因为极度匮乏的市场几乎能够吞掉任何商品，既不顾成本高低，也不问质量优劣。

上述这些办法，从短期看不管多么行之有效，从长远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则包含着潜在的不利因素。这在1949年已开始有所觉察。因为实行中央控制一切和强迫命令的办法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化，从而破坏一息尚存的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取得早期成功的因素之一，也是“游击队精神”的核心。热情一旦衰退，再鼓干劲就必须通过物质刺激，或者加大压力。但是，除非有大规模的外国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期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取得这种外援），或大量削减投资使经济增长保持在最低限度，否则就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强制手段达到取代自愿原则和物质刺激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坏处。这样管理代价很大而且难以实行，必然会削弱群众对新政权仅存的一点支持。这种制度能够建造几座金字塔，甚至一条高速公路或者一座钢厂，但是难于经营一座钢厂，更不能管理现代经济。另外，作为一种长远的方针，它同党内的至少是很大一部分核心人物的基本原则和忠实信念格格不入，同革命的理论价值也背道而驰。事情很清楚，要么这些核心人物及其原先的价值观念被制度所腐蚀，要么把这个制度的强制性削减到最低限度。

二十年后，贝尔格莱德的一位引起争论的青年社会学家斯托扬诺维奇，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这个难题做出同样的结论：

单凭革命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革命核心集团企图使原始共产主义永存不朽，硬要使之成为永久的社会状态，但事与愿违，不久便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同人类的本性相抵触。人类

的本性是倾向于个人差异、创造性、充分的物质报酬和更加舒适更加正常的生活的。压制人性，必遭报应。这种报应表现在：普遍地对工作漠不关心，生产效率低下，物质匮乏，思想停滞。……

这样一来就得使用强权，而“使用强权的人，终究也是人。因此在他人身上要加以压制的人类本性，在他们自己身上也有”。因而他们也得受强权的约束。但是，

这一过程不可能无限循环。于是革命先锋队就来满足自己成员的人类所共有的爱好，而强迫所有其他公民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革命的寡头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必将随之出现。

1949—1950年摆在南斯拉夫新统治者面前的问题是如此复杂和尖锐。他们为了求得政治的乃至人身的生存，陷入同共产党情报局的苦战，在整个世界上孤立无援，只有两方面可以求助：一方面是一个纪律严明、忠实可靠的党的机器，它处于没有挑战的垄断地位，令人敬畏地控制着国家；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他们愿意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愿意为保卫它的生存而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这不是单纯沉默无语、心存畏惧所能做到的。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出于热爱，起码也是相信这样做可能祸害最小。然而这两方面的支持是否能够保持呢？若是失掉其中一方的支持，这个政权和制度是否还能生存？1948年6月以后的头几个月，党政军机构清洗了寥寥无几的情报局分子之后，经受住了考验，证明其忠实可

靠。^①面对共产党情报局日益增强的外部压力和他们策划的内部颠覆，同时为了保卫新秩序，反对残余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党政军机构继续保持磐石般的团结，并由党加以绝对而集中的控制，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是基本的列宁主义，也是基本的实用政治学。它在未来的岁月里，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成为南斯拉夫政治辩证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有一些领导人，甚至在1949年就开始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机构的方针政策和所作所为正在失掉仅存的一点群众支持；而在过去，该政权一度是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的。正当南斯拉夫被孤立和被包围的时候，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农民顽强地反抗强迫集体化，促使党的核心集团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处境困难。新政权自夸而且显然自信他们的革命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铁托等人常爱夸口说：没有任何共产党政权，包括苏联，在获得政权时得到如此广泛的群众支持。这种支持扎根于农民。不仅因为革命时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农民，而且因为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性质和地点以及城市各阶层大都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就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以及后来新的领导核心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人。1948年，党的社会成分还反映了这种情况，即百分之五十的党员是农民出身。现在对新政权的农业政策的反抗，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受到饥饿的威胁而崩溃，而且这些政策也破坏了群众对这个政权的仅有的一点支持，并

^① 门的内哥罗党估计，因同情共产党情报局而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比其他共和国都高。克罗地亚二十分之一的党员被开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二十三分之一，马其顿是三十一分之一。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党没有发表数字（见肖普的书，第138页）。

在一个仍然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普通党员中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但是公认的教义却指明，特别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只有实行把社会主义关系引进农村的激进纲领，才能保证革命成功。

这种公认的教条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农业上最惹人注目，而且在其他经济部门里和全国的政治气氛上日渐强烈地表现出来。“官僚主义”只在原则上一再受到谴责，实际上则由于革命热情衰退到处蔓延。在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经济部门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单纯依赖于行政上的规章制度，因此更加挫伤了群众的主动性和妨碍了具体问题的解决。战后一度存在的兴旺景象一落千丈。国民收入1948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1949年增长百分之九，以后三年实际上年年下降。中央集权制作为一条总路线，导致对一切部门从经济到文化艺术都实行国家管理和控制，而铁托等人还莫名其妙地为南斯拉夫作家和艺术家未能创作出堪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新时代相称的有分量的作品而烦恼不堪。

在各种新成立的和正在扩大的机构里担任负责职务，就拥有合法的和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而权力和特权又腐蚀了这些弄权者，尤其是同意使用强制手段更使掌权者变得残酷无情。1949年春，阿达米克跟许多高级官员交谈时，发现他们很关心这类现象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戴迪耶尔引用一位童年时代的老友和共产党同事当时的话说：他们很快就开始丢掉在战前非法斗争中和游击战争岁月里赢得的道义资本——“我们的人民不是傻瓜。他们正在瞧着我们干些什么。”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公众的支持，而且影响到党的士气，尤其是在上层官员和战争与革命年代的老战士当中。他们在1949年还占党员的三分之一。每一种制度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宣扬的准则的俘虏。南斯拉夫新政权就是其年轻幼稚的俘虏。由于忠实地照搬苏联那一套，它形式上已完全官僚主义化了。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却大部分仍是革命者，其中许多人在陈规惯例和种种特权的腐蚀下，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热情。对于那些虽然享受着特权和权力，又不是心安理得的人来说，原则还是要紧的。

这样说并非美化南斯拉夫革命及其领导人。因为要对他们在游击战争中的表现，在斯大林时代里的“极左主义”、专横粗暴和天真幼稚而又野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及后来同斯大林闹翻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不能不指出他们的理想主义、信仰和年轻人的热情这些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则是产生于一种特殊的淳朴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农民，也带点知识分子味儿，被权力弄得飘飘然，现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有与众不同的住宅、专门的商店和游乐场所，跟老百姓很少交往，这样就特别容易沾染上专横武断的毛病，并为权力和特权所腐蚀。然而，同样的条件既可以产生出污泥而不染和流芳百世的传奇式人物，也可以产生一种既腐化堕落又深感内疚（不一定是伪善）的矛盾人物。上述各类人物在南斯拉夫核心集团中都有。其中一些自重的人——无论是经常的或是偶尔的——必然要按照他们曾为之战斗（甚至杀人）的理想身体力行，以便言行一致、名实相符；否则，他们就感到自己无权处于今天的地位。正是这种精神确定了

未来的政策和行动范围，并部分地决定了它们的方向。革命的神话如“电气化和工业化”以及“发扬游击队精神”等，给人以起码的期望。新政权如果希望在党内骨干分子以及非党群众中那些好挑剔的人的眼里保持合法地位，就必须让人们看到它至少是打算实现这些目标的。

铁托及其同事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既苦于缺乏管理国家和经济的经验，又深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教条主义所能提供的就是眼下这套日益失灵的办法。因此他们踌躇彷徨，手足无措，最后由于情况日见危急，才不得不采取行动。例如，迟至1952年7月，铁托本人还看不出用什么形式来代替集体化。不过，他跟他的传记作者坦率地单独交谈时已承认：“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合作社”，并且使用了大规模的、至今令人遗憾的强制手段。（当戴迪耶尔断言“我们这里没有象苏联那样的压力”时，铁托回答说：“我们这里是没有，农村里有，到处都是。”戴迪耶尔又说：“我们这里没有西伯利亚。”铁托回答说：“我们没有西伯利亚，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人送到那里去的。……”）^① 日渐意识到犯了严重错误，并努力探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办法，这种动荡不定的状况是当时政治局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典型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始于1949年初，随后几个月逐渐抓住了要害，增强了信心。跟斯大林发生争吵而铁托成功地顶住了，这就使南斯拉夫人可以放开手脚，另找出路。在以后的三年中，经济上的孤立和危机使他们非得自找出路不可。但是要改弦易辙，他们还必须打破僵硬的意思形

^① 戴迪耶尔：《约·维·斯大林的失败》（萨拉热窝，1969年版），第391页，引自速记稿。

态的束缚,而且在前进的过程中,还要勇于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进行修改,加以发展,兼收他人之所长。

在共产党情报局和西方之间

随着同共产党情报局争吵的不断深入,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解放变得比较容易,有了重点,也更加紧迫了。苏联集团恶毒的反南宣传在1949年初春开始加码。这可能同所传双方和解的尝试受挫有关,因为各方都发现妥协的代价太高。于是,夏秋两季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里,掀起了清洗、审讯、处决所谓“铁托分子”的高潮,其中有些还是领导人物。例如:1949年6月11日,阿尔巴尼亚的“铁托分子”科希·霍赫被枪决。同年9月,拉希洛·拉伊克及其“同谋者”经审讯后在布达佩斯被处以绞刑,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三十年代的俄国大清洗。拉伊克集团被控同兰科维奇勾结,企图利用南斯拉夫军队穿上匈牙利制服入侵匈牙利,而后即由他们当政作为南斯拉夫的傀儡。在保加利亚,特赖霍·科斯托夫于6月被捕,11月进行了同样的公开审判,结果象拉伊克一样被控里通南斯拉夫人策划政变。波兰的情况虽然温和,但连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也被指控为“铁托分子”。此外,还有难以数计的次要受害者。这次清洗所牵连的问题很复杂,既清算国内的各种旧帐,也清算苏联和仆从国双边关系中的宿怨,不过共同的名义都是反“铁托主义”,扣上了这顶帽子就不会有好结果了,哪怕指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审讯常常看来象是一场荒唐恐怖的戏剧。

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深入南斯拉夫国内。兰科维奇的国

家保安部为追捕苏联代理人、破获其组织(据称其中包括苏联所广泛利用的南斯拉夫白俄移民集团)忙得不可开交。1949年8月,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十分担心情报局会搞军事入侵(这种可能性他们早在1948年7月就曾考虑过,后又认为不可想象而解除了顾虑)。1949年8月18日,莫洛托夫就南斯拉夫白俄(许多人是苏联侨民)被捕一事,发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照会。神经过敏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抗议无异于最后通牒。据报告,苏联及其卫星国军队也在沿着北部和东部边境进行调动。卡德尔认为局势十分严重,铁托也从布里俄尼休养地打电话表示同意,伏克曼诺维奇则命令预定由他指挥的对付入侵的有关部队处于警戒状态。与此同时,1949年9月俄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局势如此紧张,以致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团批准秘密发布一道国防预警令。

9月底10月初,苏联和东欧政府废除了战后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正式实行经济和外交封锁。早在6月,苏联政府甚至未同南斯拉夫人商量,就放弃支持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卡林西亚省一部分领土的要求。这一行动,在促使南斯拉夫领导人相信争吵是全面的并且已经无可挽回这一点上,看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完全肯定,今后即使南斯拉夫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争执,苏联政府也不会支持他们了。

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再次召开会议,会址在布达佩斯。会议号召南斯拉夫国内外的共产党员们推翻铁托,镇压不管在哪里出现的南斯拉夫异端分子。会议听取了苏斯洛夫、陶里亚蒂和乔治乌-德治的报告,并公布了一个决议,用的是乔治乌-德治的报告标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

谍掌握中”。这个文件在南斯拉夫历史上叫做第二次情报局决议。它对南斯拉夫叛逆者倾泻的恶毒咒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收罗和杜撰的许多措词和口号，在后来情报局的宣传中广为引用，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例如：“由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所组成的贝尔格莱德集团”，“铁托法西斯集团”，“由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战争贩子的帮凶”，“残暴的盖世太保式的恐怖主义政权”，以及“铁托的恐怖政权”等等不一而足。决议进一步宣称：“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这个决议在11月29日公布。这一天正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亚伊策会议”六周年纪念日 and 南斯拉夫的国庆节。共产党情报局又一次有意或者无意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对南斯拉夫人有着特殊象征意义的日子来公布他们的决议。

南斯拉夫政权终于奋起反击，反唇相稽，并力图打破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孤立状态。这种状态，至少在年初已经引起领导人的关注。他们在1月间同非官方的西方人士交谈中，非正式地试探过同西方大国改善关系和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但当时看来没有突破的希望，因为只要他们当中还有人幻想同莫斯科和解，也就不愿冒此风险。然而到年中，南斯拉夫整个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7月，他们撤销了对亲情报局的希腊共产党叛乱的支持。9月，正在担心情报局军事入侵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同苏联集团的路线一刀两断，第一次在这个机构里提出控告，并且无视苏联狂暴得不顾体面的反对，为谋求安理会非常务理事席位推举自己的代表作候选人。

就在这时候，西方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的具体支援开始了，这给国内外的政治平衡带来了新因素。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性时刻终于来到了。1950年11月29日，正如一年前第二次共产党情报局决议选择在南斯拉夫国庆节公布一样，哈里·杜鲁门总统也选择这个节日写信给国会支持“南斯拉夫紧急救济法案”。杜鲁门在信里没有涉及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性质，只是重申冷战年代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基本理论：

南斯拉夫继续独立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国家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的野蛮威胁，不让苏联势力染指欧洲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地带。我们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独立，显然是符合我国利益的。

法案的通过，使美国对共产党政权的经济援助合法化。过去双方都鉴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公众（在南斯拉夫是党内的）舆论，只能一点一滴逐渐地消除那初始难免的审慎、猜疑和麻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1949年9月，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第一批贷款两千万美元。表面上这是一笔“正常的商业交易”，然而双方都承认这基本上是一笔政治贷款。翌年，两国政府小心翼翼地接近起来。美国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出于经常想到欧洲的地缘政治图、铁托的三十三个师（东欧最强大的军队），以及希望一个共产党政权摆脱苏联而独立的榜样能够影响到其他地方。由于美国是激烈反共的，因此它的目的显然只是“保存铁托”，而不是帮助他“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政策则基于迫切需要，同时也

是因为他们开始难以置信地发现美援确实并无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附带条件。然而，只是由于1950年灾难性的干旱和当年冬天可能面临饥馑的威胁，才迫使贝尔格莱德政权打消顾虑，正式寻求需经美国国会批准的这样一种规模的援助。当时不少南斯拉夫人思想上对此持保留态度，但由此引起的政治事件只有一起，即前塞尔维亚总理奈什科维奇于1952年堂吉诃德式地辞去政治局委员和联邦副总理职务，退出政治舞台以示抗议。

军事援助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它也经历了采取“不大公开的、临时性的和法律上成问题的”手段这样一个阶段，但这样做很快就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来由于美国修改立法(过去它没有考虑到对共产党政权的援助)，同时南斯拉夫政权也意外痛快地接受了美国的其余条件，包括同意一个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呆在贝尔格莱德，这才消除了法律上的障碍，作出了比较正式的安排。

有一段时间，至少在国务卿杜勒斯看来，这种非正式的结盟有可能变为正式结盟，把南斯拉夫拉入“北约”，起码可以作为联系国。1953年2月，在斯大林去世前不到一星期，南斯拉夫人同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友好合作条约，提到三方的总参谋部之间要进行非正式磋商。美国人竭力想使之变成一个完全的军事联盟。1954年8月9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三国又签署了一个更加牢固的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凡加诸一缔约国家之侵略行动即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家的侵略行动；还规定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便合作，并要求继续举行军事参谋部之间的磋商和召开三国外长的定期会议。10月间，关于流产的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新危机（由于美国外交之

笨拙引起)，在伦敦备忘录中解决了。这是韦莱比特（南斯拉夫）、布罗西奥（代表意大利）、汤普森（代表美国）、哈里森（代表英国）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经过艰巨的外交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伦敦协定委托意大利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管理A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委托南斯拉夫管理略加扩大的B区，并以三方贷款在科佩尔援建另一个斯洛文尼亚海港作为补偿。于是南斯拉夫同第三个北约邻国意大利之间的关系终于正常化。这样也就为杜勒斯堵塞他所设计的包围中苏集团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连锁中留下的一个缺口扫清了道路。不过这时斯大林已死，南斯拉夫人同苏联集团的关系也已正常化。巴尔干公约变成一纸空文，后虽未通知废除或取消，但从此也就无人过问了。^①

1951年春，英法两国曾同美国一道制订了一个三方援助方案，以弥补预料中的南斯拉夫下一年度的预算赤字。这个方案于1952年和1953年重新作了修订，此后就只剩美国一家坚持下去。到1955年，西方大规模援助的第一阶段结束时，美国给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总额达五亿九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减价的剩余装备和转手装备，按官方价目计算，共五亿八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只有经援中的五千五百万美元需要偿还。

南斯拉夫和西方之间的新关系具有三重意义。首先在政治上，它结束了国家的孤立状态和因孤立而造成的惊慌情绪，有一段时间这几乎使领导层瘫痪。建立这种新关系，也导致

^① 在1968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南斯拉夫感到震惊，有人问外交部长尼凯集奇：南斯拉夫人是否可以援引巴尔干公约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他笑着用英语回答说：“老的条约，象老的将士一样，永存不朽，但其影响却在悄然消失。”

外交上有益的接触，以及后来同“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两方面都提高了南斯拉夫将来对苏联集团讨价还价的地位。其次在经济上，它使这个国家避免了1950—1952年的饥荒，使其外贸由东方转向西方，从而获得任何希望工业化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机器、技术和原料，并使其经济迅速增长而又不降低生活水准。第三，它对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有重大影响。

前已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在1949—1950年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当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必须寻求新的道路时，却没有作这方面选择的知识。他们当行政官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经验不足，对外部世界也茫然无知。有些人只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特别是1945年到1948年期间；却很少有人到过西方，除了少数人受党委托，为作地下工作短期出差到西方。早在1945年，铁托就曾对一个西方访问者抱怨过这种孤陋寡闻的土包子习气给他的队伍带来的局限性。五十年代向许多南斯拉夫人开放的广泛的国际交往的机会，给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的演进带来了双重影响。直接的影响是，及早地直接接触到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了较早较广泛的个人体验。如果说后来苏联集团和西方共产党人也允许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学习，并且习以为常，那末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起了带头作用的。此外，跟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相比，主要是因为南斯拉夫享有这种同西方交往权利的人数量较大，他们又都是各种类型参与决策的人，所以有相当多的各级政治经济机构和部门可以得到各种来源的情报。这样的熏陶，在南

斯拉夫也并非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人物才能接触到。随之而来的间接影响是，把西方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不一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商业组织、销售学、指示性计划、财政管理等方面的原理引进南斯拉夫体制里来，而且还需要把这套新玩意儿糅进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去。

换句话说，1948年同东方的争吵，给南斯拉夫开展同西方的广泛交往造成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通过同西方的交往又使南斯拉夫得到了另外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既包括理论和技术上的，也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与此同时，他们脱离了东方，不受苏联的支配，只要愿意，就可以自由地从上述办法中进行选择，极少受外来的限制。

走“南斯拉夫道路”

1949年，南斯拉夫人在同共产党情报局的论战和有关宣传中逐渐转守为攻。这是在采用新法解决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实行突破的先决条件和鼓舞力量。突破也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信心与日俱增。这个突破是南斯拉夫“走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西方称这种新的社会主义为“铁托主义”。南斯拉夫的宣传家们如果在争吵中不能从意识形态上进攻苏联，就只能囿于否认苏联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脱离正轨”的无理指责，只能以此来为南斯拉夫自己的立场辩解。这样，也就限制了批判性的思考和宣传。然而一旦对苏联放手实行正面进攻和批判，南斯拉夫的宣传家和思想家们便可以转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合理合法性加以责难。一位南斯拉夫历

史学家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要么苏联是真共产党人和真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在同南共冲突中是正确的；要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变了质，苏共不再是真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南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并未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上。

南斯拉夫的雄辩家和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一旦领悟了这种论点的逻辑并能加以清楚地论述时，他们便豁然开朗，欣然去“发现”苏联偏离社会主义之处及其原因。如果说他们对苏联的这类“发现”并非象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什么都是创见，那末他们醉心于“发现美国”（他们经常在文章和建议中自我讽刺地使用这个短语）也并非头一遭儿。

他们就这样踏上了一条冒险探索、发扬批判性思考、实现制度革新的令人惊异的历程。这可以说是 1949 年和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与众不同之处。南方斯拉夫人虽有其他才能，过去却很少以哲学家和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闻名于世。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从未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过值得外界称道的贡献，也许马尔科维奇除外。新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通常也不乏使共产党难堪的“知识分子”，但很少从事严肃的理论著述。此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批判、理论和实验之花突然之间竞相开放，尽管起初往往是些思想上幼稚和政治上天真的东西，但是显得信心越来越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判断才能。再者，因为这些年代里，给《党的建设》、《共产主义者》和党的其他理论刊物以及《战斗报》撰写大批文章的

“理论家”们，都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机构中身居要职，在危机时期掌管着整个政治经济体系，因而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设计的体制反映出一种不断变动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宛如鸡和蛋的关系一样，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断定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意识形态方面，也象权力一样，是高度集中的。内部“创立”的“铁托主义”，在其形成的年代里只限于一小批人。他们都是1937年后由铁托亲自罗致的，都经历过游击战争和革命。他们的内向性和排外性，是由于生死与共的经历和风雨同舟的境遇造成的，这就使他们成为一伙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工作在一起，娱乐在一起，深更半夜互通电话，交往频繁，无所不谈。各种思想和念头在他们之间传来传去，到后来既说不出谁是首创者，也无案可查。每个人的讲话和文章都包含别人的思想，仅凭个人兴趣或喜爱加以取舍和强调而已。各项决策并无严格程序，往往是非正式地取得一致。所以能这样，是基于彼此亲密无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经历，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而形成的一个复杂而脆弱的关系网。在这个网中，每股线的粗细、耐力和质量各不相同。非知识分子出身的铁托是最后仲裁者和决策人，主宰着七嘴八舌、往往是杂乱无章的进程。他的崇高威望使他能以“长者”身分起到个人的和组织的作用。这是一个由老同志和老战友组成的亲密而又奇异的大家庭，铁托则是这个家庭中受人爱戴而又令人敬畏的“老头子”。

参加这场大辩论的人只有几个政治局委员和另外很少几个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六十三个正式中央委员和四十二个候补中央委员）都作用不大。1952年

11月“六大”以前，在意识形态发生激烈争论的四年里，只举行了四次中央全会，其中在酝酿“工人自治”那个阶段召开的一次（当时正在成立第一批工人委员会），似乎没有涉及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

1949年，政治局由铁托及其八个同事组成。他们是兰科维奇和德热拉斯（都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前者兼内务部长，后者兼宣传部长）；皮雅杰（国民议会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兼法律委员会主席）；奈什科维奇（副总理兼国家管制委员会主席）；卡德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基德里奇（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莱斯科舍克（重工业部长）；伊凡·戈什尼亚克（国防部副部长）。其中，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基德里奇在重新估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特别积极。另外还有几个人也很积极，如负责农业问题的巴卡里奇，还有一位不甘寂寞的大老粗伏克曼诺维奇。他们不是政治局成员，但置身于一个非正式的核心圈子之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根据他们个人在核心集团中的作用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作为宣传部长的德热拉斯，既有时间又奉命从事理论工作。不过，他认为自己所以干这行是由于对理论的偏爱。基德里奇掌管着困难重重的经济，对于寻求新的解决办法颇为动心，也热衷于进行试验。卡德尔是一位天生的（往往也是喜欢卖弄学问的）理论家，无需特别鼓动。皮雅杰活象当代的摩西（犹太法典制订者），他作为法律委员会主席，负责把理论变成立法草案，但在1948年后对意识形态本身贡献不大。兰科维奇有一本政论集，这只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头目在逢场作戏而已。他宁愿作一个政治上的实干家，象同事们喜欢说的那样，作“党的良知”。

因此，这是一个小集团搞起来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内部的、甚至可以说是私人性质的事业。但是这项事业的实现却有广阔的背景，不仅受到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环绕在核心集团周围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们的影响。这些人通过没完没了的讨论统一思想，从中又可以看到更外围的上自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至农村基层的种种反应。换一套术语来说，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围绕着同一个中心而重要性递减的三圈人物所组成：最里圈是核心集团，人数不足一打，都是亲密无间的同僚；第二圈人数较多，但时有增减，基本上没有固定形式，由核心集团成员经常接触的一些朋友和战时的同志所组成（戴迪耶尔即其适例）；最后是那些“摇旗呐喊”的人，他们的活动方式是在全国范围内遇到大事时加以宣扬，或对这些事情作出群众的反应，其目的既是为了促进行动，也是为了确定政治上可能办到的界限；这样通过党和人民阵线这两条渠道，也通过广泛的旅行和个人接触把情报输送给核心集团。

德热拉斯所描述的关于自治思想产生的经过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南斯拉夫党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不久，他便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次重新学习“格外用心，想看看能否找到一个谜底。那个谜语，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是坏的而南斯拉夫是好的”。这时，他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关于社会自治的原理，其中包含着反官僚主义和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下不但找到了批判苏联实践的根据，而且也使铁托及其同事们的感情上的反应得到了回响和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种感情上的反应是他们在仔细考虑自己在南斯拉夫所创建的制度时所引起的。他们“对党这部机器无法改正的专横武断的性质深感气愤和厌恶，尽管这个党是由他

们亲手建立起来并借以取得政权的”。德热拉斯接着写道：

有一天——准是在 1950 年春，我忽然想到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开始建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工厂应当交到他们手里，唯一的条件是他們要为国防或国家其他“仍然必不可少的”需要交纳税款。

德热拉斯把他的想法解释给卡德尔和基德里奇听。他说，“当时我们正坐在一辆停在我的别墅门口的汽车里。”他们都挺喜欢这个主意，尽管基德里奇开头认为这一步未免太快了一点。这个问题曾在包括工会领导人在内的有限范围内辩论了几个月，然后才在联邦议会休息厅里向铁托汇报的。铁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的工人还没有这种准备！”德热拉斯和卡德尔据理力争，强调这个“跟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的思想的理论价值，认为它一定会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欢迎。

铁托踱来踱去，仿佛陷入沉思。突然他停来说：“工厂属于工人——这可是前人没能做到的！”凭这几句话，卡德尔和我设计出来的理论一下就显得简单明了、切实可行了。没有几个月，铁托便在国民议会上亲自宣讲工人自治法。^①

不管德热拉斯所说的具体情节和工人自治的发明权归谁的问题是否准确，但他对这段时期核心集团的工作作风和一种思想产生和决定的过程的描写听来是真实的。南斯拉夫领

^① 德热拉斯：《不完美的社会：新阶级以外》（纽约，1969年版），第220—223页。

领导人遇事必先查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指导。这既是出于本能,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的依靠。据其他回忆录和报刊文章证实,这批人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特点:他们在1949—1950年间确曾在百忙中抽时间重新彻底研究战前在狱中读过的马列主义课本,有人描绘他们一头钻进书斋读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来,想从理论中寻求苏联到底错在哪里的恰当答案。他们发现,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收益最大。当时,窗外饥馑威胁着全国,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料、技术知识和适当的刺激而被迫停工。这种经院哲学同现实一经结合,便产生了新口号和新理论——“非官僚主义化”,“权力分散”和“工人自治”。而这种新口号、新理论又进而产生一套新体制和一套带着它们自己的生活 and 逻辑特色的意识形态,尽管这套东西同创始人的预料和愿望往往并不一致。

为了从教条主义束缚下初步解放出来,进行重新思考,并且得出一些反映新的理论口径(确切地说是新的理论类型)的初步结论,他们付出了1949年的大部分时光。年初,铁托及其核心集团虽然对于同莫斯科达成妥协性的和解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是主要精力已放在探索苏联到底“错在哪里”的问题上。他们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已经断定:问题不在斯大林一人身上,也不只是后来所说的“个人迷信”。“苏联出了问题”,铁托在1月中旬第一次会见阿达米克时这样说:

出了什么问题?举个例子说吧,以列宁为榜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精神被官僚主义与警察所取代,如果那也可以叫做一种精神的话。……我想,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

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统治者，以及他们所赢得的巨大的军事胜利，这一切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犯下了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的错误，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而这种大俄罗斯主义总是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①

苏联领导已经“陷入修正主义”，这是铁托在第二天谈话中说的。当时在场的有卡德尔、兰科维奇、皮雅杰、德热拉斯和基德里奇。其中有个人论证说：“或许俄国人由于国内问题的沉重负担和错综复杂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部的紧张形势，以致把什么事情都弄得是非颠倒”。

在这次谈话的同一个星期，基德里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南斯拉夫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性质”。其内容总的说是老一套，不过细心的分析家可以发觉某些新思想的苗头。基德里奇认为，因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仍然以“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标志，所以“价值规律”仍将适用于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市场也将继续起供求关系指示器的作用。月底，德热拉斯在二中全会上做宣传工作报告时警告说：跟苏共的冲突绝非出于“误会”，而是由于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因而必将“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然而我们看到，二中全会上斯大林主义正统在南斯拉夫达到了顶峰。德热拉斯的报告没有同其他报告一起放进决议，也没有登在《共产主义者》上，却被降级登在党的一个有关于干部问题的新刊物上。很清楚，南斯拉夫领导人真正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同斯大林主义决裂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和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前，那时新风貌已经昭然若揭了。

^① 阿达米克：《鹰和根》（纽约，1952年版），第102页以后。

在此期间，间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反对某些“消极现象”，如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和特权以及过度集中等。攻击这些现象当然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也脱不出苏联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因为在苏联的制度下这种现象也是受到谴责的。尽管实质上是老一套，但是这些措施同领导层继续全力开展的对基本原理的重新估价的方向是一致的。1949年的平衡政策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收紧指挥系统，并通过强迫实行集体化把斯大林主义扩展到农村；另一方面又发起一些别的倡议和“宣传鼓动运动”（如反对“官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癌症”），这些举动表示或预示着为了恢复地方权力和缩小中央机构的权限而迈出了头几步。

回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当推卡德尔和皮雅杰起草并于1949年5月通过的关于地方政府机构（人民委员会）的新法律。这项法律第一次允许人民委员会编制自己的预算，允许它们将本地区经济企业的利润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从而赋予一定程度的财政自治权。1949年法律还承认了为成立公民委员会和咨询会议所做的工作，这是为了扩大公众参加地方社会服务而设计的；同时要求人民委员会至少每两个月向公开的“选民会议”——又一个大有前途的新发明——报告一次工作。最后，尽管国家继续直接控制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乃至其内部行政管理事务，尽管通过习惯上指派地方党委书记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法继续实行党的直接控制，但是南斯拉夫历史学家仍然称赞这项法律创造了一种新气氛，使人民委员会逐渐被当作——它们自己也坚持是——一个自治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最基层的行政机关。

卡德尔强调指出这正是立法的意图。他在5月28日将法

案提交议会发表长篇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点。演讲词经增订公开发表，题为“论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这是南斯拉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的新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深入研究以后的第一批成果。卡德尔在文中大量引用马克思 1871 年论巴黎公社的话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表露了他重读这些书而有所收获时的激动心情。

卡德尔特别注意马克思所说的“保卫革命免受官僚分子的危害”的必要性。这次演讲的主题是防范官僚政治，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我们要永远牢记：任何完善的官僚机构，纵然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群众的主动精神才能得到发展。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这意味着要扩大人民群众的自治权利，使人民群众能更多地参与从最基层直到最上层的各级国家机构的工作，并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加对每个企业、事业机构等的直接管理。

当然这种话以前也经常听到过，甚至是出自斯大林本人之口。但这时南斯拉夫人批判苏联制度来势迅猛，情绪高涨，不久便达到无所顾忌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说法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具备了法律的形式，尽管它们还不切实可行，而且也不是毫无伪善的成分。

最早对苏联“脱离正轨”实行正面进攻的论文之一是由德热拉斯写的，题为“列宁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表于

1949年9月。^①这篇文章提示，现在进行的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是想对苏联在东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时为南斯拉夫坚持每个国家必须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进行辩护。同月，针对审讯拉伊克以及这种重复斯大林三十年代大清洗的情况，皮雅杰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苏联在国际上离经叛道的根子应当从苏联本国的历史和苏联的制度中寻找。^②政治局一些成员，包括德热拉斯在内，显然反对皮雅杰的论点，认为目前攻击苏联制度至少还为时过早，因为南斯拉夫制度跟苏联制度极为相似。不过到了年底，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1950年，苏联制度的独裁性质、它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对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的暴政和剥削，都被看作是俄国革命极端不彻底的恶果。它把全部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机器的手中，形成一种比私人资本主义更坏的“国家资本主义”。^③这部机器既不对人民负责，也不对党本身负责，结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腐化和日益专横残暴。南斯拉夫人由此得出结论：要从这种不可避免的蜕化变质中挽救革命，只有立即采取步骤完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其余部分：即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

^① 《共产主义者》，1949年第5期。在此之前有M·波波维奇的文章“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作先导，载《共产主义者》1949年第4期。

^② “口是心非的大师”，载《战斗报》1949年9月22日，26日，29日，10月5日—6日。

^③ 第一个这样描述苏联制度的，看来就是德热拉斯在1950年11月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后来批判术语多改用“国家社会主义”一词。这种改变一方面反映斯大林死后苏—南辩论的语调略有缓和，另一方面承认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国家资本主义”用词欠妥。

一旦完成，国家就必须开始“消亡”，必须在所有公众事务中逐步而又迅速地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进行“直接社会自治”来代替。这一过程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开始，从全部上层建筑赖以成立的“生产关系”开始，因而也必须从尽早贯彻俄国革命时一度提出过的策略口号：“把工厂交给工人”开始。

就在这理论探讨热火朝天，工业生产连续下降，农业也由于农民的顽强反抗而趋恶化的气氛中，五届三中全会于1949年12月底召开了（距二中全会只有十一个月）。会议主题有两个。会上所做的每一项决议既反映了领导人中间产生的新思想的格调，又反映了现实的压力。

全会研究了学校体制问题，宣布“教育的目的必须是造就受到全面教育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绝不要使他们沾染上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的习气。”为此，不仅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教育理论，而且也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学校系统和教师个人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务必使教育和文化“非官僚化和非集权化”。谈到农业问题时，全会在基德里奇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集体化运动的成果，告诫说不要“违反自愿原则”，不要“不惜任何代价，不管那里是否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先决条件”，硬去组织“农民劳动合作社”。鉴于几年来农业生产增长率没有取得预期的显著进展，因而现有合作社数目以保持稳定为宜。

全会关于集体化不要搞过头的警告，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在一个类似的阶段上可悲地重蹈苏联的覆辙，好象1931年斯大林告诫他的集体化工作人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但是在南斯拉夫，这种警告却标志着从“集体农庄”概念永久和全面的后退已跨出第一步，不管这种后退是多么勉强和迟缓。新动向在1950年1月得到证实。当时人民阵线执行委员

会“建议”说：目前在农村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应当集中发展“综合农业合作社”。这是西方和战前南斯拉夫所熟悉的传统形式，属于供销和技术援助一类的合作社。从此，“农民劳动合作社”再无进展，包袱卸下了，却未解决问题。新政权又拚命挣扎了三年多（正好包括旱灾严重的1952年），寻求对策，以避免向前途暗淡的农业土地私有制投降。正当卡德尔苦思冥想怎样利用“综合农业合作社”来打开一条出路的时候，巴卡里奇却端出了一个大胆的设计。这位克罗地亚书记开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研究如何提高现有的“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效率（研究报告发表于1950年初），可是事过两年，这位书记又逐渐转而鼓吹干脆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

与此同时，在工业企业里，工人参与管理的试验也已开始。起初采用的形式是同工人代表非正式地磋商有关“生产组织、商业以及劳务关系、安全保健、文化活动、假期、住房等方面的各种问题”。有些企业则把这类协商机构固定下来成为永久性的委员会。理论和实践又一次齐头并进，不过实践有时走在理论的前头。1949年秋，在挑选一批工厂进行了试验的基础上，决定推荐由选举产生的正式的工人委员会。为此目的，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其中有些人大概反对过这个主意）和联邦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之间进行了讨论。^①12月23日，双方负责人萨拉伊和基德里奇共同签署了一项“关于国营经济企业中工人委员会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建议”的文件，并把这项文件迅速发给选来做实验的二百一十五个大企业。在同一

^① 半官方的党史提到，大约在工会里有几个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反对这个主张。他们觉得工人参加管理可以通过加强工会的作用来进行，这跟通过工人委员会一样有效（而且更好控制？）。

个星期内举行的三中全会似乎没有讨论此事。大约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试验后来竟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重要特征。假如德热拉斯的话可信的话，卡德尔到第二年春天才想起把他们共同倡议的“工人自治”同原来只作为协商手段的“工人委员会”结合在一起。

这一试验被肯定、内容被扩充、并见诸法律之前六个月，还采取了许多别的“权力分散和民主化”的措施。1950年1月颁布的新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候选人提名制度，采用了选民会议直接提名的方式。这只是朝着人民更广泛地参加选举政治代表迈出的很有节制的一步，因为党的领导人不打算让提名完全失去控制。当然这样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有信心控制住全国的政治局面，即使略微放松，也不致闹乱子或者重新出现有力的反对派。从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迹象表明，他们终于相信无论是反共政党的老反对派，或是情报局的新反对派，在公开战场上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重新改组，为的是减少联邦一级的“官僚分子”的数目。这个过程1949年已经开始。有一批联邦主管经济的部被撤销，其职能转给共和国。^①为个别的经济部门设立了联邦委员会，以取代被撤销的部协调全国的经济活动。到1950年7月，党政官僚机构中精简了约十万人。

对特权以及伴随特权而来的腐化堕落现象的抨击一直等到秋天才展开，这次攻击是精心安排的，然而收效不大。根据

^① 1952年2月，联邦矿业和电力工业部被撤销；4月，农业、林业、轻工业、建筑、商业和物资各部都被撤销。各共和国接受了这些新的职权，把原属自己管辖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部门转交各县。

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形式上取消了为党的权贵们开设的物美价廉和供应充足的专用商店、特种别墅以及疗养地。同时，还宣称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不过，绕过这类规定也很容易。例如，允许选民将别墅赠送给领导人以示感激。此外，如果仅仅发一通声明宣称地位平等，那末一贯把这一套视为官样文章的人依然可以不加理会。许多新贵们的优裕生活不断招致党外人士的鄙弃和冷嘲热讽，那些俭朴自守或至少有羞愧之心的共产党员则深感失望和不安。

同时，国民议会于1950年6月27日通过了南斯拉夫战后年代赫赫有名的法案：“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通常所说的工人自治法。^①铁托亲自提出这项新法律，并论证说这一法案是根据党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三个问题的立场提出的：首先，这个法案对开始国家消亡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他对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国家机器必须加强的论点极尽嘲弄之能事）；第二，这个法案对于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党已感觉到一种危险，即党作为一种进步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具有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本身就存在一种由于铁板一块的等级制所形成的党同国家机器和经济体系合并而成三位一体的趋势；第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国家所有制仅代表“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也是最低级的形式”，而新法律则标志着过渡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形式”，标志着从“脱离正轨”的斯大林主义回到“真正的列宁主义”轨道上来。铁托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此。”^②

① 《联邦公报》，1950年第43期（1950年7月5日，第391号法令）。

② 《战斗报》，1950年6月27日。

法令颁布后，生产资料形式上不再是国家所有，而变为“社会财产”。各企业中的工人则变为受托经管社会财产的人。这种为社会所有的财产是以机器、建筑物等形式交给工人，工人则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由十五至一百二十人组成，不足三十人的小企业由全体工人组成)和管理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会选出，不超过二十四名，包括非选举产生的企业经理作为当然委员)行使职权。^①

这些机构的权限，据法令所列，似乎相当广泛：

工人委员会……批准企业的基本计划和年度决算；通过有关企业管理和完成经济计划方面的决议，选举、罢免和撤换管理委员会或其个别委员；经高级经济组织的管理委员会或相应的国家机关批准颁布企业的规章制度；审查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具体措施，并通过批准其工作的决议(第23款)。……管理委员会起草企业基本计划，拟定月度业务计划……决定企业行政人员的任命事项，裁决职工有关解雇和企业内部工作分配的申诉，……(并)负责完成计划和有效经营企业(第27款)。

实际上，这些权力有名无实。大权依然掌握在国家及其任命的经理手中。经理对生产和营业负法律责任，在经济计划范围以内行事。“对国家机构来说，以及在法律事务上涉及

^① “企业”这个词儿，在南斯拉夫是指所有社会主义部门的经济组织，不论从事生产(工业或农业)、贸易、服务业还是财政。“受托管理人”是用来强调：在南斯拉夫，无论是工人或工人委员会形式上都不是工厂的“所有者”。尽管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西方所理解的所有制的大部分正常特征都属于工人委员会或者它同公社政府二者共有。

第三者(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时”，他都代表企业。经理握有工人的录用、解雇(经过一套复杂的申诉程序)和调动的大权；法律上还有权否决自治机关所做的任何决定，只要他认为这种决定同法律或计划相抵触——计划也具有法律效力(第8款，第37—40款)。经理依法由“高级经济组织”任命和撤换。这些“高级经济组织”形式上受工人“自治”机关或它们自己的“自治机关”管辖，实际只是老机构换了新名称而已：“总经理处是作为国家部委的业务机关起作用。”

新体制并不影响有关计划、生产指标和统一分配的中央集中管理系统。只要仿照苏联的那种指令式经济还在实行，国家就继续控制着投入产出的数量和类别、收益的分配以及投资额。工人委员会按时选举，定期协商，但起不到真正管理的作用。他们手上没有可以自行处置的资金。管理委员会实际权限稍宽，但也太小，而且选举过于间接又常受经理操纵，因而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自主权。南斯拉夫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不再把1950年作为经济上“行政管理时代”开始发生转折的年头了。

结论可以有两个：新法律是为了跟共产党情报局和与之沆瀣一气的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战的一个策略，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玩弄的一个花招，以此诱使他们接受一个人民有权的幻想来代替原先答应给他们的现实。另一种可能是，新法律是非常审慎的第一步。它考虑到反对派论据的份量，那些人认为这套办法不切实际而且相当危险，或者至少是不成熟和前途未卜的。所以新法律的倡议者也指出：在一个相当原始的不发达的国度里，只有高度集中的强制积累和有计划的经济控制才能保证发展；同时在这样的国度里，多数工人

(甚至多数管理人员)依然是出身农民的文盲或半文盲,因而差不多没有为实行真正的工人自治提供任何方便。但随着工人委员会经验不断丰富,他们就会逐步被赋予真正的权力来管理一个日益成熟的经济。

也许两种解释都有道理。第一种适用于一部分高级决策人,第二种适用于另一部分高级决策人。可能还有第三种人,介乎两者之间,一方面欢迎这套法律和口号,因为它在宣传战中直接起作用;另一方面,对这套办法是否切实可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然而,放慢激进的体制改革和放慢扩大个人自由还存在一个紧迫的、现实的和直接的理由。这就是工人自治法是在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刻通过的。当时工业生产正在下降。6月份已看得很清楚,由于旱灾和集体化的双重打击,农业收成也将是灾难性的。共产党情报局的封锁带来的危害达到最高峰,使1950年外贸总额减至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第纳尔(约合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比1948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西方的贸易和援助在数量上还没有达到1951—1952年以后那样起重要作用的程度。国民收入低于1948年水平,而军费支出的增加使国防费用几乎占了这个已形拮据而且日益缩小的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到年底,又由于朝鲜战争所引起的西欧和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局势更趋恶化。南斯拉夫进口(这时全部来自西方)价格上涨百分之四十一。12月,国民议会将五年计划推迟一年,延至1952年底完成。这是一个故弄玄虚、毫无意义的举动。五年计划其实早已夭折。它是野心过大、封锁、供应失常和轻重缓急安排不当的牺牲品。“计划经济”早已变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这是战后南斯拉夫最倒霉的时刻——持续三年的经济停

滞，全国濒于饥荒，而情报局又不断施加压力。在此时乖命蹇之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求生存，亦即其领导人提出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亡问题。为此，他们要求人民继续表现忠诚，作出更大努力，同时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如果工人能够通过工人委员会参加管理的幻想（其实委员会并无实权，否则将会毁掉现行的动员和强制机构）有助于使群众积极响应上述要求的话，那也好；不过，在危机时刻，采用一种未经考验其价值的新措施，按理说有些悬乎，而且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必要的冒险。一般的政权，特别象这样一类政权遇到这种危机时，都宁愿“加强暴力工具、权力工具和国家机器、警察、军队以及其他权力因素的地位，而削弱民主的一面”。

一年来，南共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娓娓动听的言辞以及新的立法等等，在思想观念上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但这不意味着同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决裂。不过，他们确实为思想上和组织制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多数部门制止了进一步集权化的过程。此外，对工人委员会的广泛宣传和过分渲染也造成一种气氛，使得工人委员会开始被看作该政权自命不凡的基础和所以合法的支柱，以致这 1950 年 6 月创建的组织和带来的期望无论是什么样子都不能再行抛弃。于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政权就建立在两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国神话”的基础上：游击战争和工人自治。

从此，进一步采取真正的变革已势在必行。一方面宣布了工厂归工人管理的思想，并且从形式上建立起机构；另一方面现存的体制却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这样两者就形成明显的矛盾。同共产党情报局的冲突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前有增无已，这也不断促使他们更加深刻有力地批判苏联

的制度,而这种批判也以新的论据加强了一种观念,只有根除“国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挽救革命。南斯拉夫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因此这些论据也导致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和分析本国的实践。同时,南斯拉夫社会的多民族结构(在联邦宪法中有明文规定)也为权力分散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和适当的机构。经济上持续不断的危机,既可据以反对取消现行的强制加适当鼓励的办法,也可用作反证:即现行的无刺激性的制度造成了磨磨蹭蹭、不负责任、漠不关心和缺乏效率等明显恶果,因此制订一套新的刺激办法已成燃眉之急,而这套办法又要靠独立创新的热情和那种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注重成本、讲究利润的精神来提供。提倡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既是为了活跃经济活动,也是为了政治上印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这样做的结果,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为迎接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更加激烈的改革作了准备。

“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

这个政权在今后十五年内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是寻求一种政治上可以接受的适当机构,以便把这个良好的势头变为现实的目标。由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和问题的独特性,国家落后,斯大林主义在各种机构和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以及全国唯一强大的政治组织中许多(甚至多数)成员怀疑和暗中反对,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主要不是组织上的,而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经济模式,它将赋予“社会所有制的”企业

在收入分配上(特别是利润分配,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以自决权和发言权,否则工人自治仍将是一个空壳。为此,必须抛弃苏联的指令式经济,而代之以别的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前人连想也不曾想过的。有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象波兰人O·兰格曾著书探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兰格的著作以及后来(当南斯拉夫人认定此类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无害时)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可能在理论上有所帮助。可惜1950—1952年南斯拉夫人还没有发现这些资料,而且兰格本人也没有考虑过怎样从一个僵死的(正在崩溃的!)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样的特殊问题。

1950年6月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在行政管理 and 法律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个别地看也许意义不大,但却反映了并加强了一种处理问题的新方式。其中包括一些进一步动摇以至终将放弃集体化道路的措施,如1950年9月取消了机器拖拉机站;1951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在农村发展方针的建议”,再次强调只需改进现有的农民劳动合作社,主要精力则集中扩展综合农业合作社。1951年里还有一些涉及经济的措施。如2月撤销了“国家管制委员会”;4月撤销了“联邦计划委员会”以及留下来的大部分联邦—共和国经济部和总经理处;1月、5月、9月先后制订了至少三项法律,试图取消消费品的价格管制,使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市场,并取消了农产品“统销”的限制。所有这些法律,特别是后两项,被看作是走向自由市场的第一步。1950年12月,选民会议开始作为公众申诉的论坛。在隶属人民阵

线的妇女，青年和别的组织的会议上，也宣告抛弃作为“输送带”的概念。1951年6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主要关心的是法制问题。会上，兰科维奇坦白地承认了国家保安部的过失行为。大会号召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刑法，并要求司法系统进一步独立，警察和法官要更加尊重个人权利。

这些零碎的措施积累起来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未触动核心问题。只是到了1951年12月底，一个内容广泛、意义深远的尝试才使这场伟大的实验具有实质意义。当时通过了一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1952年逐步实施。这虽是一项审慎的法案，有效期仅两年，^①但实际上其历史重要性并不亚于设置工人委员会的法律。这项法案代表了提案人基德里奇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一步，从而为南斯拉夫独特的经济体制赖以成立的两大支柱之一奠定了基础。这两根互为补充的支柱就是前述的“工人自治”和这里所谈的“市场社会主义”。

苏联的那种计划体制被抛弃了。南斯拉夫人代之以年度（后改为中期的）“社会计划”。这对企业不再是命令性和强制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新的计划制度是先确定“基本比例”，而后国家便在此基础上继续计划和控制经济增长的综合、基本参数。根据1951年法令规定，执行上述职能的有三种基本比例：一是工业部门和共和国生产能力的最低利用率（即预期的最低总供应量）；二是部门和共和国按价值计算的“基本”（由国家出资的）投资总额，这种投资是由“全国投资基金”和“共和国投资基金”（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1953年建立的）进行分配而不是通过预算分配；三是按生产能力最低利用率水平支

^① 《联邦公报》，1951年12月30日（第569号法案）。

付工资所需的基金(即最低工资总额)。其余的基本比例都是辅助手段,是为保证执行上述三种基本比例而采取的一些临时措施。如1953年这一年规定的各部门和各企业的“积累比例”——实际上是捐给“投资基金”和某些纳入预算的“社会基金”的比率——既决定着工资基金,也取决于工资基金(这样就由部门来决定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备的主要分配比例)。再如,把这些对社会的“捐款”分配为投资基金和各级国家预算(这里“各级”包括公社人民委员会,因而可以加强地方政府的作用)等等。

新制度有四个因素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因为它们标志着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一,通过社会计划,国家可以摆脱微观经济计划的繁琐事务和对企业活动的直接的“指令式的”控制。然而它可以通过控制基本的分配(储备和消费)和投资环节在宏观经济计划方面保持影响,这对企业来说就是指示性计划。这样国家就不再需要制订生产计划,只要制订投资计划就行了。正如佩约维奇指出的,差别明显地反映在计划工作术语的变化上;1953年以后,社会计划对企业来说,不再是指令,而是预测。

第二,现在企业第一次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它可以自行决定其产品的类型、数量和质量,决定生产过程以及投入的原料和品种,而不必象过去那样非要执行国家主管机关为之制订的详尽的生产计划不可。在市场上采购材料、设备以及销售产品,都富于竞争性。国家可以通知企业“不能”做什么(如随意增加工资,并非特定情况特定商品而随意提价,以及自己控制利润等),但是在正常的企业活动(买卖和生产)范围内,不能命令它“必须”做什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

市场经济，因为企业现在是为销售而生产，而不再是为完成定额而生产。

第三，企业从全国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中得到的是必须还本付息的贷款而非拨款。这样，南斯拉夫人又跟另一个教条分道扬镳了，当然也不无思想斗争。伏克曼诺维奇（在基德里奇于 1953 年去世之后继任经济委员会主席）讲过一个可信的故事：在起草这项法律之前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他建议采用上述贷款办法。基德里奇立即回答说：“那不回到资本主义了！”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伏克曼诺维奇彻夜未眠，反复思考，终于肯定基德里奇是正确的，于是一清早就打电话给基德里奇告诉他自己的想法。不料基德里奇反而肯定伏克曼诺维奇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要那样说了，”基德里奇在电话里回答说，“我也伤了一夜脑筋，这绝不是回到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投资问题上采用贷款的原则。”

第四，与此同时，真正能够鼓励人们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和总的竞争能力的办法并未找到，而这原本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和工人自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所在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国家保证工资基金的百分之九十。这些钱是通过税收制度（即对投资基金和联邦、共和国以及地方预算的“捐款”）和那套“国家提取按中央机关规定的工资以外的几乎全部收入”的哲理搞来的。因此可以说，为了增加工资，重视国家机关的意见并争取相应减少对社会的财政义务可能是有用的，而提高效率以增加企业收入却未必能达到目的。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销售来增加总收入，但利润分配却自己不能做主，要由政治机构决定。投资方针也仍由国家统一掌握，而且人们普遍相信：要想从全国投资基金中赢

得投资贷款，政治权势往往比一份材料详实的盈利计划更有用。因此，这就强烈地刺激人们绞尽脑汁去同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拉关系，而不是设法提高效率和获得赢利。

1952年又遇到了1950年那样灾难性的干旱，经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危急，国民收入（以1960年为不变价格来计算）下降到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亿第纳尔，低于1948年水平。但是到1953年，南斯拉夫经济终于摆脱了停滞状态：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亿第纳尔；就业人员1951年曾减少十万人，1952年减少十一万人，而1953年却增加了十万二千人。形势开始好转，此后除短暂中断外，经济上的繁荣持续了十年之久。以美援为主的外援，源源不断，日益增多，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南斯拉夫人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证明他们的经济制度走上了正轨。然而，他们也为一些问题所苦恼。例如1951年法律的漏洞，不成功的实验，工人委员会一有机会就动用投资基金提高工资造成了“吃掉积累”的偏向等。由于多种原因，他们又着手另一项年终经济改革，这项改革在1953年12月作为一项政府法令被通过，1954年贯彻执行。这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企业和国家之间如何分配企业收入的问题。“由国家确定积累和基金比率的制度”予以废除（1952—1953年那套繁琐手段已为人所共知），代之以“利润分红制”——这个词尽管带有资本主义味道，现已被接受。这是削弱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控制的又一个标志。新法律规定，“利润”是从企业总收

^① 美国经援总额：1950年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1951年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万美元；1952年八千一百四十万美元；1953年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美元。（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纽约，1962年版），第348页附表）

入中作了下列扣除后的净收入：生产材料成本，折旧，固定资产利率（标准利率是百分之六，原则上是由于使用了社会所有的资本货物而支付给“社会”的，实际上是通过全国投资基金筹措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信贷利息，流通税，联邦、共和国和公社的其他税款，养老金以及工资基金。这样确定下来的“利润”，最后还由联邦和共和国扣除所得税，剩余款项再由地方公社和企业本身来分，比例则由公社政府确定。企业所得的份额由工人委员会处置，用于工人附加工资，企业准备金或投资基金，以及集体用项（如工厂集体福利，企业假期野营或工人住房等等）。这样七折八扣剩下来的份额，可以想象数量已微不足道，甚至根本没有。即使有一些，能分摊到工资里去的比例也还受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1954年，工人的份额相当于企业纯利润的百分之四点八，1957年上升到百分之九点二，同固定工资相比，通常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值（被称为“第十三个月的工资”），也有时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值或更多。

1954年的“新经济体制”，虽然便于比较合理的会计核算，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合理和可以预算的税收结构，但联邦政府依旧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减少了企业规定工资和控制分红的权力，也没有增加多少物质刺激。但这种体制倒是增加了地方公社对地方企业的权力，并加强了二者的关系（现在企业可以“选举”自己的经理，不过要由一个委员会提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三分之二由公社政府挑选，三分之一由工人委员会选出）。分红制度年年变动，“象是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参加者有联邦政府、地方当局、企业管理机构、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己，大家都想多捞一点”。

1953年12月的规定，是四年来经济体制中最后一次意义

重大的变革（按照南斯拉夫的标准，四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当贯彻这些规定的时候，德热拉斯危机占去了党领导人的全部注意力，结果在一段时间里进一步自由化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事了。

在这些生气勃勃的年代里，经济多次改革。这类改革是实验性的，往往计划不周，或只是宣布一下而已，有时还突然作出修正等。^① 在进行这些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也经历过多次变革，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和作风都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事实证明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看到，1949年5月通过了“人民委员会法”以后，逐步削弱地方政府机构的过程停止了。经过整整一年的准备，在通过基德里奇的第一个意义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法三个月之后，卡德尔在1952年4月向国民议会提交了另一项“人民委员会法”。他现在特别感兴趣的是改革政治机构，借此机会便提交了又一篇理论性的长文。这篇论文值得人们特别注意和细加揣摩。它是领导集团分析了苏联所犯的错误以及南斯拉夫可能犯哪些错误之后，作出的一个表明理论观点的有益的总结。它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早期宣言，宣告正在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南斯拉夫理论。在此后的十年，这一理论将结出硕果。

卡德尔一开头就对苏联的专制独裁作了人们所熟知的南斯拉夫式的解释。他说这是由于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官

^① 这里叙述得很简单，略去许多小型实验和创造以及某些重要但夭折的实验。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1952年12月引进的作为一种分配投资贷款手段的投资拍卖。

僚机构所造成的恶果。这个官僚机构垄断政治经济大权，“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它比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西方世界中任何“阶级”政府还要专横武断、无法无天。西方由于政治多元化和残存的经济多元化的增长倒还可以阻止这类集权化。至于维持这种专制独裁的秘诀，不仅在于党政官僚机器控制下的垄断经济，而且在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于用工农代表机关（苏维埃）压制自治地方政府。1936年的苏联宪法虽然有所改变，采用了西方式议会制的“形式”，但没有西方多党制的内容。“这样，苏维埃制度堂而皇之地成了‘一党制’，当然是就这个词的贬义而论。”但是只要劳动群众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通过它表达自己的意志并影响更高的国家机关，

那末，这样的体制将保证他们享有的民主多于任何多党制。可是一旦这种体制被废除……实行一种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而又不实行多党制，那时一切有关民主的议论都会变成纯粹的无稽之谈。这就是今日的所谓苏维埃民主的真相。^①

卡德尔论证说：为了避免这种结局，南斯拉夫人必须切实有效地实行三项“基本指导原则”。首先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不能象苏联那样通过虚构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少数人盗用无产阶级名义的暴政来实现，而应当让工人根据工人委员会的制度来控制经济，并让工人派代表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中参与政治决策，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其次，必须真正实行权力分散，这是反对

^①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贝尔格莱德，1952年版），第17页。

少数人在中央进行政治垄断的切实保证。为此，必须赋予地方政府机关真正的权力，而上级国家机关则应由对地方负责和关心的代表掌握。在上述两项原则支持下，第三项原则，即“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和发展中，明确而持久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化”，就一定能实现。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将要逐步采取的政治形式曾有过一个设想：实际上是设置“最高工人委员会”，其中有工人身分（生产者）的工人代表，还有公民身分（消费者）的工人代表，他们共同就更广泛的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作出决定。

卡德尔认为这个观念还有一个好处。我们看到，他曾论证过，一个没有多党制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象在苏联那样，只不过是民主的嘲弄。他说，有些国家也许不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能通过保留多党制避免上述危险，但是南斯拉夫办不到。在南斯拉夫，如果“在人民阵线之外去组织”任何政党，必然会把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包括反革命和亲苏派“纠集在一起”。他们对南斯拉夫革命正在创建的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而任何革命都有权用任何手段捍卫自己，使其中心价值不受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人必须另找一种办法来代替“以多党制存在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政治机构。现在党提出的这种代表制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组织机构，它适合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个基础有两根互相关联的支柱：一是通过人民委员会实现地方政治自治，一是通过工人委员会实现地方经济自治。目标是建立“一种没有政党的新制度，其中每个公民不必通过任何政党而直接地自觉地自觉参加社会管理”。当然，卡德尔并没有讲清

楚，为什么党的领导人所设想的这种制度能够使公众有效地参与决策的多元论制度化，尽管他们开始相信这是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中心问题（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在这一阶段以这样的形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十年之后，事情就清楚了。1953年宪法建立了部分以职业代表为基础的多院制议会。那种通过代表各阶级、各利益集团的政党间的公开竞争来决定事务的办法，将由通过组织起来的职业利益集团公开协调一致做出决策的办法来代替。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多元化的保证。

卡德尔又说，他所提出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法律并非十全十美，“当我们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变得更加强大时”，它还会更新，不过他希望这个法律代表了朝正确方向所迈进的一步。计划对地方政府单位在行政上加以重新改组，以便通过扩大加强地方政府，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基础。现存的七千一百零四个地方人民委员会改为三千八百三十四个公社，分属三百二十七个县，另外还有二十四个不归县辖的市。以前的地方政府的执行委员会被取消，其政治执行职能赋予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从1949年以来，人民委员会一直自制预算，而现在又取得一个外加的好处，即可以从社会计划所确定的企业税（所谓“社会捐款”）中提成，合法地规定自己的最低收入，再不受上级行政机关随心所欲的支配。社会计划是1951年12月经济改革的一个方面，早于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法律。

人民委员会本身现在分为两个院：政治院，它同以前一样，通过直接普选产生；另一个叫“生产者院”，由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职工就地选举产生。这是为实现卡德尔所宣扬的

生产者职业代表制的新观念所迈出的第一步。在选举生产者院的代表时，选举权要根据每一经济部门对国民生产所做贡献的大小按比例分配。这项规定显然给产业工人的选举权比农民为多。至于“非生产者”则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所谓“非生产者”，系指不在社会主义部门的生产企业中工作的人或者某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卡德尔一方面承认这种安排“当然不能认为是理想的和永久性的”，另一方面又企图用“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为之辩护。这是一条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但是他也承认：“这是一种手段，劳动人民可以借此防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变质。”农民由于抵制通过集体化实现社会主义，证明了他们的“保守主义”和不可靠性。农民代表不足的情况持续十年之久，而私人雇员在生产者院中则从未有过代表。

合并小的公社和县来组成规模较大的、经济上较强的公社和县的趋势持续发展，这样就使基层单位的结构逐步合理化，而这些基层单位现在在政治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到1955年，全国合并为一千四百七十九个公社和一百零七个县。公社的财政地位以及凭借这种地位对地方企业的控制继续加强。实际上，1954年的新经济体制使它们取得了一次大跃进；如前所述，现在人民委员会充分控制着它们的企业的利润，甚至可以全部据为己有。再加上他们在选派企业经理方面的权力，这就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和控制它们的地方党组织，在地方经济和企业决策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尽管有工人委员会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国家还鼓励人民委员会在本地区兴办企业，这是影响国民投资政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然而并不总是一个健康的因素。

宪法和代表大会

把南斯拉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套新观点略加编纂,实际上就成了一部新宪法,再进而从理论上引申到关于共产党及其作用的定义上来,这就构成了南斯拉夫脱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纷乱动荡的第一阶段的下一章,也是最终的一章。

1952年以皮雅杰为首的一个议会委员会起草了一部一百一十五条的新宪法,并于1953年1月13日由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的名称冗长,叫做“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这部根本法更换了现已明显过时的1946年宪法的大部分条款,但旧宪法作为新宪法的附录正式保留到1963年,平常提起来就称它为“1946年1月31日的宪法(未废除部分)”。这种离奇的安排理由何在?据卡德尔解释说,在政治上和体制上根本变革的时期,企图全面彻底检查现行宪法还为时过早。

党的核心集团一时正迷恋于地方分权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形式。他们天真地相信民族问题真的已经解决,“南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已经深入人心,因而产生了忽视共和国自治的实际倾向,共和国自治成了一纸法律具文,结果终于导致共和国地位正式下降。那些共和国不再具有“主权”(从而引起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宪法学家们不祥的辩论),分离权的提法也被一笔勾销。现在规定主权属于“劳动人民”。1946年宪法曾将未明确授予联邦或地方共同体的一切权力赋予共和

国。而 1953 年的根本法规定，所有这类权力都归属“劳动人民”，被赋予他们的地方政府机关（人民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以及在教育、文化和保健部门中组成的公民委员会。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即比“工人自治”范围更广的“社会自治”观念，跟这些法律条文一起抛了出来。

在联邦一级，国民议会的民族院（直接代表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构成南斯拉夫联邦制的主要标志）被并入联邦院，仅作为一个半自治团体，职权非常有限。直到 1968 年，联邦院一直具有两重性：多数代表是代表依惯例选出一名代表的选区，每六万南斯拉夫人产生一个代表；另有七十名代表则分别由各共和国议会和自治省议会选出，他们只在特殊情况下单独开会。联邦议会（以及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的第二院现在叫生产者院。根据 1952 年人民委员会法，地方一级的生产者院成立在前。卡德尔关于职业和社团代表制的思想以及成立“最高一级的工人委员会”的设想，在共和国一级和联邦一级都实现了。

“根本法”（新宪法）曾设想议会及其两院的代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然而 1954 年，生产者院除地方一级外，均由地方人民委员会间接选出。1957 年以后，则除联邦院外，公社级以上所有议会各院均为间接选举。这是一种审慎的补充措施，为的是保持党的控制。它完全符合卡德尔的理论动向，即全部抛弃政治代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

其他重要改革如：设置一名总统（代替国民议会主席团这个集体首脑），铁托理所当然地当选这一职务；联邦政府由部长会议改为联邦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体的政治执行机构，没有行政职能或各部长的职责。这是卡德尔的又一个别出心

裁的思想,试图把政治和行政这两类机构、两类职能分开,以此作为“反官僚主义”的手段;后来虽以各种形式进行试验但都行不通。共和国总统是联邦执行委员会的首脑。在联邦行政事务方面,照 1953 年安排(1956年修订过,此后也常有变动),只需要设五个“国务秘书处”,分别负责联邦五个重要方面的事务,由联邦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国务秘书来领导。其他象卫生、教育和文化等部门,把部长改为“委员会”,表示在理论上从政府部门变为“自治”部门。如同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上述改组所依循的概念,十年后才显示出它的实际意义。

鉴于民族问题持久的敏感性,“根本法”特意规定:联邦执行委员会必须包括来自所有共和国的成员,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则为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并未规定各地区各民族必须按比例选出代表,直到 1971 年才采取这一步骤。据一项统计,按共和国分类,1959 年联邦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人数	百分比
塞尔维亚	10	29
克罗地亚	2	6
斯洛文尼亚	6	18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4	12
马其顿	3	9
门的内哥罗	9	26

最引人注目的是门的内哥罗(人口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三)代表过多,而克罗地亚(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二)代表特少。

两个月以前,在南共“六大”会议上戏剧性地重新规定了迄今唯一重要的政治组织——党的职能和作用,从而使按照

根本法改组的国家机构真正起政治作用的可能性显然增大了。正如重新给社会主义国家下定义一样，重新给党下定义，是在南斯拉夫人批判苏联“错在哪里”以及南斯拉夫也可能发生错误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含义作出的。

铁托认为苏联党政不分是剥削工人阶级的重要因素，这种看法是他在1950年6月给国民议会介绍工人委员会法案的演说里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在同一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下令结束党委书记兼任地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普遍做法，以防止党对国家事务直接和过分地干预。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早在1950年12月克罗地亚共产党第二次地区会议上和1951年春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上就讨论过。到1952年初，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局意识形态专家撰写理论文章的最突出的主题。

在这场辩论过程中，南斯拉夫统治者第一次遇到社会主义民主概念中的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难题。他们力图回避这个要害问题。1954年1月清洗德热拉斯的布里俄尼中央全会上，铁托在声明中概括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又出现在196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造反的口号中：“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假如真是这样，那末象他们这样一个封闭的自我拼凑的党的核心集团，或者一个只在内部实行民主的列宁主义干部党，一面继续独揽政治大权，一面又侈谈民主，怎么能不感到露骨的虚伪呢？如果南斯拉夫的民主象苏维埃民主那样具有特定含义，那末南斯拉夫人又怎能同西方一起去谴责苏维埃民主的伪善呢？反之，如果它不独揽大权的话，谁又来担保真正实行民主决策时能够产生

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决定呢？特别在这样一个基本上是遵循传统的社会里，领导核心鼓吹的社会主义价值（用这个党的术语说是“社会主义觉悟”），还远未被每一个人甚至多数人所接受和消化之际，岂不更成问题？

在辩论过程中，南斯拉夫夫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被六中全会认可）是：一方面党必须同国家分开，同日常政治决策分开；另一方面党必须继续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要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得靠牺牲政治垄断和党政合一的“权力”，通过教育、宣传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积极参加企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机关等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活动来施加影响，从而使得一些具体问题能够公开而民主地做出决定。共产党员所拥护的政策应当是党内自由辩论的结果，这就需要内部组织是民主的，各级党组织应由民主选举产生，任何决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所有党员具有约束力。此外，核心集团的某些成员现在也第一次考虑采用多党制作为民主化的一部分，后来这种想法被拒绝，这就不言而喻地使南斯拉夫党重申自己的领导作用，抓牢另外一个生命攸关的政治武器。党虽然在原则上不得不放弃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垄断，但绝不肯放弃政治“组织”上的垄断地位。只要他们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保持内部团结和纪律，这种组织上的垄断地位在选举领导职务以及在人民阵线、工会、市政府和企业管理体系的决策过程中，几乎总是使共产党员比全国没有组织起来的非党群众的力量处于不可比拟的有利地位。作为附带措施，新计划虽未明说，却内定要采取一定步骤保证党的核心人物继续控制关键部门的关键岗位，例如人民阵线、工会、联邦和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即使级别较低的重要行政岗位的干部任命，至

少也须经适当级别的党组织的批准。这不过是改头换面、非正式的苏联提名选举制而已。

在1952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第六次党代大会在萨格勒布召开。铁托在他的定调子的发言中，用很大的篇幅尖锐抨击苏联的内外政策，指出其根源在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其他“种种修正”。这样，他就使“六大”正式确认南斯拉夫对斯大林主义的修正，并纠正了上届党代大会对苏联及其领导人所作的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身患白血病濒于死亡的基德里奇作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了最后一次重新思考之后，明确了自己的信念，也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指明了方向。他说：“新经济体制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尽量避免使用行政命令扼杀这些规律。”只在万不得已时，方可干预，例如为了“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制订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等。那种无视客观规律，一切由中央预算批准，由国家计划产量、品种、投资款项等一套办法，早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无效，只能导致武断、不合理和经济停滞。

大会要通过的最重要的事项是重新规定党的性质和作用，但结果只是象征性地改变了一下党的名称，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事后德热拉斯说，新名称是他想出来的。他后来才记起来，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曾以此称呼第一国际。这次会议往往同德热拉斯及其思想联在一起。是他，起草了大会决议。伏克曼诺维奇和戴迪耶尔很久以后也回忆说（他们有一切理由可以不这么说）：就他们而言，德热拉斯在闭幕式上的讲话是最精彩的。会上各项决定代表了最高领导的一致意见，但其产生的过程却十分微妙，这

些情况前已论及。关于“党的消亡问题”是铁托(和卡德尔)在1951年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德热拉斯。后来在布里俄尼中央全会上铁托回想起来还有点懊悔。因为那次会上把德热拉斯开除出党,就是由于他郑重其事地建议并坚持党应当立刻消亡。^①

“六大”通过的决议和党章,重新规定了党的任务。“共产党人的基本职责和任务”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南共联盟“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或社会生活的直接有效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它主要以说服的办法,影响其他组织机构采纳“它的路线或其个别成员的观点”。在党章的措词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变是把南共联盟说成是“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和最进步的有组织的部分”,而不用“先锋队”一词。卡德尔则未提党的领导作用,只讲党的“自觉作用”。

基层(地方)党组织会议今后要公开举行,并鼓励非党群众参加。尼尔1954年曾参加过贝尔格莱德党的会议,以此成功地检验了这条规定。基层组织的政治部由一名书记代替,在大一些的组织中则由三人书记处代替。党政区分的原则表现在把国家官僚机构和非官方的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统统取消,共产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只以个人身分或作为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基层党组织今后要按职业和地区划分,如工厂、城市居民区和村庄。党的上级机关不再有权向下级机关布置特殊工作任务,只能指示总的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的意见。地区和

^① 类似的情况曾经引起铁托一项建议,并为1951年6月四中全会所通过,即下级党组织不要再把党的个别领导人的理论著作当作必须学习和执行的官方文件,除非“南共联盟对此明确作出了决议”。这表明“南共联盟新理论观点的发展,是在讨论和不同意见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四中全会决议”,载《共产主义者》1951年第2—3期)

地方党组织被赋予更多的自治权；中央委员会不再指定党的组织人员去接办它们的事务，基层组织有权吸收或开除党员，勿需请示上级，党员转正前十八个月的预备期也取消了。

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另一个标志是处于金字塔尖端的政治局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成员扩大为十三人。铁托重新当选为总书记，原政治局的八名成员均被选入新的执行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新成员是三个共和国的首脑：克罗地亚的巴卡里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普察尔和马其顿的科利舍夫斯基。再加上常驻斯洛文尼亚的莱斯科舍克，新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四个成员不经常在贝尔格莱德，或者主要不做联邦工作。这同“根本法”中共和国地位形式上的下降相比，是一个对未来发展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预兆。其他新成员有伏克曼诺维奇，他是病危的基德里奇在经济方面的继承人；萨拉伊，则是工会首脑。

正当党政分开、党内权力分散和民主化问题成为大会突出的主题时，铁托和兰科维奇（他以负责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身分解释新党章）强调说，民主集中制依然是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铁托还坚持说：“南共联盟在成功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非但没有减轻其任务和职责，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它的任务和职责。”兰科维奇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并告诫说：当我们集中精力消除“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危险”时，在许多情况下已“导致另一极端”。许多党员以为新路线意味着党组织

只应处理某些总体的高深的政治问题，不必再深入研究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的基本问题。于是，各级党组织在选举工人委员会和某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以及解决城市、农村、企业

和大学里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处于消极被动状态。

铁托和兰科维奇强调民主集中制和党的责任加强，或者继续委派党中央执委会成员去掌握所有关键的“分支系统”，这同党代表大会决议和新党章强调党政区分、权力分散等等如何协调？没有答案。甚至那些对党的性质和任务创立新说的人也说不上来。结果把基层党员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因为一方面告诉他们制订和贯彻“正确的”社会主义决策的责任加重了，同时又告诉他们承担这一责任的权力必须减少。他们的、也是他们领导人的这个难题，将要左右今后几十年的南斯拉夫政治生活。

德热拉斯下台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即便按照“六大”所规定的党的任务办事，或者按照其他任何非多党制的办法行事，共产党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腐蚀而变为特权阶层，社会主义起码会变成苏联专制独裁的翻版。就是不做这样极端的推论，上述设想（德热拉斯本人在1952—1953年也曾帮助鼓吹过）也还存在另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党员的质量问题。从1948年7月“五大”以来，党员又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到1952年底，总数达七十八万名。其中许多人（即使不是大多数的话）是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和恶棍（包括战后早期入党的某些人），他们一个个权迷心窍。再加上1945年以农民为基础的党的原始质朴性和“思想水平低”，就使得南共联盟在贯彻政治局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专家阐明的、为“六大”所批准的原则时，越来越成为不合适的工具了。大多数党员和领导人不是确实不知所措，就是根本不愿意用细致的思想政治上的说服方法去代替独揽大权、强迫命令等一套简单易行的办

法。“队伍乱了套”，主要表现为士气极度低落，变革遭到顽抗，而这种情况“六大”以前已经比比皆是，后来几个月就变得更加难于驾驭了。

1953年2月，当时拥有七百万成员的“人民阵线”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并决议改名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铁托和卡德尔在党代大会上曾承认：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民阵线”处于“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它的任务主要限于动员人民参加义务劳动。在这次“阵线”代表大会上，卡德尔的定调讲话似乎预示着“人民阵线”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的新时期即将到来。他说：“联盟应当成为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自治团体的政治基础，通过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使这些机构和团体处于群众监督之下。”为此起见，他说：

必须停止下列做法，即党组织在其会议上决定一切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然后简单地把这些决定交由人民阵线批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应当主要转向意识形态的问题和类似的事务……而具体的政治问题或者其他社会问题应当直接交由“社会主义联盟”的组织去解决。

这种设想一直未能实现。现在不清楚，究竟是宣布这一主张时不够严肃认真，只是为了冲淡共产党专政在国内外的印象而虚张声势呢，还是此后十一个月发生的事件迫使他们后退了。

卡德尔讲话中还有一个声明，预示着一项具有真正深远意义的政策变革。我们知道，党的农业路线在党代大会上没有触动。党代大会后的几个星期，巴卡里奇及其他反对集体

化的人终于在执行委员会里就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赢得了胜利。正如卡德尔对“社会主义联盟”代表说的：

实践证明，我国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它和农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处理得当，应当促进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应当是自然的、逐步的，其形式要适应经济的要求。实践还表明，强制的办法（尽管铁托同志不断警告，我国还是发生了强迫现象）和在农业上制造一些生硬的组织形式，其经济效果适得其反。

一个月以后，1953年3月30日，联邦执行委员会颁布一项政令，批准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农民可以退社，带走自己的土地和农具，如果全体社员投票赞成，整个“农民劳动合作社”也可以解散；明显亏本的社必须解散。^①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到1953年底，只剩下一千一百五十二个“农民劳动合作社”和十九万二千五百八十三名社员。伏伊伏丁那本来合作社最多，在九个月内那里三分之二的社员也退了社。后来合作社数目继续减少，到六十年代中期只剩下二十来个社。1952年完全社会主义的成分占南斯拉夫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1957年下降到百分之九。1953年以后的十年期间，新政权没有一项真正的农业政策，他们想提倡综合合作社作为农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的道路，但又举棋不定，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新政权所以迟迟不愿向农民让步，除了教条主义的残余和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指导（这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基

^① 《联邦公报》（1953年），第14号。

海

础)外,还包含一些其他的政治原因。例如“农民劳动合作社”中的十万无地农民怎么办?他们大都是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前游击队员,战后才安置在伏伊伏丁那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党在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的士气问题。他们过去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推进集体化,然后帮助已建的农民劳动合作社经营合理化。为了缓和这两大问题和在理论上防止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伏伊伏丁那党的领导人瓦西里诺夫作为一种姿态提出进一步压低私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1945年土地改革时,最多允许拥有二十五到三十五公顷可耕地,现降为十公顷。这项限制显然受到党内一个集团(又是以巴卡里奇为首)的反对。他们否认一个农民拥有二十五公顷地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并认为这一措施只会给农业增产带来困难。然而,瓦西里诺夫的建议得到包括卡德尔在内的大人物的支持,他们着眼于这一问题的政治意义,终于在1953年5月27日将其订为法律。这项限制实际上只涉及六万六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的二十七万五千公顷土地,仅占全国可耕地的百分之三点七,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正如巴卡里奇所预见的,其严重后果是使家庭农场不能在一个经济上合理而有效的经营范围内得到发展。尽管1965年以后不时有人积极要求增加合法限度,但十公顷的限额依然是法律,直到1970年时才对山区农民作了些让步。

南共联盟的“六大”,社会主义联盟的“四大”和1953年12月颁布的经济改革法令以及对个体农民的让步,标志着从苏联框框中解放出来实行自由化的高潮和第一阶段的结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结束以后,铁托准备起程赴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象征着南斯拉夫同西方恢复友好关系发

展到高级阶段。就在这个时刻，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6月，苏联新领导建议重新互换大使，南斯拉夫同意，此后同苏联集团的关系开始逐步“正常化”。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经济终于摆脱了长期危机，开始了一个持续八年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时期。“六大”和最终放弃集体化以后，党内一般成员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农村尤甚，这已成为党的核心集团日益关注的事情。而党内外另一部分人则受所有这些发展的鼓舞，兴奋地议论着，认为南斯拉夫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条件似已成熟，有时甚至议论在社会主义联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成立第二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问题。

这些事态的发展终于引起铁托及其几个主要助手对形势重新进行审慎的估价。十八年后，铁托宣称他“一直不喜欢‘六大’”。他当时强调民主集中制和党的责任感。他后来在所有艰难危险时刻所作出的反应都证明这一点属实，至少可以说他对1952年11月所采取的路线是有怀疑和保留的。此刻“六大”以后事态的发展，如希望进一步改革（在他看来是危险的），经济复兴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性减少，他认为南—苏关系有重新修好的可能性，特别是党内士气低落等问题，都促使铁托在1953年6月召集中央委员会，决定从“六大”精神向后倒退一小步。此后七个月里，核心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德热拉斯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内更大的混乱，导致再一次的后退，并就此冻结现状。这种局面，尽管事关党的基本面貌，却持续十年之久。

然而南斯拉夫1954年以后的制度，同1949年刚开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第一次大辩论时根本不同。意识形态上的许多基本学说和娓娓动听的自治理论，现

已成为南斯拉夫在理论和政治风格上区别于苏联以及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特征。即使这一切在“实际生活”和普通群众中还没有多大影响，但从长远后果来看，1950—1953年的改革最终必然导致这个制度的性质起根本性的变化。在南斯拉夫，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党在国家中的作用，现在都是间接的。尽管经济、国家和党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并继续受党的控制，但上述事实的深远意义在于这三个基本的“分支系统”已肯定无疑地相互分开，独立发展并根据各自固有的职能赋予不同的组织形式。1949年“无所不包而铁板一块的社会制度”现已荡然无存。

第三章 巩固和发展

德热拉斯危机

位于伊斯的利亚西南端的布里俄尼群岛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游览胜地。在如茵的草地、古老的森林和海滨罗马遗迹之间，曲径蜿蜒，别墅错落。1947年南斯拉夫人占领以后，这个地方成了共产党上层人士的游憩场所和铁托所喜爱的私人疗养地。1953年6月，铁托在那里召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这是战后第一次不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也即南共六届二中全会。德热拉斯以其激进的观点，批评党在掌权以后有成为特权的和孤立的“官僚阶级”的趋势，早已开始和他的同志们有了分歧。这次他对选择在布里俄尼开会表示不满，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卡德尔回答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其他人则沉默不语”。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铁托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从1954年1月三中全会开始，以后凡是在布里俄尼召开中央全会，就标志着需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或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发生了危机。

二中全会的目的在于讨论和通过对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工作和风气的总结，总结中对两点作了尖锐的批评。全会致全党的信中指出：“在贯彻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主要的不良倾向。首先有如下各种错误思想：共产党人如今已无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职责；共产党员的任务现在只消做做报告；民主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不再需要向反社会主义的现象和倾向作斗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级组织和领导者在政治斗争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指示，不再是共产党员必须执行的了；共产党员改正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就是放弃为共产主义信念和目标而奋斗；他们不再需要有自己的立场等等。其次是认为“六大”以后工作的方式方法没有任何改变，工作还是老一套，民主则是我们宣传鼓动的策略等等。

信中进一步说：“各种靠不住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出现”，许多共产党员变得消极起来并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和民主思想”，“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而展开的斗争十分无力”。“党的消亡”的概念被普遍误解；党的消亡只是在遥远的将来，最终消灭了阶级敌人和阶级矛盾因而不再需要强大、统一的思想领导的时候才有可能。

德热拉斯不同意这些看法。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第二天，在我们穿过利卡去钓鲑鱼的路上，我告诉卡德尔，我不能支持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路线。他非常聪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批评我夸大了并非“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本质特征的过渡阶段。

德热拉斯在会后回去继续写文章，就如他在七个月后谴责他的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他确信布里俄尼的二中全会“是片

面的，它忽略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对这次中央全会精神的精神必须设法予以纠正”。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写的文章强调必须为争取更大的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斯大林主义的流毒而斗争，这些文章受到热烈欢迎。因此他决定进一步开展批判运动。10月中旬，他开始在《战斗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于是促进了危机的发生。他曾征求铁托的意见，铁托认为他迄今所发表的文章反映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关于这个问题所说过或写过的看法”。对于目前这一系列文章，铁托说：“有些问题我是不同意的”，“但大体说来，这些文章中还有不少有益的东西……继续写吧”。^①

德热拉斯继续干了。截至1953年夏天，要说他和卡德尔以及其他一些属于亲密的内部集团中的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他还不如这些人批评得早，批评得激烈呢！但他这个门的内哥罗人既然开了口就再也无法自制，非把批评进行到底，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可。他轻率地这么干，完全不顾自己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也不顾自己是内部集团所有成员中唯一一个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因而根本无法接触到国内落后的边远地区的意见，也无法了解当时社会上正在发生迅猛而令人吃惊的变化，以及党和人民对他所提出的意见毫无准备。

南斯拉夫党开展对社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总是在党的少数高级领导人中私下进行的。但这种批评的情绪如今却埋藏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几乎达到要爆炸的程度。德热拉斯开始无意地后来是有意地与他的同

^① 见铁托在南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志疏远起来。当他发觉自己与同志们在思想上距离越来越远时，有时遇在一起就故意表示一点轻蔑和无礼的态度，还希望别人能感到。在德热拉斯内心及其同事关系上的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动力，与他所写的东西一样，对事态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与他的思想演变也有密切的关系。德热拉斯打破了集体思想方法和老同志之间必须达到意见一致的不成文的原则。他象一个局外人那样进行批评（伏克曼诺维奇和其他人注意到他的一个重大错误，并提出责难，即他有时称核心成员为“他们”而不称“我们”）。即使在几十年以后，核心集团也还不能容忍他的这种做法。德热拉斯不在集团内部私下先进行讨论——除了他同铁托有过草率的谈话——而率自在《战斗报》上公开干，这在南斯拉夫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事情发展到中途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德热拉斯告诉我们，在12月7—8日的那夜，他的信仰彻底改变，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干了。他发现：他不可妥协的最终目标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他以奉献给过去的信仰同样狂热的虔诚信仰它。他关于那个夜晚的叙述给人提供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形象：一个是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①另一个是科索沃战役前夕的拉扎尔大公。一个要天上的王国，另一个要地上的王国，他属于前一种形象。德热拉斯也有自己不象扫罗的重要特点，他竭力避免作出任何努力去组织人们支持自己的观点。某种主义的真正倡导者证明，要别人信仰是靠他言词中的激情和真理，而不是世俗的权谋。因而德热拉斯行事的方式尽管笨拙，但其意图只是要改变他的同事的信仰，

^① 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译者

而不是想操纵或推翻他的朋友。他使用的这种痛苦的内省方式就决定了他的斗争是纯属内心的、个人自身的斗争，而决非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因而，他也就根本不可能去做许多支持他观点的党员和非党群众尖锐地批评他没有做的事。他作为全国最有权威的四个人之一，只要稍微缓和地表达这些观点，就能保持他的权力和地位，从而逐步实现他的想法。

直到 11 月底，在德热拉斯以复杂而晦涩的思想方式在《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还很少提到 1953 年南斯拉夫所出现的新的也是令人吃惊的局面。之后，文章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集中。开始是攻击“官僚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从抽象概念的角度来提倡更大的自由，还引证了苏联的实践——实际上即意味着以“六大”的名义攻击二中全会。尔后，德热拉斯便加快步伐进而具体攻击南斯拉夫党内斯大林思想的残余以及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领导方式。这些——以及那些还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些问题的人——对德热拉斯来说就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建立工人和农民可以自由地讨论、接受或拒绝南共联盟意见这样一个社会的主要障碍。至于联盟本身的角色，他认为应该是由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团体，以便为自由社会创造和提供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为了保证这些思想的无私和先进的内容，就要求这个组织成员不追求权力和特权。虽然他宣称不主张“解散共产主义者联盟”（他曾称之为“荒谬的提议”），但在别人看来，他的建议必然是：

共产主义者联盟将从旧式的党变成思想上一致的人们的真正

生气勃勃的结合。……现在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一个标准的政党将要“削弱”和“消亡”。……〔它〕将逐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而失去其政党的特性。它将和社会主义联盟合并，共产主义者也会与一般公民合为一体……

当德热拉斯在1954年1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他被警告说：在卢布尔雅那附近的一个冬季疗养地休养的铁托“非常生气”，其他的老朋友象卡德尔（德热拉斯在12月22日曾和他长谈）对他后来一些文章的含义深感震惊。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再一次和他面对面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他没有退让，反而把另一篇内容不一样的题为“道德的剖析”的文章赶紧付印，登在《新思想》杂志上。这篇文章感情冲动，把诗的形式与粗鲁的政治讽刺不成熟地结合在一起。文章揭示了一个具体事实：游击队英雄、南斯拉夫参谋长达普切维奇新婚的美丽的演员夫人，在社交界遭到那些前游击队骨干（姑隐这些人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的自命不凡和野心勃勃的夫人们的排斥。他用这个事实作为工具，猛烈攻击一批革命者为权力和特权所腐蚀，已经堕落成一个狭隘的特权阶级。这是一种奇特的自杀行为。德热拉斯当会知道，与朋友们的妻子为敌是极端危险的。

这时，卡德尔告诉他，已组成一个党的委员会着手对他提出指控。这个委员会由巴卡里奇领导。德热拉斯后来写道：“大概是因为他的观点和我接近”。1月10日《战斗报》宣布：德热拉斯的文章“是和执行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意见对立的”，并将由下星期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审议。那些原以为

德热拉斯依然是由铁托授权发言的党员群众和党报编辑们，对他的文章一直反应热烈。这种反应有时候虽然是出于责任使然，但通常是真诚的。铁托对这种反应吃惊不小，于是就行动起来。

德热拉斯在1月16日和17日再次在布里俄尼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受到谴责。会议情况一反常规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开会的方式和进行的处分都是事前计划好的，同苏联的清洗审判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其作用却有共同之处：使犯严重错误的人在公众中孤立和蒙受侮辱，如若可能则以他们的忏悔和公开认错而结束。

铁托带头对德热拉斯进行政治上的谴责。卡德尔接着从意识形态上拐弯抹角地批驳了他的思想。这实在不象一个主要官方理论家的出色表演，倒是非理论家的铁托尖锐地指出了德热拉斯的基本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致命“错误”。德热拉斯在《战斗报》上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中，12月31日那最后的一篇尽情嘲笑了继续坚持南斯拉夫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指出其不易为人察觉的严重后果。

……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起了变化，但理论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资产阶级已是过去的阶级留下的一点痕迹；在大城市中甚至小资产阶级都已消失。今天再继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斗争，就必然陷入官僚主义的泥坑，并同普通老百姓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超越法律和不顾法律地加强阶级斗争的作法，破坏法制和民主。

铁托说不是这样：

对德热拉斯来说，阶级已不存在，阶级敌人也不再存在，现在大家都一个样了。但是，他本身的问题恰恰证明，阶级敌人依然是多么危险。阶级敌人就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心脏里，并且其表现形式在不断变换。

铁托在这个基础上反复强调了他在二中全会上已经说过的话：

我第一个谈到党的消亡，联盟的消亡。但我并不是说应该在六个月或一两年之内就实现，而是说将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最后的阶级敌人还没有失去活动能力，社会主义觉悟还没有在各阶层深入人心，那就谈不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消亡或消灭问题。^①

这番话论证了恢复党的控制的合理性，也是二十年以后“阶级斗争”这样的字眼几乎已经从党的词汇中消失时铁托还要运用的措词。

德热拉斯的答辩十分混乱，两天内其他中央委员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道德上对他尽情嘲笑。最后，德热拉斯再一次发言。这个发言近乎完全而卑下地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迅速退却了。对信仰的背弃正是他所作的很多连他自己都无法满意的矛盾解释的原因。但是他还顽固地重复他的主要论点，说党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被清除出中央

^① 《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第22期，第16页。

委员会并给予“最后警告”处分，这是党内仅次于开除的一种处分。不久，他被解除了一切国家职务，包括他刚当选的联邦议会主席的职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在《战斗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正好发表。三个月以后，他主动退党。从此，他孤身独处，之后进了监狱，于是选择了一条苦思冥想，用优美的风格和人类的洞察力著书立说的道路，而不再象他原来那样作为一个党的或反党的论战者来写作。最后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帕尔莫蒂切瓦街一个朴实、舒适的公寓里过着平静的生活，慎重地思考哲学上的问题。他对来访者自我解嘲地说，他住的这个地方离议会大厦只几码远……

在布里俄尼会议上只有德热拉斯的前妻米特拉·米特罗维奇有些犹豫地替他辩护。此外就是戴迪耶尔，他是带着特有的勇气和感情为德热拉斯辩护的。他和德热拉斯一起遭到贬斥，后因自愿流放而未被监禁，一直到十年后才在家乡找到非正式的工作。他所以会遭到这样的对待，是因为他向全会讲了实话，破坏了全体一致对德热拉斯的谴责：

德热拉斯在《战斗报》上的主张，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接受了的。……我们扪心自问，就该承认这个事实。……就是那些赞成德热拉斯文章的人，现在又激烈地攻击德热拉斯。……我们怎么能对一件事情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呢？

铁托早已作了回答。他对全会说，他认为德热拉斯的思想“将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可怕的动荡。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只消一年社会主义的现实就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对你们说，用

不着进行一场流血的战斗，社会主义即将不复存在”。而德热拉斯本人在《战斗报》上开始发表一系列倒霉的文章之前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章里，就提供了又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论据。1953年8月他写道：“放弃权力是可能的，也是进步的和符合社会主义的，但是放弃的权力必须不落到别人手里，不为任何人（包括其他的阶级和政党）所篡夺”。当人们理解到他要立即放弃权力，而冷静下来考虑究竟什么人会夺取党所放弃的权力时——有的人确实想到是“阶级敌人”，但另一些人谅必想到那时只有国家保安部和军队会被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潜力的有组织的力量保留下来——甚至同意德热拉斯所持的批评观点的人，对他的结论也不敢苟同了。这些人加入了那些极力寻找借口不放弃权力的人的行列，就使德热拉斯在党中央这样一个唯一重要的政治等级上差不多完全孤立。

铁托和赫鲁晓夫

“德热拉斯给我们大大地帮了一个倒忙，他使我们十年没有取得进展”，这是六十年代初党内自由派中的一种很普遍的评论。它使我们意外精确地估计到这些自由派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立场的时间。德热拉斯的思想曾在这些自由派中造成恐慌，使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德热拉斯至多只是加强了早已开始的放弃权力和重新评价的进程的声势。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进程本身激励他写了那一系列著名的文章。当然这十年停滞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概括说来是：经济的动态，道德的败坏，各级党组织对于向它们的权力和特权挑战的行为进行的抵制，以及党的最高领导的忧虑恐

惧之情。他们担心党对至关重要的权力杠杆的掌握早已过分松弛，以致助长了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概念的复活，而在南斯拉夫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的心目中仍然存在着复活资产阶级民主的肥沃土壤。德热拉斯的思想及其所引起的普遍肯定的反应，看来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担心并非过虑。此外，还有总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演变，特别是对东欧政策的改变，以及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这最后一项因素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起着几乎是唯一的或单方面的因果作用。那些人简单地认为：南斯拉夫的自由化时期是与“东方”争吵和依赖西方所造成的；后来的“收紧”时期则是为了与东方实现一系列缓和所作出的一种必要的牺牲，许多领导人也都热心于这种牺牲。关联是存在的，但比较微妙、复杂，有时则颇为矛盾。比如，就在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同月召开了二中全会；再如，1956年和1957年第一次和第二次恢复关系的高潮中，竭力加强党内纪律和政治上的独裁等。然而，不能从这几个简单的事例看问题。

尽管苏一南在外交和商业关系上逐渐“正常化”，但双方在报纸上继续互相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下于1954年大部分时间里所惯有的局面。这说明所谓改善关系，不过是苏联新领导所追求的全面缓和外交关系的一部分而已。在10月和11月，莫斯科作了一些希望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表示。但1955年2月莫洛托夫在一个声明中说，进一步改善关系主要取决于南斯拉夫。这个声明遭到铁托尖锐的批驳。这可以解释为两国间确曾期待过的思想上的调和一致是失败了。因此5月14

日突然宣布，在月底前由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率领的苏联高级代表团将到南斯拉夫作国事访问，便震惊了世界。后来才知道，这次访问准备了六个月，而莫洛托夫的讲话表明苏联一些领导人曾反对这次访问。

1955年5月27日贝尔格莱德飞机场上的情景迭有报道：铁托穿着洁白的元帅服笔挺地、毫无笑容地站着，而赫鲁晓夫作为引人注目地率领着一个国家代表团的党的领袖则穿着皱折的夏装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向麦克风，向全世界宣读苏联共产党卑下的道歉，承认与南斯拉夫争吵的历史罪过。赫鲁晓夫说：“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攻击斯大林，他把罪过都推在“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身上。他说：经过全面研究，现在已经弄清楚，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大量的谴责和侮辱”都是根据“钻进党内的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卑鄙的代理人所捏造的材料”作出的。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苏联领导人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排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并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他也表明了建立“两党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愿望”。铁托仍然沉着脸，赫鲁晓夫刚结束讲话，这位南斯拉夫总统就把话筒推往一边，默然领着他的客人登上等候着的罗尔斯·罗伊斯牌高级轿车。赫鲁晓夫的讲话和铁托故意做作的令人悚然的沉默说明，俄国人对这个现在他们认为是极不公平的争论已承担了全部责任。

在八天的访问结束的时候，铁托和布尔加宁签署了历史上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文件正式承认南斯拉夫关于走向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道路的立场。两国政府一致肯定：“在两国关系中互相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互相平等”；并保证，

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经济性质的、政治性质的或是思想性质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内部结构的问题,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发展社会主义具体形式的不同,完全是不同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

铁托和南斯拉夫人曾公然反抗活着的斯大林并取得胜利,斯大林的继承人现在戏剧性地承认了这一点。斯大林由于过分自信而估计错误,所以行动总不得力,为时老是过晚,于是帮助南斯拉夫人取得了胜利。首先,他以为“动一动小拇指”,南斯拉夫党就会听他的命令反对铁托,结果发现南共忠于铁托而不是忠于他,接着又实行很不高明的经济封锁,结果发现西方意外地愿意“保存铁托”而不要求他作出根本不可能妥协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让步,最后是迷信武力威胁,那也太晚了,因为当时仍然无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保护伞已悄悄地、有效地扩及南斯拉夫。斯大林失败了,这是他在重大冲突中唯一的一次失败。他未能损伤南斯拉夫胜利的一根毫毛,也未能贬低这一胜利在东欧和世界上的重大意义。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被一个小国弄得公开出丑。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国那样被迫屈服便开了一个先例,即对苏联控制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和党的思想政治上的仲裁地位提出了挑战:如果说南斯拉夫能真正摆脱苏联而独立,能走自己“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能得到苏联的同意,那末别的国家又为什么不能呢?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忠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理论教条和政治策略的指挥中心的神话,尽管以前曾受到多次冲击,基本上还是维持住了。但这一次,在1955年

5月27日下午贝尔格莱德的飞机场，却给打得粉碎。苏联仍然保持着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威力，以及作为老大哥的特殊威望。但是贝尔格莱德的先例和赫鲁晓夫在国内、国际上所推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密切关联，就越来越迫使苏联领导人尽管为难却不能不赤裸裸地利用军事和经济实力（这正是赫鲁晓夫所力图避免的），以便维持比斯大林王国略为放松一点的霸权。

贝尔格莱德宣言没有提到党的关系，如果写进去那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只是国事访问结束后政府间的协议。总之，是南斯拉夫而不是苏联，似乎认为恢复两党关系还不成熟。然而一年以后，铁托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的访问作了回访。这是他从1946年以来第一次去苏联。苏联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接待，并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很好地弥补了两党关系这个缺陷。在赫鲁晓夫回国到铁托访苏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及其罪行，特别谴责了他在1948年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非斯大林化运动已经显示出更为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1956年4月正式解散。莫洛托夫因为在1948年给南斯拉夫的信上同斯大林一起签了名，即于6月份铁托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被解除了苏联外交部长的职务。卫星国之中的“铁托主义者”，不管死去的还是在世的都恢复了名誉。东欧处在动乱之中。

1955年5月以后的十七个月中，铁托被展现在眼前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整个苏联帝国将转而采取南斯拉夫的原则，他自己尤其在欧洲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将在思想和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1945—1947年的梦想以一种新的、更为美妙的

形式复活了。到 1956 年夏天，波兰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地讨论工人委员会以及南斯拉夫制度的其他方面。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并在两次大战之间担任情报局官员的陶里亚蒂，已在走南斯拉夫五年前所走的道路。但俄国的非斯大林主义者却依然没有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因为他们把苏维埃制度的祸害归罪于“官僚主义的堕落”，而不单纯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9 月，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布里俄尼与铁托磋商匈牙利的局势，并请铁托同他一起回雅尔塔接见和批准一个匈牙利的新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以格罗·埃诺为首（他是即将离职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的忠实代表），而不是南斯拉夫认为合适的纳吉（他提倡更自由的路线，主张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奥地利保持特殊关系，这是一种令人感兴趣而可能实行的想法），但作为一种过渡方案，可以勉强接受。重要的是，赫鲁晓夫似乎承认并接受了斯大林在 1948 年所否定的铁托在欧洲多瑙河地区的特殊影响。

但是 1956 年 11 月，铁托的希望即苏—南关系的改善和其他许多事情，由于布达佩斯所发生的障碍归于破灭。在苏联两次军事干涉之间当上了总理的纳吉到布达佩斯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要求避难，而他过去的自由主义盟友，格罗的继承人卡达尔，作为党的领导则邀请红军回来恢复秩序，停止匈牙利对华沙条约的背叛，并防止恢复多党制度。在枪声静寂下来一个星期以后，铁托看到由于战术上的错误估计，以致自己的重大战略设想告吹，于是企图于 11 月 11 日在普拉讲话中澄清南斯拉夫的立场。他现在面临困境：苏联第二次干涉当天的晚上他才得到通知，由于不能阻止只能勉强同意，这件事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但他也害怕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和在南

斯拉夫国内产生的影响，因为南斯拉夫人民以及大部分党员同情匈牙利人的愿望并为苏联的行径所激怒。他企图用解释来调和矛盾，能挽救尽量挽救，这和他一生中对其他事件的反映及所采取的说实话的态度不谋而合。然而，他的解释既激怒了匈牙利独立的保卫者，也激怒了这种独立的侵犯者。

铁托嘲笑苏联关于匈牙利革命是反动派及外部势力所策动的说法。他说，这场革命是以“进步力量”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开始的。由于苏联采取了长期支持匈牙利的斯大林分子、挑选并强加给匈牙利一个不合适的继承人格罗、还答应了他要求武力援助的呼吁这样的政策，使得局势大为恶化。铁托说，10月23日苏联第一次的干涉是毫无理由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这只能“进一步激怒人民”，并且使“反革命分子有可能将针对一个集团的正当反抗变为一种全民族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暴动”。但是一旦革命带上了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色彩，其结果不是苏联进行干涉，就是“混乱、内战、反革命、新的世界大战”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第二次军事干涉尽管也是令人深感遗憾的，究竟祸害小些。

苏联领导人(或部分领导人)在9月初就已对南斯拉夫的作用表示关切。他们不管赫鲁晓夫继续讨好铁托，秘密地发信给东欧各党，号召在苏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警惕铁托的影响，并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性质提出了疑问。他们对铁托在普拉的讲话反应强烈，指责南斯拉夫“散布不团结”和声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在1957年2月单方面提出将1956年答应给南斯拉夫的贷款延期。双方又恢复了前些年在报纸上的互相谩骂。铁托认为这时的形势与1948年底相仿。但事实并非

如此，因为双方都不希望这样。自负和期望似乎使铁托看不到匈牙利的教训，即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仍然是要建立在苏联的霸权基础上的。同时，赫鲁晓夫显然深信南斯拉夫最终将会按照他的条件回到社会主义集团里来。1957年8月，铁托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秘密会见，讨论解决双方的分歧。此后，再一次恢复友好关系的活动似乎又在积极进行之中。铁托以十分肯定的词句谈到苏联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用否定词句；德热拉斯在1956年底因为在西方发表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文章而被监禁，后来又因为出版《新阶级》（是根据从南斯拉夫神秘地偷运出来的原稿出版的）一书而延长了十年刑期；南斯拉夫作为一个非苏联集团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了西德与贝尔格莱德的断交。于是苏联集团在2月延期的贷款在7月又重新恢复。

第二次和好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11月准备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苏联党散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共产主义团结的决议草案，要求其他执政党的首脑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时签字。在草案中，“以民族的特殊性为借口的……修正主义”被说成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草案还一再提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苏联的领导作用。用半官方的南斯拉夫党史中的话来说，草案与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声明的原则相违背：“按照这个宣言，又要恢复以一个国家为领导的一个阵营的概念。它号召反修，实际上是直接针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外交政策。”

铁托原来宣布要去参加纪念活动的，但后来称病没有去莫斯科。南共联盟改派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为代表，他们拒绝

签署宣言。南斯拉夫报纸报道了赫鲁晓夫的恼怒和威胁，苏一南关系又濒临发生新争论的边缘。后来，当南共联盟把将要提交4月份“七大”通过的纲领草案散发给苏联和其他党时，南一苏的争论终于发生了。苏共交给南斯拉夫一个全面而详尽地批判纲领草案的文件。南斯拉夫对纲领草案作了一些非实质性的改动，算是为“社会主义团结”所作的最后姿态。在南共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三天，苏共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发表了苏联批判南共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并声称社会主义阵营的党不会接受南斯拉夫的邀请出席大会。兰科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强硬的、挑衅性的发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当即示威性地退席。唯一没有退席的是波兰大使，这曾引起一阵轰动，后来才发现他当时似乎睡着了。

在社会主义集团的报纸上又开始了反南斯拉夫的论战，调子比1954年以来任何一次都高。重要的是，这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中国共产党；而南斯拉夫人曾期望，中国共产党由于本身独立的和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会成为他们最有力的同盟者。时断时续的苏联集团的贷款，现在又中止了，宣称要延期五年拨付。赫鲁晓夫1958年6月3日在邻国保加利亚党代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称铁托是“特洛伊木马”，并且声言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挖苦说：“有些理论家是靠帝国主义国家施舍剩余物资过日子的”，又说：“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美国的小麦上的。”几天以后，铁托在伊斯的利亚的拉宾的一次讲话中反击说：“有些人还知道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而另一些人就连在自己的麦子上为啥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都不知道。”

新的争吵长达三年。回顾起来很清楚，苏联的立场和中

苏争端的事态发展密切有关（虽然中苏争吵与南苏争吵是两回事），但这也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在 1957 年调情期间彼此误解了对方的立场所带来的恶果。彼此都认为对方缺不了自己，因此要价过高。自德热拉斯危机以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从言论到行动都曾明显表现出他们担心西方的影响以及经济上过分的依赖西方。赫鲁晓夫似乎确信，现在他们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并希望抵消西方思想和信贷的影响，所以他们很可能接受波兰的解决办法：即承认他们决定国内政策的权利，以使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同苏联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铁托主观地想象苏联对贝尔格莱德的政策是克里姆林宫内赫鲁晓夫和新斯大林分子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通过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来支持赫鲁晓夫派，自己就能在苏联对内政策和对社会主义阵营政策的自由化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再一次起重大作用。但双方的想法都错了。

经济发展和政治停顿

外事作为一个因素到底对南斯拉夫的内政有多大影响很难断定，但一般认为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南斯拉夫希望同苏联和解，并且竭力利用苏联过去的屈服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东欧的势力，这种对外政策一方面要求南斯拉夫谨慎地保持独立（与此相适应，南斯拉夫既热烈地倡议“积极的和平共处”，后来发展成一个与亚、非其他中立国家“不结盟”的同盟，还悄悄地与西方保持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这后一点在每次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时都遭到攻击），

另一方面也要求南斯拉夫在意识形态和国内政策方面，同斯大林死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一套，在外表上不要有过于引人注目的差别。但是除此以外，这种政策还可以被兰科维奇和铁托这样的人用来作为一种论据，因为他们由于完全不同的国内原因，希望限制南斯拉夫的国内改革和延缓履行早已许下的诺言。

与此相反，每次与苏联的争吵，都加强了贝尔格莱德领导层中主张国内进一步自由化、或者至少不从1953年所达到的自由化水平后退的那些人的地位。这样也就使他们能够争辩说：南斯拉夫在思想意识和国内政策方面向苏联所作出的“让步”只会使自己左右为难，从来没有取得积极效果。因为一方面除非南斯拉夫完全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苏联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另一方面，这些让步又正在破坏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和增强抵抗“东方”压力的能力极为重要。同时，这种让步还再次损害着国内对现政权的支持。这种与苏联关系的起伏反复，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后果：在与东方疏远和与西方亲密的时期，南斯拉夫统治集团中某些人就要设法更为牢固地控制党和人民，以尽量减少“外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在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时期，又刺激其他一些人比较谨慎地致力于保持或至少尽量挽救自由化最后高潮中的成果。最后，一种更为内在的心理因素必然也在起作用：即有些南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在最高领导层中的战前的老党员们，他们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斯拉夫人和爱国者，他们对苏联仍然有一种既恨又爱的感情。对他们来说，苏联既是革命故乡，俄罗斯母亲，又是东欧各小国不可容忍的压迫者。因此，他们对苏联的讨好和霸道所作的反

应就十分复杂并往往存在固有的矛盾。

国际形势是一个对国内加强控制和实行自由化两方面都有影响的因素。这一点，在对一般南斯拉夫人进行警察恫吓的程度和形式上，反映得最为明显。五十年代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的大逮捕-大迫害的高潮，是发生在1956年底和1957年，即苏-南争吵的第二阶段，以及在1958年第三次争吵开始以后，而不是发生在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时期。五十年代的那些时期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和监督比1950年到1973年之间的任何时候都厉害。1956—1957年所以这么做显然是由于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如果布达佩斯的自由化出乎铁托的意料之外，转变为铁托和国家保安部所认为的反革命行动，那末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发生在南斯拉夫。因此，必须通过示威性的逮捕和判罪，使南斯拉夫人民认识到：他们所走的比较自由的不同道路，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心慈手软。由于押在赫鲁晓夫身上的赌注的失败，损害了铁托个人以至于新政权深入人心的威望，所以1958年的大逮捕和大迫害很可能是兰科维奇对此作出的神经质的反应。

党本身是在1953年夏天开始“收紧”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主要是针对党员中的混乱和消极现象，也是针对国内“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惊人的泛滥和对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日益向往。1955—1956年东欧非斯大林化运动所提供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自由化的可能性，是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但它是那么遥远，不能认为是一个作用会持续一年以上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可能性对1956年重申党的纪律和权威是有影响的。但即使在当时，也还有其重要的国内原因。

二中全会以后，党员数目显著下降，部分原因是清洗和开

除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自愿退党和有意削减吸收新党员的数目。1953年有七万二千零六十七名党员被开除出南共联盟，三万二千多人退党，这十万多人中绝大多数是下半年出党的。随后两年，又开除了二十七万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而新入党的则为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七人。到1956年年中，党员总数从“六大”时的七十八万多人下降到六十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四人。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几乎减少了一半。被清洗的人中，将近百分之二十五是工人，百分之五十四是农民，百分之十八是白领职员。因为白领职员在新党员中占的比率最大，所以南共联盟已不再是农民占优势的党，也没有变成工人阶级的党。

如果说由于这个时期的政策要求部分地回到列宁主义的“干部党”，所以党员总数的下降本身并不令人忧虑；那末，新党员中社会结构的不断改变和青年人比例下降，倒是令人担心的。有关报告也说到这种令人担心的情况，而且指出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进，也没有引起重视，而现在则归罪于按“六大”决议所进行的组织改革。据说除经济企业以外，解散国家机构和其他一些机构中党的组织，使共产党员无法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大家没有共同的利益和义务，所以留下来的公社一级党组织的会议大多变为听听报告而已。尽管这些是大家公认的进行改革的明确目的，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1956年3月，铁托召开六中全会，采取行动反对“各种消极现象”。他在会上指责：这种消极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党的纪律和责任心的松懈，共产党人统一行动的削弱，以及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央全会上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有启发性，暗示披着代表共和国经济利益外衣而重新出现

的民族问题也牵扯进去了。全会一致同意：“消极现象”

特别存在于经济领域之中。这种现象使经济领域中地方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加剧。例如超过计划水平的投资，不遵守规章制度，在指导经济政策时屈服于技术至上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对自称“为了经济利益”的地方主义和共和国狭隘观念的被动迁就，这些都是不正常现象。……它们对作为社会政治工作者的共产党人起一种破坏作用，使他们变为一种局限于地方的或共和国范围内的经济“管理者”，并“顺着自发性的潮流滑下去。……”

全会为了处理这些问题，除了严厉谴责造成这些“不正常现象”的人外，还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进一步否定了“六大”的意图。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在工厂所属单位和 1952 年撤销了“基层组织”的各机构中重新恢复。党组织中党的专职工作者的人数在五十年代初曾大量裁减，现在又要增加了，被德热拉斯取消的培养专职党的工作者的党校也拟重新开办。青年工作计划将重新制订，还打算专设一个党的机构从事青年的宣传工作，在综合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中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来自部队的共产党人应大量地在地方政府、社会主义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机构”中担任工作。

到 1958 年，这些措施已成功地坚持了党的全面而直接的控制，从而也导致了各种“弊病”、“职务的垄断”和“一小撮人对权力的篡夺”。结果由于工人中的不安和经济上的效率不高，使得这些措施不得不后退。这些措施后退的时间，又恰好同散发新的党纲草案之后南—苏关系再度恶化相一致。1958

年2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给全党的通知里警告说：许多共产党人独断专行，扩大特权，贪污腐化。种族上的狭隘观念又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罪名提出来，通知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成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并错误地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

虽然这些年里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和重新确定党的作用方面几乎完全处于冻结状态，但在两个领域里提出权力分散或自由化的建议依然是合法的。一是在地方政府方面，这是由于卡德尔个人特别热衷于这个问题而使地方分权具有足够的权威；一是在经济领域中，这是由于工人自治这个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的权威性。

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变革大多还是正式公布的，但除了批准建立大量的公社官僚机构并吸收许多职员进行工作以外，实际上收效甚微。“公社制度”是经过深入的公开讨论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自1955年9月起实行的，现在重新确定公社是：“劳动人民基本的政治性和地域性的自治组织，也是当地人民基本的社会经济共同体”，这是符合卡德尔关于共同体和自治概念的定义的。公社（以及县）后来除了扩大规模，减少数目，以便成为一种在经济上更能适应的单位外，这种新的安排并未使其权力或能力有多少增长。公社一直具有两个矛盾着的主要特征，这是1952年的地方政府法和后来党的改革所强加给它的：首先是它对当地经济企业具有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既是真正实行权力分散和权力多元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对1956年和1958年党所谴责的“地方主义”的激励。其次是公社的工作最终由党和警察机关控制。这表面上易受严格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但这种组织纪律显然不能迫使地方党

的领导人照字面上的指示那样反对地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上的这种矛盾反映了党最高领导中明显的个人分工，卡德尔这位理论家负责行政权限的下放工作，而兰科维奇则是现有制度的保卫者。他利用各级党组织以及自己对人事和国家保安部的控制，将中央集权的党的纪律和控制维持在他于某一特定时期认为合适的最低限度上。

经济方面的做法，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 1954 年以后，也是因为一些矛盾的理由，妨碍了经济制度中的进一步改革。1953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其中 1956 年有短暂的停顿）的经济繁荣说明，已经实行的改革——工人委员会和准市场经济，即储备和投资仍由国家直接控制，而其他重要的经济手段由国家间接控制——已足以达到刺激劳动、经济增长和进一步合理化这些主要目的。高增长率本身也能抑制对一种已见成效的制度乱加变动。与此同时，1952 年以后经济自由化最初的实践，就有许多例子说明工人委员会总是免不了要搞一些不受欢迎的名堂，如花费投资基金不提高生产率和工资而只提高价格。这也就促使那些一直预料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人相信，国家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手中还保留的对企业的控制手段。1953 年对工人的“奖金工资”抽取累进税，1954 年以后对工资进行行政控制，以及一步一步地加强价格管制（1955 年管制价格的工业原料和半成品占总值的百分之五十），这些作法是从 1952 年工人委员会自治水平上所作的小小的后退，这种后退大体上一直保持到 1961 年或更后一些。

1952 年以后的生产增长率，事实上是属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以 1952 年为基准（这年产量比 1947 年低百分之二），

1953年工业生产指数是一百一十一,1954年是一百二十六,1955年是一百四十七,1956年是一百六十二。招工相应扩大,但比起战后最初几年来,也更有选择性。所有经济企业中人数,在1953年是一百八十万,到1957年增加到将近二百四十万。生产增长得最快的是“建立工业的工业”,车床、钢铁和其他金属的产量在1947年到1955年间增长了三倍,建筑机械增长七十倍,车辆、电气机械和现代农业机械已开始生产。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照1956年的价格计算)1955年是八万三千第纳尔,而1939年仅六万三千二百第纳尔。

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落后了。因此五十年代中期的生活水平没有象产量提高得那么快,对超额完成任务也没有提供奖金。由于大量招工而使总工资额的增长以及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工资的增长快于消费品供应的增长,这些也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再者,工业的高增长率主要是由于前一时期开始兴建的许多新的工厂的建成、本国和进口原料的充分供应(所以能大量进口原料,反映了西方援助的影响,但从其他角度来看,也体现出一种无法忍受的高投资率)和基础结构(铁路、公路、高压线、矿山和辅助设备)的改善,而不是由于真正合理地分配资源,后来的发展表明当时并未这样做。“全面工业化”所依赖的高比率的投资,使基金的筹措也日益困难。农民由于失去了增加自留农产品和提高生产率的刺激,就不能再提供足够的储蓄以满足工业发展基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西方的援助由于南斯拉夫一再和东方恢复友好关系也在减少。要积累所需的基金必然只有从工业上去想办法了。

另一个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在逐渐恶化,而且不能不使民族问题更趋尖锐。这就是南斯拉夫的“双重经

济”问题，即一般来说在前哈布斯堡统治地区（以及贝尔格莱德区）与前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之间无论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生产率、社会服务、各种机会和“发达程度”上都存在很大差别。1953年，在北方较发达地区按人口计算的社会总产值是全国平均数的百分之一百一十（斯洛文尼亚是百分之一百八十二），而在萨瓦河—多瑙河一线以南的不发达的诸共和国（因此包括塞尔维亚的固有地区和贝尔格莱德地区）是百分之七十一，在最贫穷的科斯梅特地区只有百分之五十三。到1957年，发达地区按人口计算的社会产值已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六，而不发达地区反而降到南斯拉夫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七（科梅斯特降到百分之四十二）。^①除极少一部分地区外，这种倾向一直延续了十年。当然，也费了很大的劲，想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并且想首先通过将北方的一些储备资金改用在南方投资，以便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然而，调用资金之多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日益强烈的不满。例如，1953年在不发达地区总的生产性投资占这些地区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在门的内哥罗竟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以后四年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九、百分之二十九点四、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和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而发达地区的有关数字，在1953年是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以后几年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点一和百分之十八。

没有取得更好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南方较快的人口增长

^① 第二个下降得最利害的地方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1954年达到顶峰时为百分之八十一，以后从百分之七十九降到百分之七十五）。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在这四年中由于一两个指标拖后腿分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七和百分之五十七，而塞尔维亚固有地区则有起有伏，但总的来说，还是上升的，到1957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

率。这就是说，社会总产值要有较大幅度增长，以使按人口计算的社会产值超过北方。在南方，几乎所有的部门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显然还很低。上述这两种因素反映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的落后和缺乏社会与技术的基础结构这些更为深刻的问题。例如，工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1953年不发达地区的文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而发展地区只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即使在最好的形势下，也需要时间来解决问题。

然而，所以未能更快地发展，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投资按人口为基准计算而不是按照社会总产值的百分比，那末较多的投资基金依然落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固有地区而分不到南方。波斯尼亚不再能得到与情报局时期所得到的那种特殊待遇。当时认为它那些偏僻的山谷正是部署战略工业的好地方，如今则留下一些新的一般是未完成的工厂。这些工厂远离市场、公路，熟练工人也不愿到那穷山僻壤去。在这方面，门的内哥罗的情况颇相类似。南斯拉夫工业布局不恰当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尼克希奇钢铁厂。这个厂1953年投产，等了八年修了一条通往附近亚得里亚海的铁路，等了十多年铺了一条公路通往外地，直至1975年才修了一条通往全国各地的标准铁路线。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虽然可以归罪于计划不周和有关共和国“狂妄的野心”，但联邦计划人员所计划的特定支援年年改变也不能推卸责任。

到1956年底，官方由于成功而满怀热情，并且意识到一些遗留下来或暴露出来的问题，因此又重新讨论经济改革上进一步自由化的问题和决定将要采取的形式。这种讨论和有关经济部门的建议在意识形态上所受到的特殊保护前已述

及,都意味着 1953 年的一些事件所造成的思想上没有创造性和批评精神的状况在经济领域里比其他部门早几年结束。这里国际因素又起了作用。美国对铁托和赫鲁晓夫调情的反应是威胁要停止西方的经济援助,这种援助对于本国资金储备、出口和农业生产都不充足的南斯拉夫仍然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有一些迹象表明,四十年代后期从西欧开始的消费者的反抗运动已经扩大到东欧,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及后来残酷镇压的教训已经影响了南斯拉夫人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方针。^①如同 1949—1953 年的情况一样,这次讨论改革问题的积极性和大多数有关这些问题的想法,最初都是来自范围极小的党的最高领导。这不只是因为只有这些人被允许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虽然这一点大体上仍旧符合实际),而且正如比查尼奇所指出的那样,也是因为

从上层分散党的控制权,而不是将权力转移到基层,这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政府和党的中层官员,这些官员亟望保住乌纱帽,因而成了教条主义和现行体制的支柱。一般来说,比较自由的观点和批评的态度都出自高级领导层。争取合法性的斗争主要在南共联盟上层领导中开展,矛头主要是针对国家官僚主义的。^②

有关经济制度的辩论恢复之前有两个重要决定,正是这两个决定促成了辩论的恢复。1955 年 10 月,党的执行委员会

^① 卡德尔 1956 年 12 月在国民议会的讲话,明确地把匈牙利的教训同南斯拉夫需要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联系起来。

^② 见比查尼奇:《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剑桥,1973 年版),第 69 页。

在布里俄尼召集经济专家开会，提出社会总产值中的投资份额要降低，而用于消费品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投资基金的比率应该提高。官方解释说：基础工业的基础现在已经建成，这就使我们终于有可能集中力量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新政策事实上是要一箭双雕。优先发展那些能够迅速积累收入和便于征税的经济部门，是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为发展新工业提供资金的一个好办法。但直到1961年后，这种发展重点的变化才开始对品种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没有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和背上了继续完成现有项目的包袱，而这些在建项目一般是大型的并且主要还是基础工业。然而，这个决定依然是南斯拉夫战后经济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有效地放弃了“全面工业化”的原则而确立了“累进工业化”的原则。

第二年，还是由于成功所产生的热情以及依然存在的或新出现的问题，新政权决定完全放弃年度社会计划而起草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以便使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能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和较长的时间内决定每年的任务。制定这样一种中期的指导性的计划对于南斯拉夫的计划者来说，还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复杂工作。因为这个计划能否完成，要看计划者能不能在考虑到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对宏观经济良好地作出预测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也要看企业中微观经济的决策能不能适应计划和市场这两方面的需要。所以，起草这个计划从联邦到公社各级组织需要一年时间，由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各经济院、各企业单位拟订。1957—1961年的五年计划直到1957年底才最后通过。计划的指标订得很高：国民收入应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工业产品增长百分之七十，农产品增长

百分之四十二；个人消费计划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此外还建立一种制度：联邦政府保证在经济投资上给不发达地区（暂定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科斯梅特）提供贷款，从全国投资基金中的拨款付还给共和国投资基金而不是付还给联邦基金（这是1956年业已采取的一种方针），对于社会基础结构方面的“非经济性”投资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并在财政预算上进行直接资助。

尽管这个计划看来寄望颇高，但在四年内就全部完成了总的指标和几乎所有部门的指标。社会总产值从1957—1960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或按复合率计算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七，而原计划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个人消费品和公共设施增长百分之四十九，或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原计划预计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进口额增长百分之六十七，虽然不算太妥当但也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而出口比预计的好，按价值计算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并且在这些年世界上有记载的最高增长率中占第二位。

由于不断地取得成功和吸收了更多的人来参与计划的制订，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公开而不只是在党内开展关于经济制度和今后发展工人自治的讨论，并使这种讨论合法化。1954年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召开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想法，后来作为一种冒险的开端成了干涉的牺牲品而被搁置起来，现在这个想法又复活了。1957年6月，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为时三天。会上的争论和决议表明：这种会议可能是避开中层领导机关对经济改革的反对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大会主要的议题是：“比较自由地分配收入”和“加强企业

的独立性”。决议要求改变工资制度和“所有劳动集体经济活动的条件平等”，并意味深长地规定这包括对所有劳动集体实行同等的资本税、同样的财政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以保证“根据所达到的产量、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决定收入分配的多少”。为此，大会提出要进行许多改革，包括看来是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到国家至少部分地将投资权（“扩大再生产”）下放给自治部门的可能性。

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的纲领，以及一种公众期待进行这种改革的气氛终于形成了。这种气氛部分是故意搞起来的，部分则是自发形成的。五年计划的被采纳，显然为实现这些期望提供了适当的时机。所有有关机构都作了努力，但到1957年底进展甚微。195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这些改革，被颂为向自由化迈出的重大一步，但眼下的实际效果极小。

1958年的改革，宣布了一个全新的收入分配原则。这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今后收入分配原则的演变也是一种潜在推动力。这次改革将1954—1958年的“利润分红”制改为“收入分红”。1958年以后，在南斯拉夫就没有工资和薪水这些专门名目，而只有作为各企业“纯收入”的一部分的“个人收入”。这种“纯收入”是扣除了“商业开支”（原料费、折旧、资本税、贷款和其他基金的利息、房地产税、“捐款”——但不象以前那样包括工资在内）、流通税和其他国家税收以后所剩下的总收入。这样的“纯收入”是第一次从理论上规定完全由企业自由处理，并由工人委员会决定，分为个人收入、投资基金、一般基金、公积金等等。

然而，这个自由处理的原则很快又被一系列规定和辅助条例所破坏，这些条条框框将大部分实际控制权交还给了国

家机构。这次主要是制订一个“最低限度个人收入”方案，起点定在1957年工资和薪水的百分之八十上，并批准对个人收入超过上述水平的人加征苛刻的累进税。根据一项计算的结果，一个企业打算用“最低限度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作为个人收入，但在抽税以后实际支付给工人的只是他们上一年收入的百分之一百零九。

谨慎小心依然是这次改革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仅是由于害怕工人委员会和管理部门一旦可以自行决定会做得“太过分”，而且也是出于关心有些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标准，因为这些企业的“纯收入”可能很少，“个人收入”难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假如一个企业不能付给它的工人“最低限度个人收入”，这个差额将由公社的公积金补足，这种公积金实际上是这公社内所有企业所提供的一种保险基金，而如果这个企业在一特定时期内还不能解决困难，公社对该企业就要进行“强迫管理”。这点是很公平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当有关原则贯彻执行而上述家长制又被废弃时，许多企业中的工人就要吃发薪日发不出薪水的苦头，有时候还要持续好几个月——不过还有不少问题有争论。“有的人”（这是人们惯用的一种说法，暗指那些起阻碍作用的人），自有其理由要维护经济制度的“现状”。眼下只消经济繁荣持续下去，他们就自行其事。

党的“七大”

1957年在制订五年计划的同时，南共联盟也在筹备另一次代表大会，即南共成立以来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按党章规定，代表大会应在1956年召开，但由于党内的情况，以及由于

同委婉地称之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的起伏，以致一再延期。起先延至1957年秋，后来又推迟到1958年春。最后在1958年4月22日于卢布尔雅那召开时，南—苏关系又紧张起来了（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那份要提交大会的纲领草案），但党的队伍壮大了，并充满了信心。南共联盟如今号称有七十五万五千零六十六名党员，并且社会成分和年龄的情况都有所改进：据官方统计，工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这是空前高的数字。同时，在上一年入党的新党员中百分之六十三是青年。另一方面，农民和妇女党员的比率继续下降，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十六点四。所有登记的党员中，职员、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学家、医生、教师、职业政治家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分的人整整占了百分之四十六。

按照传统，铁托向大会作的马拉松式的报告的前半部分，论述了国际形势以及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这时，他已开始特别注意亚非地区的事件，以及南斯拉夫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关系。这标志着不结盟原则在南斯拉夫外交政策中，在铁托努力保持一个重要国际政治家的作用和形象的活动，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当铁托谈到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关系这个微妙的问题时，他几乎无视去年11月以来关系已重新恶化的现实，把第二次恢复友好关系描绘得好象依然存在似的，只是受到“那些国家中有的国家的某些同志”的破坏。他说，这些人“显出一种对我们国内的发展不信任和错误对待的倾向”，同时还荒谬地坚持“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这个阵营，所以就不是国际主义者”。铁托总结说，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建立在1955年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基础上。他没有提到1956年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还要求重建两党之

间的关系。铁托让兰科维奇去扮演红脸的角色,以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们都愤然离场。

第七次党代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通过新党纲,以代替早已废弃的1948年的党纲。新党纲是南共建立以来的第三个党纲。这是一份洋洋大观的文件,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在会议所编印的文件集中整整占了二百三十页。它从“当代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意义到南斯拉夫制度的原则和存在问题,还有南共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作用等,一一论述无遗。这既是一个南斯拉夫理论的概述,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有时也是政治行动的纲领。

新党纲从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回到了德热拉斯事件发生前的状况。因为从“六大”以来,除了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以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或重大的事情,倒是这种现代化,使得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更近乎现实。新党纲和卡德尔介绍新党纲的报告,用了同“六大”差不多的术语,给党及其作用下了定义;为防止误解还周到地申述了党的持久一贯的“职责”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性,而这些观念在1953年一时曾遭到破坏。他的报告甚至还小心谨慎地提到了党的最终“消亡”,指出党将“随着社会对抗以及历史上由于这种对抗而产生的所有压迫形式的消亡而消亡”。卡德尔解释说,对这种说法不应该再产生什么新的误解:

我国的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对某些有实权的关键岗位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必须具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关键岗位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保证。如果我

们不公开说这一点，我们就是伪君子。……”

（《南斯拉夫工人报》，1953年1月10日）

新党纲反复阐述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必然很快消亡”的传统概念，据说在1950年南斯拉夫创建工人委员会时这种消亡过程就已开始。新党纲进一步说：“在经济关系方面，这个过程同时就是消灭国家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含义被确定为：“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组织起来的直接生产者管理社会生产”，当“整个社会共同体成为一种生产者的共同体”的时候，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尽管新党章谨慎地提到了斯大林死后的一些改进，但还是象1952年那样批判了苏联对所有这些原则的违背。

新党纲也注意到民族问题。在重弹“独立、平等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决权”这些老调以后，也提出了一个新调子。新党纲指出，民族关系的前途，取决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也取决于“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条件下，一种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意识”的发展。这种说法由于出之于这样一个文件，可以说是象征了短命的“南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顶点。这种“南斯拉夫主义”是凌驾于各种种族意识之上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最后将形成一种“南斯拉夫文化”。新党纲虽然小心地特别说明它不是想要创造一种南斯拉夫“民族”来代替现有的民族，但是“南斯拉夫文化”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如“南斯拉夫文学”将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这些必然会引起非塞尔维亚人不愉快的回忆和极大的怀疑。

除了上述那些次要的东西以外，新党纲和代表大会没有

引起什么重大变化。新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三十五名成员在休会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通过的执行委员会其组成也没有多大变化。前执行委员会的十四名成员（六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已包括在内）当然被选进新的执行委员会，此外就只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弗拉霍维奇）。^① 新执行委员会由四名塞尔维亚人，四名克罗地亚人（包括铁托），三名斯洛文尼亚人，三名门的内哥罗人，一名马其顿人组成。铁托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被委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头衔，而兰科维奇专门负责“组织政治工作”。兰科维奇由于党内的这种职务和继续有效地控制着他所建立的国家保安部，明显地成了南斯拉夫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

“七大”和新党纲重述“六大”所宣布的那些原则的做法，从两次大会之间这年中新发生的事情来看，仍然是很重要的。“七大”虽然未能把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意旨声明同现行的制度和实践完全一致起来，但它就象最近在经济上的小规模改革和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那样，重新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进一步自由化的气氛，这种气氛是1953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然而，暂时什么事儿也未发生。“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一年多光景没有再开一次会。到1959年5月开会时，他们又是空口说白话，什么“这个制度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等

^① 在“六大”新选出的由十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德热拉斯被开除出党，基德里奇和皮雅杰已去世。开除德热拉斯的三中全会上，在萨格勒布会上未选进执行委员会的三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门的内哥罗的约瓦诺维奇，斯洛文尼亚的马林科和塞尔维亚的斯塔姆博利奇被增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67年，韦塞利诺夫接替斯塔姆博利奇（他当了联邦议会主席）当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因此也参加了执行委员会，使委员会成了十四人。

等,但具体分析时又流露出对现状非常满意的情绪,特别是对经济的状况和 1958 年小改革所实现的工人自治的有效程度沾沾自喜。为什么不满意呢?现有的“制度”实行得挺顺利哩。

第四章 大辩论重新开始

改革和倒退

南斯拉夫政权满怀热情跨进六十年代新的十年。经济增长率、所达到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对外关系，比起十年以前亦即战后国家的最低水平，情况已大为好转。1957—1961年的社会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便是成就卓著的明显标志。

要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某些被人觉察为倒退的现象，以及其他一些为大家所忽视、但为少数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失意者和有野心的人看在眼里的消极因素。的确，同苏联及其仆从国家和党的关系显然还处于1958年开始的“第三次争论”的阶段。1960年12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乍看起来甚至预示着一场新的论战即将爆发。八十一个共产党在声明中一致谴责南斯拉夫人以其“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责他们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工作”。但铁托却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同“中国教条主义”所作的“脆弱的妥协”，是不会长久的。^①他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年锻炼而具有的智慧，耐心地等待着中苏争论再一次爆发。果然，第二年中苏论战开始，这

^① 见坎贝尔：《铁托的独立道路》（纽约，1967年版），第42页，第125页。

就给南、苏达成新的也是比较持久的和解铺平了道路。

被忽视的消极因素是在经济方面。五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正进入第八年。这种繁荣部分地是借助于出乎预料的高额投资获得的。用于固定资产的生产投资，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以百分之十三点四的速度增长，而不是原计划的百分之八点五。这种投资比总产值增长得还快，而住房、学校、医院方面的社会投资也比预期的多。1960年的投资总数比1959年高百分之二十九，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二；而且不顾1956年以后优先投资的次序按规定已有改变，仍以极大比例的资金投在主要工业和社会基础结构项目上，这些项目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对提高生产和生产率发挥作用的。这种投资比例和投资方式所必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又由于五年计划最后几年所允许的个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而越来越大。到五十年代末，这种压力已相当明显了。此外，还要背上1960年和1961年两年歉收的包袱；连续两年天时不顺再次暴露了农业方面的弱点。

此外，作为上述各种因素的结果，贸易赤字的上升趋势已达到严重程度。贸易赤字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除1959年以外，历年的增长率还过得去。而现在由1959年的三百二十亿第纳尔增加到1960年的七百二十亿第纳尔，如果把根据四八〇号公法所得的美国剩余粮食也算作进口，那贸易赤字就增加到七百八十亿第纳尔。如前所述，不断增长的赤字大部分是以西方的援助和货币贷款弥补的，到1960年总数超过二十亿美元。但自1955年以来，这两类外援的相对作用颠倒了过来。1955年以前，无偿援助弥补了往来账户上赤字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外债只弥补了百分之十六点二；而1956年以来，

无偿援助只弥补了百分之十点七，而贷款弥补了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亏空。虽然自 1958 年重新同苏联发生争吵以后又可以接受大量美援，而且 1960—1964 年这四年中总数将达五亿一千一百万美元，但是所有这些援助几乎都是采用货币贷款的形式，将来必须用第纳尔或美元偿还。未来的高额投资以及增长率可能将继续依靠这种额外的外来基金，但旧债的偿还已成了破坏收支平衡的一个新包袱，往来账户上数目较大的赤字势将危及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

使情况更糟的是，加工工业的增长率最高，因而也是 1957 年以来经济繁荣的主要刺激。加工工业所以能迅速扩大，不仅由于有利的价格，而且由于很容易得到进口原料。这些进口原料绝大部分又是用外国贷款购买的，而且还有双重的吸引力，因为人为的兑换率和低额的进口税这两者都使进口原料显得很便宜。现在这种特殊贷款日益减少，由于支付能力的限制很难预见今后是否还有新的同样规模的贷款，而国内原料的价格却使南斯拉夫本国的生产者几乎没有可能或没有积极性去通过扩大生产来填补这种亏空，就是能填补也需要时间。随着外国贷款的枯竭，加工工业的原料供应也告枯竭。

新政权受到近来所取得的成功鼓励，不顾上述这些预兆，在 1961 年 1 月开始进行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就最近取得的成就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比之前一个五年计划则仍是一个满纸奢望的计划。与此同时，新政权还打算使经济制度自由化。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蔑视眼下的不利因素，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这些不利因素外行无知。由于对新改革大事鼓吹，大家认为这次改革是 1950 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1960 年下半年以来，有些部门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可是

政府和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还认为“尚属正常摆动范围之内”而不予重视。

国家放弃了对企业纯收入分配的控制，就使企业第一次能够自己决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多少，公积金留多少，个人收入分配多少。合理调整了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税率，取消累进税，又给赢利企业以进一步的刺激（超额利润税仍然保留，这是这次改革中若干不彻底的地方之一）。银行和信贷系统也进行了改革，最终目的是使实际上只是政府支付代理机构的银行变为自主的信用组织。改革后立即收到两种效果：一是可以迅速扩大短期贷款，一是为了重要投资项目可以挪用资金。对外贸易制度也有重大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提供贷款支持这次改革的美国、西德以及其他西方债权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南斯拉夫为了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的正式成员和进行国际自由竞争（南斯拉夫市场上外国货的竞争和南斯拉夫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所跨出的一步。新政权认为这些重大改变最终将会提高国内生产的效率，平衡国内的垄断。此外，第纳尔贬值，多重兑换率将予取消，有数量限制的进口货的比例也减少了。

总之，就象后来有人指出的那样，不管新近的这些改革是否已经增加了现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1961年年中，总的投资比率、工资水平和外贸赤字都已无法控制。政府被迫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干预，如冻结工资、延期支付新的投资、部分停止最近在外贸上所采取的自由化措施等。除这些临时性措施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些紧缩通货的老办法，如在生产力没有增长以前不许增长工资，禁用公积金以减少一部分企业的投资基金。

1961年下半年，经济繁荣转入衰退；至1962年中，新计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期望都放弃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从1960年的百分之十五降到1961年的百分之七。就196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劳动生产率同样下降。每人实际工资1959年增长百分之十三，1960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1961年到1962年不但没有增长，事实上反而下降了。

面对这些情况，铁托感到十分震惊。近几个月中，他全副精力集中在外交上，实际上不管国内问题，交给副手去处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重新转到国内事务上来。1962年3月，他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铁托在会上严厉指出，错误在于“主观上的缺点”——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而首先是在一些党的领导和高级干部之中”。但这次会议的直接结果，只是作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人事变动，即将斯洛文尼亚的B·克拉伊盖尔和塞尔维亚的米尼奇提拔到制订经济政策的关键岗位上，撤换了经济计划研究所所长；并在4月3日向各级党的领导发了一个措词严厉的通知，批判个人发家致富、官僚主义的渎职行为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号召大家起来同攻击现行制度的人以及“地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会议所取得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成果，只能稍稍掩饰一下三月会议上已经暴露出来的根本分歧。这也是“掩盖”党中央内部根本分裂的开始，铁托四年后还公开对这种掩盖表示遗憾。^①但此刻他却

^① 见伦敦瓦伊：《蛛网之魔》（伦敦，1969年版），第185—187页。并参见肖普的书第210页，第250页。他转述了后来流传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耸人听闻的描述”：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以枪相向，斯洛文尼亚威胁要退出联邦。铁托在1966年7月著名的四中全会上，还对1962年3月“掩盖”分裂表示遗憾。

凭自己的政治直觉显然倾向于去谴责过分的自由化。5月，他在斯普利特向全国发表了一个火冒三丈的讲话，严厉谴责那些社会主义的和私营企业的领导者的狭隘自私、唯利是图和不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行为。这种毫不妥协的讲话被广泛认为是主张回到中央计划和中央控制的道路上的人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当党内将这个通知和这次讲话的反应收集上来以后，铁托召开了1958年“七大”以来第四次中央全会。

对以往做法重新评价的令人头痛的工作开始了。在作出评价之前，五十年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那些妥协的作法已被说得一无是处，而且连党在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民主中起什么作用这种极为棘手的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这个问题除1953年德热拉斯曾大胆地回答过以外，是从来无人问津的。

为老利益大声疾呼的新活动家

1961—1962年的经济衰退暴露了五十年代那种折衷的经济模式的弱点，但并没有产生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解决方案，也没有造成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四分五裂，更没有引起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说法作为各自的依据，而这些却正是随后几年的混乱与社会和政治日益紧张的特征。种种混乱和紧张的情况原本是潜伏着的，只是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及1958年和1961年微小的改革通过之前所进行的辩论中偶尔公开表现出来。但这次经济衰退确实使人们迫切感到要对整个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不能再搞什么其他表面的改良。因此同样急迫地提出了以前的老问题：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今

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方针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通过一些微小的改革以妥协的手法回避了，因为以往有关的解决方法的前提是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而且越来越难以捉摸的所谓思想和政治上的一致性。

这次经济衰退象是南斯拉夫政治体制的一种化学沉淀剂。因为在这个政治体制里，七年来虽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形成了一些不稳定的小宗派，但后来又散掉了，没有造成明显而持久的分裂，而这次经济衰退开始了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以致我们可以越来越肯定地说形成了两派，并明确指出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地区或种族的利益。为方便起见，一派可称之为“保守派”。他们想保留（当然也有所改良）只是部分地非斯大林化的准市场经济，而且依然要由政治上独裁的党来控制，只是可以放松一些，并主要采用间接控制的方式，因为党的控制是现行制度发挥作用的保证。另一派，如果要给以一个专门的名称而且要具有历史的准确性的话，那就是“自由派”（很冒昧，他们囿于马克思主义和所处的历史条件，并不喜欢这种名称）。他们要求企业管理者和公民有更多的自由，缩小国家的作用，（往往是有限地）扩大实际公民权。有的“自由派”为了完成历史上使用这个名称时所赋予的任务，象来自十九世纪中欧的幽灵一样，正处在一个为期十年的从自由主义经过民族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过程之中。

这个过程一开始是混乱的，因为这些活动家本身和绝大多数已暴露出来而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混乱的。这种混乱甚至一直保持到1966年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政治游戏的规则有一种持续的特点，这一特点在1966年以后才受到怀疑，而且由于斯大林教条主义的余毒，这种怀

疑也是谨慎小心而且冒一定的风险的。这个特点就是党还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历史的一贯正确性，并通过等于排除人民参政的党的指令来强制推行。虽然南斯拉夫这样神圣地加以保护的理论为数不多，而且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便于作各种不同而且在不断变化的解释，但新政权禁止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纲领性原则公开争论（尽管经常有人怀疑），通常只是一些次要的或具体的问题才允许公开讨论。同时，由于在提出批评或建议时需要使用象“自治”、“社会所有制”、卡德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些不容怀疑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含义的差别又极为细微，结果往往使这种争论变成了晦涩难懂的烦琐哲学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一些经典的经济理论也被卷入争论。例如“按劳分配”这个传统的口号，辩论双方都重复如仪，甚至作为一种争论的武器，但双方对这口号的含义各有不同理解。“保守派”是根据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按劳分配就是按同等劳动条件下所提供的劳动产品的多少分配。但“自由派”实际上却将按劳分配重新规定为按所提供的产品的市场价值进行分配。或者如一个外国的学者所说明的：“按劳分配就是按人力所提供的或取得的产品的各种因素的（不完善的）市场价值来分配。”同样，双方所以都同意“劳动条件等同化”，也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保守派”认为波斯尼亚煤矿生产一吨煤的所得应与斯洛文尼亚煤矿生产一吨煤的所得相等，而斯洛文尼亚煤矿由于生产率高所得的“剩余额”应作为税收上缴，通过进一步投资的方式给波斯尼亚，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自由派”则指出这样的政策没有鼓励性，甚至是对功效高、成本低的生产的一种惩罚。他们的解释是这两个矿对社会的义务

相等，因而富的可以让它更富，穷的则迫使其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干脆关门。

另有一点复杂的情况是，参加争论的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就其所采取的立场来说，却反映了各种互不相容的利害关系和动机。有些几乎纯属经济范畴：人们被弄得灰心丧气，到底是现行制度缺乏效能，还是因为几乎年年作出变动，因而难于预先计划呢？现行制度或者在这个制度中计划作这样那样的改变，对人们自己的企业、经济部门、地区或民族以及组织机构的或个人的作用，是有利还是有弊？有些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如果意识形态问题确属重要，那末令人苦恼的是实际事态同标准的或纲领性的自治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呢？还是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同正统的马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日益加深的鸿沟呢？人们在南斯拉夫这些有时还有矛盾的原则中，是优先考虑自治的理论、优先考虑调和计划结构和市场结构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优先考虑党的领导作用的教义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种种理论呢？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其政治上的含义，因为每个问题都关系到一系列重大社会决策的权力分配问题，是垄断还是分权。而且因为每个卷入争论的人同时都是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动物，所以各自最终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他们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有时是矛盾的立场综合作用的结果，并还带有坚持马列主义历史的一贯正确性这一政治游戏规则的色彩，带有由这种政治游戏的词汇所形成的概念框框的色彩。

这些年来，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和计划结构相结合上的笨拙做法所造成的投资分配的不合理，以及其他种种消极影响，表示深感不安。看来，南斯拉夫不仅没有吸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的最好的经验，反而吸收了它们最坏的东西，正如 1957 年比查尼奇所说的：“这是一个矛盾的制度，既为不完全的竞争法则所支配，又为行政控制所左右，以致很难使这个制度发挥什么作用。”

1958 年 5 月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协会召开了一个大会，注意力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这一次对此提出正面攻击的，却出人意外地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这场攻击也是 1961 年经济衰退以前唯一重要的攻击。虽然大体上还不为人所注意，一个成为改革的新的推动力的机构却在从党的占主导地位机构调门完全一致的大合唱中退到台下。它的声音虽然同大合唱基本上还合拍，但已经可以听出有所区别了。

迄今为止，南斯拉夫工会建立的目的，象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工会一样，不过是作党的“传声筒”。它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独立性的表现，据说是 1949—1950 年萨拉伊抵制建立第一批工人委员会，而后来还是勉强合作了。此时，在 1958 年改革所规定的企业控制自己收入的比例增长得太慢而人们日益不满的情况下，工会中央委员会突然表现出要在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发挥作用的迹象。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工会领导调换的直接结果，而工会领导的变换又显系新政权对国有化以来南斯拉夫的第一次严重罢工所造成的冲击的典型反映。1957 年底，斯洛文尼亚的特尔博夫列煤矿自发地罢工两天，使这一重要煤矿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局面，没有扩及共和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表明自治制度上有问题，所以基本是正当的。

由于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党的最高领导召开了会议。铁托在会上宣布，这次罢工主要归罪于工会工作的被动，因为工

会没有起到看门狗的作用，没有能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因此，工会领导必须“从上到下”予以撤换。当时选来执行这项任务和代替年迈的萨拉伊担任工会领导工作的是伏克曼诺维奇。

对伏克曼诺维奇的任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就把一个思想简单、办事急躁、刚愎自用、对于经济一窍不通的人从关键的经济岗位上调开了。他要对五十年代许多轻率和代价很大的错误以及经济制度上的突然变化负主要责任。给他换个职务倒可以充分发挥他真正的才能：他的充沛精力使他在游击队里赢得了“神速”的别号；他既对党狂热地忠诚，又有独立的思想，还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只是由于过于简单地相信那些公布的原则和一点没有灵活性，所以个人野心的实现受到限制；他秉性固执，对同事喜怒无常，但这一切足以使他把上级所期望的全面整顿工会的工作干得非常彻底。他对这次降级极为不满，于是就原封不动地以他的全部品性去经营他的新事业。他竭力要使自己所管辖的新单位既是南斯拉夫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主要机关，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的个人权力的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工会首先就成了（尽管很少为人承认）党内自由派的重要同盟者，但后来又是最早的批判者，甚至还是潜在的对手。由于他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这位不能克制自己的领导人 1969 年又一次被调动，而这一次则是最后的决定性的调动（调到很大程度是一种荣誉性岗位的联邦议会）。有人曾称他为“南斯拉夫的乔治·布朗”。

重新恢复元气的工会领导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这包括企业内部的分配以及经济部门和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分配。他们从 1958 年改革中的不适当之处，甚至是虚伪之处着手抓起。伏克曼诺维奇也随着对

这些改革表示不满，只是因为制订改革方案时他出国在外没有参加。那次改革宣布，企业可以自由决定留下多少作为个人收入，留下多少作为投资和社会基金，但通过国家指定最低限度个人收入的方式和征收累进税使纯收入削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实际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这种权力。因此那次改革没有满足 1957 年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 1958 年党的“七大”所提出的要求，也没有提供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本应是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优点。工会的领导根据这一论点，史无前例地拒绝同联邦执行委员会合作起草最低个人收入方案的细目，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反对提案。他们提出税收制度必须严格限于(1)根据“社会所有的”固定资本和周转资本的帐面价值，按照不同经济部门采取不同税率所征收的现有资本税；(2)特为征课基于专利地位的赢利所设的流通税；(3)为特许开采稀有自然资源所付的租金；(4)对纯收入征收的比例税而不是累进税，以资助政府管理机构、国防、保健事业和教育等。

他们显然已参与的“为收入法而进行的战斗”，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技术问题，从逻辑上来说，是属于工会的职权范围，但却牵连着非常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当伏克曼诺维奇拿出一份建议草案征求意见和争取政治上的支持时，铁托立即看到了这一点。他警告伏克曼诺维奇可能会遇到比他想象更为严重的反对，“因为你们抓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①

正如铁托所感觉到的那样（伏克曼诺维奇没有感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会以及其他与工会意见相同的人认为，企业

^① 见伏克曼诺维奇回忆录，第二卷，第 329 页。

应该控制和分配的剩余收入中理当包含“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向五十年代妥协体制的基石挑战。五十年代的有关安排是计划和市场（从而也是国家和经济系统）之间的明确分工，这种分工使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实践的需要，控制绝大部分投资基金的数量和各部门的分配比例。这对社会主义计划和有效的“社会所有制”十分必要，对避免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和同资本主义一样的毫无控制的经济发 展有重要意义，甚至还与保持五十年代微妙的政治平衡密切相关。

对这些建议的争论以及有关的密谋在整个 1959 年和 1960 年一直没有间断过，偶尔在报纸上和议会里也透露一点。在经过改组而突然活跃的工会中央报纸《劳动报》上，在 1959 年 4 月的工会联合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对企业控制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和改进的税收体制重新作了更为有力的论证。工会组织的领导人、政府、联邦经济院和（或者）经济学家协会，两次组成联合委员会起草具体建议。尽管表面上坚决支持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的这个计划，但是在这两次工作中，上述联合委员会的授权和组成都被任意变动，而且委员会本身也突然被解散。

这阶段的反对意见似乎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有的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有的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和官场的嫉妒。只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有足够理由论证制度的经常变动比现存的不正常的情况和非刺激性的措施危害更大。这种观点是托多罗维奇代表联邦执行委员会将 1959 年的社会计划提交联邦国民议会时提出的。但是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有的人也可能讨厌工会中央委员会和联邦经济院在这个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内罕见而任性地固执己见并进行干预，特

别是在他们 1961 年的改革方案已在起草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讨厌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狂妄自信。斯塔门科维奇迫使工会中央委员会接受这些看法，他是塞尔维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一般认为他是接近兰科维奇的。根据伏克曼诺维奇的说法，先是斯塔门科维奇，后来是兰科维奇自己，坚持要他把为 1959 年工会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删去——这段话说工会有权利和义务“对所有社会问题形成自己的见解”——他们两人这种做法最终是得到铁托支持的。

至少对许多参加辩论的人来说，他们在争论时都清楚地意识到：任何进一步认真的改革，特别是影响中央政治领导对投资的作用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国内地区之间的（在南斯拉夫也是国内种族之间的）资金、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并进一步意味着政治权力原先在地理和种族方面的配置也终将发生变化。这种感觉是大多数卷进 1959—1960 年“为收入法而进行战斗”的人在确定态度时所考虑的一个因素，但这种感觉甚至更为直接地引起与自由派只有部分共同点的其他方面的注意。从长远观点来说，这一点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所谓的其他方面包括各地方党政当局和地方经济利益，它们的得失是与这种再分配密切相关的。

再者，意识到真实的利害关系或由于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各地区的不同态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新的东西是人们坚持要承认和考虑地区利益的日益增长的愿望和能力。开始，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表明了这种主张（这是符合事情的逻辑的）；后来，想维持现状的人作出反应，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现时所以坚持这个观点，主要是因为公布的自治原则与看到的自治实践之间有可能利用的缺口，而且还出自日益增强的

自信心，因为在一些小的冲突和胜利中人们发现五十年代权力分散(以及他们自己感觉到的矛盾)削弱了中央领导加强中央独裁的意愿和能力。然而实践很快证明，这种仍然不稳定的基础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于是就要找出或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手段来增进和表达这些地区性的特殊利益了。

新政权宣传了权力分散、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人民参政的社会主义神话，因而新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要求接踵而来。第一个成果就是产生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多元主义，而在多元主义的情况下，统一的观念将会特别模糊。这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参政者将会把利益冲突中的地区因素当成种族矛盾，因而使之愈演愈烈，达到异乎寻常的感情用事的地步，以致很难使双方互相了解和妥协。于是战后相对平静的“民族问题”又成了南斯拉夫的中心问题。

国内地区之间的争论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十五年来来的经济发展显然未能实现一项基本诺言，缩小(即使不是消灭)比较发达的北方诸共和国和极不发达的南方诸共和国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差别。各派都同意这种失败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失败原因的看法却分歧很大，因而对今后的策略也各有主张。

上文谈到，寻求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比较合理的方法，要能用最小的代价而收最大的效果，这是五十年代的一个中心课题。人们还没有找到这样一种方法。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继续在采用针对特定情况的临时援助，并反复改变支援方法，而且在各方面明显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分歧和越来越多的挫折。困难不仅在于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其他具有类似“双重经济”问题而种族上比较相似的国家来说，尽管这些国家的

计划人员同南斯拉夫的计划人员一样坚决和经验丰富，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感到棘手，最明显的就是邻邦意大利的情况。困难还在于彼此猜疑很深，都怀疑对方是否正在得到或企图得到份外的东西。这种猜疑的根子是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中形成的。1953年以来又被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加深了，而这种经济上的地方主义是受到一种制度的鼓励的；根据这种制度，地方可以发挥主动性，可以独立作决定，然而绝大部分资金却仍由中央控制。

就支援不发达地区这个问题来说，1961年的改革又是一个不会付诸实行的妥协方案。过去，国家提供保证进行投资以加速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并拨款促使它们的社会服务和财政管理与其他地区达到同一水平，这至少曾有助于拟制1957年以来的长期计划，但这种制度在原则上弃而不用了。现在决定代之以联邦出资的“不发达地区发展专用基金”，类似意大利南方银行的办法。然而这种基金实际上拖延了四年才建立起来，因为在如何筹集基金的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对于怎样就算不发达地区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新分类法，这表明向一些“发达的”共和国、特别是对克罗地亚作了进一步的让步。除整个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科斯梅特以外，塞尔维亚南部的特定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以及利卡、巴尼亚、科尔敦和达尔马提亚内地这些克罗地亚地区，现在都包括在不发达地区的范围之内。新的税收制度也是考虑各地区利益的妥协方案，并且部分地接受了工会联合会起草的税收建议。按经济部门采用统一税率的比例税对产品定价高的赢利企业有利，这种企业一般是指北部和西部的加工工业，但对这种企业的“超额”利润也附征超额累进税以部分地保持平

衡。征收这种超额累进税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对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刺激，而过去正是因为需要这种刺激才改为统一税率的。

基于上述情况，1961—1962年的经济衰退便把过去一些学术上的、或显然介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争论问题，如什么样的地区应优先发展，资源分配由中央计划安排或由地方根据市场需要安排哪一种相对来说优点多，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如何等，提到切需对整个经济制度重新评价的高度。这次评价以各经济学派之间的大辩论开始，起先是争论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且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专业会议和专业杂志。除几个人例外，各派可以说都反映了地区利益。结果，关于经济问题的非常专门的、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常常成了另一种更激烈的争论的显而易见的烟幕。那种更激烈的争端就是在种族上谁占支配地位谁处从属地位，南斯拉夫国家的基本形式和目的是什么等。这样分析事态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符合实情的，但也容易令人误解。虽然上述两类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逻辑上、甚至在心理上又是不可分割的，但经济制度问题暂时可以先行讨论；即便首先需要从政治上考虑，也可加以分别处理。鉴于党的核心内部现有的力量均势，以及党继续垄断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因而重要的改革仍然只能在经济领域发生，而这样的改革现在已有很大的可能。党的一位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比兰季奇在1961年后回顾说：

人们可以轻易地用“合理化”、“讲究实效的经济”这样的名义去“攻击”旧的经济制度。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

既然造成了对生产的迷信，也就会感到难以抗拒某些经济手段和经济关系的瓦解，因为这类经济手段和经济关系明显地引起和增加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并促使人们造成不合理现象，而这样的经济手段还不在少数。

经济学家的辩论

1954年以后的十年间，南斯拉夫的公众“辩论”往往都是循着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格式进行的。他们一般要等一个高级领导、通常是铁托本人的暗示。这种暗示标志着党的核心领导集团对此问题的秘密争论至少暂时告一段落。于是胜利一方的见解公之于众，而且几乎一定被低级干部的幼稚而过分热情的解释搞成过分简单化的“运动”，从而大为减色。这种运动总是先走向极端，又很快被高级领导用力扭转过来。人们根据所提供的辩论内容，常常可以推出反对派一方的观点。反对派是不会完全沉默和罢休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面临以下情况时往往不起作用：(1)由于中央领导没有明确表态，于是就含蓄地称之为机密的哪些问题；(2)异常复杂因而容易让人从细节上挑毛病或钻空子的问题；(3)在具备了(1)或(2)项条件时，真正将权力分散到有独立行动能力的半自治地方中心手中。

上述辩论程式的所有情况在1962年开始的对经济制度的辩论中都发生了，但显得特别广泛和持久。十分清楚，最初的“暗示”是铁托1962年5月在斯普利特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大家认为这是他赞成中央集权主义强硬路线的信号。人们早已料到这条路线会出现的。这方面的先兆一个接着一个：

1961年底为抵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急措施。1962年4月3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给全党的通知，以及同月颁布的一个法令，亦即建立一系列委员会来监督联邦执行委员会的企业纯收入分配新条例的执行。所有这一切措施无非说明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制度。在斯普利特讲话以后，开展了一个独特的反对私营手工业者的“运动”。这些手工业者受到极大压力，以致成千上万家店铺纷纷关门，不久就弄得那些领导们找不到人来修理他们家的电视、汽车和自来水管，最后不得不勉强收兵。有些研究者喜欢寻找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与苏—南关系的波动之间的联系。他们指出自1961年夏以来苏—南关系又开始好转，因此导致苏联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于1962年9月正式访问南斯拉夫，而且据说在那年秋天又把德热拉斯重新投入监狱，因为他在国外发表《与斯大林的谈话》触怒了俄国人。

但是，此刻作出这样的判断为时尚早。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还刚刚开始。

1962年7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全体会议。按常规这样的会议要发表一个明确的宣言，但这次会议讨论结束时，没有发表宣言，只是铁托牢骚满腹地说：他曾经“期望这次全会成为我们经济政策的转折点”，然而相反，“我在各个报告里没有发现谁对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今后我国经济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作出回答”。尽管克拉伊盖尔和米尼奇在报告中以及铁托自己在总结性的讲话中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些尖锐的分析，这次讨论以及全会结束时所得出的结论中只明确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即在短期内采取通货再膨胀的措施，刺激经济再活跃起来；第二，继

续认为农业生产的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农业中较小的社会主义成分；第三，坚信权力分散与通过大批量生产使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经济一体化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上述第二点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消极意义，第三点也不是新东西，但在这时候重新提出来是“暗示”又要开展一个进一步合并企业的“运动”，以纠正五十年代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分散局面。这个运动也象往常一样迅速走向极端，对工人委员会施加政治压力，使它们接受并非自愿的合并。顽固的地方主义者也想好了对付的办法：他们既要多少合并一点企业，又要不破坏地域的界限，于是就常常荒唐而不合理地把一些企业合并起来，这些企业除了是在同一个公社或同一个区这点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兰科维奇作为组织书记有一个长篇报告，他概述了中央四月通知和铁托斯普利特讲话以来党作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他指出已经“严厉批评了独立主义和地方主义、沙文主义倾向、共和国的闭关自守和地方民族主义的优越感以及其他与国家统一相矛盾的倾向”；他号召大家遵守纪律，积极执行全会决议。但是，这些并没有给基本问题提出一条明确的路线。甚至铁托对建立“政治工厂”支援不发达地区所造成的浪费和广泛的消极后果的尖锐批评，在会议正式通过的结论中为了适当地缓和语气也被改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有些发言者具体提到了扩大企业或共和国和公社在投资上的作用这个关键问题，而在结论中同样变成了一种不关痛痒的提法，即“经常注意进一步加强工人管理的物质基础”。辩论及所通过的结论的主要内容表明，分派还不太明显，或者说任何一派都没有形成明显的多数；从三月份就开始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仍将继续下去，很可能是还在希望终于会出现一致。

的意见。

铁托的总结性发言充满了前后矛盾的论点，因而可以认为他支持一些相互矛盾的解决方案。但铁托的发言不仅证实了这种看法，也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已在矛盾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他发言中有点冗长的那部分。其中，他似乎赞成“自由派”纲领中的要点，而又承认意见有分歧，不急于作出决议。然后他又回到投资基金这个关键问题上，抱怨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所做各种报告仍然“没有说清这些基金应投放到什么地方，由谁去处理”。他只一般地提到共和国和公社，而不提企业，虽然他说“我们至今已从那里拿走了一切”。铁托同意，“我们必须保证正当的权力下放和合理分配资源，以便人们能自由地使用他们的资源”，但他不同意这么做就得“将权力完全下放到共和国和公社”。他反复说他倒愿意把重点放在企业上，但又补充说，“我想有些同志可能会不同意我这种想法，而我并不坚持要大家今天在这里就接受这种看法”。

铁托报告中这些犹豫不决的话与后来一些可靠的研究报告中所提供的情况是一致的。这些研究报告说，当时铁托刚从国外回来，便遇到了这样一个经济局面，他最初的反应是把破坏经济景气的需求过分的情况归罪于掌握投资基金的权力下放，因而又打算选择严格的由中央集中控制的办法。但当时有人给他提出证据说，尽管形式上权力下放了，百分之八十的投资基金仍由中央有效地集中控制，只是在财政上对这部分资金管理不严。因此，在四中全会时铁托已不愿意支持中央集权的立场，但也不愿意站到另一边去，为那些企图争夺联邦现有权力的共和国派的利益而支持公开分裂。

与此同时，争论的双方都利用中央没有作出决定的空子加强自己的阵营，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家队伍的动荡上。1962年12月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协会召开会议，讨论即将脱稿的新宪法草案中涉及的经济问题的含义。虽然发表了好几种看法，但占上风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经济衰退主要是过分自由化的结果，这种自由化鼓励了主张分裂的地方主义，导致各地方发展速度不平衡，并使个人收入增长过快以致无法满足其需求。这种批评反映出他们心目中的解决方案起码是部分恢复中央集权制，而且还要改进计划工作和缩小市场的作用。

一个月以后，即1963年1月17日—19日，经济学家在萨格勒布再次开会。这次会议是由经济学家协会和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日后证明它是这次广泛而持久的辩论中最激烈、最重要的一次交锋。

萨格勒布的讨论，以对目前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起因所作的两种时常矛盾的研究为基础，这两种研究即后来大家所知道的“黄皮书”和“白皮书”。黄皮书是在霍尔瓦特的支持下，由一部分同发起单位联邦计划研究所有关系的经济学家起草的。霍尔瓦特自1962年3月以来是联邦计划研究所的负责人，本人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过大家通常对他有争议，他自己的见解到底是拥护集权还是自由化，别人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这显然是由于他作为负责这个联邦计划机构的一个克罗地亚人的立场所决定的。黄皮书的作者们在地区和种族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其中两人对编写白皮书也出过力。黄皮书基本上是中间路线的立场。它认为这次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61年的自由化改革以及同年秋天和第二年所采取的限制措施都过于仓促和有欠考虑，还由于投资结构上的严重

缺点，当然这种缺点并不一定是基本制度的缺陷。白皮书在地区上和论点上都比较明显的派性。克罗地亚党的书记巴卡里奇自称是这一派的“创始人”之一。白皮书的作者都是克罗地亚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些人今后十年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将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克罗地亚的总理达布切维奇-库查尔，他从1966年到1971年12月是党的第一把手；佩里欣，他后来当了国家银行的行长，1972年1月以后担任克罗地亚的总理；西罗特科维奇，他1969年后是联邦执行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副主席。

白皮书第一次全面说明了克罗地亚人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这种看法当时刚刚出现，其基本论点是：中央统一计划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可能是一种最好的分配资源的基本方法（因为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它便于动员劳力和资源，也便于实行一种高比例的积累，而使用其他办法则不然；同时，这也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统一计划就愈来愈行不通，因为需要作出分配决定的数字越来越大而且情况越来越复杂，超出了计划系统所能应付的范围，而市场的有效分配能力则日益增大。因此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就越应给市场力量以更多的自由，计划者或政治家也越要少加干涉。

萨格勒布的讨论非常尖锐，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主要争议是“中央集权论”者和“权力分散论”者之间的分歧，也是主张更多地考虑计划的人和主张更多地考虑市场的人之间的分歧。但正如米伦科维奇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一共有四种明显不同的观点。“权力分散论”者都认为目前经济上的困

难“是由于过分集中，管理不善和干涉太多，是中央统一计划心理所遗留的恶果”，然而其中一派希望“企业能从条条框框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让它们自己根据市场的力量来作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种决定”；而对另一派来说，“使用权力分散这个字眼并不是反对计划本身，而只是反对由中央计划而不让共和国或地方一级来计划”。“中央集权论”者也有两派：一派主张需要更进一步加强中央的计划工作和对企业的控制；另一派同意市场经济，但只能限于目前的范围，不能再加以扩大。

经济学家的辩论在 1963 年进行了一年，又继续到 1964 年。当时(重要的是)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不限于专业会议和发行范围很小的专业杂志，而且也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出现，并在公开的讲话中进行。辩论还受到当时环境即衰退以后的经济状况的影响。

1963 年新政权在经济上所做的主要工作，如同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退回到 1956 年的状况，通过冻结基金、禁止个人收入的增长、加强价格控制等措施，砍掉了虽然重要但收益仅敷支出的企业，并取消了公社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控制权。除这些措施以外，在外贸和信贷系统上所作的一些次要而有益的改革，还有斯普利特讲话的心理影响，以及政府和党所显示的力量也都起了作用。因此，经济上也有了相应的反映，1962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63 年全年又恢复到 1956—1960 年这个时期的迅速增长的速度。1963 年底，米尼奇以联邦执行委员会社会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 1964 年度计划时，列出了一张鼓舞人心的成绩单：过去一年中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是战后第三次出现最高增长率，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五，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七，出口额上升百分之

十六，实际投资额的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七，在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中个人消费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三，劳动生产率破记录地增长百分之九点五。

但是，这一张令人欢欣鼓舞的社会主义生产增长的统计表中还隐含着两个不祥之兆。第一，以个人消费和特别以投资形式出现的需求的增长速度再一次快于供应的增长速度；长期来比较稳定的生活费用开始上升，到1964年初突然加快了速度。第二，由于用赤字来解决日益增长的消费而扩大了贸易差额，第纳尔再一次贬值已势所必至。据新闻报道，1964年前六个月的工业生产比上一年高百分之十八，但投资总值却高百分之五十（1），这些当然不能再作为自我祝贺的根据。伴随这次新的经济繁荣而来的畸形发展，与导致1961年的繁荣走向崩溃的情况一样。

由于采取了能在短期内生效的权宜之计，经济增长得到了恢复，1961—1962年的经济衰退现象停止了。但经济结构上的弱点，虽然当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可是没有得出结论，所以实际上仍未触动。然而这种弱点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否则起码会反复出现一种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动荡不定的经济循环，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作出政治决议，将经济上的辩论拿到联邦议会和发行量大的报纸上进行公开的讨论——这是经过若干次虚假的开始以后在1964年1月底所采取的一个措施。这个日期同决心公开承认一些工厂、特别是斯洛文尼亚和斯拉沃尼亚的工厂“停工”（只是在三年后才坦率地称为“罢工”），同公开承认这些停工合法、亦即肯定工人自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一致的。

辩论公开化

显然,在某些方面已经作了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决定,但毫不妥协的反对派现在对这些决定的态度是,不在一般原则问题上作文章,而在具体问题上挑毛病。《共产主义者》4月23日的评论中暗示这是事实,而且第一次公开承认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分歧。评论的作者指出当前在“某些根本性的改革上意见是一致的”,并进而说:“特别强调这种一致也许显得多余,但是一年以前不存在这样的一致和决心都是事实。”评论随后又指出,“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在一般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的观点。”

1964年交给公众讨论的经济改革的内容中,包含了1962年7月铁托同其他人在四中全会上所讨论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拿出来公开辩论之前,经过了提炼和仔细推敲,有时候还修改成有关经济结构改革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都带有1963年1月白皮书中克罗地亚观点的印记。在辩论过程中,论点越来越明确,但在所强调的问题和所提出的口号方面都作过一些重要的修改。

这时候自由派的攻击非常明确地集中在三个重要的目标上:第一、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部分和消费部分目前的比例,第二、对投资体制进行政治控制的问题,第三、现行价格制度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主要是第二点起作用的结果。自由派还改变了他们的攻击方式,尽管这种改变是微小的,但却很重要。他们的关键用语已不再是“权力分散”,而是“取消国家控制”。同时在近几个月,他们发现自己的纲领

中包含着一个深得人心的口号：“生活水平较高而又压力不大的社会计划”。这种改变一方面是一种战术，以便使自己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比如避免别人指责他们通过权力分散提倡一种与整个南斯拉夫国家利益相对抗的地方的和民族的（特别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也反映自由派看出了现行制度中究竟哪些内容确实是他们所不喜欢的，认识到了早期自由化尝试中所走的弯路。

自由派的论点，就其在 1963 年白皮书和黄皮书中的这种成熟的形式来说，是从同意五十年代所逐渐形成的混合经济制度加速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开始的。当时还在使用国家控制的手段，其中包括在储备和投资方面的支配地位，这对于任何一个不发达社会的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来说可能是必要的，但只限于实现经济“起飞”之前（经济“起飞”被过分简单化地解释为国民收入按人口计算达到五百美元，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断定这是“发展”的一个奇妙的起始点，而南斯拉夫恰恰在 1964 年接近了这个水平），也只限于大多数人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技术和政治经验之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可能同意 1961 年的自由化推进过急，缺少一个短期的缓冲阶段；但他们的基本论点是，当时所以出问题，是自由化进行得不够彻底。他们坚持认为：在起飞以后还保留广泛的行政干预，保留中央决定的做法以及从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对于投资的政治分配，往往导致一系列的偏差，而这些偏差必然致命地损害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和社会政治原则。

他们在辩论中指出，这些偏差在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点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几乎十年没有变动，国民收入中作为个人收入的部分一直停留在百分之四十二左右，而投资

总额却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南斯拉夫报纸曾作过比较：美国占百分之十六，意大利和波兰占百分之二十三，匈牙利占百分之十九，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52年至1961年这十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同期投资消耗额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点四，个人消费只增长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南斯拉夫已经越过了必须（或有益地）压制生活水平的阶段。人民不仅应该分得国民收入的较大一部分（社会部门中百分之三十八的月工资依然少于两万五千第纳尔，当时合三十三美元），而且这样做（最好采取可以自由支配的直接收入的形式）将会有助于确立一个比较合理的需求结构以及一种较平衡和较健康的经济增长局面。

第二点，也是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体制问题。这种体制是以分工的原则为基础：社会计划负责将全部投资基金分配给各部门，因此也就包含了政治因素；而市场则负责把投资基金分配到各部门中最终的使用者（企业）手里。这种体制的弊病应对国民收入中投资部分数量过大以及使用上的不合理负很大责任。

上面所指出的早期的改革是真正把在投资上作出决定的主动权分散到各个部门——到1961年已不仅在联邦政府中而且在大多数企业、银行、公社管理机构中贯彻执行——但控制权没有下放，联邦中央也仍要对错误或失算真正承担责任。虽然应该从商业银行的尺度特别是赢利的角度来分配投资基金和发放短期信贷，但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银行在作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压力比对经济标准更为敏感。它们的资金毕竟都是来自政治渠道（国家）而并不来自经济本身。进一步说，这种制度也并没有规定谁对资金在经济上的使用和偿还

负主要责任。银行不关心会不会失去这些资金，因为这些资金不是“它们自己的”；事实上它们自己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本身的业务，即鼓励尽量借贷。政府当然也不为别人所作的决定负责。因此，企业有了困难就可以请求免去贷款，或请求延期偿还，更经常的则是再一次请求信贷，帮它们渡过难关。

这样就可能造成另一种特殊的不负责任的情况，也就是现在到处在谴责的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对一个公社来说，在自己的范围内有一个工厂上缴税收和提供就业机会当然是件好事。只要计划一个价廉物美的小工厂，就能获得信贷。但工厂一旦投建就常常会发现原先对费用的估计不足，于是就需要增加贷款。公社和银行所调拨的资金越是增多，也就越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而特别当联邦或共和国政府必须设法维持一些无利可图的企业时，情况更是这样。

由于上述的和其他方面的滥用资金的情况，实际投资总是超过计划，有时候甚至超过几倍，破坏了储备和投资的平衡，造成通货膨胀。这样在全国，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就出现了一批“政治”工厂。所以称之为“政治”工厂，是因为根据“政治的”决定，该在某公社建立一个工厂，并且以后又根据“政治的”决定，某工厂一经在那里建立就不得关闭，甚至与其他地区较大的工厂合并也不行，因为那个工厂为另一公社所控制，属于另一个税收系统。

第三个偏差是控制百分之七十的工业品的价格所造成的。当时需要控制价格是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现在认为这主要是超额投资和资金使用不求实效的结果。价格控制所引起的特殊问题是：这种控制往往倾向于维持一种价格比例

结构。这种结构是指令式经济的遗产，也是根据指令式经济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为了适应互不协调的个别需要，又毫无计划地加以改变。结果，南斯拉夫的价格就很少能符合实际地反映出相对稀少的价值，因此它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起作用所必需的合理“信号”。例如，在苏联型指令式经济中，把原料和生产物资的价格压低，消费品则定价很高，以便增加对原料和生产物资的需求而限制对消费品的需求。在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准市场经济中保持着这种关系，对供应结构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象采矿、林业、金属和机床等部门似乎是非赢利的部门，因为它们的产品价格低、需要特许权和缺乏扩大生产的刺激。另一方面，消费品由于价格高而大获其利，就导致这类企业毫无节制地扩大生产，从而造成对原料的过量需求，而原料的生产却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它们的价格太低。

自由派总结说，执行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仅仅是带来国民收入的大量浪费，造成个人消费水平不必要的降低，产生许多闲置的工业能力，永远不能有利地加以使用。它还破坏了赢利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他们看到自己的赢利作为税收上缴，而以投资和补助的形式转到亏本的企业和地区——他们喜欢用的批评的提法已变为“对积累的财政‘没收’”——也看到这些赢利以补助住房、休假、旅行和社会服务这些无法与个人能力和勤勉联系起来的形式，作为“间接收入”进行再分配。甚至这些企业明显赢利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处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下，价格订得不恰当，又有种种令人产生错觉的现象，如企业中利润的取得主要不是依靠市场因素而是依靠提供资金和其他种种方便的政治关系，因而没有人能算出真正的生产成本或哪些地方相对地

来说确实成本较低。执行这种经济制度也造成了工业布局上极端分散的恶果。这是地方领导对竞争这个口号采取热情而又只从当地利益出发的态度造成的。他们按照市场理论所规定的内容进行竞争,但没有受到亏本的惩罚,而恰恰是这种亏本倒能使市场经济对资源作出有效安排。简言之,他们创造了一种陷于残缺的中央计划和不完善而且走了样的市场之间的经济,这是一种完全政治化了的经济,但却是一种无实效的政治化的经济。

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是进一步采取在此刻来说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措施,即撤回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对经济的干涉。据说这种意见这时也只是从原则上被肯定地接受下来,而“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并没有解决。尤其强调的是,各级国家机构不应该干预投资,而只负责不在银行业务范围内的市政工程、重要的基础结构项目以及尚未建立的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这样税收和“捐款”可以减少,“积累”则由挣得这些积累的赢利企业自己掌握。可以设想,这些企业自会懂得如何恰当处理这些基金,或是用在本企业的现代化和扩大再生产上,或用在附属机构上,或者通过银行系统按照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标准投放给其他企业和地区。因此,银行系统本身要受作为实际股东的存户(主要是赢利企业)的检查,并与它们共同作出投资决定和分享利润。

这样,各个企业同银行合作就能控制自己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而且按照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对企业的成败真正负起责任来。给不发达地区企业的国家补助应予取消,如认为有必要补助时可从专用基金开支;它们应该更多地依靠同发达的共和国的有关企业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或从这些企业那里得到

的信贷。实行了这样一种制度，投资的比例较低，从而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价格也就可从行政管制中逐步解脱出来。经过这一合理化改革以后，生产增长率一般从数字上看会低一点，但对于一种中等水平的发展现状来说却比较符合实际、比较相称；在这种生产发展水平上实行工业化，应该是有重点地进行而不能全面铺开。

对立的论点和民族问题

所有这些论点和政策，不管经济上有多大价值，显然可以认为首先是对比较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有利。虽然事实将证明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但这种感觉却事关重要，而且在原则上也是对的。自由派论点的出发点，如以上所述是假定经济已经“起飞”和在这种条件下需要修正经济策略并采取此刻所推荐的新的体制性措施，特别是在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部署上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结构。但如果可以认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包括伏伊伏丁那在内的塞尔维亚北部地区经济已经“起飞”，那末南部地区显然还未“起飞”。南部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根据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甚或是罗斯托）的发展观，完全有理由提出：对这些经济未“起飞”的地区的投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性质。有关投资也必须继续集中用于这些地区仍然缺乏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这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上进行政治控制，并由中央再分配，而不是按照银行家的标准安排。他们也可以坚持：自由派的对立论点不是异想天开就是虚伪的，因为那种观点认为不发达地区虽然失去了由中央决定的“政治”投资，但大

部分可以在地区之间或企业之间的经济投资中得到补偿。事实上，经济上的地方主义、种族上的狭隘观念和自治的原则（这可以防止一个企业控制另一个企业，或从其投资的企业中获取利润），都会继续妨碍在适当的规模上进行这样的投资。

根据南斯拉夫辩论的惯例，反对派一方的路线是只能“小声地讲的”，或者在说到那些“重要的具体问题的分歧”时才听得到。这其中有几个论点以后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其一认为：经济系统不能为某些企业或部门的垮台所造成的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后果负责，因为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偿付能力是完全依靠津贴、补助和不断打强心针来维持的，要不就是依靠更多的“政治”投资基金。即使从福利国家这样的社会制度所承担的义务来说，一个政权也不能根据落后地区抗议它们遭到忽视，就要对那里肯定会出现的失业、缺乏社会服务项目以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负责。而第二种反对的论点是一种推论，它认为把重点从投资转到个人消费会带来两种好处：首先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就构成了一种总体需求，为经济的理想增长提供均衡的刺激。显然，在这种改革者的主张中，首先考虑的是对耐用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需求。但要使消费者对这些生产部门的需求不断上升，就意味着早已达到工资标准顶点的人还要提高个人收入。因为如果提高最低限度工资标准，往往就会增加对价格较贵、质量较高的食品如肉食的需求，也会增加对廉价房屋以及其他一些由于供应极难增加或其他原因使需求增长不受欢迎的商品的需求。但是，当食品价格日益上涨和社会服务与“间接收入”可能削减的威胁已使那些收入低的人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是准备对扩大

个人收入的差别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后果负责呢？

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对下述问题展开辩论：现行制度事实上并不象所传说的那样歧视发达地区，也没有从发达地区提取资金在不发达地区作无效的投资。支持这种论点的统计材料是复杂的和有争论的，保守派强调现在是在按人口进行投资就是典型，这种统计材料说明发达的共和国比不发达的共和国发展得快(门的内哥罗除外)。而自由派则倾向按照占各地区社会总产值的百分比统计的投资资料，这样就表明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超过整个国家的平均投资水平。然而，现行制度并未歧视发达地区这个观点还是可以令人信服地提出来的，并且可以补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纯经济的论点，以利于将来真正(同过去假的照顾形成鲜明对照)优先照顾不发达地区。

这些纯经济论点的最重要之点在于：迅速发展南方是(而且将一直是)最合理的长期发展战略。因为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藏非常丰富，适宜于发展为工业区，而且还有大量未利用的劳动后备军，这在本地使用比转移到外地去便宜。但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南方企业所得到的作为通常开支用的社会资金很少，又有战后歧视原料的价格控制制度，因而投放给南方的资金短期内所得到的利润率之低是公认的。这一切掩盖了上述有利条件。因此这种解决历史上遗留问题的优先照顾并不能认为是援助，而只是对历史和错误的价格政策所造成的不公平现象的一种补偿。从长远考虑，这种补偿将会带来大量经济和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论点也构成了一个有力地反对更多或严重依靠市场结构的理由。市场的自由化只能加速地区经济的两极分化，甚至不久前只是有

限地使用了市场指示因素，就产生了一种从社会甚至是经济的角度看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市场只计算直接的经济开支，而低估了发达地区投资的实际社会耗费，如迁移的开支、按人口计算的较高的公共服务开支以及房屋和其他社会基础结构的开支。

这些论点是有力的，既有理论上的说明，又以统计数字为根据。这些统计数字的质量（与数量！）同自由派所搜集的相比，同样给人深刻印象，以致巴卡里奇绝望地惊呼：“如果我们都抢光了，谁还能在南斯拉夫得到什么好处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肯定会取决于政治力量，而不是取决于在“开发”问题上或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上辩论双方论点的长短，所以保守派的这些论点明显地展示了南斯拉夫大多数人、大多数共和国和大多数处在关键地位的党员的利益。“中央集权论者”或“保守派”没能利用这种潜力是他们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2—1963年企图强制执行一种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法，后来因为各种复杂情况受到了阻碍，其中有的情况已讨论过。至少在1962年中期以后，党内的保守派已没有能力在中央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取得大多数的支持，或得到铁托的坚决支持。这就使对立面有了自由和时间去收罗新的论点和同盟者，而不必担心违反党纪受到处罚。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重新使用中央集权的办法，导致再一次通货膨胀以及超额投资和1960—1961年期间的外贸问题，这就进一步使中央集权的做法失去信任，而且使拥护者都灰心丧气。同时，辩论越来越公开地有从经济问题转为民族问题的趋势，也就搞乱了讨论的问题，因为经济上的和种族上的利益实际上不总是能用同样

的方法解决的。于是，自由派的力量暂时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壮大。

对于六十年代初发生的经济争论中有关共和国和明显的种族内容的日益公开的讨论，不是使人振奋，就是令人恐慌。这是由于过去十五年中，普遍以为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在南斯拉夫历史上也是危险的对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必加以考虑的。这种讨论甚至还有外交政策方面的意义。例如 1963 年一个显然是次要的辩论，不仅吸引了经济学者，也受到全国性报纸的注意。辩论的题目是：在确定将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中心这个问题上，“多瑙河概念”有利还是“亚得里亚海概念”有利。前者是基于内河航运，后者则着眼于海上航运。克罗地亚濒临亚得里亚海，隔海就是西方；多瑙河及其宜于航行的支流穿过塞尔维亚流往东方。克罗地亚人认为这种两刀论法是错误的；克罗地亚的海岸连接着东方和西方，而且是不结盟的，越来越多的东欧过境运输通过其港口进行即是证明。而塞尔维亚人回答说：这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人口、可耕地、工业以及将来的发展都将分布在广阔的河谷地区，而不会在岩石嶙峋的海岸。

种族的对抗在当前争夺投资基金和中央所分配的其他利益方面，同样是很明显的，而且具有更为直接的重要性。海港作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或塞尔维亚一门的内哥罗在民族骄傲和民族利益上竞争的标志，是一个比较明显和比较突出的例子。1963 年一位访问者从科佩尔到巴尔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发现人们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尽管有人表现出高兴，有人表现出怨恨，但他们几乎都公开承认，在决定哪些港口应该建设，保持或扩大内地贸易区的问题上，作为有关

的政治当局，它的民族感情要比经济上和地理上的考虑重要。

民族感情的概念在公开和私下的讨论中表面化了，从而在各方面引起了直接与大辩论有关的反响。讨论的内容据说是关于按夭折的 1961—1965 年的社会计划要在塞尔维亚建设的一些主要社会基础结构项目数字不合理以致要求联邦资助的问题。因而，⁷塞尔维亚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理由继续顽固支持联邦在投资中起作用（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对此是反对的）。这些项目中包括 1963 年开工的多瑙河铁门地区的南—罗水力发电和航运系统，以及伏伊伏丁那境内多瑙河—蒂萨河—多瑙河运河系统；后一项工程战后即开始，但长期未予重视因而缺乏资金未能竣工。贝尔格莱德—巴尔铁路则是引起争论最大而且很明显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项目，尽管支持建设这条铁路的人坚持它对发展和社会都有好处。这条铁路系整个塞尔维亚直达海边的通道，是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政治家自 1879 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有了这条铁路就可以完全避开非正教地区，避免依赖克罗地亚或外国的港口。虽然战后每一个发展计划中都列入了这项工程，但截至此刻只在两端修建了两小段：一段是从贝尔格莱德到伐列伏，一段是从巴尔到铁托格勒。其余部分的修建要通过地形极为复杂的多山地区。1963 年 12 月，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党中央委员会（有趣的是，不是由形式上看来更为合适的有关共和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合作协议显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种共和国之间的正式协议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其他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个协议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玩弄的一个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串通一气的阴谋。他们短期的目标是在废

除中央集中分配的投资基金之前抢先占用这种资金。

他们长期的目标可能更阴险，因为前一年关于“南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又活跃起来，从当前的形势看，这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末第一次扰乱了南斯拉夫的政治舞台。眼下，这种“南斯拉夫主义”仍被谨慎地说成一种含糊不清、最终要把各民族的文化合并起来的单一的南斯拉夫文化，或者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爱国主义，不过这种爱国主义是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它并不抹煞各民族本身的特点以及忠于本民族的观念，但对绝大多数非塞尔维亚人来说，这种“南斯拉夫主义”仍然使人感到不过是亚历山大国王“南斯拉夫民族”的翻版，再仔细考察考察也许到头来还是一种“塞尔维亚化”。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1961年12月在公开出版物以及《战斗报》上又暴露出来了。它们刊登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场前所未有的针锋相对的辩论，即塞尔维亚当代最有名的作家乔西奇和斯洛文尼亚诗人皮里韦茨的辩论。但三个月以后，铁托本人看来支持这种“南斯拉夫主义”运动。因为他在斯普利特的讲话提到的各种支持中央集权的论点中，就清楚地包括了需要“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文化”。由于受到这种鼓励，支持“南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就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塞尔维亚作家协会的刊物《文学报》上。到了1962年9月，铁托和卡德尔都感到不能再一次出来向公众作出保证。铁托在联邦议会和社会主义联盟的联邦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我们说融合，并不是指民族的融合，民族的同化或对民族的否定。”在同一场合，卡德尔说得更明显：“我们的联邦并不是一个创造什么新南斯拉夫民族的机构，也不是一种进行民族融合的机构，这些都是形

形色色鼓吹霸权主义的人和宣扬民族取消主义恐怖的人的幻想。”然而，怀疑没有消除。

公开承认经济问题争论中的种族性质，本身就可能是、并将证明是一种两面都可以使用的双刃武器。但这个武器暂时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自由派用得得心应手。重新提起“南斯拉夫主义”和塞尔维亚保守派的作法，无意中给自由派帮了忙。保守派过分暴露了偏袒共和国和种族利益的立场，忘记了自己身上背着特别遭人怀疑的包袱：他们自己是人数众多、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中的一员；他们的首都也就是南斯拉夫的首都，象征着中央独裁政府。因此，他们没有能巩固所渴望的作为大多数不发达地区的保护者和代言人的地位。

自由派得到了这些无意中的帮助，并且机敏地将“权力分散”改为“取消国家控制”成功地分散了对立面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自由派本身也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偏袒自己共和国利益的一面。这样，自由派就能利用人们认为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同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是一回事的这种看法，使自己得到好处。

对马其顿这样的其他一些民族来说，从他们的经济利益来看，基本上支持中央集权制度的；但由于“南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明显恢复，他们对塞尔维亚又开始疑虑重重。他们既然认为“南斯拉夫主义”就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于是思想上就产生了矛盾：既怕塞尔维亚的统治，又怕失去从中央对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得的利益。萨格勒布的自由派很容易就帮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作出了选择。他们收集的统计材料指出，在不发达的地区之中，唯有门的内哥罗因其特殊的政治影

响，利用中央再分配的资金一直发展得比较顺利。他们也微妙地暗示：掌握在北方富裕的企业手里的额外资金，只要有有利的经济投资机会，就会向南方找出路，以补偿南方失掉“政治性”投资的损失。总之，到1964年象茨尔文科夫斯基和格利戈罗夫（前者是个正在走运的人物，但还不能算是自由派；后者作为联邦政府中一个生气勃勃的自由派经济专家早已声名赫赫）这样年轻的马其顿领导者，不管他们所作的是否是决定性的考虑，也同斯洛文尼亚人或克罗地亚人一样直言不讳地赞成“取消国家控制”。甚至象科斯梅特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在塞尔维亚人和国家保安部的统治下也越来越不听话。因为这种统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保守派因此失去了1962年所掌握的主动权，也没有能在塞尔维亚和一些不发达地区形成坚强的核心，而这本来是他们后一个时期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对自由派来说，尽管他们在挫败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案时得到支持，并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依然没有取得足以推行自己的方案的政治地位。把经济问题的争论提高到民族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同盟者，其中包括那些从经济利益来看是支持中央集权制度的人；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也起了类似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立场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所涉及的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北部的企业，为数至少与克罗地亚的一样多），本应把他们推到自由派一边。但他们现在倾向于同塞尔维亚的保守派联合行动，或者至少保持沉默。自由派无力推行自己的方案，还有三个更重要的因素。第一、自由派同保守派一样，没有能控制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五名成员中稳定的或有效的多数。执委会中有人支持保守派，有人支持自由派，或者不大表态。

第二、铁托的态度是关键性的，但却很暧昧。第三、党中央和政府以及警察机构中依然是塞尔维亚人占优势，而党政机构又越来越为警察机构所控制，但警察机构则是头号保守分子兰科维奇所精选的工具。

因此，自由派从1964年初到1965年7月这十八个月中零零碎碎拿出来的改革方案，显然不是党中央的自由派取得什么重要胜利的成果，尽管战后南斯拉夫历史上各种重大决定都是在党中央作出的。自由派的改革方案的产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各种人、事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当时迫切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来。这种经济问题是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缺点所造成，不是优柔寡断的干预所能解决的，而且由于无所作为反而日益严重了。其次是在高级领导层中也存在着相持不下的情况，这种情况继续阻止着强行实施中央集权的方案；同时还有另外几个往往具有政治首创精神的新的中心在活动，这种活动所以未受限制是由于党中央存在着决策上的真空，也是由于共同的挫折、奢望或感到以一种新的、公开的和独立不羁的方式来表达并推行自己政策主张的时机终于来临所促成的。最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过去各种改革及其理论基础的性质、累积的影响和内在逻辑等，这种种因素也构成了多方面的动力。它们共同使外表毫无联系而又不相协调地合在一起的政策主张有了明确的定义，得以归纳起来，而且终于重点突出了。如果在自由派后来的改革中把重点转向市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这种转变方式的本身就是一种警告。南斯拉夫终于不再存在一个有效的、单一的政治权力中心，除非确实由于多元化而出现了无法开展工作的局面或者保守派发动袭击才能恢复旧观。

第五章 自由社会主义

发展的辩证法

1965年的改革是历经一系列政治事件而瓜熟蒂落的，就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因素、人物和政治倾向的辐辏和影响。这些政治事件包括：一、1961年至1962年间起草了一部新宪法，1963年春正式通过，并且由于对宪法的程序进行了重要改革，1964年的社会计划才得以通过；二、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因为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拥护中央集权制的人可以接受，但也可以作为向更广泛的自由化改革跨出的第一步；三、工会代表大会和议会的辩论及其所作的决议都明确地赞成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代表大会才于1964年12月最后拍板定案，同意采取自由派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只是顺应日甚一日的改革要求和既成事实，而不是党代大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一项明确决定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键时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仅在1964年3月16日召开过一次会议，也就是自1962年7月那次毫无结果的全会以来的第二次会议。

前已述及，在北部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领导人以及贝尔格莱德中央自由派指导下的经济学家们，业已起草了改革的原则。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曾经使中央无法通过任何其他解决

方案。但是，他们在中央无权、在中央以外又缺少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而现在，找到了一些办法把赞同改革的意见集中起来。为了进行改革，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还改造了一些现有的机构，如工会联合会，以适应新的需要。工会联合会这个组织早在1959年就已经开始变化了。现在到这些新的改革机构工作的人员正是第一次大辩论到第二次大辩论的十年中社会变革的方式和性质的产物。他们从政治上给自由派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从而使辩论一方活跃的和潜在的支持者的数量与类型大大增加，而另一方却在很大程度上毫无变化。

在1962年至1966年的斗争中，支持中央集权解决方案的人主要还是那些1950年至1953年期间对宣布进行改革感到不快的人。他们直到德热拉斯的极端主义导致了一次准中央集权性质的妥协时才舒了一口气。从那时到现在，这部分人中包括大多数党的积极分子和官僚机构的成员。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亲眼看到革命遭到了背叛；其他一些人官职在身，小心维护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各种特殊待遇；但其中多数人（包括兰科维奇本人），从根本上说都是些讲求实际的搞政治的人。他们认为拟议中的变革意味着权力分散，担心这样做下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迷失方向，甚至很可能使这个多民族国家解体。中央集权方案的拥护者还包括危险地集中在这个国家发展较慢的地区的大多数企业和公社，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属于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特定的民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企业和公社从中央根据政治需要统一掌握的资金中拿去的多，交回的少。这种单位的数目正在减少，尽管减少得不多，但意义很重要。如果说中央集权的保守方案的支持者在种类和数目上基本同过去一样，那末对

各种不同的“自由化”方案有兴趣的人，这些年里却无论在性质和数量上都已经历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如何实现1950—1953年间酝酿过的那些目标，南共联盟煞费踌躇，但随后十年折衷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成就为此开辟了出路。

到1965年，南斯拉夫的人口已接近一千九百五十万，比二次大战结束时增加了四百万左右。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革快得使人眼花缭乱。在改革进行了二十年后，除了值得注意的个别地区以外，南斯拉夫在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出现了新面貌。人们在五十年代中叶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中，一些已经实现，不少方面仍然遇到了挫折，但人们又燃起了新的期望，甚至在十年前按传统或情理而言连想都不敢去想的那些人也满怀希望。

大约是1965年前后，曾经有人认为贝尔格莱德是共产党国家中唯一存在汽车停车场问题的首都。1966年，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哈尔彭又来到了他1953年至1954年为了作人类学研究曾进行过野外调查的地方——奥拉沙茨村，这是1804年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发难的地方。他这次来访发现：即使在这相对偏远和未经开发的舒马迪亚的一角，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如故，但实际上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这些变化他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显著变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明显而渐进的革命，曾经使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无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都迥然有别的那些特征正在消失。”哈尔彭重新会晤了他十二年前第一次到这里来采访过的人，因而在访问记中描述了一些人事的变迁以及社会风俗的更改。他还谈到一些轶事，最有趣的如：

有一位乡村老人，过去一向喜欢讲述塞尔维亚历史上的光荣业绩。而现在，从贝尔格莱德飞往铁托格勒的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喷气式班机从他头上飞过时，他举起手杖自豪地说他认出那是一架法国“快帆式”客机。他常常高兴地讲述他七十岁那年第一次乘坐飞机到门的内哥罗共和国去探望儿子的情景。他的儿子是一个工厂的经理，正在亚得里亚海滨建造自己的夏令别墅呢。

哈尔彭还说，他和他的家属在1953年是搭牛车到奥拉沙茨村的，1966年则是坐的汽车，但通往村子的泥路在1953年时已保养得相当好。笔者最喜爱的乡村在多瑙河对岸的巴纳特，那儿也有这类问题，现在刚刚解决。也是在1966年，这个村里的人看到没有希望得到国家的帮助，就自己筹款，自己动手，向附近一家化肥厂借来工具铺了一条新路，不再走那从玉米地里穿过的泥巴路了。他们中有人这样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二百五十年了。帕夏、王子、政委都来过，后来又都走了，可那条烂泥路还在那儿，所以我们决心自己动手来干啦。”

对南斯拉夫人个人来讲，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正是以这样一些事情来衡量的。变革意味着在自己的村子里有清洁的自来水，或者是在农产品价格提高后手里有现金，预料到明后年要安装自来水就先在屋子里盖好盥洗室。变革还意味着自己或自己的兄弟、亲戚在城里有了工作；或者是为了得到急需的东西而对现金收入增加了兴趣。一般说来，这种急需很少是想增加一块地，大多数是希望孩子能受到中等教育或专业训练。变革使人工流产频繁起来。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只能负担一个到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另一方面孩子多已不再是一

笔财富,而是负担。因为每一户最多只能占地十公顷;此外,现在农业机器很好买,代价比养育子女要便宜得多,而且不会象孩子那样忘恩负义。也许变革还意味着重新恢复父母在革命前所见到的那种社会地位,但现在这种地位已不再是资本家,而是满足于当工程师、医生或科学家了。变革也可能以能在海滨或萨瓦河畔建造一所别墅,或者到国外去旅游为标记。出国旅行也不再是到的里雅斯特去采购东西,因为现在国内已经可以买得到,所以是真正去游山玩水了。到六十年代中期,变革已经使全国,包括边远省份的小城镇在内,都奇迹般地出现了超级市场和小型自动售货商店,与比比皆是的乡村集市相互补充。由于超级市场的性质及其存在的事实,市场经济在包装和现代化食品加工方面都必需适应这种要求,从而不仅便利了人民,而且还使食品的花色品种得到了增加。

南斯拉夫人口增长的情况,除个别地区以外,已同西欧国家一样。至少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部分地区以及塞尔维亚东部,出生率一直是在下降的。据粗略统计,伏伊伏丁那地区目前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四点四,科索沃地区是千分之三十七点九(这是欧洲最高的出生率)。总的来看,国内人口自然增加率下降到每年百分之一,而且还在下降着。全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尽管在科索沃和其他一些山区刚刚开始,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业已完成或正在顺利进行。变化的特点是: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比例)起了重大的变化。

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就业、教育以及南斯拉夫人的居住地点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到1966年,在社会主义部门工作的人数近三百六十万,比九年前增加了一百二

十万。其中，搞经济工作的三百万；而在工矿企业工作的则为一百三十五万八千。这些人的素质也较以前有所不同。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占全部劳动力百分之五十九的雇员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不包括个体农民及手工业者），而在1958年仅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二十点七。持有大学文凭或同等学历证书的工矿企业雇员人数在四年中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仍不过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八人——但是据说在这些部门中还有十七万五千人缺少必要的技能。1963—1968年期间，只具有小学程度的工业企业经理的数目从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四点四。这些变化反映了教育系统的显著发展，尽管还不算完善，所培养的人才也还不能满足需要，但已对经济逐渐产生影响。到1961年，南斯拉夫的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即自1953年以来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准确地包括了自然增加的情况）；到1971年，城市人口更进一步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但是与大多数发展迅速的社会相比，南斯拉夫城市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慢的。除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仍然是欧洲城市发展速度最慢的国家。

上述变化使南斯拉夫同世界各国的接触方式及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也为南斯拉夫对世界情况的了解提供了一些日益扩大的渠道。这些渠道对所有南斯拉夫人（包括城市和农村）视野的扩大、社会观念乃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他一些影响南斯拉夫发展的渠道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共产主义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特性。这比之现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制度，起码在技巧上能够更快地把不发达国家人民最大限度地从文化上调动起来。党的各级机构和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组织网，把各种指示、“指导路线”以及

情况传达到最边远的居民区，除了最固执的一些公民以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指示能够受到全民的重视。目前世界上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样板有多种，而且在相互竞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概念尽管从理论上认为经济应占有首位，但在实践中对发展过程的总的性质的理解比大多数（且不说全部）搞现代化的样板要深刻一些。因此，通过各种“传送带”所传达的内容不仅常常涉及经济、政治问题，也涉及社会变革中范围相当广泛的各个方面，诸如文化、教育、家庭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系统等。在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一些国家里，各种政策、价值观念或各种具体方案是通过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宣传网来传达的。这种做法也自有这种做法的效果，但公民们由于经常受到一次次宣传“运动”的反复冲击，终于形成了一个听而不闻、无动于衷的保护层，使宣传运动达不到这一制度所预期的效果。

其他重要消息的传达和潜在的政治动员，通过有广泛影响也更为方便的宣传工具进行。1962年南斯拉夫有二十一个广播电台，1966年增加到七十七个。这一时期内登记的收音机数目由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万，其中一半属工人所有，农民占三十七万三千台。1962年登记的电视机为十二万六千台，到1966年增加到七十七万七千台，平均每二十五人有一台电视机。同年，四座电视台总的播放时间超过四千小时，其中七百七十六个小时用于播送“新闻、政治和其他时事节目”。南斯拉夫电视台从“欧洲电视”选用的这类节目比任何其他成员国都多。其他节目中三百八十九个小时用于“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这一类节目中有什坎基奇的专题讲话节目，还有每周多次向全国播送的采访重要政治家和其他人物的访问记，

内容之坦率令人惊异。到 1967 年，全国有一百万电视用户，而到 1971 年则增加为二百万户，即全国每二点八户就有一台电视机。

报纸发行量较为一般，特别是在农村，那里的地方政权和出版人员经常抱怨缺乏读者。由于收音机和电视机在农村的迅速普及，报纸的发行量还在继续下降。六十年代中期，全国有二十三家日报。1964 年总发行量是一百七十万份，1966 年减少到一百五十万份以下，到六十年代末发行量回升到 1964 年水平。报纸上刊登的文章质量不断改进，内容不受拘束而且生动活泼，尤其是 1966 年后更为明显。贝尔格莱德的主要日报《政治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它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拥有出色的记者而著称。六十年代后期，《政治报》可能是欧洲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但是两家具有特殊民族任务的地方报纸，萨格勒布的《信使报》和卢布尔雅那的《事业报》，它们的国内新闻专栏越来越值得一阅。^①在一百五十多种周刊中，最受欢迎的正派的新闻杂志有萨格勒布的《星期三信使报》，这是 1970 年发行量最高的杂志；其次还有贝尔格莱德《政治报》出版的《新闻周报》。其他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期刊有通俗的或严肃的文学刊物，有专业刊物以及数百家不同规模的企业出版的内部刊物。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侧重于探讨思想理论问题的刊物，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权势集团的喉舌如《社会主义》杂志；另一类是独立性的、常常与权势集团唱反调的刊物，如《观点》和《实践》杂志。以上两类报刊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社会上层

^① 然而发行量最大的却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份生动活泼的小型晚报《新闻晚报》。它使该报的所有者，因始终以“官方”报纸形象出现而影响大大削弱，以致奄奄一息的《战斗报》得以维持下去。

人物中颇有影响。《共产主义者》周报是唯一真正官方性质的党刊，具有特殊的地位，显然是全体党员的必读刊物。

社会变革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唯一完全不可避免的方面是：随着时光流逝，老一代的游击队员日益年迈，新一代又崭露头角，这对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的补充和组成都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暂时还只是不声不响的和缓慢的，有时候也是难以预料的。它涉及青老两个关键的社会阶层，因此它的缓慢性就同它的必然性一样，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有重大意义。

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歧异以及接班问题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南斯拉夫的具体问题是负责党、国家和经济工作的老一代的领导人还不算太老，这点前边已多次提到。这一代人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和后来接管政权时仅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一直管理着国家，现在不过五十多岁，还不愿意退休。下一代人中准备接班的合适人选在等了二十年后已经变得愈来愈不耐烦。在南斯拉夫的政治术语中，这些人指的是战争初期参加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或在战争末期当过少年游击队员的人。他们现在大约四十来岁。而紧接他们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第三代，也就是说还有另一个同年龄的集团，他们与第二代人的经历极不相同。这些人在战争中还是小孩子，他们没有参加过建立新南斯拉夫的斗争，但他们在新社会长大，在日益发展的学校里学习，完全接受了新社会的价值观念或受到其影响，而且正在政治、经济领域中沿着前程的阶梯努力向上爬。与老一代人相比，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有专长，这就更助长了他们对老一代的无能和欠缺的蔑视。在这种情况下，中间一代的接班人如果

没有在下边的压力变得过大之前尽快获得最高级领导职位，那末他们就有被排挤掉的严重危险，就不会再有升到最高一级的那一天了。相对来说，中间一代的人数较少，但很重要，因为他们目前担任着仅次于最高级职位的很多极重要的职务。直到1965年老游击队员这一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后两代人晋升的障碍，而后两代人对前程的灰心则极易导致政治分歧。目前反映比较尖锐的是中间一代人。1965年至1966年间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作用之一就是突破这一障碍，只不过大多数支持改革的人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模糊的。

在经济领域中，“突破障碍”早已开始了。企业经理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现象，反映出愈来愈多的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已渗透进这一阶层（其中甚至还有少数妇女）。1966年连任或首次当选的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企业经理中，三十至三十九岁的占百分之十四，四十至四十九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八，五十至五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三十五，另外还有两名不到三十岁的经理和三十二名六十岁以上的经理再次当选。但是，首次当选的二百六十二名企业经理中，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九岁之间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四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十岁以上的仅占百分之八（而过去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六十）。新当选的经理中有十五人不到三十岁，约占百分之六。

党的组成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前已述及，南共是一个正在老化的党。直到1965年，新党员中年轻人的数目持续下降，而老党员则逐年进入老年人的范围。二十六岁以下的党员数目，从1950年占全体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下降到1966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四十岁以上的党员比例相

应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但二十六岁至四十岁之间的党员人数始终占大多数，1966年为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

然而从党员的党龄来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目前只能算是个新党，是改革和自治时代的党，以改革和自治为主导思想。1966年底，南共一百零四万六千零一十八名党员中，只有两千九百人（占百分之零点三）是战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老革命者，另外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六名党员（占百分之六点一）是战争年代中入党的；其余党员中十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在1963年以后才拿到红皮党证，还有四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九人（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是在1958年以后入党的。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前入党的党员数字目前占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五，在决裂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在党的历史上有些时期，人们入党动机明确。到1966年，这种党员中人数最多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1945年至1948年“行政管理时期”入党的十八万七千名党员（占百分之十七点九），还有一类是1958年至1962年间入党的二十七万八千零九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那是在党的“七大”之后，是国内实行自由化，国外与苏联重新交恶的这一时期。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62年至1963年期间党员人数则急剧下降，同1953年至1955年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在这两个时期中，党在国外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在国内实行保守的紧缩开支的政策。

近来南共党员职业和文化水平的变化，继续体现了自南共执政以来就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当然也略有不同）。六十年代中期工人党员数目下降的速度事实上加快了，1965年比

1964年减少近五千名，1966年比1965年又减少一万一千五百名，因而工人党员的数字在党员总数中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无论是与早些时候比较，还是与总劳动力中相应的数字比较，此刻工人党员中有更多的人是高水平或一般水平的熟练工人，半熟练或完全没有专门技术的工人更加减少。1964年到1966年期间，党内享受养老金的人增加一万四千人，无法分类的“另一些人”增加了一万五千人。党内工程师、技术员、律师、经济学家与文教卫生工作者的数字都有绝对或相对的增长，而办事员及其他低级雇员的数字则下降了。战后一直在减少的农民党员的数量已暂时稳定在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党文化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所有这些变化。

当然，根据上述数字进行概括不很可靠。但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肯定的：首先，党的组成情况与1945年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大不一样，甚至与1955年的南共联盟也不相同。到1965年，党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党员和多数中级军官在战争年代还不是成年人，而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五在那时或在与斯大林决裂前还没有入党；其次，具有长寿美德而仍在掌权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经受了各种革命斗争与革命后实践的考验，可以设想他们从中学到的经验，除中国以外，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望其项背的；第三，申请入党的年轻人减少；第四，全党的文化水平空前提高，而无产阶级性却减少了。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的年月里，普通党员和领导人的行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年轻的党员或是在进行自由化改革期间入党的党员不见得总是比年纪大的党员，包括战前和战争时期的老战士的思想更“自由化”一些，或者比他们更少一些“小职员那种阿谀奉承的思想”。当然，这些老党员的入党

动机同样是复杂的，而且他们的观点往往由于切身的痛苦经历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斯拉夫，对决定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的是一些制度化的程序和期望，而不是人们所在组织的社会的或个人的组成情况。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形成并大大发展了或前所未有地动员起一些社会阶层。他们以种种新方式支持社会改革，并有能力为改革大声疾呼，致使1965年的改革渐具规模。实际或可能拥护部分或全部改革方案的阵容愈来愈大，包括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他们有许多有力的理由一概反对政治控制经济，特别反对由贝尔格莱德控制，也反对贝尔格莱德或者各级党组织以任何形式对经济进行政治控制。他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使他们便于把上述意见集中起来并加以宣传。社会主义企业家这个真正的新阶层中有很大部分就属于这一类人，此外还包括广泛扩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很多人，特别是这两类人中那些在赢利企业中或富裕地区工作的人，以及直接分享这类企业家和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而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支持改革的人中还包括愈来愈多的由于受过教育、享有社会地位、已迁居城市或与城市联系增多而了解了民族社会主义理论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人。这使他们认清了无论是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半专制主义，还是当前对公民参与政治的限制，都是有弊无利的。此外，迅速扩大的就业大军和可能就业的人中的雄心勃勃者也支持变革。他们不管与事实是否相符，把自己的境遇和个人失意都归罪于“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并归罪于党和国家。

政治体制上的发展和变化也具有上述相同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不仅建立了新的机构，同时也改组了一些现

有机构,以便得心应手地推行改革。首先,自1950年以来政治上的权力分散已在体制方面引起了变化。尽管权力分散是渐进的和不完全的,但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半自治的共和国一级和公社一级的机构。这些机构有权制定自己的计划,可以在财政和其他方面同本地区的经济组织有直接联系,还能对企业、银行和社会服务部门领导人的任命及人事政策发挥重要影响。这些联系意味着地方领导人掌握着相当独立的财权,并可以此来增加自治的程度。因为他们可以办越来越多的事情而无需向上级申请经费,也就不必征得上级的同意了。他们关注的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使之不受上级政治机构的侵犯。同样重要的是,地方政权及其领导人批准或撤销经费以及优惠的权限日益扩大,这样就获得了更有力的手段在各方面网罗听命于自己的人。其结果是形成了地方分权的体制,加强了地方当权者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地位。最后,地方政府和共和国政府确实拥有相当多的并逐年扩大的行政权、人事权和财权,而且由于那种反对倒向贝尔格莱德的民族偏见和其他的偏见又不断强化了这一状况,因而就使地方政府往往比在其他情况下吸引和掌握了更多具有雄心壮志和富于才干的人,而这种人在联邦政权机构中反而为数较少。^①

地方民族主义对目前基本上以地域划分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出现起了重要的双重作用。首先,它培育出本身就带有

^① 从美国联邦制的演变中可以发现一种与此相对照的富有启发性的情况。当时,美国财政收入的归属是向反方向发展的:即逐渐把收税的权利和岁入集中到联邦一级,而地方和州一级政府的财政权则相对来说日益削弱。这就把更多的职权转移到联邦中心。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趋势是目前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很少能胜任其职务的主要原因,地方职务至多被看成是通往华盛顿的枯燥无味的进身之阶。而加拿大的经验则与南斯拉夫相似。

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偏见的地方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还有着个人的理由追求本地区、亦即本民族的利益，怀疑为其他民族利益讲话的共产党同僚的意图，怀疑贝尔格莱德的意图——除一些塞尔维亚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认为贝尔格莱德是代表塞尔维亚人利益的。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民族主义给地方领导人提供了一种获得群众真心支持的潜力，一旦这种潜力发挥出来就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向中央闹独立的地位。为了激起群众的情绪以取得支持，他们只需象目前所做的那样卓有成效地竭力捍卫本地区的利益并公之于众，证明他们所捍卫的利益也就是本民族的利益，这样他们自己就一身兼为民族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了。这些事情他们也都轻易地办到了。由于需要让人民看到他们正在维护本地区和本民族利益，还起了另一种作用，即促进了公开的政治辩论和冲突，并使群众消息灵通，为进一步扩大地方的权力和公民参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战略在某一共和国愈是取得成功，在其他的共和国和本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中产生的疑虑也愈大，在其他地方的广大群众和上层人物中引起的恐惧也愈大。他们担心民族情绪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会再一次导致分裂主义和内乱，至少是使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完全停顿下来。这种反应肯定会成为目前正在退却的中央集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借口。无论如何，这种一直在全国各地实行的战略本身至多只能反映出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的缩影。因为只有斯洛文尼亚，可能还有门的内哥罗，真正可以声称自己差不多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而上述战略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却是以此为前提的。

六十年代的后五年中还产生另外一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因素，使反中央集权和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情绪活跃起来。这些

情绪分散来看，影响不大，汇集起来则不可忽视。导致上述因素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进一步在内部进行扩大“直接社会自治”的有趣实验，以及取消国家在公社服务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中的领导作用的实验（上述机构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是由国家或私人管理的）。以地方上的“教育共同体”和“保健共同体”为例，在这些机构中直接由群众选出的供应者代表和消费者代表共同商讨有关资金、管理和服务质量等问题（代表中有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医生、其他医务工作者、学生家长、高年级学生以及交纳当地教育税和参加健康保险基金组织的人）。管理上述机构的人有权决定与他们自己或家庭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满意，并对保住职务、扩大权限愈来愈有兴趣。后来的年月里，这样一些“利益共同体”在种类和权限方面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它们彼此间通过谈判签定“社会合同”，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将成为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而且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实现“取消国家控制”这一希望的主要寄托。

在通往改革的道路上，为了把各个自治团体的利益集中起来，此刻正在创建另外一些与上述利益直接相关的中心。顾名思义，它们即使不是反对中央集权性质的，也是主张权力分散，反对垄断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自1960年11月开始草拟的南斯拉夫战后第三部宪法的产物。它们对议会制度所作的变革将会产生令人惊异的重要后果。

从宪法到党代会

1953年的根本法对1946年的宪法作了很大改动，然而这

显然是一部尚待完成的宪法，连起草者也不讳言这一点。其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理论和结构方面的基本改革尚未完成，无法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样，1953年的根本法看上去就象是一张记录现有改革项目的清单。此后，南斯拉夫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迅速前进，其社会和体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1963年的宪法仍然是一部在措词上经过仔细斟酌的过渡阶段的法规。它把这一阶段所经历的可作为准则的体制改革成果写成较为明确的条文，并为下一发展阶段制定了蓝图（不过某些章节极为费解！）。由于1953年至1963年期间，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理论和作风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其他变化，1963年宪法与人们通常所设想的共产党国家的宪法就多少有些不同；它不那么故弄玄虚，使人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现实困惑不解；也不那么道貌岸然，在宪法中大摆他们的虔诚愿望。1963年宪法所建立或改进的一些机构和法令以及所阐明的一些原则，将是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并具有真正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难以预料。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筹备，新宪法于1962年秋提交群众讨论。筹备期间，成立了由卡德尔任主席的宪法问题特别委员会，负责撰写宪法草案初稿。其下设立负责法律问题的小组委员会，由乔尔杰维奇任主席。另外还建立了几个常设的或特别的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特定的章节。例如，来自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小组起草了宪法中有关“共同体制度”和“劳动联合单位”的条款。“劳动联合单位”是工人自治组织的一种改进，自1960年为通过“收入法”进行斗争以来，工会一直提倡采用这种形式。在共和国一级的领导人之中，参与新宪法筹备工作最多的是巴卡里奇。筹备过程中，他除了在很多其

他问题上起作用以外,还提出:只要建立起适当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应当是宪法所涉及的),工人就不可能把“积累吃光”,因而可以放心让他们去负责管理积累和投资,这是“取消国家控制”的一项措施,应该使这项措施在新宪法中有所反映。

新宪法的筹备工作是在布莱德和布里俄尼岛高级领导人休养的别墅里不声不响地进行的。有关人员深入地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宪法。草案初稿的要点于1962年7月提交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审定的草案交联邦国民议会和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在9月20日至21日为时两天的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大事宣扬的公开辩论。经过六个月常常是极其热烈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讨论之后,宪法草案作了多处改动,修订稿于1963年3月提交联邦议会。新宪法通过了,并于4月7日正式颁布。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宪法、公社的规章也都重新写过,与新宪法取得一致,随后在6月初进行了选举。改组后的联邦议会于6月29日开会,卡德尔当选为主席,南斯拉夫议会生活中的新时代开始了。

最后通过的新宪法篇幅长得出奇,内容极为繁杂。全文包括九项“基本原则”,仅前言部分就有十六页之多。正文共分三部分,十四章,二百五十九条。杭德尤斯把前言部分描绘成“囊括所有已经应用或有待应用于整个南斯拉夫的各种原则的大杂烩”,而在第一部分(社会和政治制度)里又把这些原则“细分为有关个人、社会团体、经济和国家等方面的总则”。只有在第二部分(联邦的组成)才看得出同传统的联邦宪法(如美国宪法或南斯拉夫于1946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有相似之处。

宪法的其他部分则反映了南斯拉夫的国家观念,它认为

国家的职能通过“社会自治”机构逐渐被社会所取代，国家也随之“消亡”。因此，在新宪法中不再使用“国家”一词，而代之以“社会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新宪法成了社会上正式的政治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据以行事的规章大全。由于南斯拉夫“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实践仍然在变化之中，宪法中的阐述就不够清楚，因此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新宪法不过是一个过渡性文件。卡德尔在九月会议上谈到，应当将新宪法看作是过去十年中企业和公社自治方面的经验用法律形式记录下来的尝试，以便在社会生活更广泛的领域中真正运用这些经验，并为随着新的“社会结构”日趋成熟而到来的进一步政治变革铺平道路。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1963年的宪法十分强调把“社会自治”作为普遍体制和“不容违反的公理”（第34条）。主要是阐述自治本身含义的“社会经济组织”一章，带有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工会和自由派理论的特点，体现了有关收入分配的方案——劳动者根据个人的、劳动联合单位的和整个企业的劳动按比例分配收入。为采纳这个方案，工会联合会整整作了三年的努力（第12条）。本章还从法律上批准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的纲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关于企业在按利润比例安排投资方面所起的作用（第11条）。但总的来说，与工会联合会、各企业、其他自治协会和公社相比，各共和国并没有得到加强。概括起来说，宪法体现了把自治作为南斯拉夫准则的新的最高目标。这是自由派的主旨。在反对经济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的斗争中，他们改变战术采用“取消国家控制”的口号^①以来一直坚持这一点。

自治的原则还发展到用于议会制度。1953年成立的“生

产者院”实际上已向自治方向迈出了一步，现在则要在议会中进行新宪法的最引人注目和最具政治重要性的体制实验。后来卡德尔任主席的联邦议会（即原来的联邦国民议会）成了一个由五个院组成的独特的立法机构，其中四个院代表行使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公民。所有各院的选举都是在公社一级或共和国和自治省一级的议会进行，选民不直接参加选举，但由各选区公开的选民会议提出候选人。

联邦院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机构，有一百二十名代表，选自传统上按地理划分的选区。^② 联邦院内设有民族院，由每个共和国选出十名代表，每个自治省选出五名代表组成。^③ 联邦院除了在少数几方面事务中具有独特的权限（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和解散联邦执行委员会）之外，主要任务是在平等基础上与有关的“劳动共同体院”一起研究并通过议会法案或其他条例。“劳动共同体院”共有四个：经济院，文化教育院，福利保健院，组织政治院。每个院有一百二十名代表，分别由“相应的活动领域里的劳动组织或劳动共同体”从本组织中提出候选人，然后由公社议会选举产生。^④ 这些通常被外国学者

① 另一项体制上的创新是建立了宪法法庭，授权它判断议会、行政机关或自治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也是1963年宪法摆脱马克思主义权力统一原则的几项变动中最突出的一点。

② 这些代表由各选区全体选民会议（在社会主义联盟监督下）提名并由公社议会选举产生。他们与选到其他院的代表不一样，要经过广泛的公民投票“确认”。下文将提到这一独特条款的后果。

③ 1963年宪法通过以后，科索沃—梅托希亚不再是自治区，而提为自治省，与伏伊伏丁那地位相同。1968年12月，根据第七条和第十八条修正案，取消了纯塞尔维亚语的地名“梅托希亚”，作为对阿尔巴尼亚民族感情的让步，而科斯梅特也就简称为科索沃。

④ 组织政治院在有的方面例外。它的候选人必须是“劳动共同体”管理机构的成员或是“社会政治组织或协会的任何官员”，从而使这一机构实际上多少有些莫名其妙地成了经理人员和官僚政客的院了。

称为不同社团或不同职业的各院是自治思想的体现，它所代表的选民范围同 1953 年建立的第二院即“生产者院”相比也有所扩大。过去一个院的工作现在由四个分工明确的院接替，（间接地）扩大了代表范围，现在它不仅代表在“生产性的”企业中工作的人，也代表了在“各种劳动共同体中工作的劳动人民”。每一个院同联邦院一道处理根据宪法规定与该院所代表的社团利益有关的事项，因此设有五个院的议会在研究每项提案或作出每项决议时，它的职能象两院制议会一样。^①

由于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议会都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组成，而且在每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公社议会中都有一个或数个社团性的议院，这样，一个南斯拉夫选民通常就正式地、（在公社一级以上则是）间接地享有了三重代表权——在政治院中他是作为消费者的公民，在社团性的议院中是作为生产者的公民（但只是当他在一个“劳动共同体”中工作时才享有这个代表权，也就是说没有参加合作社的个体农民或是个体手工业者以及自己开业的律师等等都不包括在内），在联邦一级，即在民族院中，是作为一个共和国或一个自治省的一个民族的成员。

卡德尔认为：各级新的议会表明南斯拉夫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观念彻底决裂。早在 1952 年，他本人就提出过这种决裂的必要性。现在，当他解释新制度的理论基础时，又用了

^① “劳动共同体”这个术语在南斯拉夫语言里或翻译成英语时都很别扭。但却忠实地体现了南斯拉夫理论家力图解决一个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十分重要的问题的特定阶段。使用这个笨拙的词语，是想寻找一个能包罗万象的合成词的结果。这个概念既包括工厂或农业集体（即已开始实行自治的“企业”），也包括学校、医院、零售组织或律师协会等内容。在 1973 年的宪法起草之前，“劳动共同体”改称为“联合劳动组织”。

当年的一些提法。在一党制的国家里保留资产阶级类型的议会是对民主的嘲弄。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最初几年，一党制这种形式还可以为人民所接受，因为捍卫新秩序需要党进行专政。但是，过了这一阶段，一党的最终是无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想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这种形式必须摒弃。与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各种代表机构必须能够反映和解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其表现形式是劳动共同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每个公民自身的各种不同利益的冲突。因为每一个公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商品的生产者、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或创造其他价值。因此，上面谈到的各种机构不应该以资产阶级民主方式代表阶级利益，只使用本阶级的成员，而应该按其社会职能来分配利益和使用人员。南斯拉夫模式的设计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要代表合法的社会主义利益，还要通过联邦院的联合机构调处上述利益之间的冲突。联邦院是一个“授予联邦全部立法和政治权力的总的政治机构”，它同作为“社会自治的首脑机关”的各个社团性的议院一道配合工作，这些议院“在各自的行业和自治范围中是最高一级的工人委员会”。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的社团性议院以及公社的扩大了的生产者院，使这样一个“最高一级的工人委员会”包罗一切的体系完整化了，它们的职能是与共和国、自治省及公社的作为联邦院下属的“总的政治机构”的议院平行共事。

不管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预想的目标是什么，新的联邦议会以及部分共和国议会很快就使人刮目相看。几乎一夜之间，南斯拉夫的议会生活就变得比在任何其他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里都要令人兴奋和富有成效。1963—1964年冬天出

现了一系列事件：议会曾对政府议案进行抵制或者作了实质性的修正；在议院里，政府部长受到当场批评。这些前所未有的场面使采访议会的记者不知如何进行报道。他们被召去开会，并被告知可以如实报道议会上的辩论情况。那一时期，有关1964年社会计划草案初稿的讨论情况可算是最重要的事件，尽管不如否决一项法案那么富于戏剧性。当时，联邦执行委员会、有关的议会委员会、联邦院以及经济院就此计划进行了广泛的吹毛求疵的辩论，并作了修正。这是议会头一次没有满足于仅仅履行一下批准社会计划草案的正式手续。在通过这个计划的每一段落时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批评意见是针对这项计划明显的过渡性质。计划的草拟者则坦率承认，这一计划就是为了要和延期的七年计划经修改后可能提出的任何方案取得一致。四中全会曾经要求提出七年计划方案，但十七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准备好。代表们生气地反复质问：中期计划在哪里？关于进行基本改革的决定在哪里？很明显，这样的决定是导致延期的原因，也正是国家经济自1961年以来日益急切地等待贯彻的内容。^①

敢于直言的代表们，同部长们和党的高级官员们一样都是先前那个坚如磐石有着铁的纪律的党的党员。但这些代表敢于抵制部长们的各种决定，敢于批评党的高级官员优柔寡断。他们是通过间接选举当上代表的，通常仍然没有竞争，但都是经过仔细的“筛选”才上去的。以1963年为例，选民会议上共提出六百四十七名候选人，但只有六百零三人经各级选举委员会“批准”以竞选联邦议会的六百个席位。事实上，这些

^① 各报，包括《战斗报》都详细报道了辩论的情况。（见1963年11月20日、22日、12月7日—8日、13日和21日的《战斗报》。）

代表并不是由选民选入议会的，而是党的各级领导人、社会主义联盟的官员以及负责“干部政策”的机构使他们当选的。因此，他们不对选民负责，也不觉得自己应有这种责任感；相反，他们只对实际上使他们当选的人负责。那些人在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公社的各级机构中担任职务。尽管这些机构松散，分工混乱，但通常能够有效地下达上面的命令。身居高位的南共联盟组织书记兰科维奇这时虽然无正式行政头衔，但实际上是国家保安部毫无争议的头目。他对人事任命及候选人资格很关心，而他的地位恰好大大增强了他的控制能力。兰科维奇和国家保安部不仅是由党任命来维护纪律和监督执行命令的情况的，对党员的要求尤为严格；他们还自封为现状的维护者，也就是五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捍卫者。可以设想，这样的人肯定会注意到这些议会的行动和创造这些议会的宪法原则对他们所维护的一切的挑战，以及对他们本身权力的挑战。

鉴于上述情况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因而也涉及到是哪些)代表们早在1963年至1964年就敢于采取可能激怒党内那些有权撤换自己的人物的行动，而这一点他们是应该考虑到的。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自治权愈来愈大的机构的问题，就要涉及一系列因素。首先，代表某个特定集团的利益或与其他单位的、即使是上级单位或联邦政府、共和国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发生公开争议，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认为是反党行为。因为党就这些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当然这也只是些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得令人不快的规定。其次，正如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党本身已不再是铁板一块。若干共和国的干部政策和保安部门在兰科维奇下台之前

就一直或变得不完全受他控制。这就使得党的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出现分歧。分歧的规模在 1962 年以后由于党中央在基本政策问题上的僵持局面而扩大了，从而留下一个空子。其特点是上面下达的指示有时含糊不清，有时自相矛盾，使下级组织有隙可乘，而且也为在公开保护地方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保护地方利益的体制提供了方便。

另外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主观、心理方面的，这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和社会风气所衍生出来的，而其基础则是人类的一种癖性，虽然远不是普遍如此，但总的来说也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那就是，一旦被委派一定的任务，那就要去适应这些任务的要求并力求把它完成。所有这些代表可能都是共产党建立的相当广泛的权力机构的成员，但是其中大多数还担负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其他职务。这些职务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因而左右了他们的思想。同时，这些职务的设置乃至其中某些职务的批准，又都是一个共产党社会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于是，他们尽力想照批准的规章办事。但由于政治、经济现实与理论上的设想出入极大，因此不断遇到挫折。

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人为例，他们奉命使企业有所盈余以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被安排到这样的岗位上，在那里执行这一指示，受到社会的期待，同行的压力，并且预先知道有成绩就可以得到金钱和地位的奖赏，办事不力要受处分，甚至受到政治制裁。但事与愿违，他们发现在照章办事时，整个制度的种种弊端（包括行政管理 and 价格控制上的缺陷，税收政策的抑制作用，市场的不完善以致无法向企业提供合理的信号等），使他们几乎无法如意地牟取赢利。面对这种形势，

企业管理人可以采取几种办法，包括重新制定并贯彻别的规章制度，但通常意味着非法活动，如施加政治影响谋取合法的定额或资金，以及其他不正当的做法。但是为了有利于进行改革这一制度的斗争，他们也可以成为联邦或共和国经济院的代表，这样就能使他们根据社会对他们的正常要求去管理企业。工人委员会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的处境与此相似，他们被告知，企业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应该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对此坚信不移。通过实践，他们才知道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不管交给他们的任务多么不切实际，使得他们困难重重，他们也和那些企业管理人一样，通常是尽其所能地发挥作用，并在工作中把所接受任务的内容加以改变使之稍稍切合实际。此外，还使负责完成这些任务的机构的实际作用与条文上所规定的稍稍接近一些。

南斯拉夫现存制度规定了这样一些任务，并且配备了人员，却又设置了一些障碍使预计要开展的工作无法完成。正是这种状况反过来促成了一场以维护现存制度的理想的名义反对现存制度的现实的革命。这便是伦德瓦伊最富有洞察力的一篇文章中的主要内容。他写道：

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决心寻求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并感到不得不（至少是部分地）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时，他们设法使搞经济工作的人有一种掌握权力的幻觉，然而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使这种权力的幻觉变成幻觉的权力，而这种幻觉的权力便逐渐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种幻觉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革命只存在于议会各院和某些其他机构中，而不在党内。其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各个机构已经成为目前进行改革的适当工具，不但人人可以利用而且生气勃勃；而党却不具备这些特点，它是南斯拉夫各种发展变化的组织机构中改变最少的组织。正如一位赞成改革的共产党员在这场战斗后得意地向笔者谈到的：“当我们意识到决不能依靠党的机构时，我们就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各级议会。”

第二个问题是兰科维奇及其朋友们在完全有能力办到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阻止起草和通过一部实质上同他们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宪法。这部宪法使以后用来反对他们的一些原则、机构及措施合法化了。这个问题对回答第一个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1963年的宪法是卡德尔、巴卡里奇和一些自由派的作品。当时自由派的宪法学家如乔尔杰维奇和盖尔什科维奇也参加了部分或全部起草工作。宪法草案的初稿一以贯之地代表了他们的观点。考虑到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的严重分歧，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最初很令人惊奇。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任何一个保守派领导人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而正式通过的宪法中改动过的部分很明显是保守派反对或修正的结果。但改动的部分中除一处有一定的意义外，其他改动的部分都不大重要。对此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在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任何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宪法、议会机构以及人民有参政权的宣言从来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兰科维奇和他的副手们从早期学习苏联样板的过程中和以后推行他们自己的制度的实践经验中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并得出了适当的结论。因此

在他们看来，写一部宪法不过是一种无害的游戏，无需介意。这种游戏也可能有一些用处，那就是分散他们所鄙视的那些想法不切实际的人的注意力，耗掉他们的精力，因为那些人最近却显示出一种危险的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決心，并显示出了才干。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保守派看来通过控制干部来控制政权是最重要的，他们实际上掌握了这个控制权并加以扩大。对宪法草案的一处重要变动就是设置联邦共和国副总统的职位，副总统执行总统委派的任务，并在总统缺席时代行其职务（第223条）。^①这一职位的设置显系保守派所为，目的是让兰科维奇担任此职。果然他如期当选，而被普遍认为是铁托选定的接班人。另外一个塞尔维亚人斯塔姆博利奇成为政府首脑，即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为人顺从，当时是个克尽职守的保守派。他的新职务原来也是由铁托担任的，有理由认为这一职位的权限比一个可能毫无权力的议会主席要大得多。^②把这两个最重要的新职务抓到手以后，兰科维奇、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保守派满意了。

在这关键时期，兰科维奇的态度说明他蔑视宪法、议会以及那些理论家和理想主义者，却对识别和控制党和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兴趣极大。他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作风相一致。直到那时候，无论从个人角度看，还是从他对南斯拉夫沿着自己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建树看，他在官场是一帆风顺的。他通过控制

^① 与1953年宪法一样，1962年宪法草案中规定：联邦议会主席（卡德尔即将担任的职务）在总统铁托频繁的出访访问期间代理总统职务。

^② 根据1953年宪法，共和国总统（铁托）主持联邦执委会。但1963年宪法（肯定是在铁托要求之下）将国家元首和政府的职责分开了。

和操纵南共党内干部的任免和国家保安部门的工作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他的重大作用受到高度评价。其中包括他在战争期间保卫革命使之免遭敌人的破坏，在1948年至1949年间维护南斯拉夫独立使之不受共产党情报局的阴谋暗算。此后，他还保护了党的权力，捍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使它不受到斯大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派”偏向的影响。兰科维奇原是塞尔维亚的农民，学过裁缝，具有舒马迪亚人特有的精明。他把纯朴和阴险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性格溶为一体，对哗众取宠的时髦语言以及满口时髦话的城市知识分子颇有戒心。他的这些特点使他逐渐成为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实干家。他本能地了解人民，了解他与之打交道的各种机构的政治分量。对于这些不易驯服的巴尔干各族人民，他认为自己懂得统治他们和为之服务的唯一正确的方式。他对社会主义的朴素理解，对党、对铁托本人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他认为党是巴尔干农民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和免于流徙这些理想的最有效的工具；他把铁托看作领导和朋友，是铁托发现了他的才能，提拔他，使他成为党的强有力的台柱和党的“良知”的化身。

如果把他天生的精明说成哲学不太过分的话，那末他的哲学使人看起来象是种种教训的混合物。其中，既有从帕希奇统治塞尔维亚人的方式中学来的东西，也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战前监狱、“学校”里学到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精髓，此外就是他自己在战争年代和战后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他的风格是恩威并施；他对列宁所坚持的建立一个纪律严明、骨干精练的党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并且对塞尔维亚激进党搞朋党政治的门道心领神会，运用自如。此外，他在战

争中建立人民保卫部的经验似乎增强了他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他的塞尔维亚同胞是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南斯拉夫和保护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可靠的依靠对象，而这种偏见是每个塞尔维亚人都很容易有的。兰科维奇并不掩饰他对意识形态和理论既无兴趣也无能力。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好的列宁主义者，一个能干的“塞尔维亚激进党人”，而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不是个社会学家。正因为这样，他没有能够认识到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社会在一些关键方面已不再是帕希奇所认识和统治过的那个社会了。

兰科维奇倒台时在一篇声明中自己承认了这些弱点。当时人们嘲笑他的声明，认为是虚伪的，其实那正是他的诚实的自白。他写道：

有些同志可能记得，我常常提到，有很多事情是我力不能及的，我不理解，因此也无法去做，或是至少不能象我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所做过的那样去干。……我一向认为，今天也仍然这样认识：我只配当一名执行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路线和政策的解释者，这是由于我没有才能参与政策的制订……没有才能参与创立涉及广泛社会问题的政策。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在宪法问题上战胜了兰科维奇。他们在个性、政治价值和作风上与兰科维奇截然不同，他们彼此之间也迥然有别。在南斯拉夫国外，通常把卡德尔看成是始终如一捍卫“自由主义”的干将，同“教条主义”的卫护者兰科维奇进行了斗争，但在南斯拉夫国内，他从来不是这个形象。对这两个人贴的政治标签只能使人产生错觉。如果说兰科维奇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一直保持着舒马迪亚的农民气质，那末卡德尔无论谈吐举止都是个道地的斯洛文尼亚教师。1949年以后他实心实意地提倡权力分散，实行自由化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他接替德热拉斯成为主要的官方理论家之后，他在这方面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宣传总是带有他早年“极左”倾向的色彩，显得迂腐，学究气重，甚至有点教条主义的味道。具有这种性格通常就表现为纸上谈兵，把得出符合逻辑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看得比这一政策应用于（南斯拉夫）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更为重要。例如，卡德尔把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作为社会自治的先决条件，为了贯彻他这种激进的教条主义的主张作了种种努力，而这肯定是造成工业和服务部门支离破碎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合经济原则的荒唐作法本应同中央集权制一起为造成国家1962年的灾难而受到严厉谴责，但卡德尔却认为后者是主要的弊病。然而，或许正是由于他的主张从理论上看来是合理的，因而他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总的原则就恰好同各派新兴的社会力量一致，也同了解如何实践这些主张的较为注重实效的自由派政治家一致。

巴卡里奇基本上属于上面后一种人，尽管他也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有兴趣的知识分子。除铁托本人以外，巴卡里奇无疑是近百年来克罗地亚所出现的一位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他富于想象，城府很深，喜爱悄悄地在幕后活动，但却是首先认识到在变化着的南斯拉夫社会中群众性宣传工具具有潜在的政治作用的人之一。巴卡里奇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甚至那些在战前同他一道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最亲密的朋友们也有此同感。他矮胖虚弱，常常由于生病或思

考问题而索居赫瓦尔岛的别墅中。他是一个懂得如何保养自己有限精力的人。从战争结束到六十年代末期，他一直是克罗地亚公认的统治者，自1952年以来他一直是全南斯拉夫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精明地多次拒绝请他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建议（据说包括1963年请他担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如果他接受的话，就不得不离开克罗地亚的地盘，而迁居贝尔格莱德。^①

自从1948年以来，在南斯拉夫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巴卡里奇颇为可观的政治能量大都使在有利于实用主义和自由化这方面。他那敏锐的当然难免出错的政治嗅觉，本能地告诉他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他曾在五十年代初期取消农业集体化时起过作用；此外，还对其他一些事件施加过微妙的影响，如1961年以后使克罗地亚把斗争口号从“权力分散”改变为“取消国家控制”；他还提出过一些办法使“权力分散”和“取消国家控制”都能有利于原来实行中央集权的非塞尔维亚人的不发达地区。这些情况上文都已讲到。他后来为实现自由化作出的重要贡献显示出他的洞察力，而正是这种洞察力使他始终勇于带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巴卡里奇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尽管他也是个头脑清醒坚信自己主张的克罗地亚共产党人。他比大多数克罗地亚同乡更清楚地看出：克罗地亚的民族利益实际上可以同不分民族的反对国家控制的经济协调一致，同政治上的自由化协调一致。他认识到：过分强调民族利益会使克罗地亚陷于孤立，并会象过去那

^① 他于1969年前往贝尔格莱德。当时，他相信克罗地亚掌握在自己亲手提拔的亲信手中，是毫无问题的，但灾难却接踵而至（参看第七章）。

样强化保守的中央集权制；而强调反对国家控制和支持自由经济却能提供一个可以团结大批同盟者的纲领。很多地方的很多人同心协力促成了1965年的改革，并使兰科维奇于1966年倒台。但是能够预见联合的可能性，并制定全面的政治策略来着手开展上述各项工作的，只有巴卡里奇一人。为实现联合他进行了超人的工作。

干将们都一个个登场了。其中，有那些企业管理人，“专家治国论者”，以及地方上负责的权贵，他们有理由不喜欢中央再分配的做法。而那些代表各民族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则对塞尔维亚的统治忧心忡忡。所有这些人，根据新宪法所批准的议会有责任维护自治团体利益的新精神，都在寻找一种能使他们畅所欲言地表明自己倾向的手段，以便在政治上远远胜过那些软弱无力的经济学家团体或《经济政策》、《事业报》和《信使报》这样一些报刊。还有经济院，作为对现存制度日益不满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合法的喉舌，在集中代表企业利益的各种新机构中，具有符合形势的特殊潜力。再有工会联合会，它宣称捍卫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而实际上主要是保卫赢利企业（或有赢利潜力的企业）中的劳动者（和管理人）的利益。也有共和国一级的政治官僚，他们利用党中央意见分歧的瘫痪状态，就象当年塞尔维亚的尼满雅王朝利用十字军征讨君士坦丁堡的可乘之机一样，积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并且发现工会派的纲领中以及经济院中大事鼓吹自由社会主义的人的纲领中有不少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此外，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体系中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派。他们是光杆司令，十多年来一直在招兵买马，以求实现“六大”的那些理想。他们现在发现，虽然队伍没有拉起来，但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

都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向同一目标的进攻中，至少已有了一支利益相同的杂牌同盟军。

1963年底，经过激烈辩论，联邦议会通过了一个显然还是模棱两可的年度社会计划。紧接着在当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事态发展表明终于要作出改革决定了，但同时也可看出只能一点一点慢慢来。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经济学家的辩论”中，自由派一边的主张通过宣传工具传达到群众，承认现在已就改革的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1964年1月1日，控制储备金和投资的主要联邦机构全国投资基金组织以及相应的共和国及地方投资基金组织均被撤销。过去全国投资基金组织负责经管的款项占总投资金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些机构的资产和债务转给管理过它们的银行。由于这些机构的废除，必须交纳给这些投资基金的“捐款”以及联邦征收的“超额”利润税也随之取消。这样，联邦一级对企业收入所征的税收削减到只剩下资本税和个人所得税。首先提出这些改革建议的是B·克拉伊盖尔。伏克曼诺维奇嘲笑地指出：三年前，即1961年1月，卡德尔召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开了个高级会议，会上他们已同意进行改革，现在所做的不过是贯彻老早通过的各项改革计划而已。

3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主要目的是确定南共联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并着手为“八大”作准备。会上讨论了给党的各级组织发一个指导性文件，题目是《关于党代大会前各种活动的基本指示》。此外讨论了弗拉霍维奇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南共联盟的作用》。在卡德尔的注意力转移到宪法、议会和经济问题方面以后，弗拉霍维奇似乎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主要的官

方理论家。

他们两人在处理当前重新出现的批评意见时，都有些小心翼翼。这些批评涉及一个大权独揽的党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和较为民主的政体中的国内决策和对外作用问题。据说，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直接的社会自治”将成为愈来愈现实的目标和当务之急。全会重复了过去用过的陈词滥调和一些闪烁其词的提法，这说明党还会继续象以往一样，以一种暧昧的态度寻求难以捉摸的中庸之道。这也是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公开倾向。比如中央全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既不存在“从上面采取行动并受权发布命令的外部因素……”，也不存在“假自由主义低估和否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作用的态度”。这种提法当然很好，就是不太具体。弗拉霍维奇给党的“团结”这一概念在较为民主的时代所重新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权力分散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团结，是把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统一起来的这种政治觉悟的生气勃勃的集中体现。”这种提法可能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但是对基层的党的书记，甚至对中央委员会的一般成员，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作用。难怪一位中央委员在辩论一些“基本指示”时有些感伤地问起：这一文件是否旨在“发起一个提高生活水平的运动”。铁托以家长的态度耐心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搞什么运动，而在于认识不认识这是当前阶段必须解决的事情。问题是如何去解决。”

改革者的口号是，增加个人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可能而且是一种“职责”。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基本指示论述的十个经济议题中唯一最容易懂和最得人心的议题。其中特别强调需要在工人的直接控制

下（即在企业直接控制下）扩大企业总收入的部分，但是对于当前最关键的争端，即是否应在这一范畴内包括投资基金的问题，文件中只附带地提了三次。而改革者最喜爱使用的典型词汇“取消国家控制”文件中却没有出现。六中全会所通过的文件仍然落后于联邦议会上的调子，与新近的或即将出现的立法相比，它的改革的倾向还不那么具体。但是，它确实表明了自拥护中央集权制的三中全会或表现出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四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相当大的进展。

1964年4月20日—25日召开的工会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进一步调动支持改革的力量及时提供了讲台。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据伏克曼诺维奇说，这些准备激起一些人士的反对，这些反对者指责：“我们‘野心太大了’，我们想使工会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党的‘又一个中央委员会’，我们正在制造一个‘影子政府’”。后来他回忆起曾把这些指控向铁托报告了。铁托当着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个代表团的面气愤地回答说：“竟然说你们正在成立一个党中央！好吧，假设有些人想另立中央而不能那么干的话，你倒不妨成立一个。”

不管伏克曼诺维奇凑便想起的这些话语是否真有其事，从铁托在工会大会开幕式上向与会的工会代表所发表的简短欢迎辞来看，他是赞同他们的活动和改革的原则的。在这之前，他已经讲过两次话（3月7日在尼什概括地讲过一次，六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表示支持“压力不大”的计划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这是自由派革新者的口号。而这次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只不过是在一个较大的场合对特别合适的听众重复了他的支持。但他增加了一个内容，即恳切地要求工人们

从下面施加压力，迫使政治领导人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铁托在这样一些场合的哗众取宠风格的典型表现，然而在这次会上他这样提是值得注意的。他还告诉代表们，“不只是在下层，在你们当中，在企业里，在经济方面，事情往往不象理想的那样顺当，就是在我们当中，在上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工会大会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宣读的伏克曼诺维奇的七十二页主旨报告以及其他报告有力地支持了同工会立场一致的改革纲领的要点，而这些要点正好是改革的中心问题。如要求在国民总产值中减少投资的份额增加消费的比例，以及由经济部门代替国家在投资中起主要的作用。这些内容，伏克曼诺维奇已在一系列措辞直率而激烈的文章中详尽阐述过。文章在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在《战斗报》上发表。在对大会的各个委员会的即兴讲话中他又重复了自己的观点，由于讲话过于直言不讳，以致这些话不得不从会议记录中删掉。有些人热心照他的样子干，而各企业的代表则举出实例证明下述观点：

由国家机关以及其他非经济的社会因素支配的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被不合理地投资并耗费掉了。只有当直接生产者和他们的自治机构成为储备和投资的主要管理人，这种现象才能避免。

4月16日至17日，联邦议会也用了两天时间主要讨论经济形势。讨论中强调了同样的问题，并且实际上制订了1965年改革的基本章程。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

B·克拉伊盖尔这样的斯洛文尼亚人，还有特里帕洛和斯皮利亚克这样的克罗地亚人。B·克拉伊盖尔已经是联邦经济事务的重要发言人；斯皮利亚克现任克罗地亚总理，新近又当了伏克曼诺维奇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所有这三人都将在改革后的南斯拉夫的不同岗位上起重大作用。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辩论中的主要支持者是来自工商业部门的普通的后座代表，如重要的锡萨克钢厂的经理韦贝尔。会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经理们和“专家治国论者”口袋里万无一失地装着党证，以日益增强的信心站起来要求降低税收、简化国家规章，以便他们能够通过获得利润和合理投资的办法来发展企业，建设社会主义。辩论之后于5月20日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决议》，决议忠实地复述了联邦议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内容。

为进一步缩小联邦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7月份又贯彻了两项措施。首先，突然宣布过去由国家补贴的一些基本商品（如面粉、面包、牛奶、电力和煤）的零售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九。这是取消补贴和建立起同真正的市场经济较为适应的价格比率的第一步。7月9日联邦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关于为社会政治共同体提供资金的基本法》，重新为联邦、共和国以及公社各级划分了管理各种社会机构、干预经济事务的职责范围，并重新规定了财力物力的分配。这样，就要求公社一级自己设法资助上述社会机构，而联邦的作用缩小到只给那些财力、物力难以满足这方面的“起码需要”的共和国拨款。这也就是指经济水平——第一次准确地解释为按人口计算的收入水平——低于南斯拉夫平均水平的共和国。

党的“八大”

至此，万事俱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4年12月7日至13日在贝尔格莱德正式召开。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极为有利，只有两个事件投下淡淡的阴影：一件是“八大”开幕前两个月赫鲁晓夫倒台，另一件是贝尔格莱德不结盟会议以后美国国会的反南斯拉夫态度。自从1944年夏天以来，铁托还从未象在前两年那样同时受到东西方的欢迎。1963年8月，赫鲁晓夫在愉快的气氛中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时两周的访问；两个月之后，在铁托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期间他受到肯尼迪总统的热情接待。这两件事就是铁托同时受到东西方欢迎的象征。1964年10月，在开罗召开了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或许不如1961年贝尔格莱德会议那么成功，因为铁托和苏加诺在共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但这次会议表明不结盟运动生气勃勃，拥护者日益增多，而且再一次确定了铁托作为运动的三个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与此同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南斯拉夫与所有邻国的关系空前和睦。这对一个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不时与邻国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个不寻常的成就——它曾对意大利和奥地利提出领土要求，鼓动希腊的共产党暴动，并同华沙条约国发生激烈的争吵。

在所有对外关系中，与东方修好最直接地关系到南共的切身利益。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战后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南共“八大”，就充分说明恢复了友好关系。

苏南关系的缓和在1961年就开始了。显然是苏联采取主

动，而且是中苏争端的副产品。那场争吵，在同年 11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戏剧性地公开了。导致周恩来中途退出“二十二大”的直接分歧是阿尔巴尼亚问题，其他的分歧包括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影响。从东方、西方、第三世界这三个方面来看，取得南斯拉夫的同情和支持对严阵以待的苏联领导人极有好处，因为南斯拉夫仍然是连接这三方面的独一无二的桥梁。苏、南双方进行谨慎的试探早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就已开始。1961 年 7 月，南斯拉夫外长 K·波波维奇访问了莫斯科。8 月，铁托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会议上为苏联说了好话。于是，赫鲁晓夫于 1962 年 5 月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游说，告诉他的巴尔干同志们南斯拉夫“也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年 9 月，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次访问并不是完全成功的）。12 月铁托到苏联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假期”，这是铁托自 1956 年以来第一次访问苏联。这个仍然没有悔改的异端分子被邀请到最高苏维埃讲话，无疑是少有的荣誉。他小心翼翼地提到南斯拉夫是个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高度评价自己国家的独特制度，例如仍被苏联视为离经叛道的自治制度。但是代表团成员兰科维奇在基辅讲话时，却使用了“在苏联领导下的全世界工人阶级与所有进步力量”这样的措辞。这是 1948 年以来第一个南斯拉夫官员念出了符合苏联心意的颂词。铁托本人在 1963 年 1 月回国后，开始狠批抽象派艺术、庸俗低级的文艺作品以及南斯拉夫文化中其他“腐朽的外国影响”。他的话与赫鲁晓夫不久前对苏联类似现象的攻击如出一辙。很明显，这是铁托想使南斯拉夫的政策至少在不太重要的方面与苏联一致起来。赫鲁晓夫在 1963 年 8 月访问

南斯拉夫期间，以礼尚往来的姿态头一次把工人自治说成是“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尽管他担心自治的含义与“列宁主义关于统一领导的原则”是否一致）。在这期间，还宣布了南斯拉夫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经互会，即苏联集团的共同市场。于是从1962年起一直延续到整个1963年，苏—南之间低级的经济和文化代表团频繁地互访；同时，南斯拉夫被准予同华沙条约成员国建立关系或对其发生影响，“其程度是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以来所罕见的”。

然而到1963年中，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步子放慢下来。因为一系列迹象表明南斯拉夫我行我素，并未就范。5月，南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考虑“南共联盟对当前各种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也就是讨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中苏争端所引起的危机的立场。南斯拉夫在与苏共建立的新关系中所表现出的犹豫和动摇，一方面是由于领导层的谨慎。这不仅是基于以往的经验，而且也是出于意识到可能危及南斯拉夫与西方仍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铁托在报告中暗示，还有另外一个国内的原因。几乎所有南共联盟的一百万成员以及绝大多数颇有影响的中层干部都是战后入党的，其中大多数人是南共被情报局开除以后入党的，他们在同莫斯科进行激烈争执的时代长大成人，许多人显然难于适应同莫斯科友好的这种形势。铁托在报告中向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忘掉已经过去的误解”，要求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不仅要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关系而且还要建立友好关系的重大积极意义”。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南斯拉夫报刊上经常出现进一步阐

发“积极和平共处”原则这一类的文章，从理论上证明中央政策的正确性，以便起码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的同志释疑。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数年来一直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提出世界并不天然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要划分成互相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是苏联传统的论点)；世界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每一个东方或西方国家中，都正在进行着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因此，象中国人在当前同俄国人的论战中所做的那样，谈论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处的可能性持否定看法，都是荒谬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利益的，尽管这些都是确实不存在的范畴。此刻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进一步认为，当前的关键性的斗争是和平力量与反和平力量之间的斗争，后者是由极右分子(冷战专家和其他反动派)、中国人和其他极左的“教条主义分子”的邪恶联盟所组成。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有什么不结盟。因此，南斯拉夫可以问心无愧地与赫鲁晓夫的苏联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的教条主义。

铁托在1964年12月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谈到了上述所有的论点。除此以外，还对中国进行了谩骂，对下台的赫鲁晓夫能理解这些论点谨慎地加以赞扬，同时有分寸地阐述了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很明显这两方面都是说给列席的苏联代表团听的。但铁托和“八大”最关心的事情是即将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全党统一思想支持改革。这就打破了外国观察家的某种成见：他们认为苏、南两国的相互关系同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的动荡存在着某种固定的联系。

1964年党代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党的正式最高权力机

构同意进行自 1953 年以来在制度方面的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铁托本人后来把这一系列改革称之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个词出自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之口是有分量的，而且还具有革命的政治含义。在铁托、卡德尔和其他发言人代表执行委员会发言，提出进行改革的倡议后，再由“八大”正式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过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续，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又极为重要。因为根据南斯拉夫政治游戏的规则，大会通过决议意味着正式结束了合法辩论和反对的阶段，那一阶段是从议而不决、模棱两可的四中全会开始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议后，反对派必须忠诚地支持他们所讨厌的改革，而且在大会上就要表态支持，否则就会成为处分的根据，包括撤职或开除出党。兰科维奇自己在“八大”所做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是作为党的团结的一般原则提出的，并未具体涉及即将进行的改革。他的负责国家保安部的副手和朋友斯特法诺维奇和他一样表了态。在一般性辩论中，斯特法诺维奇主要谈的是，在社会现代化以及政治多样化所造成的更为困难的条件下共产党的“责任”问题。

有鉴于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自由派”联盟的优势虽然有限但却是有效的。这一联盟的形成是巴卡里奇和其他一些人努力的结果，现在它的成员包括在党中央工作的共产党的辉格派，集中在国家北半部的那些虽有发展前途而又障碍重重的企业及其下属单位中负责经济事务的自由派，反对中央集权或反对塞尔维亚的地方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和工会中无(或有)利害关系的主张自治的理论家。

他们的优势在辩论中或在与经济事务无关的问题的结论中也反映出来。其中明显的是民族问题以及“干部政策”的某

些方面。八大对这两个问题与对经济改革的关注不相上下，甚至对这两个问题更为重视。铁托、卡德尔和弗拉霍维奇在他们的报告中都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谈民族问题。在铁托的主要讲话中，这个题目足足占去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话后代表们就此发表意见，其坦率程度是任何一次党代大会上没有先例的。不管是“地方自治的”民族主义主张(非塞尔维亚的)，还是“中央集权制的”民族主义主张(塞尔维亚的)，都再一次被宣布为同样有害的东西。但后者成了所有报告以及决议批判的主要之点。特别受到谴责的是那些鼓吹“南斯拉夫一体论”的人。不久前铁托似乎是支持这些人的，而现在却称之为“某些人”，说他们有

糊涂思想，认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就是消灭各个民族而人为地创造一种新民族，亦即创造一个单一的南斯拉夫民族，这样做无异是执行同化、官僚主义的统一、独裁和霸权的路线。

一般认为：各种地方民族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弗拉霍维奇称之为“共产党地方派”的这样一些人，是反对人为地创造新民族的观点的，也是反对有关经济上的集权现象的，特别反对在投资制度方面的集权。这种投资上的集权导致种种问题，尤其是引起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为得到数目不多的资金而竞争，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剥削，力求按地区或民族分布分配资金，而不愿意由联邦一级、实际上也就是按(塞尔维亚的)中央集权的办法分配资金。这样，改革和民族问题就牵连到一起。因为正如卡德尔所指出的，只有把投资控制权转归经济系统，彻底取消根据政治需要或地区分配资金的办法，才能摧毁“中

央霸权”的“物质基础”，并动摇铁托所说的那些人的地位，他们“经常自封为我国各民族中这一个或那一个民族的利益的‘保卫者’”。

铁托讲话中关于经济改革本身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简短——在五十八页的报告中只占八页，报告大部分讲国际事务和民族问题。象在以往一些类似场合里那样，铁托津津乐道地把一种肯定会受欢迎的观点简明而通俗地解释出来。他强调指出，迫切需要改变消费—投资的比例，以便于增加消费，提高生活水平，这是拟议中进行投资制度改革的基础。他还承认：

我们有一些同志，主要是来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同志，他们把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改变当前的作法可能会危害这种已经加速的发展。

然而，现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保留中央集权的那一套行政办法不仅会使不太发达的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会使整个经济的发展受到牵制”。过去已经“妥协够了”；今后“我们不能允许掌握执行大权的个别共产党员不贯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政策路线”。

卡德尔在题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长篇报告中阐明了领导集团的分析 and 意见。他作报告的内容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自治”，取消国家对储备和投资（即扩大再生产）的控制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投资，而避免产生“每一个投资问题自然而然地也就变成了政治问题”的情况，同时还能持续

地把“按劳分配”和“同工同酬”的原则贯彻到市场经济结构中去。投资少而收效大就能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实行改革和价格自由，尽快合理地加入国际分工，还能得到其他一些人们所期望的固定工资以外的福利。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监护人”仍然是必要的。它将采用比较适当的“干预经济的社会手段和措施”，即主要采用间接的和财政的方法而不是行政手段来纠正市场的“自发”行动，但是市场将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分配基本上通过市场来进行”。

卡德尔还认识到必需寻找新的手段，以便在改革后的信贷和银行制度范围之内吸引和调动足够的资本，进行较大或较长期的投资。他甚至说这一点“极其重要，整个扩大再生产系统的运转实际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与此同时，他对应该如何寻找这些手段却又说得很含糊：“最重要的是先从银行着手，也要从基金的使用方面去发掘，如经济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基金，保险机构和社会保险的基金，以及储备金等等。”他对这一问题的预料以后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就象他所谈到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如不发达地区的特殊问题以及改革对就业率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由于政治和技术上的种种原因，可行的解决方案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些(及其他)漏洞在以后的三年中将把改革和改革者推向失败的边缘。

在全会的辩论中，即将进行的改革的发起者之一 B·克拉伊盖尔承认，他们将要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说，提高个人的消费水平象改革的宣传者有时提出过的那样，不仅仅是改变现有的消费—投资比例的问题，还需要对南斯拉夫的支离破碎、效率低下的工业结构彻底进行改组，以及彻底改变劳动

力的结构和质量(即“技术水平状况”)。放弃现行的再分配手段(如对企业利润征收高额税收来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等)所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性,正如从长远看,势必证明是健康而有益一样。为了支付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所需要的进口原料,要迅速增加出口,这就给生产者增加了压力,使他们缩小生产范围,集中生产在世界市场上可能比较受欢迎的那些南斯拉夫产品。这样,失业现象肯定会普遍有所增长,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压力会更大。但如果迅速加强服务性行业,就能增加无数就业机会,而且比工业的花费要小。从对产品征收流通税转变为对消费品征收营业税将使不发达地区获利,但这些地区仍然需要(得到合理管理的)联邦发展基金。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需要重新调整经营态度。否则就得继续实行老的投资制度,然而老的制度显然弊端更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代表出于勇气或奉命在会上公开表明他们继续持保留态度。其中大多数来自不发达地区,他们以帕伊科维奇为榜样,他是门的内哥罗中央委员会书记,而且自1948年以来任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采取了一种“如果……就同意”的态度:在象门的内哥罗这样的不太发达的地区改革是很受欢迎的,但有一定的条件,即必须记住新建工业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必须接受原料和生产物资的比较合理的价格,以及必须采取措施保证资本的流通不受地区的限制。

一种不同性质的警告是由巴卡里奇的年轻的门徒特里帕洛提出来的,他是萨格勒布党的书记,克罗地亚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指出,有关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深入细致的讨论,各种官方的机构也已同意,但却没有任何一致的行动。相反,

作为走向改革的第一步而取消了的的企业税，在 1964 年又换成给联邦上交一笔“强制性贷款”，而这笔钱又至今未曾使用。他认为，最糟糕的兆头是，准备提交大会通过的 1965 年社会计划草案包括了另一笔强制性贷款，但没有包括一项保证进一步减轻税收的内容，“这样，以前那种增加投资和进一步由中央控制资金的趋向就会继续下去。”如果七年社会计划的特点与以前的作法一样，那末中央控制的资金所投放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就会使改革无法实行。因此，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在 1965 年进行改革，否则就永远别再改革。现在是该结束“只进行原则的讨论”的时候了。

周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一点不含糊的，重复（甚至可以说是抄袭）了八个月以前联邦议会为改革提出的一整套基本章程。全会甚至确认在尽力解决四中全会所提出的问题方面，“南共联盟的一些领导机构决心还不够大”；而且还含蓄地承认主动权已在议会，因此党实际上只是在批准议会所采取的立场——这是共产党国家传统的“传送带”系统的一种明显的颠倒。

兰科维奇的报告主要涉及组织纪律问题，这正与他的党内职务相称。报告的主题是：在越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控制。他指出：

将来，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我们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这种工作方法将保证共产党员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能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跟上社会变化的进程，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区别其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明智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还将保

证共产党员不为官僚主义和其他有害倾向所腐蚀，以致不能抓住本质解决问题。

他还坚决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个自治的时代并不象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已经“过时”。在党内“鼓吹‘少数派权利’的合法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这种论调并不是新的，这是党的一贯路线。但是，在这个时候不仅由兰科维奇重申这一观点，而且由弗拉霍维奇作为较温和的观点的发言人重申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一些人发出警告。这些人在前一年重新开始的有关理论问题的争论中，曾再一次对党的现行控制权的范围和性质是否合适以及对民主集中制是否继续合法提出疑问。他们曾公开质问，承认党内有党、承认“少数”反对派甚或第二党的合法性的时机是否还没有成熟？^① 尽管党内的保守派在一些战役中失利，但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战役中却没有失败。

然而，保守派还是同意扩大党的领导核心，增添新鲜血液，并同意进一步将党和国家的职能分开，这些作法总的来说对他们的对立面有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也对这个政权能否延续下去感到担忧，他们知道这个政权的基础是一个已经对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的党——二十五岁以下的党员数字，已经从1958年占全体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下降到1964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六——而且党的领导层年岁愈来愈大，其中纯朴的老游击队员过多，不适应当前时代

^① 埃里克·伯恩“在大会之前，从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处听到，在最高一级领导的会议上曾讨论过成立第二党的问题，即成立某种‘反对派’组织来促进政府工作”，后被否定（《基督教学科学箴言报》，1964年12月26日）。参看戴维·宾德1964年12月10日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所需要的较现代的微妙的政治风格。

保守派还有另一个考虑。兰科维奇和保守派几乎同自由派一样有理由对现有的中央委员会不满。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央委员会应为他们当前所遇到的大部分困难负责。中央委员会显然不活跃，委员们也没有起到他们传统的作用。作为集体，他们应该是政策的热情的批准者，作为个人，他们应该是政策的执行者。这些政策是执行委员会决定，经兰科维奇的组织政治书记处解释并贯彻下去的。兰科维奇以及提交大会的题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把这种状况主要归咎于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其他工作负担过重，对他们的作用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所代表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以至使他们无所适从。但执行委员会本身就相持不下，未能提出明确的行动指示，也是导致中央委员会不够活跃的一个原因。这种认识在兰科维奇和报告所提议的改革中也有反映。

迫使保守派同意进行他们所不喜欢的经济改革的同一逻辑，现在正迫使他们接受鼓吹改革的干部。作为共产党人，他们迷信经济增长的速度。保守派所偏爱的一套制度和人员显然未能保持经济急速增长而又不引起不堪容忍的副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对自由派进行了遏制。因此保守派被迫允许自由派试一试，后者断言他们的制度才是出路。由于保守派控制了国家大权并下了决心，他们无疑认为：可以控制自由派的尝试及其在政治上可能引起的后果；而如果改革失败，自己的保留态度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就要重新出来以加强了中央集权主义原则管理国家。

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一百五十五名委员（党的“七大”时选举的一百三十五名委员至今只剩下一百二十八名），其中七十

一名是头一次当选；上一届委员中有四十四名落选，其中有些人自愿离开，有的则怨气十足，牢骚满腹。但是落选并不都意味着降级，有几名落选的中央委员是政府高级官员，他们离开中央委员会是党和政府职能分开的新运动的一部分。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从五十二岁降到四十五岁，有些委员非常年轻，决不可能积极地参与过民族解放斗争，而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同时，执行委员会扩大到十九名委员，其中六名是塞尔维亚人，四名克罗地亚人，三名斯洛文尼亚人，四名门的内哥罗人，两名马其顿人。“七大”当选的十五名执行委员中，萨拉伊已去世，六十七岁的老资格的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员莱斯科舍克由于健康原因请求免职。其他委员全部再次当选。六个新委员是：茨尔文科夫斯基（马其顿），B·克拉伊盖尔（斯洛文尼亚），米亚托维奇（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帕伊科维奇（门的内哥罗），斯皮利亚克（克罗地亚）和托多罗维奇（塞尔维亚）。执行委员会的平均年龄从五十七岁下降到五十四岁，其中最年轻的是四十四岁的茨尔文科夫斯基，最年长的是五十一岁的米亚托维奇和托多罗维奇。在所有执行委员中，除帕伊科维奇和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亚托维奇以外，都与改革运动联结在一起，被认为是自由派。铁托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弗拉霍维奇与卡德尔、兰科维奇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1965年的改革

“八大”以后的七个月中所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在实行自由化和权力分散方面不如“八大”通过的决议那么坚定。这种状况的造成，从一开始就不仅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

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由于体制改革的拖延，总的经济形势没有得到改善。在1964年和1965年初，对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的需求量继续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货物的供应量。生产也是如此，一些部门照旧发生故障，一些部门则依然生产过剩。因为不同经济部门和地区的利润率不同而带来的工资收入的差别被视为“不公平”的观念，仍然同需求结构、市场经济的逻辑或是南斯拉夫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定义极不相称。在外贸方面，用于各个进出口部门的第纳尔的实际兑换率的差别，在最近一次设想要采用一种单一、不变的官定汇率的改革之前曾达到1960年那种严重失调的复杂局面。如今在这些外贸部门中，官方订的第纳尔与美元的兑换比值则从一美元合七百五十第纳尔到一千三百第纳尔不等。

到1965年初，出现了在当时看来是难以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另外，显然无法支撑下去的是贸易和收支方面所出现的赤字。国家为了补偿利润率方面的不正常的差别或促进出口，以补贴、回扣或特别减免税等形式大量干预经济，其数额日益增长，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联邦财政部预测，如果对外兑换率和国内价格比率没有重大改变，1965年需追加出口津贴一千亿第纳尔。同时进口的压力也会继续增长，铁路和电力设备工业的赤字会分别达到九百亿和二百五十亿第纳尔，而且大量企业会出现亏损，以致不加征二千亿第纳尔新税作为追加补贴就不能弥补亏空。而旅游业和其他非商品性质的外汇收入，近来虽日益显得重要，但也可能会停滞或减少。

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在实行自由化和权力分散之前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但这些措施实际上无异于对经济进一步

实行中央集权的控制。1965年春，联邦执行委员会根据法令采取了具有这种作用的反通货膨胀的一揽子措施，其中包括冻结全部价格、减少投资需求、减缓新的就业率以及限制消费信贷等方面的措施。上述法令的执行被认为是整个体制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引起了相互矛盾的解释，并使次年的政治形势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联邦议会的联邦院和经济院于1965年3月通过了新的银行和信贷法，这是向创造一个迥然不同的投资制度所跨出的关键的第一步。这个法令规定银行不仅对国家负责还要对其所有的社团机构储户负责，力求达到“取消国家控制”的目的。法令中还包括一些吸引企业向银行存款的条款。这样，通过银行系统就能积累起一笔相当数目的额外基金，由于税价较低和对社会投资基金的清理，就使这笔钱成了企业的财源。没有这笔基金，整个经济就会缺少一笔足够的自由投资的资金储备。上述两方面内容对于南斯拉夫修改了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都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求行之有效的资本积累和调动办法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新的办法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方式。而法令的不足之处，对南斯拉夫以后几年中所遇到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自1961年改革以后，南斯拉夫的商业银行从理论上有权批准长期(投资)和短期信贷；但是共和国和公社一级银行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当地，这两级银行在1965年3月共有二百家。事实上，只有三家联邦银行和六家共和国一级的银行(自然是相形见绌的)安排了足够的资金来发放投资贷款。即使如此，有关银行在这类贷款上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它们管理的社会投

投资基金。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全部投资贷款中只有百分之一一点七是由银行本身提供资金的；不过到 1963 年银行出资的投资贷款上升到百分之二十点四。国家一方面通过上述社会投资基金的政治来源对投资决策进行间接的政治控制，此外还通过任命所有银行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及经理在各级进行直接控制。当社会投资基金于 1964 年 1 月废除，其资产转给适当的联邦银行和共和国银行以后，国家的这种任命权仍然保留了下来。

根据新法令，银行成为自治的经济组织，“代表共同体”承担“管理专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的社会资金”的任务。这笔资金的来源包括存款（主要的社团机构储户既分享红利也要担一定风险，这是另一项新发明）、外债和公债、偿还的款项以及从发放的贷款中所得的利息等。最后这一类来源碰巧也为过去的三家“联邦”银行增添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为此后来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三家“联邦”银行即南斯拉夫投资银行、南斯拉夫农业银行和南斯拉夫外贸银行，现在基本上则是塞尔维亚的银行（设在贝尔格莱德）。它们曾经管理并于 1964 年继承了以前的全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这笔资产如何另行分配未能达成政治协议，因此一直为这三家银行所保存，从而使它们成了国内银行界的三巨头。

有关银行业务的地域上的限制以及对储户或借贷者选择银行的限制都被取消。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在整个南斯拉夫开展业务，不过需要一笔最低限度的专用基金以便发放长期的投资信贷。现在的银行还可以“由企业、其他劳动组织和社会政治共同体联合”开办，而不象以前只能由社会政治共同体即公社、区、共和国或联邦的政府开办。国家的各级有关机构通

过社会计划或其他一般法令保留了为投资政策提出“基本方针”的权利。国家仍然有权任命根据联邦或共和国法律建立的银行的经理(三年以后这一条款废除了);有权指定把它们的存款用于某些特定的投资;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有权与银行共同作出安排,以较低的利息和其他优惠条件提供贷款,以满足特殊需要,而银行在利息上的损失则由国家补偿”。当时还设立了由国家银行行长任主席的协商性质的银行理事会。联邦政府通过改革以后的国家银行或者联邦议会的各种指示,继续保持对金融业务的正常控制,如规定最低限度的储备金、最高利率或国家银行作为“银行家的银行”进行业务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条件。最后,国家银行继续代表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外币兑换业务。一直到1967年,只有三家前“联邦”银行有权办理对外支付业务和与外国签订贷款合同。

对各家银行其他业务的控制权,掌握在银行自己的代表大会手里。这是包括银行代表在内的一个新机构;但按法令规定,代表大会代表中起码应有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来自企业和其他法人,包括在银行的资本中作了投资的政治单位。这些企业、单位实际上成了股东(人们在非正式场合已在使用这个词了),它们的表决权和投资额的大小成正比,但每一储户至多只允许控制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个法令有两个目的,从银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和作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企业及其他储户可以控制银行及其投资方针(在银行资本中所占股份愈大,控制权也愈大),从理论上讲就是集体控制了分配,并且在决定全国总投资额时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各自所能控制的数量是与它们对国民收入所作的贡献成正比的,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它们在

国民储蓄中所占的比例。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与“生产者决定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与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理论也是一致的。其后果人们也可以料到，这种控制只能导致经济性质的投资，而不会作政治性投资。因为各个储户即股东都是既成的利害关系人，他们要保证使自己的存款投资在获利最大的地方而不投资于“政治工厂”。同时，这个法令还希望通过让闲置资本生利再加上有表决权这样的银行制度吸引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国家投资政策的各个较低的目标，这笔资金原来是作为强制性的储蓄由国家通过税收系统征收的。

就在这个当儿，从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方面却正在出现一种威胁，它造成政治上的困难，以致上述种种做法有功亏一篑的危险。根据巴卡里奇在这个事件发生一年后所承认的情况来看，当时愈来愈多的克罗地亚人终于提出要算一算帐，他们发现计划中调整价格比率的措施将使克罗地亚的工业遭受损失，因而要求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反对拟议中的改革，或至少促使它进行重大修改。而主张改革的宣传本来就在列举大量统计数字，“证明”克罗地亚在现行制度下是受剥削的，给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火上加油。因此，早已忧心忡忡的萨格勒布领导现在面临这种新的情况就更加惶惶不安了。巴卡里奇说：“这就是我们同意尽快进行改革并且表示坚决支持的原因。”

以B·克拉伊盖尔为主要专家的改革发起者，担心这种额外增加的复杂性会使形势变得对他们不利，于是也不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就开始匆匆忙忙地起草法案，当后来出现了本来可以预料而事先未充分估计的困难时他们又去责怪经济学

家。这套法案提交6月17日召开的南共联盟八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7月24日，克拉伊盖尔把它拟成十几条法令、决定、规定和命令，提交给联邦议会的联邦院和经济院的联席会议。结果全部通过，经铁托总统签署于同日颁布。其他有关的法案也早已批准，其中包括新的银行法以及重新修订的企业基本法。但是，南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和群众都认为1965年7月20日这一天是改革的开始。

以大写字母“R”为代号的这个改革方案，计划在国民收入的初步分配、第二次再分配和对外贸易这三个牵涉全局的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目的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步分配中扩大市场的作用，缩小国家进行第二次再分配的范围，简化外贸手续并使之合理化，以增加外贸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此外，还明确宣布这次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它将迅速扩大作为“自治”生产者的一般群众在制订政策中的作用，并要求党在其作用和工作方法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

国民收入初步分配的重新组织，主要是通过不同程度地提高全部价格从而大幅度调整现行价格比率的手段进行的。总的来说，价格上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四（高于1964年的平均水平）。工矿业产品的价格一般上涨百分之十四，农产品上涨百分之三十二，交通运输上涨百分之二十六，建筑业上涨百分之二十二，主要的原料和半加工原料（如矿砂、矿石、木材、生铁、铅、锌、电解铜、铝等）最高上涨百分之五十九，平均为百分之四十五，而加工工业的产品价格仅平均上涨百分之八。大部分产品涨价的基本标准，是依据这一产品的所谓国际市场价格与第纳尔新的比值折合以后的价格。克拉伊盖尔在把这些改革提交联邦议会时承认，新价格的决定依然有任意性，

有些价格是迁就某些利益的恳求而作了让步，因此毫无疑问还需要作大量调整。他说，在价格还不能随供求关系自由波动时，市场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国民收入分配者的作用。他希望市场能尽快发挥这种作用，但目前还办不到。

为了缩小国家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再分配中的作用，必须对税收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全面检查，以便最终使国家从全国企业纯收入中取走的份额由百分之四十九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九。克拉伊盖尔说，这样的—个变化“代表着一次伟大的革命行动”。流通税削减为最终消费意义上的营业税，这种税是可变的，根据不同的部门或产品进行调整（这样，它仍然是国家干涉市场的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营业税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其中包括百分之十二的联邦营业税，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六的地方营业税，以及临时征收百分之二的共和国税款作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毗邻的波斯尼亚以及马其顿的救灾基金。克罗地亚等地最近遭到特大洪灾，而马其顿在1963年大地震后斯科普里的重建工作还处于刚刚开始阶段。集体收入税全部取消。这样，资本税实际上成了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投资基金的唯一来源，但也从目前法定的每年百分之六减少到百分之四。然而有少数例外，所以有些部门不久前很少交纳资本税或者根本不交，现在就需要多交点。^①个人总收入税以及社会保险的特别税也减少了，个人收入税从百分之十七点五下降到百分之十点五。

要实行减税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即差不多完全取消国家

^① 继续存在的一些例外情况使平均资本税降低到百分之二点八。仍然享受百分之二的特许资本税率的，有电力的生产与输送、煤和焦、黑色冶金、农业和食品加工，以及运输等部门。一般来说，这些部门也是从物价比率的变动中得到好处最多的部门。

在投资方面的作用，取消国家对出口的补贴和回扣，取消国家对薄弱的工业或部门的补贴，这些部门的不切实际的低价格已经造成人为的亏损，另外还必须减少“间接收入”（如有补助的假期、旅行和住房等）和其他形式的中央再分配的金额。但是，克拉伊盖尔注意到国家在其他领域以及各级政府中的预算也必须缩减，而这在联邦一级不容易办到。因为国防、养老金以及支付外债利息的开支已占有所有非再分配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五。此外，这种缩减在由社会保险提供资金的服务行业中贯彻起来也有困难。事实上，尽管各方面、特别是联邦议会经济院不断催促，以上几方面的开支根本没有缩减，这成为使改革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遭到破坏的几个问题之一。^①

为了支持所有这些改革，使外贸自由化和简单化，就必须大大调整第纳尔的已经非常不现实的官方汇率。第纳尔在短期内已经贬值两次，从七百五十第纳尔一美元的比值贬到一千二百五十第纳尔一美元。到年底，这个数字从心理方面的影响考虑又换成十二点五第纳尔一美元；当时重新发行货币，一个新第纳尔相当于一百旧第纳尔，并重新使用“帕拉”（分币）为小额货币。大部分进口货的定量限制取消了，平均关税从百分之二十三减到百分之十一。克拉伊盖尔和其他人第一次谈到到七十年代第纳尔将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为了进行改革，南斯拉夫也在国际上寻求援助，这是最后推迟宣布改革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而国际上对南斯拉夫改革的反应是有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改革，同意额外给南斯拉夫提取八千万美元的权利。苏联和它的三个东欧盟国也为南斯拉夫

^① 1965年11月初提交议会讨论的1966年联邦预算，要求增加一百七十五亿旧第纳尔，主要由于改革后国防开支增加了（见1965年11月4日《战斗报》）。

工业现代化提供了贷款。南斯拉夫同时还与美、英、意、法等国政府进行着类似的谈判。支持改革的外援最后达到一亿四千万美元，1966年8月南斯拉夫终于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整个改革计划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特点。1965年11月决定取消年度社会计划，因为这种计划与新制度不相适应。1965年2月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终于建立起来，尽管对提供资金的具体方式仍然有争议。房管部门受到特殊重视。房管部门的资产从1965年8月1日起重新估价。房租分期大幅度上涨，以便达到至少能够维持折旧和维修费用的“经济”租金的水平。最后还成立了“房管企业”，专门负责收房租。这种新的形式目的在于集中大笔资金，以便用于大修和在大城市修建新的住房。但这一形式很快就为新的政治分红、贪污和贿赂大开方便之门，而现有住房的维修却毫无进展。

农业方面，第一次供应个体农民新的机械设备，并给他们与社会主义农业部门同等的条件去取得银行贷款。这是自1953年取消集体化以来第一次对个体农业所做的重大让步。上述措施含蓄地承认了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未能吸引农民，也未能使个体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这也明确承认了对于达到改革的其他一些指标来说，重要的是拥有更多可供销售的剩余农产品，以及让农民富裕起来以提高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

后果：抵制和兰科维奇

改革宣布了，改革派在党和议会的种种明文规定的支持

下显然已开始掌管各项工作。但仅数月工夫，就清楚地看出成效甚微，而价格比率的变化和贬值最初在许多部门的影响却是消极的。甚至这一点点成效也不过是7月宣布的各种大胆设想的微弱反响或者立即被贬为以“一种机械的原始的办法”来实现那些大胆的目标。一项项措施（有时是莫名其妙地）遭到失败，要不然也荒谬地走向极端。最显著的成果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个“运动”，敦促各企业发掘物质、组织和人力上的“内部潜力”以适应新的情况，结果为突然变得老练起来的南斯拉夫漫画家和“卡巴莱”餐馆内的讽刺表演家们提供了好材料。

南斯拉夫的政治家和那些日益好辩而且在地区和作用方面派性十足的新闻界，激动不已地、有时则显然是不知不觉地论证：背离中央的路线总是有道理的。如提出某些重大投资项目不能再延误，否则就会给这个或那个共和国将来的经济繁荣带来严重损害。某些经济部门由于遭到价格比率的变化及其他改革措施的不公平待遇处境相当困难，必须予以支持。尽管作了保证，然而失业的人数还在增加，生活水平正在下降，特别是收入最低的那些人。这种形势要求恢复被削减了的社会服务或至少作出让步。当需要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工人委员会采取简单化的解决办法，他们宁可裁减几名工作上需要的工程师和技术员，而不去解雇一百个多余而又不熟练的工人。他们还砍掉研究和发展经费，取消奖学金。这是一些会造成经济失调、有时候对社会来说也是不合理的措施，现在只有国家下达指示或干预他们的预算才能制止。求助的呼声不仅来自南方，也来自发达的北方各共和国。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实践中发现价格比率的变化对他们专门经营

的加工工业有严重影响,强烈要求支援(特里帕洛特别建议降低资本税率)这个陷入困境的部门。

10月初,联邦议会的联邦院和经济院就改革的初步效果进行辩论。会上,有人强烈要求采取通货再膨胀措施来阻止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并使企业免除缺乏流动资金的困难。B·克拉伊盖尔代表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他说,目前的投资水平以及国家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总数上依然大大地超过限额;如果现在从7月的措施后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还对要求自由定价的其他代表说,这也依然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10月21日的《共产主义者》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官方社论,题为《走入歧途》,以沉重的口气叙述了种种回避或歪曲改革的企图。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对雇用二十二万五千人的四百二十五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四名工人已被解雇,预计还要解雇一万九千人。

到冬至前后,重要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至少在私下里已大大泄气。其中有人对笔者说,“这简直象用拳头打一堵橡皮墙,你好象把它打下去了,一会儿就又恢复原状。”另一位在1966年1月直率地说“改革完蛋了”。一个月之前,巴卡里奇曾直截了当地告诉克罗地亚党执行委员会(这里是问题产生的政治根源):“我们力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群众发动起来,而这就肯定要引起冲突,甚至是在我们过去得到最大支持的地方。”

只要每个人都按照南斯拉夫政治游戏的规则办事,想要找出抵制改革的中心就很困难。尽管如此,改革的阻力何在已日益明朗;而且愈来愈清楚的是,这种抗阻比改革计划的不足之处或所揭示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更大的严重性。有

些党政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高级和中层领导干部，在决定进行改革前就顽固地持保留态度。他们不支持改革，而且也不愿意坐等改革失败以证明他们自己的正确。在一个人们不能公开反对现行政策的国家里，上述这些干部的力量就加倍的强大。因为他们在组织上占据了最有利的职位，能够在一方面非正式地暗中影响各级的决定，而外表却又顺从地发表公开讲话支持对立面。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象兰科维奇那样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历史和共产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幼稚设想（认为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气派大、花费多的投资项目上）的影响。因此，他们把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去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对塞尔维亚经济的影响，分析改革的利弊。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热情支持者。当然，并不是所有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塞尔维亚人都赞成他们的观点，如托多罗维奇和M·波波维奇就曾表明不赞同那些观点，但他们主要在联邦而不是在共和国参与政治事务。因此，真正决定塞尔维亚党的路线的是塞尔维亚党的书记韦塞利诺夫和卢基奇；后者是兰科维奇最亲密的合作者，从1963年至1965年任联邦内务部长，直接控制了警察机构。他们使塞尔维亚采取一种明显对立的立场，特别是在仍然允许党进行“干预”的那类问题上。这与克罗地亚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事情愈益清楚：只要这些人盘踞的“堡垒”没有被制服或攻破，改革就永远不能真正贯彻执行。这特别是针对中央和塞尔维亚党的机构以及国家保安部门（1964年11月改名为国家安全部，但仍被人称为国家保安部）的情况而言的。另

外，同样清楚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究竟谁真正统治南斯拉夫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铁托和改革派在一段时间内对上述情况仍然限于不指名的含糊的指责。他们批评“官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势力”，反对战前“咖啡馆政治”的“复活”，即指有一些共产党人刚刚在官方的会议上反复声明支持改革，然后又私下在咖啡馆里聚会策划反对改革。同时，党的执行委员会于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在幕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无法贯彻改革措施的问题和民族问题。《共产主义者》2月3日刊登的文章在描述最后一次会议时，具体地点出塞尔维亚是反对改革的抵抗中心。同时宣布已组成一个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内的党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经济领域内的民族关系”。

当改革派看到上述警告没有任何显著效果时，他们在铁托支持下动用党的一件传统武器，即喋喋不休地要求党员遵守党纪，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根据这个原则，只要党一旦作出某种决定，全体党员必须忠实执行，积极支持。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使用这一武器同样收效甚微。为了达到如上所述的特殊目的，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于2月25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扩大的三中全会。铁托为使与会者真正明确会议的意图，在开幕词中建议全会分两段召开，中间休息一段时间，以便与会者回去与所属的地方党组织磋商，然后返回准备作出真正有约束力的保证，这种保证是得到所有高级党组织同意的。全会经过两天辩论于2月26日晚准时休会。3月11日重新开会，讨论、修改和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以比往常具体得多的词句重申：全体共产党员必须毫无

保留地、积极地支持“八大”通过的改革方针和 1965 年颁布的改革措施。会议指定起草决议的十七人委员会，几乎清一色是支持改革的重要人物，其中至少包括四个塞尔维亚中央委员里的三个委员。

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与以前一样，不少人纷纷做自我批评并呼吁团结和忠诚，其中包括兰科维奇所做的严厉的自我批评。这是他为了与正式的党的政策取得一致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努力，而且还勉为其难地承担了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进行攻击的主角。很明显，铁托在会前私下和他谈过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他。另外，塞尔维亚的党的书记卢基奇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谈到塞尔维亚所以不能全心全意支持改革是有“客观上的困难”，如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下降等。他尖锐地指出，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共产党员自己都不能理解改革，更谈不到向别人解释了。

铁托 2 月 25 日的开幕词中有一点是令人费解的，甚至在全会结束之前就引起了不少争论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他相当具体地谈到了党员，特别是“我们南盟的上层领导”，对未能贯彻执行一致通过的决定和经济改革措施应负的责任，但是他还反复声称，所以会迷失方向和不团结，所以地方民族主义和“咖啡馆政治”重新活跃起来的真正根源，是一伙在当前南斯拉夫思想意识中差不多被遗忘了的人。他说，“所有这些现象只有一个背景，即阶级敌人正在幕后活动。”后来，为了把他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他提到了国际形势。他说，“作为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化身的阶级敌人正在各条战线发起攻势。”

当全会于 3 月 11 日再次召开时，弗拉霍维奇和卡德尔感到不能不同意铁托的这一警告，但又设法通过重新解释这句

话使其含义发生变化。弗拉霍维奇指出，在铁托提到“阶级斗争”以前，“我们已经多年没有使用这个词了”。他解释说，除了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残余影响以外（甚至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还表现在阻挠工人阶级实现他们的权力，以及官僚主义的长官意志上”。这种说法与德热拉斯“新阶级”的理论不谋而合，同时也是卡德尔的解释。然而，铁托在闭幕词中却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意思。他说，由于革命已经剥夺了阶级敌人的权力，因此南斯拉夫的阶级斗争当然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阶级敌人在肉体上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存在，并与国外的阶级敌人有着种种联系。”

在这样的场合，意见分歧往往是很细微的。不过，B·克拉伊盖尔在全会第一天就不满地指出：塞尔维亚的斯塔门科维奇和克罗地亚的特里帕洛两个人都支持铁托，而且都赞成继续进行改革，但他们各自的讲话中对“继续进行改革的解释却很不一样”。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茨尔文科夫斯基讲得最为直率。他在3月11日最后一次会议上说：

事实证明，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有一些分歧，我们也没有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而且，我们不打算达成一致的决议，或者说在通过决议时也不会有一致的行动。

他是正确的。各级党组织讨论如何贯彻三中全会决议的讨论会按规定召开了。一个细心的观察家可以从这些讨论中发现程度不同而又掩饰起来的违背决议的言词和行动，如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他还可能发现在这些共和国一开始只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任务，而不象其他地方那样

由中央委员会出面，这一点也是耐人寻味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全会增强纪律性的号召收效不大。南斯拉夫终于不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党了。

在党内确实存在着有一股有组织的力量，这股力量已证明自己决心和能力蔑视党的正式路线。铁托作为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培养起来的精明的政治家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如果这股力量不能以纪律加以约束，就必须把它摧毁，否则它就会取代党而成为南斯拉夫的实际统治者。铁托就要去搞垮曾为进行革命和保卫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那个人及其所控制的机构了。这个人及其所控制的机构曾一度是铁托所要挽救的党和制度的左右手，而现在却死心塌地成了反对派。铁托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坚信改革或是相信改革派，而只是按照他的理解来挽救党。他悲哀地意识到他这样做在人和政治方面意味着什么（如事后在他的一些话中所透露出来的）。正如铁托似乎已经预见到的，未来将要严酷地考验这两股力量的能力，看哪一方面能在这多元关系中生存下去。

布里俄尼：八届四中全会

1966年7月1日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布里俄尼开会，正如十二年前德热拉斯下台之际在布里俄尼开会一样。这是“八大”以来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前不断谣传这次会议将会作出重要决定，但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会议的决定会如此富于戏剧性。正当会议还在进行时，岛上的电传打字机就传出消息：兰科维奇辞职；据说铁托本人谴责国家保安部和党的领导核心中的一些成员参与了“争权斗争”的“分裂集团”。还有消

息说：会议保证清洗反对改革的共产党员，改组整个党。此外，还发表了党政特别委员会在上层领导中追查反抗中央、搞非法窃听等情况的报告。

最后导致召开布里俄尼全会的政治活动的细节，由于各种说法不一而且不全面，至今仍然很模糊，但基本轮廓还是很清晰的。铁托的态度和他愿意采取行动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是由于铁托是总书记，是“南斯拉夫唯一的一个历史性人物”（有人在布里俄尼会议上发言时这样称颂铁托），只要兰科维奇保住铁托对他的信任，那末他本人和他所控制的机构就是碰不得的。关于这一点，党政特别委员会的塞尔维亚成员拉多萨夫列维奇实际上已在会上承认了。当时他向全会解释说，这就是迟至6月下半月特别委员会仍然认为要求兰科维奇向他们作证是不妥当的原因。当然，兰科维奇没有去作证也必然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拉多萨夫列维奇说：

我们的处境是：兰科维奇的职位使他认为无需到委员会作证，而我们也认为没有必要请他出席作证。我们以为这是他应该与铁托同志一起来解决的事情。

然而在三中全会前后的几周内，铁托已经逐渐看清了他的副总统和组织书记，而这一点其他几个关系密切的伙伴也有所察觉。这个情况使他们壮起了胆子，趁兰科维奇3月26日赴苏的时机开始了反对兰科维奇的活动（当时他代表南共联盟出席苏联党代大会，为时两周）。一贯当重要带头人角色的巴卡里奇，在赫瓦尔休养数月后此刻再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离开了他的克罗地亚大本营跑到贝尔格莱德向一般的

电视观众发表讲话(3月24日),向那里的党的积极分子发表讲话(5月18日),而后又在萨拉热窝讲话(5月29日)。他讲到在今天这个较为民主的时代里,党的组织和思想改革的必要性,也讲到了促进实行1965年改革方案的必要性,特别提到改革对推行民族主义将是个障碍。巴卡里奇公开发动攻势,则是以三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他在3月6日《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答记者问为标志。一个记者说:“其他一切都不谈,我认为目前民族主义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来说,连第二位问题也算不上。”巴卡里奇回答说:

……就目前而言,我要说这个问题至少是第二位的重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改革同时取得反对民族主义斗争的胜利。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减慢。而民族主义的问题也就完全有可能从第二位问题变为第一位的大问题。

在塞尔维亚,其他主要政治家根据中央委员会以及4、5月间召开的其他一些党的会议充满矛盾心理的态度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正在逐渐小心翼翼地向着比较自由化的立场(就其含义来说也就是托多罗维奇和M·波波维奇这样一些人的反兰科维奇的立场)靠拢,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前程。

搜集罪证的工作首先从引人注目的国家保安部开始。特工人员以维护“中央稳健方针”和服从兰科维奇的意志为名,无孔不入地任意滥用职权的丑行,是众所周知的。这就使他们成了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替罪羊,不过从事实的性质来说,至少部分是真实的。这项工作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似乎是米什

科维奇。他是克罗地亚人，1965年接替兰科维奇的亲信卢基奇担任联邦内务部长。尽管米什科维奇战后曾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人民保卫部和国家保安部担任过重要职务，还担任过内务部副部长，但对占据国家保安部核心的塞尔维亚集团来说，他是圈外人。他很快就发现下级工作人员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们直接向斯特法诺维奇请示报告。此人是兰科维奇最亲密的同事，也是国家保安部的创建人之一，并长期主持工作，现在是联邦执行委员和联邦内务委员会主席。另一方面，国家保安部的重要对手，独立的军队反谍报局，给米什科维奇提供了近水楼台之便，因为他的弟弟伊万是那里的一个上将。于是，一系列复杂的阴谋活动就接踵而来。据说军队反谍报部门窃听了国家保安部，后来国家保安部又为时已晚地极力把部队的反谍报部门纳入自己的窃听系统。国家保安部门的窃听范围已包括自己的部长以及每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了，显然铁托也不例外。

国家保安部窃听党的高级官员一事以及在铁托住所（一种说法是在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发现窃听装置，另一种说法是只在其中一处）发现一个话筒（或几个话筒），无异给反兰科维奇力量提供了盼望已久的最后一击的武器。现在他们迫不及待地以此向铁托施加压力。其实铁托显然已倾向要作出某种决定。4月28日，在他出访罗马尼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匆匆忙忙召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要解决“干部政策”问题（兰科维奇的禁区），而不是前些时候所宣布的讨论民族主义复活的问题。当铁托得知国家保安部未经授权进行窃听活动的时候，他就迅速而坚定地采取了行动。

铁托住所的窃听装置显然是在6月9日发现的。事也凑巧，这天正是新闻界报道兰科维奇官方活动的最后一天。当时立即任命了一个“技术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揭露了在党的高级官员中的窃听范围。初步的调查报告交上来以后，6月16日召开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证据送到会上，执行委员会通过选举任命了一个党政六人特别委员会，对此事正式进行彻底调查。特别委员会中每一个共和国有一名代表，由茨尔文科夫斯基任主席。兰科维奇投票赞成委员会的任命并提出辞职。六天以后，即6月22日，执行委员会再次开会听取特别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并认为根据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理由对兰科维奇、斯特法诺维奇和国家保安部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于是召开了7月1日在布里俄尼举行的那次中央全会。

伏克曼诺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为这段故事增添了可靠的细节，既富于人情味又有启发性。他谈到6月16日会议的前几天铁托召见他，直截了当地把受到窃听一事告诉了他，并说这是“马尔科和切查（即兰科维奇和斯特法诺维奇）干的”。伏克曼诺维奇表示难以置信，铁托回答说，“顺便告诉你，你的住所也被窃听了。”6月16日会议以后不久，有一次伏克曼诺维奇在党中央机关碰巧和兰科维奇乘同一个电梯，他显然垮了。伏克曼诺维奇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两个人都哭了，兰科维奇伤心得只是喃喃地说：“唉，泰波啊泰波！”^①他到了自己的一层便走出电梯，留下伏克曼诺维奇悲哀地沉思着“被时代所抛弃的革命者的命运”。但是在四中全会前夕，他收到了茨尔文科夫斯基委员会详细的调查报告的副本，发现自己的电话早

^① “泰波”，即伏克曼诺维奇在游击战争时期之外号“神速”的音译。——译者

在1950年就被窃听，他对兰科维奇就不那么同情了。伦德瓦伊也复述过一个与此相似的可信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有一次，在铁托几个最亲密的同事的小范围内辩论兰科维奇的问题。据说卡德尔说：“几年前我就发现电话被窃听了。”铁托生气地质问：“你为什么告诉我？”卡德尔平静地答道：“我想可能是你让干的……”

在四中全会上兰科维奇和斯特法诺维奇都讲了两次话。他们力图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窃听一事上，而且都矢口否认他们与此事有关。兰科维奇在第一次讲话中表示对所发生的事情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第二次讲话中为答复对他的批评，把这点扩大，承认应承担“道义和政治责任”。斯特法诺维奇直截了当地否认国家公安部曾对铁托进行过窃听，并说这是别人干的。尽管整个情况极为复杂，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讲的是真话。特别是因为6月9日以后，有记录可查的第一批解职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沃若维奇的，他是铁托私人的军事副官，显然与铁托家里安装窃听装置的事情有关。但这件事以及其他窃听事件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国家公安部惊慌失措的官员显然在6月初以前就开始销毁罪证了。

中央委员会为了这个缘故和某种更为恰当的政治原因不愿把注意力集中在窃听问题上，而坚持把这一点作为整个问题的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侧面来对待，当然也认为这件事是可悲的，而且暴露出不少问题。会上讨论的是两个更重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国家公安部总的表现和作用，国家公安部所搞成的这种局面使铁托对全会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难道不使你们

联想起斯大林统治下发生的情况吗？”当然兰科维奇和斯特法诺维奇要直接负责，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也必须承担间接责任。特别是中央（再用铁托的话来说）“实际上让保安部门自行其事长达二十多年，是犯了错误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种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党的领导在这个方面的授权范围对整个南共联盟的思想、组织和作用意味着什么。

茨尔文科夫斯基委员会对国家保安部所作所为的公布和全会以后新闻界广泛地对国家保安部的“揭露”，把国家保安部有目的的干预干部政策和有关决定的情况统统揭露了出来。这种干预的范围上至外交部和联邦其他各部，下至公社和企业。有些作法很清楚是为了把“保守派的”观点强加于人，或是破坏党的政策，以便加强支持兰科维奇作为铁托继承人的力量（兰科维奇本人并不一定完全知情或授意）。但是他们干的很多事情往往只是为了保证使效忠于国家保安部的这个派系里的老人占据受人尊敬的有利职位，若是靠能力和资格这些人根本上不去的。另外，被揭露出来的非政治性的普遍腐化堕落的情况，使国家保安部作为“党之剑”的形象受到更大损害。如有组织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走私和在国际上或国内进行其他非法的经济活动，卖官鬻爵，侵占公产，私设赌场以及强迫犯人为国家保安部官员建造别墅，等等。最后，一些文章还公开揭露了某些塞尔维亚和联邦公安机构领导人的种族偏见。文章详细描述了在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警察对大多数阿尔巴尼亚族人民进行恫吓的手段以及故意残暴迫害他们的行径，而这种作法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都已普遍废除了近二十年。

如果说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对这些事情并不怎样感到惊

奇，但经官方授权大规模公开揭露一党专政国家的公安人员所干的无数不法活动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必将对南斯拉夫的政治作风和人民态度产生巨大影响。在其他国家里，象贝利亚这样的被免职的警察头目或是个别的警官在受到他们为之服务的政权的谴责时，罪名总是滥用职权，然而这里受到攻击的是整个警察机构。只有一些共和国一级的公安机构，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还有几分希望取得人民的信任，它们声称抵制了“兰科维奇集团”的有力的渗透。它们没有遭到耻辱，也可置身于即将进行的清洗之外。

茨尔文科夫斯基委员会报告中强调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保安部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只在暗中监视外国特务及特嫌分子和“阶级敌人”，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情报网，专门收集、加工各种有关普通南斯拉夫公民和党员态度的材料，其中包括被尖刻地描写成“原始的”“非现代的”对公众和党员的观点进行典型调查的方法，这些观点往往涉及经济改革这一类特定问题。他们对取得的材料任意加以解释或歪曲，以得出与国家保安部头目的政策倾向和偏见相一致的结论。然后，把这些结论送到党的中央机构。据说这些报告几乎是党中央各机构包括执行委员会在内唯一可以利用的详细情报，中央就靠这些材料来了解地方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人民的意见。

人们突然看透了依赖唯一的一个渠道取得关键性的政治情报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个渠道是封闭的，自私自利的。它自行招收人员，基本上自治。正是这一情况使较有远见的中央委员真正感到不安，尽管他们对国家保安部“非法”收集情报的被“揭露”所表现出来的震惊和反感又是多么虚伪。当

情报的垄断通过兰科维奇个人与所有政治任命和候选资格的垄断性控制结合起来时，就变得更加危险。伏克曼诺维奇在四中全会上总结一系列恶果时指出，兰科维奇作为国家保安部门的组织者和党的组织书记，“从组织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把整个党掌握在他的手心中了”。于是，“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事实上党却不能从组织上付诸实施。”

在以后的辩论中，拉多萨夫列维奇指出，完全依靠国家保安部“传递正确和不正确的情报”，对各共和国关系的影响也同样是严重的，尽管这一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拉多萨夫列维奇说，在塞尔维亚要靠国家保安部获得斯洛文尼亚的动态，而在斯洛文尼亚要想知道贝尔格莱德的情况也要通过类似的途径。但是这样得到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客观的，是经过“某种特殊解释的”消息。他在讲话中谈到：

一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往往打电话给另一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告诉他：我们收到了这样那样的通知，说你们那里发生了一些与我们有关的情况，这种情报可靠吗？以上现象是不正常的。然而，如果事情不这样处理，这些书记之间虽然不互通声气了，但消息就会添油加醋地不胫而走。请原谅我这样直言。

这次危机虽然看起来不再象铁托曾担心的那样危急了，但对他来说这一危机也是执行委员会1962年3月会议上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结果。他说，“当时我们大致上已经看清了这些反常现象以及政策被歪曲等情况的目的何在，但是我

们没能抓住它们的根源。”对此，铁托承担了个人责任。他说，领导核心那时候“干了一半停手了”，“原因是存在着某些妥协的倾向，唯恐整个事件会影响我们党的团结和领导核心的团结，其实即使是在那时，团结也早已破坏了”。铁托没有提及，茨尔文科夫斯基委员会还发现，国家保安部曾奉兰科维奇之命，在1962年3月会议上秘密录制了磁带。那次会议原属绝密范围，不录音的。他也没有提及这一发现所不可避免地引出来的种种推测。

人民群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兰科维奇的倒台和国家保安部名誉扫地的戏剧性的事件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而铁托则正在厌烦地否认西方新闻界对四中全会的解释——全会结束三天以后，他在布里俄尼对一个老游击队员代表团说：“我没有参加任何自由派。”——与此同时，反兰科维奇联盟的领导人正忙着草拟和贯彻他们这次胜利的政治决议。布里俄尼全会批准了茨尔文科夫斯基委员会的一系列建议。如保安部门必须彻底改组，割断与党的直接联系，将其职责限制为对付“阶级敌人的活动以及来自国外的威胁”，并把它置于“代表机构及其执行机关”的有效监督之下。这一点是指在适当的时候建立监督内务部工作的某些议会委员会。同时，“政工人员”应立即替换国家保安部执行岗位上的专职保安军官。调查应继续进行，以便查出“每一个滥用职权事件的真正动机和含义”。兰科维奇辞去党内各项职务的要求被接受，他辞去副总统一职的辞呈也已送交联邦议会。斯特法诺维奇由于他的“不合作的态度”，不仅失掉了职位而且被开除出党。托多罗维奇接替兰科维奇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M·波波维奇接替了他在执行委员会的职务。拉多萨夫列维奇补选入党中央委员会顶

替斯特法诺维奇。7月14日联邦议会接受了兰科维奇辞去南斯拉夫副总统一职，并选举K·波波维奇任副总统。每一个新上任的官员也同样是塞尔维亚人。当清洗工作开展下去时，在较低的各级也是小心谨慎地按这样的作法进行的。

全会在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时候，通过了弗拉霍维奇的一项提议，即任命一个由托多罗维奇为主席的四十人委员会，以考虑南共联盟组织上的“彻底改革”，并提出建议。弗拉霍维奇的报告实际上已为托多罗维奇的委员会规定了方针路线。报告本身坚定地重申南斯拉夫共产党体系中自由派的原则。报告认为，党给自己规定的作用已经不能适应“深远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形势”，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形式和各种观点已经过时。前者包括“南共领导机构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坚持陈旧的工作方法和古老的权力概念”。而后者则包括党内“行政人员的关系和思想”以及“为了形式上的团结实际上容许南共联盟内部存在公开鼓吹采取‘铁腕’政策的势力”。所有那些过时的东西，“已经导致踌躇不前和思想上方向不明，并且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放弃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和社会主义造成危险”。

报告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急不可待地特别重申了1952年党代表大会的一直没有执行的方针，并再一次明确地反对1953年6月二中全会（布里俄尼）对这个方针的否定。报告说，迄今为止所有的讨论和建议都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而且“这已经辩论过多次了”）：

南共联盟的各级领导机构不应该去管那些属于由选举产生的

有关机构管辖权限之内的问题，而应该关心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应该把党员的工作引向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有关自治的一些根本问题，并使党员起到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这必须成为所有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以这样难办的（如果还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指示对党和党员的性质进行改革是上述分析和规定必然得出的结果，从而也揭开了南斯拉夫政治史诗的又一新篇章。这一章在五年半以后结束。那时候同今天一样，又对党不完美的组织形式及党员的跟不上形势的“思想”进行指责，还是用“党在组织上没有能力（把正确的政治观点）付诸实施”这类词句来概括其后果。不过，这些指责却同样贴切地用到了此刻正在取胜的自由派联盟唯一显赫的成员——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机构的身上。

第六章 自由主义的上升

新的多中心政治

1966年夏季发生的事件引起了政治和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并巩固了反中央集权联盟对于重要决策机构的控制。中央集权当局的主要堡垒被摧毁以后，政治中心随之受到削弱，于是这样的决策机构也就更多，而且分布得也更广了。如果说，1966年以后南斯拉夫还远远没有实现官方意识形态所期待实现的那种以直接的社会自治为基础的非党派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那末当时的政权至少已经从一个中央集权的一党专政制度变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多中心政治，代表着特别的、已经制度化了的地区性和职业性利益。然而这种多中心政治还刚刚兴起，意义还不够明确，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也不平衡，因此越来越令人感到，主要权力和责任到底落到何处还很难说。

有四种中心分别得到代表个人或团体利益和思想的某些不稳定的联盟的支持；它们都参与了继承日益瓦解的中央集权制的全部或大部分权力的争夺。这四种中心是：共和国和自治省一级的党政机构；南斯拉夫基本的地域政治单位——五百个公社；国民经济中的“管理—技术骨干”，以及南斯拉夫理论称之为“自治者”的有广泛基础的无产阶级骨干（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有时也称之为“工人阶级”），在大多数场合指的就

是社会主义部门所雇用的那些人。另外，目前威信下降的联邦机构还构成一个潜在的有候补资格的第五种中心，它们或者作为剩余的未经改革的传统机构保留下来（可能比人们所设想的要多），或者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可能不象以往那样专权，也可能同以往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势力中，只有第四种中心掌握主要权力，才完全符合南斯拉夫理论和 1963 年宪法中所包含的职能集中和“直接社会自治”的原则。其他三种中心中的任何一种取得胜利，都意味着南斯拉夫官方马克思主义所断然拒绝的那些形式将继续存在，意味着通常把传统的行使职能的方法和现代的行使职能的方法混杂在一起的一种或多种国家形式将继续存在，弄不好还要遭受独裁专制的统治，至多是实行以地域的、种族的或阶级的选民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形式”的代议制民主。但是，不论实际选举权的大小如何，在体现职能集中的原则和选派代表的方式上势必与第四种中心获胜时的情况根本不同。

这最后一点不仅仅是政治哲学中的深奥之处，也不仅仅是南斯拉夫马列主义变种的重要性及其是否当真和可行的一个标志，它还关系到南斯拉夫国家的真正性质和目的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国家是体现了那个曾一度消逝的思想（这种思想原来主张南方斯拉夫人自然的统一，而现政权已代之以缩小形式的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思想）呢？还是一个主要凭借武力拼凑在一块儿的民族共同体，一个向多民族国家的邦联过渡的联邦，一个由明显的、制度化了的共同经济和政治利益所构成的共同体？还是象南斯拉夫理论最自命不凡的时刻所宣称的那种正在演变过程中的全新的社会主义

体制？对于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或做不出回答，将决定普通的南斯拉夫人民怎样生活和受到什么样的统治。

1966年，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肯定下来，或者多少倾向于最后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一种。这样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除了新制度及其领导人如果不能实现他们的诺言，特别是经济上的诺言所承担的风险之外，还有三种因素被暂时忽视了，或者说被低估了。

第一种因素是：在兰科维奇倒台之前和之后，有许多力量都在极力削弱中央集权的党政机构。这些力量中具有决定性的并非那些主张实行“自治”的理论家和利益集团，而是我们已经看到和将要看到的日益拥有自治权的地区和民族的领导集团，他们阻挠中央行动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大。其结果是（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些民族领导集团所具有的自治权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嫉妒，构成了五十年代的准中央集权制不致再恢复的最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以及今后的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例如，这些人很可能真的认为，巩固他们自己在一个邦联中下属的共和国里的权力，是实现真正的“取消国家控制的”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但他们可能会发现，手段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他们也许正喜欢这样。

民族问题还可能以其他方式影响甚至决定这种新的而且还很脆弱的多中心政治的前途和命运。1966年的事件曾有可能引起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从而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全部或大部分塞尔维亚人在“保守的”政纲下团结起来，把这个政纲理解为或者装做是为了保卫塞尔维亚的民族利益，为了替塞尔维亚民族雪耻。四中全会之后采取了许

多预防措施。比如，用塞尔维亚人接替那些被清洗的塞尔维亚人；几乎全部让塞尔维亚人发言来谴责国家保安部（其中塞尔维亚人占多数）和兰科维奇“派系集团”；另一方面，又威胁和谣传要相应清洗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的“假自由派”分子和“无政府自由派”分子。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无法消除大部分塞尔维亚人和几乎所有的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都倾向于把兰科维奇的倒台、改革运动的发展和国家保安部的被清洗看作是塞尔维亚的失败。另外，还有一种同样严重的危险，即另外一些民族陶醉于自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民族胜利之中。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缺乏能力又不负责任的人的引导下，以一种挑衅的态度放纵自己的民族情绪，这就可能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应，甚至会导致一场政变来恢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以抵抗地方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幽灵。凡是在1966年夏季目睹了萨格勒布为兰科维奇倒台而欢欣鼓舞的情景，并注意到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主要是克罗地亚民族利益胜利的人，都明显地看出需要一批头脑清醒、精明能干的领导人出来防止上述事态的发展，把人们的热情引向官方所要求的方向，动员起来以便进一步进行改革。

第二种因素是，1965年到1966年的“自由派联盟”在重新分配共同的敌人——中央集权制原有权力的过程中，由于暴露出他们在各自的利益和目的上的重大分歧，可能会分裂成原来的几个组成部分。已有迹象表明，这种分裂可能在布里俄尼会议以后的三个月之内发生，主要是通过代表工会因而表面上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发言的伏克曼诺维奇与两家贝尔格莱德报纸《经济政策》和《政治报》之间进行的一场激烈的交锋表现出来。《经济政策》一向代表本书所提到的社会主义

企业家们的观点，而《政治报》至少在当时也是如此。

第三种因素所具有的分量难以断言，可是它的潜力在后来却越来越被低估。这个因素就是党本身，也就是指“以铁托为首”的党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和最后的仲裁者的传统作用（“以铁托为首”这句话，是信徒们必须永志勿忘的礼仪性用语）。

早在十三年前，即德热拉斯危机发生之前，就曾从理论上阐明过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一个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和国家中应发挥的作用。最近，最有权威的理论家们又反复论述，重新明确了它的作用。他们认为，党应是一种施加影响的工具，它作为权力工具的作用应逐渐缩小。党的影响应出于它作为一种进步力量所具有的卓越的见识以及久经考验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威信。然而，十三年来，就连那些诚心诚意地想实现这一理论的人，也不知道如何将它付诸实践。他们一致同意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社会上最先进的分子”的组合，以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的专门知识（最近又懂得了折衷的现代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武装自己，并且必须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在合法的“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利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以及个人本身的各种利益发生矛盾时充当调解人和良师益友。然而，这些理论家中，即使是最老练的理论家，迄今为止还不能阐明这种现代化的领导作用，也无法采用普通党员所能够理解和使用的方式来解决党没有实际权力而要保持实际影响的这个难题，即既要避免令人不能容许的干涉行为，又要避免政治上的无能（卡德尔所说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腹背受敌，就是指上述这两种危险）。共产党人要么继续保持其地位，因而各个党员必须保证使党规定的基本原则变

成政策，要么就不再保持这种地位。要么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和企业不能不考虑党的建议，要么就是可以不考虑。如果党的建议可以不受重视，南斯拉夫的体制和政策就可能会走到党所不能接受的邪路上去。最低限度，党也会变成一个萎靡不振、毫无权力的辩论俱乐部。连卡德尔、弗拉霍维奇和巴卡里奇这样一些自由主义体制的理论家们都一再强调，他们并不想把党的作用降低到那种地步。但是，如果党的建议不容忽视的话，它的权力倒不会丧失，而理论却会成为空谈。

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在 1966 年以后似乎有希望得到解决。用党的另一个习惯用语来说，这是“生活本身”所造成的，然而解决的办法只是部分地符合这种迄今尚不清楚的理论的要求。党早已不再是集中领导的坚强磐石，而且也不能再十分有效地垄断政治权力了。从下文还会看到，到 1966 年，由于共和国党阀之间的不和，使中央几乎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甚至议会选举中也发生不少令人惊讶的事情，如有些人居然没有得到官方领导人的批准就夺得了席位。公开的冲突公开解决，这已日益成为地方政治生活的特征。在这些公开冲突中，地方党委会，党的积极分子，公社议会机构和昔日的“传送带”——社会主义联盟的地方执委会、工会、青年联盟或者退伍军人协会，它们都组成不稳定的集团互相对立，反映了个人与个人或者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不同利益。合理的结论只能是：一种真正的多中心政治，虽然还不是“自治”，已经在坚实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只有发动一场政变才能将它推翻；同时由于这种坚实的土壤就是各种强有力的、现在正在有意识地加以鼓吹的集团利益，所以政变也很难发生，因为它会给经济和社会基础造成破坏。这对于党本身的“联邦化”来说，更

不容许。1971年5月，象茨尔文科夫斯基这样一位知识渊博、专心工作的政治家曾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我们今天已经发展到不可想象联邦党中央还能撤换共和国党的领导的阶段了。”但是刚刚过了七个月，许多事情就证明他的话是错误的。

这一结论忽视了以下事实：党部分地放弃了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放弃了地方分权后的控制权，这对当时出现的分散决策权力和扩大群众参政面来说固然是必要的，但社会变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反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党阙的力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部分原因。党的地位所以发生变化至少还有其他三方面看上去似乎不甚相关而实质上互有牵连的原因，这些原因仍然可能发生有意或无意的变更或者消失。第一个原因是，那些在南共联盟执行委员会和其他重要的党中央机构中占优势的人，正在以种种理由鼓励或者默许党放弃控制权。这些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这种优势，又在四中全会上和后来党的改革中得到了加强。但是这种优势还是相对的，脆弱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有密切联系，即至少自1962年以来，中央机构中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曾使一些机构部分瘫痪，从而使其他权力中心得以乘机扩大其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除了兰科维奇及其所控制的机构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只有逐渐地或突然地撤换那些半瘫痪的中央机构的班底，或者其负责人也许由于意识到在经济或民族问题上遇到困难而思想发生转变，才能消除上述两种障碍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党的权威。在这一点上，近来决定夺回控制权的党的机构同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些党员和群众最近在多中心的状况下

已获得一些利益，并还加以巩固和制度化。但冲突的结果如何尚难预料，而且双方力量的对比也难以估计。可是第三种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因素，它可能打破这种力量的均衡。这种因素就是铁托本人。四中全会时，铁托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当时由于他本人的某些理由，他是反中央集权和主张搞自由化的力量的暂时而又勉强的盟友。发生危机时，是他，也只有他才能把兰科维奇撤掉，并使清洗国家保安部成为可能。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而且还可能转向其他方向。只要铁托还活着，就无法估计这种力量是否会削弱。

除此之外，最后还有外界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和政策。它们都可能发生作用，但本文并未把它们估计在内。另外，南斯拉夫人民军军官团虽然迄今还没有成为一种因素，但却是一股极为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是亲中央集权主义的力量。当他们了解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后，也可能起作用。

南斯拉夫动荡不定的多中心的政治体制，以及与该体制有因果关系的种种理想、参政权的扩大、公民自由和企业家自由的扩大，都前途未卜，仍然面临着险峻的局势。

1966—1967年党的改革

1966年夏季，通过宣传工具透露了国家保安部的一些罪行。正当公众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时，托多罗维奇委员会已着手准备有关党的改革的建议。对党进行改革是布里俄尼会议首先肯定的，反中央集权的联盟想借以巩固自己的胜利。9月

底，报告初稿和一整套改组计划都已拟就，经有关领导部门讨论，已由执行委员会批准。这时，非党公众感到高兴的是，那些曾对国家保安部的罪行进行过认真严肃的调查和报道的新闻记者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揭露党的特权和腐化行为，这使人联想起十二年前德热拉斯单枪匹马攻击共产主义风尚时的情景。

10月4日中央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改组的建议，并同意根据当时党的章程进行改革。这样，就不必冒险去召开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了。至于召开不召开这样的党代大会，7月份以来一直在讨论。当时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决定如何改组，也还没有为这些改组准备好人选。因此，凡是在预定于1968年底召开的下一次党代大会之前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临时的、试验性的。

五中全会批准的改革，废除了迄今大权在握的书记处，对执行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并重新规定了它的作用，但没有触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现在，执行委员会将成为一个单纯的行政执行机构，其成员也减为十一人（六个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是当然成员）并彻底改组。一些党的老资格的官员曾经无视党章，把执行委员会变成了拥有很大权力的决策机构。现在，这些人已被撤销其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新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除了书记一职由托多罗维奇担任以外，其他人都是较为年轻的人（年纪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八岁）。这些年轻人以前都不是那么有名，也不是那么有权力的。他们既不兼任其他的政治执行职务，也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是在改革中创立起来的新的最高决策机构，共有三十五个委员，包括除托多罗维奇以外的

所有十九名前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被分派到五个委员会去任职，接管以前由三个书记分管的职权。为了使得新建的体制更加圆满，中央委员会为铁托新设置一个南共联盟主席的职务(以前称为总书记)。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奉命根据同样的原则改组各自的机构。在以后六星期中，全部照办了。

铁托在闭幕词中证实，搞这些改革的主张是他在召开布里俄尼全会之前的几个月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这些改革代表了他自己最初对于兰科维奇问题的想法和解决的办法。铁托曾用这样的话来解释兰科维奇问题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机构不完善，以致使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消极被动，而且毫不负责地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书记处，特别是集中在兰科维奇一人手中。他说，结果造成了“个人迷信”，并且以可能的接班人为核心形成了“宗派集团”。

很显然，铁托的目的有限。他要采取防止大权旁落的组织措施，以避免再出现象兰科维奇那样弄权的情况。他还希望党的最高领导阶层能够在一个范围小而代表性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决定政策，并有一个得力的、效率高而又可靠的机构来执行。但是这个执行机构不能享有自主权，也不能左右政策的制订。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希望把决定政策的权力(主席团的职务)与行政机构(改革后的执行委员会)分开，并选一批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实这两个机构。比如，新的主席团人数要多一些，以便更有代表性，它不能象旧的执行委员会那样自命不凡，那样容易产生“个人迷信”的倾向。但是它与一百五十五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不一样，它的规模仍不应过大，并有足够的权威，能够保证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然而其他一些人还有别的想法。据铁托和托多罗维奇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反对建立主席团的情况比较普遍，因为其中大部分成员仍然是 1945 年以来就一直统治着南斯拉夫的有权威的老革命家。反对建立这样一个主席团的人想达到的目的是真正削弱党中央以各种形式行使的政治权力。削弱的办法是：制订政策时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化”或者放松至今被当作列宁主义干部党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有些人甚至认为削弱党中央的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他们的最低目标。他们想要削弱整个党的权力，这是自 1952 年的党代表大会以来一项公开宣布的原则。

因为改革派的动机和目标不总是相同的（这一点他们是不能承认的），也因为有人不但强烈反对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早已完成的改革，还反对其他一些事情，因此辩论的时间之长出乎预料。结果，托多罗维奇委员会在五中全会后拟定的“论南共联盟的改组”一文的草稿原应在 1966 年 12 月底发表供全党讨论，但起初推迟到 1967 年 3 月底，后又推迟到 4 月 27 日才发表。甚至在该文发表以后，1967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也只接受了关于进一步进行“临时”改组的具体建议，而对该文中的政治和哲学部分则不表态地称之为“进一步讨论的良好基础”。讨论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已经延迟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 1969 年 4 月召开为止。那时，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五中全会时，托多罗维奇的报告中主要谈的是关于使党能适应“自治的形势”的一些改革，可是铁托主要关心的却不同，这种差别是意味深长的。铁托在五中全会的闭幕词中表示：他担心对国家保安部的批评可能过了头，因为国家保安部还是需要的；他不安的是，

一些非党人士开始干预党的问题，而且“形形色色的异己分子已经开始表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并制订了各种不同的哲学路线”。他还认为报刊上对于党的特权问题的揭露也搞得太过分了，因为纯属党内的问题，党是能够而且理当自己来解决的。党的“领导作用”通过改革应该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

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兰科维奇下台一周年时接受了进一步改组的意见。尽管中央委员会批准“论南共联盟的改组”一文时极其小心谨慎，但这些进一步的改组却有着潜在的重要性，而且符合改革派激进的愿望。当每个企业和公社建立单一的党组织之后，党员在小单位中的分散状态即将结束。公社党组织将包括居住在公社区域内的所有党员，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时属于两个基层组织：一是公社或者地方共同体，一是他们所在的企业或部队。公社或企业党组织的最高机构，是每隔两年选举一次的代表会议。而党委会只是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

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使党员既能有更多的机会关心那些与他们所在的企业和团体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又能通过这种双重身分保持“较为开阔的眼界”，同时还能使党的基层组织避免陷于纯等级制度的关系之中。改革派希望一下子就能解决他们的这两个主要问题。改革之后，在企业 and 公社这些平行而又相互联系的“自治社会主义”的基层决策单位里的党组织扩大了。各个共产党员将不再作为“外部力量”或是上级党组织的“传送带”把意见强加于人，而是通过他们的日常活动影响决策。这样，他们就处于一种按照新的政治准则也能发挥作用的地位，而且仍能获得成功。

地方党组织实行了这个计划。根据它们在五年之内的工作来看,这个计划成功地实现了计划制订者的一些希望,但不是全部。许多地区的政治生活日益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基层组织在一些通常是超出地方范围的重要问题上,常常互不相让,而且抵制上级党组织,其中包括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它们只是在有些时候才按照共和国首脑机关自己派出的、或应要求而派出的工作组的意愿办事。基层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控制着委任权和提升权,因而它们仍有很大的潜在力量,“人事关系和官官相护”仍如以往一样重要。地方党组织越来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在前些年的投资制度下因给予特惠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网显得更加重要了。但是,还看不出党的权力部分地分散以后究竟实现了多大程度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基层党员参与制订政策或作出决定的权力看不出有增加的迹象。基层党组织抵制上级机关的政策的能力加强,同基层党员制定政策的能力不是一回事。而且这种抵制往往来自地方党委会或“非正式的团体”,而象代表会议这样的比较直接的代议团体偶尔才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党委会及其书记的权力通常要比代表会议或者它的主席大(也不总是如此),但表面上是在代表会议的领导之下。由于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开放,更富于戏剧性,它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常常使人联想起其他一些混杂的或过渡性的政治体制中的那种由当地的一些“老板”及其“走卒”们搞的“核心小集团政治”。由不是永久性的“非正式的团体”所组成的不稳定的联盟是南斯拉夫特有的一种形式,它以各种具体利益和人物为基础,这在改革之前已是地方党的生活的主要特征,现在则显得更为重要了。强调共产党员参加“自治机构内的公开论战”,就是允许

把这些非正式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党的会议上拿到工人委员会或公社议会中去，这样就使得自治机构内的政治气氛变得更浓。用党的影响和操纵来代替那种只靠发指示和实行高压的作法已成为党的新策略。可是，只有最老练的精明圆滑人物才偶尔能学会成功地执行这种新策略的妙诀，而其余的执行者要么无视他们不知道怎样应用的某种理论，一味地墨守成规，要么不知怎样控制，甚至灰心丧气地放弃控制。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还同时考虑了另外一项工作。应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全会同意开除兰科维奇的党籍。一些党组织后来还要求逮捕和审判他。正当着手起诉的时候，联邦议会在12月批准了一项总统法令，赦免了兰科维奇及其十七名最密切的合作者。公布的理由是：“鉴于自治的力量和人道主义，并考虑到兰科维奇及其他一些被告在过去所做的贡献”，已没有必要也不宜再惩罚他们。几个星期之后，在1966年除夕，德热拉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服刑的时间只相当于1962年判决的一半略多一些。同月早些时候，一项旨在提高社会保险税的提案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社会福利和保健院中，以四十四票对十一票被否决，于是该共和国政府宣布辞职。虽然通过妥协，解决了这一“危机”，但却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震动。人们都知道，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还从未有过这种先例，即一个共产党政府自己把它在议会上的失败当做不信任票而感到不得不辞职。以上这三个事件以其不同的特点表明，自从布里俄尼全会以后，政治气氛是改变了。

改革后的经济

随着 1965 年的改革,南斯拉夫经济进入了漫长而困难的重新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特点证明,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们毕竟是正确的。改革后的头三年中,经济出现衰退。到了 1967 年,经济已完全停滞不前。结果造成失业增加,移民增多,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提高,或者反而下降,政治上也动荡不定。但是货币与战后的任何时期相比,暂时却是比较稳定的。这些现象又导致采取了一系列勉强的计划性很差的正统通货再膨胀措施。在以后三年中,投资、生产和就业开始不稳定地向上增长。而且不出人们所料,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通货膨胀加快,收支赤字越来越大,第纳尔疲软,最后只能不适时地贬值。有时候看起来,这场改革想要充分实现的唯一目标在政治上却是极不可取的,即不断扩大个人、部门和地区在收入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尽管为社会主义所不容,但改革者还是勉强地接受了,认为这是所追求的真正市场经济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

1963 年和 1964 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而 1965 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四。1966 年又恢复到百分之六点六,这主要是因为天时有利、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与此有关的改革开始见效使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四的缘故。但到 1967 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又下降到百分之一。这一年,工业产量没有增加,农业下降百分之二。1964—1967 年的四年中,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点九,而 1961—1964 年则是百分之九点七。1957—1960 年是百分之十二点七。到 1967 年底,

工业产值以固定价格计算只比 1964 年增加百分之九点一，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这与五十年代的累计增长率相比，或与 1963—1964 年的情况相比，实在可悲。1963—1964 年两年中，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1967 年整个就业率比 1964 年低百分之一，从三百六十一万人减少到三百五十六万人；在社会主义部门中，就业率事实上下降了百分之三，但小私有行业的就业率（主要是手工业、服务行业和饭馆）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从而得到部分补偿；不过小私有行业只占总就业数字的百分之三。更糟糕的是，这种经济衰退不仅出现在一个工业就业率一向迅速增长、较近一段时期以来第三部门的就业率也迅速增长的社会里，而且发生在劳动力市场受到极大人口压力的时候，因为大量战后出生的人已成年，都在寻找工作。虽然有大批的人暂时移居西欧谋生，但据统计，1968 年的失业人数比 1964 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在失业人员中，受过中等教育、高级职业训练或大学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多。

政府总想彻底解决巴尔干半岛老一代人所谓的“农民问题”（这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可是屡遭失败，因此对解决失业问题和改善经济状况并无帮助。弃农外出就业的人数激增，超过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地区除外），因而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开始是相对下降，后来是绝对下降，直到改革后发生经济衰退时才停止下降。1953 年到 1961 年，近两百万南斯拉夫人离开农业，靠非农业的工作谋生。到 1967 年，估计达二百五十万人左右。1948 年依靠土地生活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而现在只

占百分之四十八。离乡背井到工厂和城镇找工作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各地剩下的农业人口越来越老，结果有些地区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力普遍下降，税收基础遭到破坏，在农业公社中地方资助的社会事业（其中包括教育）也遭了殃。同时，人们新近继续不断地大量移居国外，使得搞政治工作的人和计划工作者进退维谷。这种局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南斯拉夫 1965 年的改革却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共产党所大吹的“电气化和工业化”的社会革命，得到满怀热望的农民的支持。随着这场革命而来的便是迅速而广泛的工业化时期，凡是寻找职业的人都找到了工作，“工人”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因而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人们普遍地接受了工业和城市的价值观念，它也成了有进取心的青年男女所追求的目标。但流入工业和城镇的人口太多，以致超过了所能容纳的限度。再说农场，由于政府不重视，农业状况不佳。这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年龄大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劳动力的外流（不管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状况多么不充分）并没有足够迅速地由机械化和改进土地的利用来弥补。现在，由于实行了经济改革，非农业部门的新工作急剧减少，对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的影响尤大。南斯拉夫搞政治工作的人对于社会学一无所知，工作中又不负责任，却轻率地议论要把剩余劳动力送回农场。结果适得其反，剩余劳动力因为在本国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纷纷外流西欧城市寻找职业（象在其他地中海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在危机时刻固然部分地减轻了压力，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自从放弃集体化以来政府所一直指望实现的农村社会化进展缓慢，也没有迹象表明今后会有多大成就，能为解决迄今

未能解决的农村就业问题作出更多贡献。集体化的残余已无关紧要。1963年，农民劳动合作社只剩下三十九个；到了1966年，可怜地只剩下七个，耕种面积仅有一万一千公顷。政府在五十年代曾寄予极大希望的综合合作社一直停滞不前，社员人数减少（1964年有一百五十万人，1966年减为一百三十万人），占有的农田和可耕地的总面积（1966年，农田有八十九万公顷，可耕地有四十四万四千公顷）和合作农民的人数（1963年以来，一直浮动在一百二十万人左右）也逐渐减少。从1960年以来，官方转而强调另外一种形式，即大型的农工联合企业，经营项目包括农作物、牲畜（从饲养到屠宰）、食品加工和装罐以及食糖生产，甚至还开展零售业务。1966年，这样的联合企业有二百六十二个（1963年有三百四十八个，经过经济上的考虑进行普遍合并后，减少到二百六十二个），共占有农田一百多万公顷，其中可耕地八十四万一千公顷，雇用十四万二千名工人。通过购买和租借，整个社会主义部门所占有或耕种的土地总数也同时增加到大约全国农田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放弃集体化以后大约占百分之九），但是增长的速度一直很慢，看来不可能再加快。年岁大的农民和到城市去的人交给社会主义部门的土地，已超过这些部门准备接受的数额。

农工联合企业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部门，在提高农业产量和就业率方面看来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社会主义的农业还没有为那些仍在观望的个体农民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光辉榜样。南斯拉夫最大的农场——农工联合企业“贝列”，占有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汇合处的巴拉尼亚地区的大片肥沃土地，只是这个地区易遭洪水侵袭，1963年这个联合企业损失了二十亿第纳尔。在伏伊伏丁那的贝切伊的另一个联合企业，据说

占有一万五千公顷优质农田、几个工厂、三千五百名工人，但由于投资不当和试验失败，在1963年也“损失了大约三十五亿第纳尔”。1965年年中以后，农业产品价格提高，暂时改善了这些农场的财政状况。但是到了1968年，贝列的利润率又大幅度下降。1971年，该联合企业的经济问题发展成为当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一个重要政治争端。这种情况在南斯拉夫是时常发生的。

上述困难局面始终存在。如果城市无法吸收从农村流入的人口，就必须减慢流入速度，或干脆禁止流入。但这样一来，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又无法解决。此外，在城市开放期间设法进入城市和工厂的这帮现在带有排外性的无产阶级贵族，同农民（这些留在农村的农民由于人数过多无法致富，而且被迫长期居留农村）之间将形成一种新的阶级差别，当然两者之间有时还是可以互相渗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务农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堤坝一旦被冲破（现在南斯拉夫就是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劝说人们留在农场，更不用提让人们再回到农场了。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不仅由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就业机会增多，而且政府的其他政策和对于这些政策的某些优点所作的成功宣传，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只能占有十公顷土地的限制，使大多数南斯拉夫农民传统的愿望即当一个占有较多土地的富裕农民不复可能。同时，二十多年来，政府一直有意无意地进行思想灌输，现在连电视和学校课本也毫不例外地介绍城市和工业的情况及其优越之处，这就卓有成效地美化了城市的优点，并且过分地突出了城乡差别。例如描写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收

入较高,享受城市生活的乐趣,而农民的命运则是每天起早摸黑下地干活,浑身泥巴,收入低微,生活枯燥。

在经济衰退、失业、人口外流和长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同时,同样令人失望的是工资差别的日益扩大,这种差别在南斯拉夫叫做“社会差别”。1968年,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就业人员每月收入仍低于六百新第纳尔(当时为四十八美元),而另外一些人收入则高出六倍或更多。这些人包括党政机关和有关机构的高级工作人员、数目日增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以及大多数在利润极高的部门里服务的人,如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彩券业(1)、某些外贸企业和电气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报纸津津乐道地登载这样的新闻,如一个企业或部门的看门人的收入比另外一个企业或部门中技术高超的工人或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还要高。同时,由于在国家掌管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大大削减了用富裕地区的收入去贴补较穷地区的数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也扩大了。

人们已经看到,这次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用两种办法来改变国民收入的结构:即一方面通过减少投资来增加个人收入,另一方面是通过扩大社会主义企业(“经济系统本身”)的权力,削弱各级国家机构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控制储蓄和投资(或者说“积累”)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一个时期内颇有作为。结果,从1964年到1967年,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民收入中,个人净收入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三十三提高到近百分之四十。据一个统计,经济机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日益扩大,1961年控制百分之四十五强,1964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九,而到1967年达到百分之五十八左右。这些经济机构为国家经济提供投资的份额,在1966年达到高峰,占总数百

分之三十九点四。

然而，在1967年和以后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开始逆转，终于使经济企业发现它们能自己支配的收入和改革以前差不多。这一回，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获得的权益，还不如当时出现在南斯拉夫的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银行系统，特别是1964年继承了全国投资基金资产的贝尔格莱德的三家前联邦银行。这种新经济力量同过去国家的情况一样，不受企业支配并对企业不承担责任。到1970年，银行资金则占全部经济投资和房屋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一·二，逐渐接近于1961年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比例，即百分之六十一·七，而当时银行资金只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零·九。到1970年，经济机构所占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八，低于1961年的百分之二十九·五。

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有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又常常是交互作用的。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几个方面是有影响的。首先是根据以前的两个经济模式所作的不合理的投资造成的负担，结果遗留下来不少“政治工厂”（一时也不能关闭许多），并造成生产品种和质量上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另外的一个负担是，国家承担了一些花钱多而又见效慢的大型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属于基础结构方面，原是改革前夕根据设想的经济不断高速增长的比率而制定的。但此刻不得不在经济衰退时期继续承办，随后又由于通货膨胀而使成本大为提高，于是在总投资额中占用的比例愈益增大而不是缩小。因为这些项目系国家承担，规模很大而收效甚慢，引不起那些有闲散资金的银行或企业的兴趣，这就使国家的投资规模与改革的意图相矛盾。最后，既是党政方面的也是经济方面的一个

遗留问题是，党政干部大多是无能之辈，不知道怎样从真正的市场经济出发来考虑问题和办事。

还有一个负担，就是多少有点运气不佳。南斯拉夫开放经济，以空前的规模同外国竞争，而且充满了十九世纪自由贸易者的那股热情。可是，正当他们竞争的时候，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却后退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南斯拉夫的对策来得很慢，与改革运动的自由竞争精神颇不相称，而且考虑到南斯拉夫在这些贸易伙伴的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很小，其对策的潜在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另外，所有参加制订投资决策的企业、银行或国家机构，都持有种族和地区的偏见，因而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通以及联合进行投资就继续受到严重的阻碍。资本的流通和联合原来都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不但对于创建一个真正的、全南斯拉夫的资本市场有重要意义，而且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帮助那些缺乏资本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赶上相对发达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由一些更直接的政治因素以及草率制订改革方案和实行改革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是重要的。其中包括：许多规定存在缺陷，一些政治上有争议但又带有根本性的微妙问题推迟了解决的时间。在那些推迟作出决定、而且会引起严重后果的问题中，其中一个就是外汇制度。它本来是技术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却变成政治上争论得最厉害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怎样尽量使一种非兑换性的货币，能符合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关系中进行自由贸易的需要，并符合适当刺激出口的需要。实行改革的政权把努力使货币达到可兑换的水平

作为肯定的解决办法，但却把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估计得太短。它在 1967 年找到了一项临时解决的办法，即用“限额保留”的方法鼓励出口，即出口和旅游的企业有权平均保留它们赚取的外汇硬通货的百分之七，准确数字因部门而异，有的部门可以保留百分之四，最高的如旅游部门保留百分之二十。这笔外汇由保留单位任意使用。其余部分则应在指定银行换成第纳尔。这种银行在 1967 年底有十七家，其中最大的五家在贝尔格莱德。指定的银行又把这些外汇卖给进口单位和其他提出要求的单位，当然也包括那些原来挣得这些外汇的企业。但银行卖出的外汇总量是供不应求。

这种办法显然会遭到指责，说它是中央再分配这一旧制度的残余，因为它从那些挣得外汇的人手里把钱（这里指的是诱人的硬通货）夺走，去给那些未曾挣得外汇的人。挣得外汇最多的地区或部门的政界人物和商人争得最厉害。克罗地亚地区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因为这个地区的工业、达尔马提亚的旅游业和大批移居西欧的克罗地亚人每年可带来大量外汇，占南斯拉夫硬通货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但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末的那种政治气氛中无法解决。1968 年以后，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贸易赤字大大增加，第纳尔要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显然比 1965 年所设想的日期更为遥远，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更加激烈起来。

1965 年颁布的《银行法》不但没有解决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甚至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了。新的银行制度未能按制订者的预期发展，即成为可以取代那种对企业负责的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以便能够按市场指令进行投资，并通过银行控制国家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虽然人们

都看到银行在投资中所起的支配作用，但是那些向银行提供资金因而控制了银行代表大会(银行形式上对它负责)的企业和其他法人发现，实际上要想控制银行的决策权很困难，就象工人委员会难于控制其企业一样。其所以难以控制，还因为只有具备职业专长和专门情报的银行经理，才有左右决策的力量。而银行代表大会通常是没有这种力量的。更重要的是，虽然“股东”的代表在形式上控制银行代表大会，但实际上作出投资决定的银行信贷委员会则完全由银行的雇员组成，由银行经理任主席。银行代表大会的成员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而且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商业利益，他们都试图压倒对方。“股东”们又往往向他们“拥有”的银行借贷，借款的数目常常超过他们向银行所提供的资本的数目(1968年至1970年，南斯拉夫所有企业部门的总“积累”只比它们在这些年中偿还的投资信贷多百分之二)，这样也就削弱了他们对银行决策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又进一步为银行制度中出现的集中趋势所加强，这种集中趋势是由于需要更进一步集中资本所造成的。小银行相互合并，或与大银行合并，这样到了1967年6月，南斯拉夫银行总数从改革前的二百七十七家减少到一百零二家。在大银行里，个别“股东”的力量就必然很小了。

企业和银行本身的信贷委员会支配全部存款和投资基金的权限还受到另一种不同性质的限制，即受到大银行所控制的一笔相当数额的投资基金的限制，这笔投资基金相当于偿还1964年国家投资基金取消之前从国家投资基金中借出的所有贷款的款项。根据1965年的法律，国家保留任意动用这些基金的权力，这种权力在1966年的法律修订案中又得到加强。特别是联邦政府广泛使用这些“额外预算”，以提供鼓励

性的津贴,资助政府的新老投资项目,如旅游事业等。1967年以后,除了增加税收,加重企业负担这种倒退的趋势以外,国家继续控制这些基金,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由企业或银行实际控制的投资资金的比例和绝对值。结果,国家进行再分配的那部分国民储蓄实际上又重新集中起来,从而又部分地回到了1965年以前的制度。^①

同时,大银行的权力和作风,象那些在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中享有垄断或支配地位的企业和“社会主义联合企业”一样,说明自由社会主义在银行这个部门中也常常会显示出其资本主义同行的绝大部分弊病和某些长处。这种情况再加上经济停滞、失业、流动资金匮乏和“社会差别”,大大扩充了心怀不满者的队伍,也扩大了要求对这种改革再进行改革的人的队伍。改革派把这样的要求解释为对他们政治立场的攻击,是改头换面地要求恢复1965年以前的经济制度。可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出其他解决办法,于是就顽固地抱住已有的成就不放,而这种顽固态度在迄今为止以变化频繁而著称的这个制度中是很少见的。于是,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正象即将看到的那样日趋严重,其潜在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新帝国主义和新共产党情报局之间

正当经济停滞不前,党为自己的改革而苦恼的时候,南斯拉夫政府对于国内政策的态度受到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贝尔格莱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的严重影响。1963年,^②世界

^① 1971年,经过长时期的政治辩论,“额外预算”原则上取消了。

^② 原文如此,疑为1968年。——译者

上的不结盟运动、苏美关系的缓和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南斯拉夫同所有邻国的良好关系，可以说都在蓬勃发展。但是在南斯拉夫的眼中，这些全都被颠倒过来。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能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再次受到苏联的压力。不结盟国家，特别是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不结盟国家，似乎再次处于美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之下。冷战和军备竞赛早已深入地中海一带。南斯拉夫自己在边界上能否抵抗得住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领土收复主义，也颇成问题。

南斯拉夫报界、外事官员和铁托本人声称，美国公开地和秘密地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对共产主义和不结盟政策的一种新的挑衅。它危害和平并引起轻率的反响。南斯拉夫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干涉。如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1967年6月的中东战争，对柬埔寨施加军事压力，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家门口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如意大利由于在一个贸易条约上有分歧意见，以及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以前的“B区”问题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危机，对南斯拉夫重又产生敌意。再如1967年4月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塞浦路斯问题恶化，美国在1966年禁止向南斯拉夫出售剩余小麦等。

许多南斯拉夫官员都私下里承认，仅仅谈论“帝国主义阴谋”未免过分简单化，而当时人们的印象是，美国以及西方的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以致现在美国的压力和西欧不声不响地采取保护贸易主义比苏联的压力更令人焦虑。因而苏联的压力对南斯拉夫来说，甚至可能会在策略上有用处。另外，尽管苏联自1965年以来没有象美国那样对小国事务进行军事干涉，但南斯拉夫与东欧集团的关系却从1966年年中开

始恶化。这主要与两个具体问题有关：一是苏联对兰科维奇倒台和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和党的改革的反应，一是南斯拉夫未获邀请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当然即使南斯拉夫接到邀请，也不会去参加。

1967年春季的一段时间内，俄国人似乎要公开攻击南斯拉夫的改革，尤其是关于党的改组和重新规定它的政治作用，因为它们严重违背列宁主义的学说。然而，双方试探性地进行几次辩论之后，不久公开辩论就沉寂下去了。南斯拉夫人不愿参加1967年4月的欧洲共产党卡罗维发利会议，但还是派出了一名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前外交官迪兹达雷维奇去说明原因，并重申南斯拉夫的观点，即在其他情况下，愿意进行党的多边会谈。后来，6月爆发的阿拉伯—以色列六天战争一方面使铁托心神烦乱，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使他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与苏联集团（罗马尼亚除外）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了。这就是在外交上共同支持阿拉伯国家，为此铁托甚至亲自到莫斯科参加了所有欧洲共产党的政府和党的首脑的多边协商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然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国内改革的明显疑虑仍然存在，并且把这种疑虑与南斯拉夫对准备召开新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所持的态度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即使不是从外在的政治逻辑也是从内在的意识形态的逻辑联系起来考虑了。南斯拉夫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样的大会和1968年2月至3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预备会议深表疑虑。如果大会谴责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即便不正式“开除”中国共产党，那也无异恢复过去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先例，教条主义地确定什么是

“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错误”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种逻辑，试图规定一条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南斯拉夫的一些评论指出，这样的一些做法，纵然是用笼统的话来阐述，也将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过去由一个中心来领导的形式为另一种由国际会议来领导的形式所替代。会议的发起者坚持说，这个会议必须看成是 1957 年和 1960 年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继续，因而 1960 年通过的决议仍然有效。正如南斯拉夫报刊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1960 年会议通过的决议强烈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纲领，指责它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搞颠覆和背叛马列主义。最后，南斯拉夫共产党虽然一方面同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赞成召开一次大会，把所有的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统一到反帝反殖的共同旗帜之下，但是南斯拉夫人一再表示，他们怀疑召开一次只限于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能否在实质上有助于反帝反殖的事业。他们指出，如果这次大会真正是反帝的，那末把那些不发达国家中自称是共产党而对本国“民族解放事业”贡献极小或者毫无贡献的有名无实的党派或集团请来参加大会，却把那些虽然不是共产党——通常是执政党——而对“进步运动”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党派排除在外，就会使大会变得毫无意义。

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急于避免新的争吵，并显然真正担心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人民战线”会失掉机会，所以他们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没有接到参加布达佩斯的预备会议的邀请，因为预备会议只邀请参加过 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党。如果预定召开的大会仍然坚持 1960 年的大会由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字的声明

中反对南斯拉夫的条款，而不正式加以撤销，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即使接到邀请，也不会参加。然而，南斯拉夫党原则上并不反对许多共产党一起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协商（虽然他们赞成建立一条包括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更广泛的战线），因而也会“支持布达佩斯会议中任何他们认为有益的观点”。

南斯拉夫与其紧邻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反映出南—苏关系正在走下坡路。南斯拉夫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关系进一步冷淡，甚至与罗马尼亚也处于关系冷淡的边缘。1964年4月，罗马尼亚前总统乔治乌-德治发表了脱离苏联监护的“独立宣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又合作建设铁门水电站和航运工程，这为两国（现在都致力于把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础。可是，在过去的两年中，铁托没有能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乔治乌-德治的继承人）建立起个人之间的亲密友谊。所以，1967年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发生分歧：一个问题是中东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铁托与苏联站在一起，而罗马尼亚却采取与此不同的独树一帜的态度；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共产党大会的准备工作，罗马尼亚勉强参加，而南斯拉夫却没有参加。同时，索非亚采取了同志之间最不友好的行动——保加利亚报纸再次把马其顿问题提了出来，这显然是为纪念即将来临的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九十周年而开展的有计划行动。南斯拉夫对此比往常更为愤怒和不满，因为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默许，甚至可能是指使，保加利亚政府不会在这个时候打出这张特殊的牌。这也就引起南斯拉夫外交官员和公众舆论作出许多不祥的预测。

不论南斯拉夫的反应是否过分，可是一想起保加利亚对

马其顿的领土收复要求，意大利关于朱利亚地区的领土收复要求，再加上希腊好战的反共军事独裁政府上台，就又造成南斯拉夫四面楚歌的感觉。四年前，他们还得意洋洋地说他们和七个邻国中的六个建立了空前良好的关系；可是到了1967年，与南斯拉夫保持良好关系的只剩下奥地利一国。

南斯拉夫在外交上的反应表现出疑虑和矛盾，这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正经历着权力分散的混乱过程不无关系。外交部利用一切机会向两个超级大国集团表示，虽然南斯拉夫在越南问题和世界共产党大会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愿意和它们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联盟不是纯官方的组织，因而它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试验性活动。给它提出的任务是挖掘地区性的潜力或者更广泛的潜力，谋求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不结盟（不亲苏，但也不反苏）的阵线。这个阵线由独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进步”力量所组成。可是，它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就遭到惨败。^①铁托1968年2月7日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呼吁，成了报纸的头版新闻。铁托是在和纳赛尔总统、海尔·塞拉西皇帝商谈之后，呼吁召开“一个不但不

^① 这是指由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联合召开的一系列地中海会议。会议讨论了新近“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加强试探的“模式”（包括希腊军事政变，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闪电战，塞浦路斯问题，以及关于在意大利策划军事政变的传说）。俄国人和法国共产党人都把这种做法说成既反美也反苏。事实证明，按南斯拉夫的主要兴趣，即要在意识形态上联合更多的“不结盟国家和进步力量”，是很困难的。法国共产党人反对把戴高乐派包括在内，意大利共产党人反对把意大利社会党人包括在内，阿拉伯国家反对把法国的密特朗集团包括在内，而埃及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则反对把突尼斯的新宪政党包括在内。整个计划随后被悄悄地塞进新闻报道的最后几页，成为不结盟外交中次要的东西。

结盟国家参加，而且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都参加的新的“大会”的。南斯拉夫报界和政府对此显然大为吃惊，急忙表示同意铁托的意见，但又把铁托顺便告诫大家这样的会议需要进行充分准备的话解释为“通向这一会议的道路当然是漫长的、复杂的和使人厌倦的（《共产主义者》周报的说法）”。事实证明，会议的召开的确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等待了很久。因为卢萨卡不结盟会议是继 1961 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和 1964 年的开罗会议之后，于 1970 年 9 月才举行的。

南斯拉夫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人消极抵制这种别出心裁、风头主义的作法。他们显然认为，南斯拉夫要推行雄心勃勃的全球性外交政策，至少自 1965 年以来在外交方面已经力不从心；在这些人看来，南斯拉夫在南欧毕竟还是个不够发达的小国，外交政策必须按照这种现实情况来制订。因而，他们主要关心南斯拉夫与邻国以及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经济关系，特别关心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贸易协定，关心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与外国公司订立合营的生产安排——这一做法已由于 1967 年通过的一项尚有争议的法律而成为可能。虽然他们也认为不结盟重要，但这只能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手段，用以争取其他一些同样对小国反对大国压力的斗争有兴趣的国家在外交上支持南斯拉夫而已。所以，他们要求在制订外交政策时也要“民主化”，因为这是经济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必然结果。他们这种提法的含义是为了在确定一项外交政策的风格和重点时，使联邦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增加地方和共和国利益的影响，从而避免华而不实。外交部长尼凯集奇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1967 年 6 月，当铁托总统刚刚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议归来时，他竟然对铁托说，你不应该事先未和

其他同事商量就去参加会议，也不应该在中东危机一事上同苏联站在一边。他的这种作法打破先例，但结果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辩论

在兰科维奇倒台的前几年，就已经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审慎地重新展开辩论，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和社会，实行自治以后党和民主集中制的作用的变化，以及南斯拉夫阶级结构的性质及其政治含义的改变等等。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自六十年代初期就经常在一些昙花一现的杂志上和标新立异的戏剧和电影上试探过容许活动的范围，有时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麻烦，甚至有的人还遭到逮捕。与此同时，官方的理论家也开始对一些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方式是先党内私下进行，然后转为公开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1963年宪法的起草，经济改革的斗争，以及1964年党代大会的准备工作。他们同党外理论家一样坦率，尽管他们有更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目的。一个新的、半官方的党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于1964年创刊，作为他们辩论的主要论坛。这些人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参加辩论，不可避免地为其他人参加辩论开了路。

辩论的双方都明显地使用比较折衷的词汇和概念，这说明多年来人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带有存在主义印记的学究式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布尔雅那最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带有形象逻辑和近代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以贝尔格莱德为最；在萨格勒布则有一种

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人类学”。到了六十年代末，不但知识分子和学生，就连普通的政界人士也都使用起社会科学的专门术语来了。这些术语主要来自西方，有时已脱离其学术来源和原意而庸俗化了。地方党政官员在向工人或农民讲话时，很普遍地使用这样的词语：“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扩大赞同的基础”，“社会阶层”，“核心人物”或“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此同时，他们还继续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同样深奥、费解的专门术语。

在公开讨论中，言论的自由仍然是有限度的，其中还有一个绝对的禁区。在卢布尔雅那，有一群年轻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父母是老一代游击队员中知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年轻人在他们以前所办的两个杂志被查封以后，又创办了一个名为《展望》的文学和政治评论性刊物。在这个刊物上，他们一开始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自治所创造的“开放结构”、市场规律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农民地位等问题。尽管对这个分析的看法有争论，但是在当时斯洛文尼亚的政治气氛中还是允许的。此后，他们开始抨击“文化上的官僚主义”，要求农民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代表权，甚至发展到不怎么掩饰地攻击整个党的官僚主义。尽管斯洛文尼亚党的机构中的一些比较年轻和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员向他们反复发出警告，他们还是跨出了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即公开主张两党制。1965年5月，《展望》被查封。卡弗契奇是曾经极力劝说年轻的编辑不要超出界限，以便挽救这个杂志的一位党的官员。他在和意大利的一个前共产党新闻记者谈论这件事时承认，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曾经考虑过建立两党制的可能性，但后来又否定了。这位当时四十四岁的斯洛文尼亚

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这个共和国在改革时代中的主要政治人物，可是在1972年倒台了，罪名是鼓吹“专家治国论”和“无政府自由主义”。

《展望》事件发生两年后，政府在特殊的情况下，又不得已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另一事件。在扎达尔大学哲学系任教的一名年轻的俄国文学讲师米哈伊洛夫(俄国血统)，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敌对宣传”，为此在1965年被审判。他的文章发表在贝尔格莱德一家文学杂志上，这是他在一个夏天对莫斯科的一些主张标新立异的作家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文章中猛烈地批评了当代苏联的文化政策和苏联对自由的压制。他甚至提出：苏联第一批集中营是列宁而不是斯大林建立的。虽然是在苏联大使提出了强烈抗议，铁托本人也指责了这些文章后开始起诉的，作者还是被判一年徒刑，缓期执行。西方报刊对这一案件作了广泛而同情的宣传。在这种影响下，米哈伊洛夫又写了许多文章，并公开写信给铁托，谴责南斯拉夫没有言论自由。他还在1966年7月发表声明，准备创办一个“反对派刊物”，作为第二党的核心。他再度被捕，这次被关进监狱，开始了自德热拉斯以后南斯拉夫最有名的政治殉难者的生涯。如果他被允许创办他的杂志和党的话，他本人尽管不能算是个什么危险人物，但开这个先例却太危险了。然而，多党制的主张仍然不时出现，而且相当引人注目，以致政府发言人不得不反复宣称：对这种主张仍然不予考虑。

在南斯拉夫知识分子目前所专心从事的对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含义的重新审查中，什么问题都可以涉及，唯独有一个例外，就是对于自治的原则不能表示怀疑。这是心照不宣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南斯拉夫知

识分子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原因在于两方面：第一，改组党的工作已跨出了最初的几步；第二，对托多罗维奇委员会的“论文”的前提显然有争议。正因为这样，涉及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党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就构成了这次辩论最初的焦点。

兰科维奇危机还记忆犹新，它提醒人们这些问题对于“直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哲学来说，既具有理论含义，又具有现实而直接的政治重要性。正如卡德尔在这场辩论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心问题是必须建立一个以自治和民主为基础的制度，

它将使我们能够通过最民主、最正常的方式，尽可能没有痛苦地、没有摩擦地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客观矛盾，同时解决利益、观点和看法的分歧。……这就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提出解决这种有史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矛盾和分歧的策略与办法……按照历史的惯例，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种种事件的发展所引起的每一个政治变化，不管是政府的更迭或具体政策的变化，总是要出现令人想起政变那样的一些政治动乱。

在同一篇文章里，卡德尔进一步提出一些其他的基本设想，这些基本设想几乎涉及辩论中的大部分主要问题。例如，南共联盟并不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唯一创造性的因素”。一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不一定总是进步的。南共联盟必须“有思想和原则，并随时准备捍卫它们，但是要有灵活性”。假若这些思想和原则经过检验是不正确的，那也没有必要过分着急。“我们已经不再幻想建立形式上的团结。”问题是怎样建

立真正的团结。文章最后再次明确地谈到这样一个老题目：

党的组织及其机构，除了采取政治手段，例如说服、帮助、向公众提供情况、教育等类似的办法以外，决不能干涉议会和劳动组织中的自治机构的决策和行动。

这些话显然把民主集中制和“党政分离”（茨尔文科夫斯基 1967 年初的文章的题目）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比 1954 年以来的调子还要激进。同时，这些问题的讨论，自然就会使人们重新考虑当今南斯拉夫的阶级结构。例如，由于推行了现代化（根据托多罗维奇委员会的“论文”），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不是真的开始“与技术知识分子融合起来，而且还间接地与进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即与脑力劳动者融合起来了呢？”如果真是融合了的话，那末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得产生某些影响企业和公社内的决策结构以及影响这个新概念所指的工人阶级在党内所起的作用的具体后果。同样重要的还有怎样给“社会主义本身的官僚集团”下定义和分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种官僚集团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实体，能够变成一个“新阶级”。这种看法是“德热拉斯主义”的，而且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上是令人怀疑的。巴卡里奇写道，如果“官僚集团”真的能变成一个阶级，代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作对的话，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义务来消灭它。他说，这种看法显然是荒谬的，因为现代社会里若没有一个集团来完成官僚机构的各项职能，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转；一个旧的官僚主义集团被消灭，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马克思在警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注意它自己的官僚集团时，曾经

承认说,问题在于谁是“官僚主义者”,他们对谁负责,以及怎样使他们负责。不同意官方观点的批评家们反驳说,官僚集团已摆脱了表面上的统治阶级的控制(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人民和象剩余价值这样一些事物,因此它已具备了马克思给阶级所下的定义的全部属性。如果这样还不算一个阶级,那算什么?

双月刊杂志《实践》在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的论战中总是首当其冲。该杂志在1964年由萨格勒布大学的一些哲学家创办,常常发表一些超出迄今所允许的范围之外的文章,以试探政治气候。《实践》一创刊,就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炫耀地而且在当局看来简直是傲慢地“批评现存一切事物”。这个杂志主张作为追求纯粹真理的大公无私的哲学家,必须反对那些政客,并与他们抗衡,因为这些政客的职位使他们为了政治利益不惜歪曲真理,甚至当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候也在这样干。《实践》及其撰稿人被指控宣扬知识分子高人一等,以及使用新经院哲学的手法,企图以马克思早年的看法来攻击列宁和晚年的马克思。于是,攻击和威胁接踵而至。其实,这些攻击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5月和6月间,萨格勒布党组织和克罗地亚议会的共和国院也曾对这家杂志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开批判。参加这次批判的突出人物包括铁托本人,还有党的理论家,如巴卡里奇、卡德尔和弗拉霍维奇,也有较为年轻一代的人物,如佩丘伊利奇、特里帕洛和绍什基奇。所有这些人都一向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公开发表的观点,在一般人看来,与《实践》政纲中的大部分观点极为相似。官

方对这份杂志的注意使它出了名，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西方报刊几乎年年预言《实践》要倒台，但直到1975年才应验。1966年，在克罗地亚议会就《实践》问题举行的讨论中，曾有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对话未为人们所注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粗暴地问道：“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在资助这个破烂货？”当时，巴卡里奇在猛烈攻击这家杂志的过程中，前言不搭后语地回答说：“加切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支付经费支持这家杂志？是我们，是我们在资助《实践》。”

意识形态的辩论本来很清楚是一直“围绕着政策问题”进行的，可是到这时候早已变成了又一次无休无止的、舞文弄墨的、尖锐刻薄的个人之间的攻击和令人厌烦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院式的辩论。这样的辩论枯燥无味，使局外人感到不可理解。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参加辩论的人竟为一些词句或重点上微不足道的差别发那么大的火。比如，既然双方都一致认为，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构已经摆脱了任何其他阶级或阶层的控制，而且正在对生产资料实行垄断，并由他们自己来分派剩余价值的用途或进行再分配，那末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的官僚集团称为“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阶级”，为什么关系如此重大呢？又如卡德尔曾用过“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很明显，他指的是苏联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否应被解释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平行的独特的第三种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是一种“堕落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为普通人所不理解的争论之一。然而恰恰是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极为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发展到恶毒的个人攻击。象《实践》这样一类的杂志，还有同它差不多只不过较为谨慎的贝尔格莱德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不落常套的杂志，都站在“反

官方”一边，反对它们称之为“官方”喉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有时也反对《战斗报》。^①

进行那样的辩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显然谁也弄不明白的细节有时至关重要，而且包含极为复杂的政治含义并带来严重后果，这一点已由第二和第三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历史所证实。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原因。

在辩论的后一阶段，《共产主义者》的敏锐的编辑阿尔特曼曾评论过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报纸与一些斯洛文尼亚老作家之间发生的争执。这些老作家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因为他们曾经公开批评卢布尔雅那的一些“新左派”的文章。阿尔特曼在评论时伤感地提出，“在一场政治辩论中，人们应该注意谁在说什么，而不是仅仅注意谁在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辩论，大多数中欧的政治辩论，和几乎所有的南斯拉夫的政治辩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往往变成个人之间的争论。这一事实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目前这种辩论风格产生的原因及其效果。南斯拉夫新近的这场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之下，发生在成员为数不多而教养上和文字上都相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这类文化共同体是小国和“面对面”的社会所特有的。这样的辩论的风格和个人之间的攻击符合中欧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并非左派政党才有，看来倒是中欧地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参加这场辩论的人都是一起长大，一起学习过的。有的在战前是年轻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并在地下党工作，也有的在社会主义

^① 它们的论战场所也包括官方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双方代表在会上提出论文，其题目如“自治情况下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关于南共联盟改组中的民主集中制”，或者“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先锋队性质的改变”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官方”刊物的专栏并不总是拒绝发表“反官方”作家的文章的。

南斯拉夫的大学里学习过(有的人则全都经历过)。他们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或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往往是并肩战斗,或是各站一边。他们经常正式和非正式地相互通婚,甚至新政权的官员也常常与被推翻的阶级的成员结婚。因此,由于传统和个人的原因,双方都大量地使用“仅仅根据个人好恶或偏见所作的论证”,以致很容易变成个人之间的攻击。在辩论中,真正重要的是为过去个人所受到的冤屈或政治上遭到的迫害进行报复,并无端设想对方“真实”的动机,而不是双方在辩论中所讲的实际内容。

双方还从对方的言词和行动中识别出一种个人和集团的背叛。在“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看来,政界人物正在背叛他们双方年轻时共同追求过的理想和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政界理论家看来,“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则正在背叛1965年以后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这些改革在目前正是为实现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在政治上可以采取的最大限度的步骤。政界理论家认为,“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背叛表现在他们不断揭露象失业和不平等这样一些弊病和缺点,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中,只有恢复更大程度的中央控制,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还很深的机构进行再分配才能避免。另外,他们吵吵闹闹地提出激进的批评意见,也只会有利于“在四中全会上受到谴责但没有被消灭的力量”。最糟糕的是,象《实践》集团那样的理论家们在坦率地讨论“核心人物”的必要作用时(不管这些核心人物是否自称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含蓄地(很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其他人、特别是目前当权的改革派们所不敢说出的东西: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①这一制度本身及其具体改革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工人阶级应该对一切公共事务

作出直接的抉择，无需通过中间人；而且社会的变化和教育现已造就了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它队伍庞大，社会经验丰富，完全能够自己正确选择，而不需要任何核心人物。可是改革派和“论文”的作者，以及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辩论中为“官方”说话的人都清楚，这统统是假的，但他们都将错就错地付诸行动，而且口头上坚持说是真的。他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等于重新向那些暂时遭到失败而主张中央集权家长制的党政权力主义的人投降；或者等于自己承认，将由别的人（而不是工人）进入他们摧毁那种权力时所造成的真空。在这一点上，怀疑他们是否真诚，特别是当那些和他们一样具有响当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身分的人对此表示疑问时，那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所以他们宁愿重弹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这样一种老调，同时想办法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有研究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信誉扫地，例如控告他们在讨论核心人物时“用 C·W·米尔斯的论点替代马克思的论点”。

可是与此同时，毫不妥协地攻击学究式人物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而又拥护现有权力机构的官方自由派，却继续悄悄地保护那些学究从事工作和发表政见的权利。关于这一点，巴卡里奇 1966 年在克罗地亚议会关于《实践》问题的辩论中曾顺便承认过。这并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对于这些辩论对手及其思想所怀有的带有嫉妒性的敬意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那些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在意识形态上赞成更广泛的多元化和自由而秘密策划反对过兰科维

① 这句话引自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这里意为其他人明知不讲，只有《实践》含蓄地说明了事实真相。——译者

奇的人，也是忠于他们自己的原则的。如果把南斯拉夫社会看成是一个已经成熟，能够进行一场真正自由的“思想斗争”的场所的话（当然这总是限制在对“社会主义的几种办法”作选择的范围之内，不过这个范围正在日益扩大），那末《实践》、《观点》及其撰稿人的专业活动就应该允许其存在。这些捍卫言论自由的保护人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他们自己和党的机构也有权保留和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现在也正在这样做），并有权用政治行动帮助宣传这些观点。但是有了言论自由，党就不能再用“行政”办法制裁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① 尽管这种自由的定义轻易地为党继续坚持垄断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狡辩，但它还是引起了对于自由地表达少数人观点的重要性的热烈称颂，这点是同J·S·米尔的观点相同的。^②

与此同时，这场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辩论所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主要是使改革派的联盟沿着它的天然裂痕发生分裂。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不集中在主要是领导集团内部较为平静地进行的一些显然比较急迫的重要问题的讨论，而转向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战斗。其中一个问题是：

① 参见特里帕洛：《坚定不移地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萨格勒布，1967年版），第259页以后。他当时是巴卡里奇的追随者，认为“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我们对于一些杂志基本上没有采取行政措施，也没有撤销补助金”，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他说，相反，“就我们不赞成的某些观点进行意识形态的论争，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表达不同的看法。”

② 参见希列戈维奇（南共联盟中央委员，退休的游击队上将）的话：“批评不会、也不能破坏创造性的过程。恰恰相反，某些观点和原则，即使一度已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不再反复考虑和反复检验，结果不是停止不前，就是教条主义。批评和教条不能同时共存……我们将不得不适应这种情况，即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某一个人能垄断的。”（《星期日评论快报》上发表的访问记，萨拉热窝，1969年1月26日）

建议南共联盟应成为一个“本质上完全新型的政治组织，它的基本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起指导作用”。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使用准确的方法，把党的机构在某些具体争端和问题上的决策权，真正转移给自治机构，同时又要作得不过分，不降低党的影响，不冒险做出过多的用党的观点来看可能会“引起倒退”的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以茨尔文科夫斯基和特里帕洛为代表的地区发言人和以绍什基奇为代表的中央机构的理论家，率先要求正式承认少数人在党内通过了反对他们的决议后有权继续为自己辩护，或有权辞去执行决议的职务，而不致名誉扫地或受到党的处分。他们认为这样比执行自己不赞成的决议要好。

在烦琐哲学家们喧闹的争论声中，在当时的激情中，有一个警告几乎没有被人听到。这个警告是铁托在辩论的初期，即在托多罗维奇委员会“论文”发表前夕发出的；他若不发出这个警告，就不会参加这个辩论。他说：“我国人民的觉悟水平距离要求还差得很远。只有达到要求的水平时，党才能逐渐消失，它的作用才能逐渐减小。”他说，在实现这一点之前，“1948年的教训”，即通过严格加强民主集中制而实现团结和严肃纪律，对于南共联盟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异议和反响

到1968年，南斯拉夫笼罩着一片动荡不安、飘忽不定的气氛。持不同政见的潮头日益增长。在人民的心目中，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巩固其合法地位，主要是在四个方面显示了能力：第一，保卫了自己作为一个地处东西方交界处的小国的朝不

保夕的独立；第二，维护了国内爱吵闹的种族集团之间同样不稳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统一”；第三，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第四，至少在实现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民主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可是，在所有这四条战线上的情况却显然在发生动荡。改革以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希腊军事改变和六月战争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南—苏关系的恶化（这从1966年起即已开始，而1968年年中以后突趋严重），南斯拉夫的安全和独立比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没有保障。由于地方领导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致使联邦政府和党中央机构日益陷于瘫痪；与此相关连，各种族共同体之间的相互猜疑和相互指责也逐步升级，以致造成事端。许多人开始看到，党的核心集团已经四分五裂，它方向不明，领导不力，优柔寡断，较之没有分裂之前可能更差。大学象是地震仪，可以测出各种不同的政见：如卢布尔雅那的“新左派”，在萨格勒布占优势的民族主义者，在贝尔格莱德则各种人物都有。

目前主要掌握在反中央集权的改革派联盟手中的政权，两年多来对不同政见所掀起的浪潮的基本反应，实际上是不予理睬，除非紧迫地威胁到要破坏和动摇改革纲领中的某一根支柱或者公共秩序。改革派手中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计划”（这是美国政府在几年后给起的名字），他们以战后南斯拉夫政治中前所未有的坚强决心来执行这项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比查尼奇所创造的新名词“四D”^①来制订的，即地方分权、取消国家控制、非政治化和民主化。

例如1967年4月，当改选联邦、共和国、自治省和公社议

^① “地方分权”，“取消国家控制”，“非政治化”和“民主化”原文都以D字母开始，故称“四D”。——译者

会的半数议员时，选民们根据党的指示，有比以往更多的候选人可选择。以前只是非正式地负责组织提名和选举程序的社会主义联盟，现在则开始正式负责选举工作。党员和党的机构也接到严格的指示，只能根据党的新规定，通过联盟来影响候选人的挑选，而不能象以前那样，把自己拟定好的名单“强加”于人。结果表明，在许多地区中，有的共产党员真心实意地试图按照这些指示去做，但力不胜任，有的党员则心怀怨恨或不知所措而没有在选举活动中起任何有效的作用。

公社议会各院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中一半席位甚至在1965年就开始进行争夺；1967年，平均每个席位二点三人竞争。公社级以上的议会各院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由公社议会选举）。1963年宪法中有一项奇怪的条款，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来“批准”那些选到联邦议会的联邦院以及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的共和国院和自治省院里的人。这个条款在技术上使公社议员可以为这些最有实权的议院中的每一个席位提出一个以上的候选人，以便让选举人挑选。然而这种程序不符合现行制度和政治习惯，因此在1963年即要求选举人为联邦院的一百二十个席位批准一百二十个候选人。一些自由派的党的领导人批评了选举法。于是，1964年对选举法进行了修订，以便鼓励提出更多的候选人。即使这样，1965年进行选举的六十个选区内，只有三个联邦院的选区各提出两个候选人。根据1967年的新精神所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公社议会提出八十二个候选人供选民讨论，以便从中再选出联邦院的六十个席位的人选。使大部分观察家吃惊的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十四个拥有多个候选人的选区中，除四个以外都在塞尔维亚，当地各公社议会向选民提出了四十一个候选人来竞选二十五个

席位(六个席位每个有两个候选人,三个席位每个有三个候选人,还有一个席位有五个候选人)。

正是这些竞争的结果,以及在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为争夺地方和共和国的席位而竞选的结果,使得改革派联盟的成员大为吃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实行直接的和更自由的选举是否妥当,南斯拉夫社会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现更大的民主的程度。在为选举联邦院而进行激烈竞争的大部分塞尔维亚选区中,候选人中的一方代表游击队和党的“老战士”,他们往往是民族解放斗争中得过不少勋章的英雄,而对手通常是属于兰科维奇倒台之后经过改革并已“自由化”的党的机构且由那种机构提名的人。正是这些老游击队员在选举中战胜了那些年轻的“官方”候选人和改革派人物,尽管他们被称为共产党的“保守分子”,是粗野的和要不得的候选人。

例如,在南塞尔维亚的一个选区里,自由派的联邦外贸部长朱韦罗维奇出乎意料地被一个叫拉佐维奇的所击败。他是一个已退休的游击队陆军少将,曾被授予游击队英雄主义的最高荣誉——“人民英雄”的称号。在查查克的西摩拉瓦河选区,另外一个人民英雄、退休将军乌罗舍维奇,在一次选举中击败了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在1969年的选举中,更富有戏剧性地再次取得胜利。

1967年的一次最臭名昭著的选举,发生在舒马迪亚的一个主要属于农村公社性质的地区拉扎雷瓦茨。这里的选举优胜者约瓦诺维奇战胜的对手有四个之多。他在战前是王室军官,后来当了游击队的人民英雄和中将,外号叫“大胡子”,因为他到游击队时还留着通常是切特尼克的特征的络腮胡子。

他后来在国家公安部工作过。在竞选过程中，约瓦诺维奇搞了党称之为“煽动性的活动”；他向农民许诺，要铺设通向他们村庄的道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与工业工人比改善农民的相对待遇，同时还私下抱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塞尔维亚的利益遭到了忽视。

约瓦诺维奇在选举中获胜后，把他私人的一些朋友也带进公社机关。他凭借这些人和游击队老战士组织（以前是兰科维奇的势力范围）的帮助，开始包围、孤立、一直到最后攻击地方党组织（这是后来他被控告的罪名）。此外，为了实现他在选举时许下的诺言，他强迫选区里唯一重要的工业企业捐献机器，为农庄筑路。为此，他被控破坏自治，“滥用职权和瞎指挥”。

1967年秋季，南共联盟的地方和共和国机构采取联合行动，以求把他赶下台并驱逐出党。他除了上述罪行以外，还有一条更严重的罪行，就是他搞竞选和掌握权力主要依靠一个由党内外反对势力所组成的奇怪的联盟。这个联盟后来被称为“地下政治力量”，由兰科维奇的旧人、前共产党情报局的支持者、前切特尼克和其他一些人所组成。他们的共同纲领是“塞尔维亚沙文主义”。

1967年底，“大胡子”被取消了代表资格，并清除出党。但是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以及克罗地亚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尽管没有这么富有戏剧性。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个事件当时普遍认为是战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关系史上最严重的公开事件。1967年3月17日，萨格勒布的主要文学周刊登载了“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

言”。这个宣言由一百三十个著名的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出面，并以十九个文学团体的名义签署发表，其中包括有名的克罗地亚母亲社。签名者中有八十个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位克尔莱扎，是当今克罗地亚最著名的作家。他是铁托个人的朋友，也是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委员。“宣言”谴责了1954年的诺维萨德协议，因为该协议宣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为一种语言，但有两种字体（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和两种变体文字（ijekavski 和 ekavski）。“宣言”要求政府和宪法完全承认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停止所谓对克罗地亚变体文字的歧视，以及在克罗地亚的学校里、报纸上和官方文件中只用克罗地亚变体文字，等等。宣言发表后，引起了政治骚乱和疯狂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签名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一些拒绝撤回宣言的共产党员失去了党籍。四十五名塞尔维亚作家也遭到同样的待遇，其中有一半又是共产党员，他们以同样的措词写了一个答复，即“提供考虑的建议”。其中有一条要求贝尔格莱德电视台使用西里尔字母，并要求克罗地亚地区的七十万塞尔维亚人应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受教育。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任期将满的联邦议会通过了1963年宪法的第一批六项修正案，并于4月份，即议会解散的前夕，宣布了这六项修正案的内容。这些修正案体现了兰科维奇倒台以及其后进行的党的改革所形成的改变了的政治力量均势对联邦结构最初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修正案中有四项涉及到联邦与共和国的关系，而且总是对共和国有利；第五项则废除了联邦副总统一职，这个职务原是1963年为兰科维奇设置的。第一项修正案是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

1966年12月关于如何分配联邦基金中的援助经济发展款项发生争执之后提出的。它大大扩大了民族院的权限。自1953年以来,民族院一直隶属于联邦院。现在它将接受“委托”举行会议,在与联邦院“平等的基础上”,“从各共和国,各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相互平等,保障各共和国的宪法权利的观点出发”来决定各种重要问题,其中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及其他一些晚近看来在民族关系上很容易引起矛盾的问题。民族院名义上虽还隶属于联邦院,但此刻实际上已经分出来了,而且根据只一年之后的第二批宪法修正案,它将成为议会中最强有力的议院。第四项修正案直接反映出兰科维奇事件的教训。根据这项修正案,共和国和联邦将共同负责公共秩序,而过去只是联邦充分享有这方面的权力。这项修正案还规定,共和国检察长应由共和国议会指定,而不再由联邦检察长指定。虽然这六项修正整个来说至多不过是为实现邦联制所跨出的微小而又可以退回来的第一步,但“有些南斯拉夫学者和政界人物却大胆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从联邦制变为邦联制”。

5月11日,新的联邦议会开会选举它的官员和新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并再次选举铁托为共和国总统。即将卸任的议会主席卡德尔在告别词中主要谈了选举制度。他的话反映了拉扎雷瓦茨和类似“案件”的教训。卡德尔利用这次机会又提起了他的另外一个得意的想法。他认为:在当前的议会和选举制度以及要求进行更直接的、竞争更激烈的选举的倾向中,还保留了过多有关政治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残余。在这种选举制度中,选民的利益是“通过作为这些利益总代表的政党或这些政党的高级领导不完善地加以集中和过滤的,就象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情况一样”。他说,南斯拉夫最

近的选举再一次表明，“一个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公民，或对情况了解不确切的公民，肯定不是合格的选民”。但是，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能不能既使选民扩大见闻而又不会“引起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经常发生的种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呢？”这还很难说。问题是，“尽快”抛弃拘泥形式的政治代议制，即“一种以取消了具体的社会劳动关系因而毫无特性的抽象公民为基础的制度，而采取更坚定的措施来实现代表团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往后的事实证明，时机还不成熟。要把卡德尔这个得意的想法写入宪法，还需要七年时间，还要经历许多不同的情况和进一步明确“代表团制度”的含义。

新议会批准的新联邦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行政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说明联邦的权力在不断削减，并符合改革的一贯原则。除了铁托，外交部长（尼凯集奇）和国防部长（留比契奇上将）以外，全部人员都进行了调整。由十七人组成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中，尽管有九人是党的中央委员，但只有主席和一个副主席同时是党的主席团成员，而现在仅有的六个国家或联邦部长中，没有一个人是党的主席团成员。从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来看，新班子比预想的还要弱。因为原定主席人选B·克拉伊盖尔在1月份的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议会选举了什皮利亚克代替他，作为温和的保守派的塞尔维亚人斯塔姆博利奇的继承人。^①什皮利亚克不久前任克罗地亚执行委员会主席，更曾是工会联合会里伏克曼诺维奇的副手。在他担任联邦总理的两年中处处受到嘲笑，人们怀疑他的才智和能

^① 现在的共和国总统和执行委员会主席都是克罗地亚人。因此，由于考虑到塞尔维亚的种族敏感性，原名单就要再一次修改。M·波波维奇象托多罗维奇一样，是个反对兰科维奇的塞尔维亚的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代替原来的候选人即门的内哥罗的弗拉霍维奇成为联邦议会的主席。

力,因为他领导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政府。本来,克拉伊盖尔是肯定会成为一个比较得力的主席的。但什皮利亚克出任此职,实际上只是奉行公事而已,而这一任命原本要求他成为南斯拉夫自由竞争时代的卡尔文·柯立芝。^①

二十年来党内任免高级和中级官员,虽然表面上是通过投票决定,但实际上一直是由组织书记兰科维奇决定,这是他的特权。现在,这一权力已经完全由共和国机构掌握。这样,这些共和国机构的权力得到全面加强。同时,联邦机构的成员也就变效忠中央为效忠于各共和国委派他们职务的新的委任人和掌握他们工作命运的新主子,以及这些新的委任人正在实行的各自为政而又经常互相分歧的政策。由此产生的后果,关系到联邦一级的党政机构中担任第一流和第二流职务的人员的质量问题。被委派到联邦一级机构去任职的人都有临时观念,总想早晚要回共和国工作。离开了基层,去制订和执行那些选民总不能一直完全满意的决议和政策,有许多明显的不利之处,而在基层才能有真正的作为,才能找到真心实意支持他的选民。一位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委员、社会学家,在1969年被调到联邦党的机构中任职。他在谈到上述思想情况对于一个早已无能的联邦行政机构所产生的影响时说:

联邦行政机构的工作质量不断下降。杰出的人材到联邦工作都是违背自己意愿的,他们向往到一些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去工作,这样的权力中心在各共和国里越来越多。甚至配备联邦政府的一套干部都有困难,因为各共和国通常只派二流人

^① 卡尔文·柯立芝是美国第三十届总统(1923—1929年),曾主张商业和企业自由发展。——译者

物到联邦政府去工作。

随着组织和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央党政权力不断受到侵蚀。这些变化，既是主要权力已实现转移的象征和结果，同时也加快了权力转移的速度。变化之一是，1967年秋季决定在下一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之前（而不是之后）举行共和国党代表大会。以往，联邦的党代表大会总是首先召开，决定党中央机构人选，并制订政策，以便让随后召开的共和国党代表大会接受下来，并使之适合地方情况。现在却反了过来。共和国党将各自制订自己的政纲，委任自己的官员，包括在中央机构任职的代表。这些人选只需随后举行的联邦党代表大会批准即可。

1968年12月颁布的十三项追加修正案，又对1963年宪法中有关国家的部分作了意义重大的修订，这证实了1967年修正案所表明的发展趋势。联邦议会的联邦院被废除，它的职能和其他作用都转交给完全独立的民族院（其中有二十名代表来自各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十名代表来自各个自治省议会）。民族院现已成为贝尔格莱德议会中最有权力的议院。修正案明确规定，议员们必须忠实地代表委派他们的议会的观点。联邦议会的立法权限受到限制，它制订税收的权力现已明确地限制于制订资本税、流通税和（“如系保障市场统一，避免或消灭市场混乱所必需”）为下级政府确定各自的税额规定界限。结果，共和国议会的立法权限随之扩大。其他几项修正案重新规定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自治省的性质、起源和权限，使他们除了名称以外，在绝大多数方面都与共和国平等，把原来只有“南斯拉夫各民族”才享有的一切权力扩大到所有少数民族。这样，就确立了南斯拉夫人的至高无上的“民

族和少数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联邦概念，这些共和国和自治省是被看作民族邦的。

拥有一百二十名议员的社会政治院代替了由官僚和管理人员所组成的奇怪的机构——旧的组织政治院。这一百二十名议员是通过成年人的普选直接从选区里选举出来的，每个选区只派一名议员。目前这样做，就明确地拒绝了卡达尔的意见（他不赞成保留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残余”），也是向那些极力主张所有议会的议院应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直接选举的人做出的妥协。当克罗地亚议会坚决地修订它的共和国宪法，要求它的五个议院中的四个进行直接选举时，这些人主要集中在何处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修正案中有一项涉及企业里的自治组织，而且对于那些进行 1965 年改革的人们来说，还忠实地反映出提高技术和管理效率的持续重要性。管理委员会是非强制性的；一个企业的“管理机构”的形式和人员组成现在可由每个企业自己决定。企业还有权把“具体执行权”授予经由工人委员会挑选的并对工人委员会负责的个人或团体。这样，就可以建立由专业上合格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其他训练有素的专家，并且可以“授权”给他们，让他们有效地管理企业，不受非专业人员的干扰，但他们最终需对工人委员会也就是对集体正式负责。然而，这个办法及其制订者后来因“反对自治、主张专家挂帅”的罪名而遭谴责，但正是那时，这一变革的重要性才显示出来。

第二批修正案通过之前，也就是在接近 1969 年选举的时候，自由派政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受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愈来愈多而有时是十分激烈的批评。这些人当中，有贝尔格莱德大

学的学生，他们于 1968 年 6 月发动全国性学生罢课，第一次严重地冲击了自由派的联盟；1968 年 11 月还有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到布里斯蒂那的大街上游行。这是对当权者提出了最尖锐、最直接的挑战。他们这些人和人们对他们的反应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象征和预兆着有三种反对势力正在寻求自己的联盟，即：“手腕强硬的保守主义”，带有各种色彩和怀有不同目的的民族主义，以及“新左派”，后者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化，对此深感厌恶。

关于经济学家、学生和“地下政治力量”

1967 年的最后几个月，当意识形态的辩论还在进行的时候，南斯拉夫两位主要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突然引起了一场新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如 1965 年的改革、改革者的才能及其文化水平、批评的动机和后果等。接着展开的辩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本身的范围。

这场新的讨论是这样开始的：贝尔格莱德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长霍尔瓦特于 9 月在萨格勒布的《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南斯拉夫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或者缺乏关系）。文章指出，如果南斯拉夫的政策制订者能够在当代经济学方面，特别是在西方的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方面受到较好的教育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时间进行改革，同时更有效地消除他们自己的“停停走走”的政策所造成和加剧的经济增长率摇摆不定的现象的。六个星期之后，《信使报》又发表了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教授巴伊特的一系列文章。他赞同霍尔瓦特的绝大部分分析，

但他担心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抱悲观态度，再加上人民和政府一直对市场经济的真正作用及怎样能控制它一无所知，很可能导致反对 1965 年改革的原则，而不是略作修改来进行适当的控制。同一个星期，《信使报》的另一个喉舌，发行面很广的周刊《星期三信使报》发表了霍尔瓦特写的另一篇更为惹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经济增长减慢的代价》。这位贝尔格莱德的经济学家用通俗易懂的、惊人的统计数字，充分阐明了他以前的观点。他计算出，在过去的三年中，由于经济停滞不前，生产上的损失高达七万二千亿旧第纳尔，或者相当于 1966 年的全部产值。他认为经济停滞不前，在理论上本是可以避免的。

这两位经济学家虽然对具体的改革措施持批评的态度，但他们谁也没有批评过合理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基本优点。这两个人的调子和目的显然是“支持改革”的。然而他们在文章中严厉抨击了改革者的能力。尤其是发表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星期三信使报》上的那篇文章，语言通俗生动，够得上是一篇破坏人民信念的危险宣传品，因为这两位受人尊重的权威实际上在告诫人们，他们为改革做出的努力已被引入歧途，他们为之作出的牺牲如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是不必要的，这些都应归罪于最高领导层的无知和管理不当。这两位经济学家和《信使报》与《星期三信使报》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连串的攻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批评性文章在公众舆论和人民思想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攻击这两位经济学家和《信使报》以及《星期三信使报》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战斗报》或《世界周报》上（《世界周报》是《战斗报》社出版的一份发行面很广的期刊），同时也发表在《经济政策》上，这最后一种刊物通常被

认为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忠实喉舌。《战斗报》的评论员对起“涣散和降低士气”作用的批评到底为什么样的“客观利益”服务提出质疑，因为这些批评“不负责任地”指责国家领导人“不懂科学，外行，迷信专家，并且无能”，因而推行了“灾难性的政策”。姑且不谈写这些批评性文章的教授们的动机，就是一些编辑的“主观”动机也令人怀疑。一个作者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诘问：巴伊特在卢布尔雅那，而霍尔瓦特在贝尔格莱德，可是为什么他们所有的批评文章都在萨格勒布发表呢？于是，一场在经济学家和政界人物之间进行的辩论就变成了《战斗报》和《信使报》报社之间进行的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的笔战。这两家出版社一向被看做是拥护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各自的种族中心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观点的。

当这场辩论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党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11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八次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改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在讨论中，特别提到了霍尔瓦特和巴伊特对党的批评。全会通过了一个多少有些自我辩护性的决议。决议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将一如既往地根据进步社会思想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与新发现来制订自己的政策和进行实践”。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同打着‘科学性’旗号，推行保守的、官僚主义的、主张中央经济统制的社会发展观念的任何企图进行斗争”。

中央委员会宣布，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许多企业和部门中树立了“经济观点”，使之在适应更加自由、更富于竞争性的市场压力方面获得了成功。同时也承认，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和缺陷。由于税收的日益增加、新的庞大的投资计划的制订和对银行实行政治控制的残余影响太

多,投资转向消费和根据“经济本身”的需要制订政策的过程已经停滞不前。现有工厂的现代化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没有按计划完成;缺乏流动资金,失业,特别是有知识的干部找不到工作,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另外,某些部门中把个人收入提得“过高”,也是令人关切的问题。这些部门有“银行、议院、电力工业、外贸和批发业、商业公司、保险公司、住房建筑企业、贸易代理商、彩票业以及一些体育俱乐部等”——这是一张很重要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克罗地亚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手新中央集权主义者这两派的主要攻击目标。中央委员会还承认,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各联邦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难于取得“一致意见”。

尽管中央委员会含蓄地承认了两位教授对党的批评有些道理,但是全会的讨论和决议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而且对这种批评是不服气的。显然,中央委员会并无后退的打算,对于经过一定困难达到自由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也没有动摇。国家必须进一步减少对于经济的干涉。至于这样一些人,如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或者担心专家挂帅、大企业和社会主义联合企业会危害自治或党的控制的党内“保守分子”,全会的决议中没有提到,但是对他们的忧虑却作了尖锐的答复:

共产党员在劳动组织中,将为建立自治关系,为造成一种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进取心和对专业工作的责任感的气氛而斗争。

学 生 造 反

那些为全会定调子的人表现出一种自满情绪。然而,经

济的严重衰退、最近进行的选举、民族主义的“事件”，以及报纸越来越大胆地不断报道有关“社会差别”和“地下政治力量”的增长等消息，都表现出国内的一种情绪，这与全会上的自鸣得意形成鲜明对照。直到那批从来没有给政府找过大麻烦的人采取了行动才使当局大为吃惊。这些人是大学生，他们在这一代人中原来一直相当消极，常常因为不关心政治而受到党的发言人的责难。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一事实和政府对此作出的各种反应既重要，也说明问题。

在1968年6月的爆炸性事件发生之前，有一段时间里，传统上一贯冷淡的南斯拉夫年轻人似乎按捺不住，也要搞当时在国际上流行的行动主义和抗议活动了。干柴已经堆起，一点即燃。构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党内意识形态混乱，东欧和西欧又发生思想骚动；政府极力鼓励群众搞政治，从而导致了日益公开的辩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城市中心地区有效地参加政治活动现在看来已有可能；报纸上广泛地讨论经济衰退和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影响学生的是大学过于拥挤，住房条件差，奖学金额子太少，尤其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限，以及“几代人之间的冲突”（尽管有人极力否认在南斯拉夫存在这种“冲突”，结果却反而弄得人人皆知），而且电视上又经常播送其他国家年轻人造反的消息。

春季里已有一些迹象表明，学生和其他年轻人很不满，而且他们正在说出他们的不满。在4月和5月，全国各地的学生团体聚集到一起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又一次批评了使少数人发财、失业人数增加以及工人和技术员不得不迁居国外的改革。5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

举行的讨论会上，现在名声已被搞坏了的“人道主义知识界”的教授们发表讲话。其中一位教授给学生出主意，要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大学，一个批判的、进步的大学”。他还说，“改造大学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要求之间仅一步之差”。他说，学生应该富有批判精神，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出批评“有时会与反对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傍晚，贝尔格莱德学生和青年志愿旅的工人为观看一场免费的杂耍表演在街上打了起来，这个平常的事件成了导火线。城市防暴警察粗暴地加以干涉，激起了学生的大规模反抗，结果很快就变成政治性的暴动。第二天下午，警察和大约四千名参加游行的学生之间发生了两次严重冲突。游行的学生手持标语牌，提出许多政治要求。在第二次冲突中，警察大打出手，至少重伤一百六十九人，急需治疗，其中有的人还是受的枪伤。

到那时为止，学生的暴动和官方采取的行动与在欧洲和北美的大学城里发生的事件很相似。但是当学生与警察发生第二次冲突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学生运动波及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但是无论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其他大学所在的城市里，再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行动。相反，学生和政府都表示愿意停止对抗，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对话。贝尔格莱德学生和支持者们由街头示威转为秩序井然的静坐示威，并在校内举行长时间的讨论。这样持续了五天，地方当局和塞尔维亚当局曾有一时似乎要向那些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人屈服了。这时，铁托亲自进行干预。他发表了一篇颇有戏剧性的电视演说，明显地站在学生一边，还要他的部长们检查以前的政策，示威在欢乐的气

氛中结束了，学生们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跳起了科洛舞。

1968年6月的学生示威运动具有广泛的意义。首先，它标志着学生已成为南斯拉夫政治天平上的一个新的砝码。这个因素本身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但是示威运动的纲领相当充分地显示出南斯拉夫有知识的新一代的价值准则和态度。他们是完全在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第二，这场运动是自发性的，它非常克制地拒绝了反社会主义的口号，而且也确实影响了当局的政策。这场自发性的运动说明政治上的首创精神不但可以来自上层，而且也可以来自下层。它反过来又加速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局内部的两极分化，即有的人愿意承认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运动，而有的人却不愿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起重视的是，大学里的某些党的官员和上级党组织中支持他们的人，没有采用“行政手段”（他们有时也使用行政手段，但总是违心的）就成功地掌握了学生的示威运动，随后又使之消散和瓦解。

贝尔格莱德学生的纲领在一个星期的罢课中演变得更加明确和有节制，而且注意到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接受、政治上又行得通的限度。但即使如此，纲领的最后文稿中仍然保留了学生们在示威的第一天所提出的要求和口号中的基本要点。这些要求和口号曾贴在大学建筑物墙上马克思和铁托像的旁边，它们集中体现了学生们自己所特有的、自发的态度：“工人们，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们的要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罢免无能的政客！”“让我们走向明天，抛弃那些毁灭了昨天的人！”“杜绝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者，不要你们管工人的事！”“我们不要失业！”“打倒

社会主义的新王子们！”“打倒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要做真正的人，不要第纳尔！”“多盖学校，少买汽车！”“新闻报道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自由！”在被封锁了的大学建筑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根据马雅可夫斯基一首诗的主题为学生运动谱写的一支歌曲抓住了与会者的心：

我们从书本上知道我们的父辈是勇敢的人，
他们的梦想温暖着我的心，
可是我们今天和将来所关心的是：
向左！向左！向左！

尽管国际上的“新左派”和南斯拉夫哲学界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其明显，但有一点曾经而且可能还会引起争论，即许多特殊的要求（例如立即充分就业）只能依靠重新恢复准斯大林主义的指令经济才能实现；所以，学生的示威运动对斯大林分子或“地下政治力量”中的“兰科维奇分子”有利。然而，主要的影响显然是学生运动接受了南共联盟的正式纲领以及党最近对社会和政治现状的批判。至少南斯拉夫革命青年中的学生领袖显然已经吸收了其中一些理想和想法，并开始认真对待它们。罢课期间，还有一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即通常在口号、要求和讲演中大量出现的种族主义内容却明显地不见了，至少在贝尔格莱德大学里是这样。这可能是南斯拉夫建国以来的五十年中，种族主义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第一次没有起作用。

人们都认为这是场危机。面对这种局势，有关官员不得

不更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一些起初在市一级的党组织、社会主义联盟和议会会议上直言不讳的人，清楚地感到应该镇压这场危险的运动。可是其他人都认为这场运动是有益的，因为青年人的热情、理想和学生们具体要求可能被引导到有用的方面来，以便去实现已经宣告的改革和理想。而且在引导的过程中，还可以把新的一代人完全结合到现行的制度中来。他们认为，其他的途径只能使新的一代人完全脱离今天国内的社会，就象在外国发生的那样。后来进行政治总结时，正如一个参与者所说的：双方都记得“在那人人亮相的时刻，谁站在哪一边”。

尽管双方意见分歧，可是在罢课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似乎双方都同意而且都坚持的策略（只有在铁托于周末参加进来之前曾一度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策略就是双管齐下，而且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情况为我们揭示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治新风格的内幕。

首先，为了把学生和工人隔离开来，避免发生大规模罢工（仅在一个月以前，法国就发生了一场总罢工），当局禁止在大学外面搞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全国各地工厂中的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它们在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学生们称之为歪曲学生运动目的的“谎言”），召集工人开会，照章办事地通过相似得令人怀疑的信件和决议。这些信和决议避而不谈更大的政治问题，一面同意学生们关于改善生活条件和改革大学的“物质要求”，一面却又谴责学生的斗争方式，并提醒他们，将来不得不交付提高了的教育费用的是工人们。被派到贝尔格莱德地区工厂去的学生代表，除了少数人以外，全部被拒之门外。当时还组织了一些“工人护卫队”把“挑衅者”和“颠覆分

子” 轰走。(铁托后来在星期天的电视中讲话中含蓄地说, 当局的确害怕罢课会发展到工业部门去。他说, 工人们要抱怨的东西比学生还多, 而且“当一些官员想到工人阶级要是也采取损害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关系的行动将会引起什么后果的时候, 就吓得惊慌失措”。)

其次, 要想使那些主张实行“强硬手段”的人态度缓和下来, 就必须设法使学生运动接受官方同意的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框。大学里的大部分党员有的出自本能, 有的经过仔细考虑, 都很快地承认(也有的人只是暂时承认)学生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支持学生的示威活动, 也和学生们一样, 对于警察的行为, 对于报刊的宣传和国家没有实现宣布过的目标而感到愤慨。学生运动领袖的老练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贞受到称赞, 因为他们的纲领据称是符合南共联盟的纲领的。他们赞成把运动局限于一定的界限之内, 这在兰科维奇倒台之后的政治气氛中还是合法的, 可以接受的。学生会和大学党委会等机构也帮助引导学生运动。它们连续几个月一直劝诱“温和”的学生和职工, 孤立“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大部分都是哲学系的), 以便分裂和瓦解学生运动。

这样,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共产党员中, 就有那么一批值得重视的人物, 他们在共和国党组织中某些人的支持下的所作所为, 说也奇怪完全符合当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理论对他们的要求, 而且取得成功。他们不是通过手中的权力(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 他们作为少数派, 还暂时没有这种权力), 而是运用说服和操纵的方法, 决定性地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一成功的原因值得研究, 因为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官方理论所没有抛弃的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仅有的一些传统优点, 即组织上的

垄断和思想上的相对一贯性。大学里仅有的组织要么是党委会，不然也是由党来控制的。它们的唯一对手是学生行动委员会。学生行动委员会是在学生运动爆发的最初两天里自发产生的，其成员不断变换，因为他们要防止任何一个集团控制他们的委员会，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虽然这些学生行动委员会在最初阶段还被允许存在，但是不久就受到压力，要它们在第一个周末之前解散。党内老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理解学生行动委员会的潜在意义，因此那些行动委员会的继续存在便成为第二周辩论的中心问题。

另外，在这种充满莫名其妙的愤慨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不满的气氛中，“官方”的大学组织已准备好了一套现成的批评意见和要求，作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内容。这些要求恰巧是南共联盟的纲领中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其中有人民充分参政的民主、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行使反对官僚主义的权利等。除了那些偏见极深的人以外，这些要求对于任何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少数学生和教师认为这是涣散学生运动的诡计，但是他们被孤立起来了。由于缺乏组织，也没有一个一致的针锋相对的纲领，他们在政治上就无能为力了。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上层机构很惊慌，匆忙地采取行动。执行委员会和党的主席团急忙于6月9日召开会议。接着，铁托在电视上向学生和全国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就象一个宽宏大量而又严厉的老祖父绝妙的炉边谈话。他要求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他说，党的最高领导自从3月中旬以来已在紧急地考虑累积起来的经济和自治问题，尽管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已指定一个党的委员会于6月中旬以前提出解决方案。但是，目前“事态的发展比我们预

料的要快”，当务之急显然是立即采取行动来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把那些故意捣乱的人驱逐出党，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行动准则的人实行纪律制裁，并帮助那些收入低的工人，因为正是他们一直肩负着经济改革中最沉重的担子。以上这些行动该能满足学生们的“正当”要求。铁托还宣称，学生们的要求正是他个人力图要实行的事情，试图以此把学生争取过来（他暂时成功了）。他说：

学生们看到我经常提出这些问题，可是总解决不了——这就是发生这次反抗的部分原因。现在我向学生们保证，我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大声疾呼，学生们也应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辞职。

在这个周末，被委派提出解决方案的党的委员会匆忙写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首要任务的指导方针》，并予以发表。7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研究这些首要任务的指导方针，以及学生的罢课运动，并批准关于党的改组问题的进一步建议，这些建议要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推迟到1969年初。党中央的第九次全体会议还成为官方发表权威意见的讲台，表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权的深切同情，并警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干涉。

《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首要任务的指导方针》和九中全会，并没有偏离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既定目标，也没有忘记把“客观”存在的弱点和自治的敌人罗列进去。《方针》和全会都试图详尽地论述南斯拉夫所有

的经济问题,但总是不具体,这说明没有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然而还是进行了一些细小的调整,表明改革派已开始认真考虑普遍的异议和党内的批评。八中全会曾为自由竞争辩护,可是《方针》却不然,它承认必须改革税收制度和其他经济手段,以便国家能对市场发挥某些纠正作用,尽管他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的。他们建议“自治者”之间要进行直接的、多边的协商以达成协议,来解决诸如就业、收入分配、价格和社会服务等问题。这样,国家就无需再对这些方面多加干预。(这是引起另外一种主张的萌芽,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正式的制度,即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合同”决定政策的制度,载入了1971年宪法修正案和后来的1974年宪法。)但是,要是必需国家进行控制,以防止通过非法活动或不完善的竞争“发横财”的话,那末平均主义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看来有些学生是要求这样搞的。《方针》和全会甚至敢于把悬殊的工资差距(如果这些差距反映了技术的高低、生产率的差别或市场价值的不同)也说成是有益处的,而不仅仅是“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方针》和托多罗维奇在全会上的主要讲话都反复谈到贝尔格莱德学生罢课的意义,认为学生罢课总的说来是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铁托曾在电视讲话中赞扬学生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可是还没过三个星期,他就在6月26日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出了要对学生运动作严肃分析的信号。他说,他现在仍然信守当时说过的话,但是希望再详细谈谈他当时顺便提到的那些企图渗入大学里去的“异己分子”。这些各谋私利、思想不同的“异己分子”,“今天似乎已经

联合起来”，而且“想要合伙在我们的国家里制造混乱，混水摸鱼”。托多罗维奇说，所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正在利用学生运动。他列举出如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来自流亡者中心的反革命集团，阶级敌人的残渣余孽，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中央集权制的拥护者，兰科维奇分子，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其他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假自由主义者，等等。”这些势力清楚地知道，学生运动中的批判性言论（这些言论引用了某些教授的观点，他们把当今的南斯拉夫政策说成是“一条导致在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丧失人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代表一股诋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潮流，起到一般反动派和斯大林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

《方针》的作者和全会的组织者似乎曾经希望：通过非常坦率地承认过去的失败和对将来要干得好些许下琐细而又模糊的诺言，以及为此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再加上1968年年中主要经济指标回升的迹象日益明显的情况，将会使人感到当局采取了行动，从而使政治气氛平息下来。事实上，仅仅承认失败而不采取认真的补救措施，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况且政策没有改变，只是强压怒火，决心要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看做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敌人。学生和教授们对此深感苦恼是颇有道理的。他们曾持温和的态度，而且准备进行对话，不搞暴力冲突。铁托也曾对他们表示同情，还许下了令人满意的诺言。然而这一切似乎都被无情地出卖了。令人满意的诺言只不过是个诡计，其目的是在开始反对这些人之前就把他们分散，让他们去过暑假。到7月底，观察家们即预言，当高等院校在秋天开始新学年时，校园里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斗争。

然而，1968年8月21日，苏联及其他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又打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旗号宣称，只要苏联领导人认为任何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危害，苏联就有权对这些国家进行干涉，这对南斯拉夫构成很大威胁。因此也就使批评者暂时沉静下来，并改变了他们和政府对世界和本国形势的看法。一个数目字概括说明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在1968年，大约有十万名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加入了南共联盟，几乎使这样年龄的党员增加了一倍。他们绝大多数是在8月21日以后加入的。

捷克斯洛伐克的冲击

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发言人，以及所有有发言权的公民，除最顽固守旧的反共分子或新斯大林分子外，对于杜布切克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头七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反复表示了他们的热情支持。报纸和电台广泛地、满怀同情地报道了杜布切克的“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而布拉格的大部分报道则反映出这个国家正在探索与南斯拉夫最近取得的经验相似的东西（有些相似点是真实的，有些只是出于主观的臆想），特别是有关这两个国家里“保守的”和“进步的”共产党势力之间斗争的经验。人们指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象南斯拉夫人一样，已开始对陈旧的经济制度进行必要的、自由化的改革，并发现新经济模式需要“民主化”的政治生活，也需要党发挥一种新的作用。他们正在努力清除党内那些继续与他们作对、并企图破坏这一新进程的人。他们还发

现另一点与南斯拉夫相似的地方，即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和“技术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求自由化，这种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要“恢复”或“复活”捷克斯洛伐克 1948 年以前的民主传统，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具有真正民主传统而且唯一工业发达的共产党国家，竟然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多年来一直令人深感失望。

1968 年 4 月底，铁托访问了莫斯科，当时也讨论到了布拉格的形势和苏联对那里事态发展的日益不安。苏联 8 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铁托透露说，他曾在那次会谈中警告过俄国人，“切勿使用任何武力，因为这样会造成灾难性的局势”。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夏季召开一系列会议，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就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一个星期，铁托和罗马尼亚总统、党的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还相继访问布拉格。西方评论家们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协约国又复活了，这个联盟曾把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以保卫他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当时是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威胁，而今天是反抗新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威胁。由于苏联的态度明显地日益强硬起来，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具有潜在的危險性。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后来承认，除了在 7 月，即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切尔纳开会的前几天，他们确实感到过不安外，他们根本没想到苏联会突然进行军事干涉。就象杜布切克和许多西方观察家那样，南斯拉夫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两个因素上，他们相信这两个因素足以防止武力解决。第一个因素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曾苦心孤诣地避免重犯纳吉政府 1956 年在匈牙利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曾导致俄国

人的干涉；第二个因素是，人们认为苏联政权本身的演变已使它远离斯大林主义，而且由于它极为重视自己对一些重要的不参加集团的共产党还保留着的那点影响，加之它十分关心东、西方缓和，因而不敢采取武装干涉的行动。南斯拉夫人认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军队沿着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调动，只不过是恐吓，向布拉格政府施加新的压力而已。

8月21日，苏联的武装入侵使南斯拉夫大为震惊，而且这一入侵是在假日中发生的。正在休假的南斯拉夫党的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立即乘喷气式飞机、直升飞机和快艇赶回，参加在铁托的休养地布里俄尼岛上举行的紧急会议。在那里，他们发表声明，谴责华沙条约五个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谴责它们动用军队“践踏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全体会议，听取铁托的讲话——他刚刚同齐奥塞斯库在南、罗边境上紧急会晤后回来。他宣称，如果现在南斯拉夫自己的独立受到威胁，“我们知道怎样使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它，不管威胁来自何方”。铁托把这次入侵——它旨在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的演变”，并防止这一演变“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斯大林的反南斯拉夫运动相提并论。他说，“光荣的无产阶级红旗在1948年曾一度被玷污过，但我们已经竭力除掉它上面的污垢。现在，这面红旗又落下来了。我们能否尽快地把它洗刷干净，还是个问题。”

10月中旬，南斯拉夫相应地制订出一个战略方针，以抵御来自东方的新威胁。这说明南斯拉夫仔细地考虑了俄国人可能施加的种种压力，并决心顶住每一个压力。

首先，俄国人由于西方对这次入侵事件的反应温和，同时

鉴于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以及在使主要西欧共产党同自己关系更加疏远方面已经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很可能在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索性使用军事手段一举干掉东欧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国家。因此，有必要让俄国人清楚地了解，南斯拉夫人民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一样，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侵略，他们将进行长期的英勇斗争。南斯拉夫各阶层都发表了强硬的声明，并得到群众大会的坚决支持。南斯拉夫的一些预备役军人也被召集起来，侵略者可能经过的暴露的道路上埋下了地雷，还把准军事性的青年志愿旅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除了这些紧急的防御措施以外，南斯拉夫政府又大幅度地改变和调整了国防设施和战略。联邦议会匆忙通过了一项“全民防御”的法令。据南斯拉夫人说，这项法令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试图对游击战术进行整理，并制订相应的制度，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基本战略防御思想。根据这个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六十五岁的南斯拉夫人都负有战斗使命：他们将在正规部队和民防系统中作战，并在前线抵抗后可能失守的城市里组成小股部队对占领城市的敌人进行骚扰和破坏，或者在山里的游击队以及支援游击队的乡村组织中参加战斗。总而言之，南斯拉夫警告俄国人，如果他们动用军队的话，南斯拉夫就是第二个越南。

苏联的第二种选择是，恢复东欧集团的经济制裁。即使不恢复1948年至1954年那样的全面封锁，也要象1958年至1960年那样，实行有限的制裁。南斯拉夫人于是在两条战线上采取对策。他们向莫斯科接连发出信号，表明尽管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关系恶化了，他们仍希望与东欧保持正常的经济

关系,并希望扩大这种关系。作为一种预备性的措施,他们努力加快与西方进行贸易和信贷,特别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一项商业协定(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制订了向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新方针。

第三,在思想和宣传战线上,他们拒绝了在与苏联集团的论战中主张采取低姿态的谨慎派的意见,而决定坚决回击。当苏联报刊称他们为“修正主义分子”甚至“资本家”,并且用诽谤的腔调报道南斯拉夫日益严重的失业、不平等和改革遭到的失败时,南斯拉夫报刊也把苏联的经济贬低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客观地报道苏联集团内部生活水平的差别和工资差别的悬殊。这样的报道还是五十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铁托本人也谈到,正当东欧集团肆意谴责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的时候,他们国家的人民只要弄得到一张护照就纷纷涌向南斯拉夫,购买这个国家的经济所生产的生活用品,这些商品经济实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非他们自己的产品可比。东欧集团的报刊把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称为工团主义,并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缩小自己作用的做法说成是危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列宁主义的行为。这时,南斯拉夫人就又重新采用1950年至1952年的分析,把苏联政治制度说成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主义,并发表文章说在东欧集团里令人窒息地缺乏个人和企业的自由。

第四,南斯拉夫还采取预防措施,监视并压制国内的一些集团和个人的活动。这些集团和个人出自不同的动机,可能要利用苏联的压力,或者让苏联利用,以便污蔑南斯拉夫的改革是“修正主义的”,并从内部推翻改革派。

后来，人们清楚地看到，在1968年秋天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后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即使不是全无道理，也是过于夸大了事态。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国家关系和两党关系也先后在逐渐正常化。但是，这些预防措施的最后项仍然保留在议事日程上，同时“全民防御”的战略也有了更为明确的“全面”发展。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的持久影响又恢复了许多或大部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动机的疑惧。他们认为，苏联的动机似乎比几个月之前使他们忧虑的美国可能发动的帝国主义进攻更具有威胁性。

南斯拉夫的“地下政治力量”从困难的经济状况、1966年7月以来塞尔维亚人地位的降低和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过分要求”中汲取了力量。如果俄国人依然是重又对南斯拉夫心怀叵测，那末他们无论是在短时期内施加压力还是对铁托身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进行长期盘算，难道不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把“地下政治力量”变成一个南斯拉夫的苏联共产党？在“地下政治力量”的政纲和混乱不堪的哲学中，不是有许多东西有助于苏联的这个策略吗？例如，保守派急于想建立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党，不发达地区盼望恢复由中央统一计划的指令式经济的分配办法，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传统的亲俄主义，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厌恶消费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和腐败。这些恰恰是苏联集团的报刊在新的论战中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靶子。这场新的论战是在南斯拉夫谴责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开始的。

人们得出了某些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结论正符合那些希望得出这些结论的人的心意。笔者于1969年采访塞尔维亚党的执行委员会新任书记佩罗维奇时，把她现在对贝尔格莱

德学生运动的批评与她在 1968 年 6 月的讲话中对学生运动一般的赞许做了对比。她回答说：那不过是我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前说的话，自从去年 8 月以后，我们就必须重新来看这些问题了。必须知道，“政治保守主义”的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在大学里和南共联盟中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在南斯拉夫过去的革命年代中人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现在依然存在。“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苏联制度的性质，而不在于什么‘个人迷信’——而且我们不能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就不存在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条件！”

她的这种判断及其所含有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思想，代表了在 1968 年 12 月塞尔维亚党代会上巩固了自己地位的那些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兰科维奇倒台和自由派占优势后他们在其他共和国首都中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的思想，特别是在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斯科普里。她对“当前的阶段”作了进一步估价，把它描绘成“一个在社会主义联盟的格局内向政治上的多元化发展的矛盾交织的制度”，她的这个估计具有同样的典型意义，也很说明问题。例如在 1969 年的选举中，人们看到再也没有一个决策中心了。问题是，南斯拉夫人能否接受“我们在思想领域里开展自由斗争”（这也牵涉到不同利益的斗争）和“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以后开展理论斗争”的后果。看来还得要有较大的耐心去进行探索，当事情发展到“采取政治行动会使我们分裂的时候”，如果要避免捷克斯洛伐克式的解决，南共联盟就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行事。“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因素：南共联盟在组织上和决策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但它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且始终如一地为之奋斗。”

这样的说法完整地概括了改革派联盟中共产党辉格派的力量、弱点和基本的矛盾心理。其力量则包括他们的决心和至少在策略上的始终如一。这些都来源于一种深刻的、真诚的信念，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须不断发展地实行人民参政的民主，来自对那些反对向群众开放的政治力量的动机和实力的准确估量，出于在实施一种比较开放的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方面比大多数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有更强的信心。他们的弱点是没有能充分地分析南共联盟从一个列宁主义干部党，亦即“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党”，转变成为六个结成联邦的、结构上民主、成员众多的核心组织的含义。自然，这六个核心组织要意识形态一致，从理论上来说具有“目标明确而奋斗不懈”的优点，并“在一个社会主义联盟的格局之内，在政治上多元化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如果这种努力能够成功，参照彼得·布劳在论述一个普通的群众性的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的说法，那就会完全取消南共联盟和其他根据各种社会利益集合而成的组织之间所残存的界限。至于下面分成六个部分的南共联盟，尽管还能在决策体系中起非同一般的作用——部分是由于它以前曾把绝大多数其他出类拔萃的人物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之内，部分是由于它在各机构之间具有一种普遍公认的能力——但它主要将成为各种职业的或种族利益的代表们相互竞争和交换意见的场所。这些代表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左右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

如果南共联盟就这样被降为一个中立的、不大涉及意识形态的市场，或者降为六个这样的市场的联合体，那末它作为一个纯洁的革命力量那种特有的和理想的作用还能剩下多少？它作为一种纯洁的革命力量，在理论上是不代表任何特

殊利益的，而在实践上对其他社会力量也只承担某些随意而定的最低限度的义务。

这样的考虑直接与实践有关，不管那些主张改革的政治家们对这一点看得多么不清楚，但这毕竟是他们内心矛盾的一个原因。鉴于党的教义称之为“地下政治力量”的势力及其思想发展的最新情况，并考虑到最近在党的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自治力量”的软弱和不成熟之处，如果先验主义地认为：上述这个过程所造成的整个复杂的政治形势，终究不会“使民主化的政策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或导致复辟国家官僚的专制主义或专家治国的专制主义”，那就太危险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概念和国家官僚的或专家治国的专制主义，正是 1968 年的《方针》所指出的威胁南斯拉夫实验的两大危险。如果这两者之一看来是实行多元化所得付出的代价的话，那末最终谁来维护南斯拉夫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那时他们又怎么办？

第七章 多元化的代价

不同政见的复活和克罗地亚的策略

南斯拉夫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一事中感受到外来的威胁,从而导致了国内政治气氛的平静,但这种局面如昙花一现,好景不长。正当官方和公众对于苏联的下一步打算依然感到极度不安的时候,第一场戏剧性突变就在新南斯拉夫正式诞生二十五周年、即1968年11月29日前夕爆发了。这一突变所采取的形式,是科索沃自治省的阿尔巴尼亚族的游行示威。这次范围广泛、看来组织良好、有时出现暴力行动的游行示威,恰巧发生在毗邻的阿尔巴尼亚自己的国庆节(11月27日),发生在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对少数民族问题异乎寻常地公开发表了一些意见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这是意味深长的。1966年7月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掌权的国家保安部被制服以后,阿尔巴尼亚族这个目前人口已近百万的迅速增长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在权利平等和人身安全方面情况已大为改善。然而,该民族政治上活跃的阶层对此并不感到满意,反而在这些方面提出更多要求,并要把他们那个地区改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这样一来,作为当地多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族实际上就会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①科索沃的游行示威及其在西马其顿引起的反响,无论从规模

上看，或者同历史上的大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主义联系起来看，都是令人震惊的。这还表明，民族问题重新成了南斯拉夫种种麻烦的焦点。巴卡里奇于1966年3月曾经预言，假如改革的斗争不能迅速获胜，民族主义会成为全国的“头号难题”。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自从围绕1967年3月的克罗地亚“宣言”和塞尔维亚“建议”的喧嚣发生以来的二十个月中，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说明民族问题仍然是症结所在。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大声疾呼，要求他们的语言在联邦一级享有更高的地位；所得结果包括1967年选举之后在联邦议会装置了同声翻译设备。1967年10月，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清洗了比较出名的委员之一、受人尊敬的萨格勒布前市长、克罗地亚政府成员霍列瓦茨。他被指控在领导克罗地亚侨民中心的工作中犯了“民族主义偏向”的错误。该中心是半官方机构，当时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温床。

在兰科维奇下台以后的塞尔维亚，“地下政治力量”的活动以及民族主义分子在里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似乎一度使得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回潮成了这条战线最为严重的问题。塞尔维亚党的领导（在1968年11月的党代大会以前，基本上仍然由兰科维奇时期遗留下来的只是相对坚定的分子所组成，而在1968年还由其中一员即前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塔姆博利奇担任领导），以毫不掩饰的极度敏感的态度作出了反

① 就这一次而论，没有迹象表明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政权同这场游行示威有什么瓜葛，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牵连。地拉那对苏联侵捷后的意图也感到忐忑不安，就在这时它放低了反南宣传的调子，暗示南、阿两国向来就是并肩对付共同敌人的。游行队伍中，新办的布里斯蒂那大学的学生再度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

应。在该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 1968 年 5 月的会议上，历史学家马尔扬诺维奇和作家乔西奇大胆批评了科索沃与伏伊伏丁那的阿尔巴尼亚族和马扎尔族的民族主义表现。他们说，在科索沃省，有人公然宣扬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在该省的塞尔维亚人则在现行就业政策上受到有组织的歧视。他们援引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从该省迁出的事实作为证明。在那里，南斯拉夫公民这一超民族意识不再受到鼓励（而为了更紧密地团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这一超民族意识是本应受到鼓励的），在人口调查或填写表格时自称“南斯拉夫人”则多方受到阻挠。对此，他们也表示关切。马尔扬诺维奇告诫说，在反对“一元化”的掩盖下，“官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或者地方主义的势力”，实际上正在鼓励他们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尽管这两人也批评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若干具体表现，他们还是被自己的同僚谴责为犯了“民族主义”和“反对自治”的错误。至于中央委员会并未清洗他们，那可能是因为距离塞尔维亚党代表大会只有六个月了，在代表大会上可以采取一种比较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把他们去掉，而这一点代表大会后来是做到了。从这两人过去和以后的活动记录看，他们是南斯拉夫的真正爱国者。他们所沾染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要比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僚轻得多。鉴于这一事实，对他们的谴责——甚至比对霍列瓦茨的做法还要明显——看起来是反对民族主义的热情过了头，或者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典型手法。

兰科维奇下台后的领导班子的所作所为，只有在制造分裂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加剧——具有公开表达这种情绪的更大自由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和各共和国之间关系紧张、发

生争吵这个背景上去理解。他们即使在 1968 年 6 月的学生罢课和工会代表大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要求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采取对策之后，还是竭尽全力顽强地坚持 1965 年改革的自由化精神。他们并不三心二意，而是专心致志于联邦的进一步改革，并使党进一步“联邦化”。他们之所以抓这两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仍然把“官僚集权主义”（这是一种针对联邦党政机构的称呼）的残存堡垒对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继续抵制视为难解之结，这个棘手的问题使所有其他问题都无法解决。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使这些堡垒终于无险可守了（办法是解除他们手中残存的经济武器，或者把从地区上和职能上讲都能代表多方面利益的代表充实到那些机构中去），准斯大林主义的、集权主义的和被公认是塞尔维亚人独揽大权的独裁主义复辟的危险才能消除。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国家才能再度在从联邦到公社的适当级别上，采取现代财政的而非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此作为企业之间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合同”所无法提供的稳定力量和纠正力量。正如一位持这一主张的塞尔维亚政界领导人物于 1969 年对笔者所说的：

我们并非如某些经济学家所暗示的那种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我们懂得该做什么，也懂得拖延不决的代价。但是，如果不把人民的思想打通，如果不把人们头脑中会使我们倒退的因素彻底肃清（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操之过急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这一点我们明白，但是他们不懂。

与此同时，大多数改革派相信，解开中央集权制残余这个难解之结，乃是最终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这种解决民

族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是 1943 年以来南斯拉夫联邦制所固有的那种以温和措施消除民族主义的政策的发展。在改革派的心目中,这种解决办法构成了一个更加开放、更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的前提,这种制度不会迅速堕落到毫无结果的民族争端中去。否则,集权专制势力对民族分离势力的镇压终将再度发生。由于他们还深深相信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上的原因消除之后,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和民族主义就会消失,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中央再也没有一个馅饼(无论是资金还是权势)可以争夺的话,在更加开放的政治舞台上难免会出现的民族主义分子,就不可能纠集到一批可观的追随者。

由于萨格勒布的巴卡里奇的门徒们的坚强个性,由于克罗地亚同一切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集权主义作斗争有着特殊的利益,以及克罗地亚人在草拟改革计划和推翻兰科维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明确地表达和广泛地宣传实现上述目标的政治策略所需要的领导力量必然来自克罗地亚,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改革成功,也应该如此,这一点在当时来说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只要克罗地亚反中央集权主义的领导人在塞尔维亚新领导班子中的志同道合的同僚还没有牢牢掌握该共和国的党组织(这在 1968 年 11 月才办到),只要这些塞尔维亚领导人还在为了控制该共和国的和地方的政权机构以及塞尔维亚的舆论而不得不同那些闷闷不乐地总是把兰科维奇的垮台视为塞尔维亚的耻辱的人们作斗争,那末也就只有这些克罗地亚改革派才能引人注目地博得如此广泛而团结的选民们的支持。其他几个共和国只好退居一旁,充当必要的助手角色。象往常一样,南斯拉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管他们是合作还是对抗。

克罗地亚领导人在 1967—1968 年期间的政治策略集中在两个目标上。

他们竭力主张党政机构进一步分散权力和“民主化”。这需要在四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一、通过修改宪法进一步削弱联邦中央（1967 年和 1968 年修正案只是朝这个方向跨出了头几步）；二、放宽“民主集中制”的尺度，使少数派的呼声得以上达；三、在直接进行的竞争性选举方面和企业盈利的分配方面提高普通公民的发言权（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减联邦税收和财政权力之后，企业盈余会有所增加）；四、清洗那些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照新的准则办事的老一代共产党员。克罗地亚领导人的部分论据肯定是以个人的和克罗地亚的政治利益为基础的。削弱民主集中制就会削弱联邦党中央对各共和国党中央的残存的控制权。同时，向群众开放权力可望加强年轻的、象他们自己那样的“现代的”共党政界人物的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如何为民请命，如何管理更加开放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一种策略，使得他们能够享有和利用给主张“一元化”的对手贴标签的种种好处，可以攻击对手思想保守，不求上进，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自治制度抱怀疑态度，对于“社会主义理想”能够通过“开放的、民主的政治对话和政治对抗”取得胜利抱着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

特里帕洛于 1968 年 1 月在里耶卡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这班人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累赘”，他们包括“对现行的一切看不顺眼……革命意志完全衰退的”老游击队员；让他们留在共产主义者联盟里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和另外一些仍然占据要津的人物，包括某些参与把兰科维奇赶下台的联合行动的人在内，在观点上同兰科维奇本人如出一辙。现在阻碍继续

前进的就是这一班人：

同志们，这个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对派也许连一个有名人物也拉不到自己的周围，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包括克罗地亚在内的所有的共和国里，有那么一个思想政治讲坛供这些势力使用，他们认为自治会使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崩溃，大家应该回到老的行政官僚和集权主义体制中去。

克罗地亚领导在追求涉及党政机构和干部的这样一些目标的同时，也使劲攻击联邦政府继续控制着大部分外汇（正如前面所述，这在克罗地亚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攻击设在首都的几家前联邦银行以及储存在这些银行保险柜里的前联邦基金（这是 1965 年改革中不曾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还攻击某些资金雄厚的外贸企业。这些企业是由改革以前塞尔维亚人掌权的联邦机构筹建，并提供资金和人员的。现在，这些企业还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着令人生畏的剥削权力。对此，除克罗地亚人有看法之外，许多人都有同感。他们的口号是“把原先的联邦资本联邦化”和“清算账目”，以便每个共和国可以看一看自己对联邦作出的贡献，并从联邦取得了什么，从而就将来应当提供多大贡献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决定。

在提出这些论据的时候，萨格勒布的领导人可以宣称，他们不单是在维护克罗地亚企业主和职工的利益，而且是在维护克罗地亚民族的利益。他们的斗争也是在维护所有“生产者”的利益。根据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理论，“生产者”应该支配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现在却正

被贝尔格莱德的官僚、贝尔格莱德的银行以及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的外贸企业伸出的触手所“攫取”。

隐藏在这条攻击线背后的是其他民族上和历史上的考虑。凡是影射过时、集权、专制，统统都用“贝尔格莱德”这个字眼，因为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的首都。臭名远扬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在战前的南斯拉夫曾统治并残酷剥削更为富裕、更有文化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近来，塞尔维亚又曾试图通过兰科维奇以及塞尔维亚人独揽大权的党和警察的官僚体制重演故技。那班塞尔维亚政客，从教养上说是粗野无知的，从所受的训练来说是手腕强硬的，因而是些“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或者至少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塞尔维亚称王称霸，剥削成性，专横跋扈，这是为什么克罗地亚还没有象丹麦……那样富裕而民主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唯一的原因）。克罗地亚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一是社会主义的。早在1967年，在语言危机前后，新的领导对这样一个指责就显得很敏感：即他们以权力分散为号召向群众实行开放的方针是在玩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

南共联盟纲领和克罗地亚的民族利益都要求“权力分散，取消国家控制，非政治化和民主化”。这里没有矛盾。克罗地亚群众的热情支持就更进一步证明（如果需要什么证明的话）他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当然，所谓群众，也象在任何社会里一样，指的是能够明确无误地表示其感情的少数有政治发言权的人。在其他共和国和地区，克罗地亚人的为数众多的同盟者也是如此；斯洛文尼亚人从经济利益上反对集权制，这同克罗地亚人是不谋而合的；对马其顿人来说，他们的防御性的新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塞尔维亚霸权的恐惧，比起这个不

发达地区从中央集权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得到的财政上的好处,关系更为重大;还有其他同盟者,甚至在塞尔维亚的新领导中也有由于自身利益或意识形态的信念而反对集权制的。由于在本共和国和联邦的其他地方拥有这样巨大的力量,由于自信心的不断提高,巴卡里奇的门徒们不屈不挠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权力真空所造成的瘫痪

反对中央集权的地区领导人所制订的策略,只要对于南斯拉夫有没有一个能够应付重大事件的中央政权不大在乎,那末这个策略就是可行的。遗憾的是,适合他们要求的条件如过眼云烟,其存在的时间大体上同什皮利亚克那个“无所事事”的联邦执行委员会的任期相终始;即使在那时,也还是把希望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即改革后的衰退能够度过,既不会发生巨大的风波,也不会遭受国家的干预。最后挫败改革派意图的是,原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那种需要坚决予以处置的全局性的经济问题愈来愈严重,无法等待他们从容完成其使命。当他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1969年选举之后什皮利亚克之被撤换,表明了这种认识),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只取得了局部而非完全的成功,而这一特定情况将妨碍他们自己或者别人进一步采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

1968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生产上的回升正在继续。从1968年到1971年这四年的社会总产值再次达到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长率,其中1969年曾经高达百分之十。这四年的工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在经济衰退的四年期间只增长了百

分之二十；到 1971 年，工业产量则相当于 1952 年的百分之六百七十四。在就业方面，1968 年还继续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现在开始以平均每年大约增长百分之四的比率上升了。

这些固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情况，然而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经常伴随景气而来的那些消极性质的副作用，显得比正常情况下更大、更麻烦。经过两年的相对稳定之后，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 1968 年增长了百分之五，1969 年百分之八，1970 年百分之十一，1971 年百分之十六；多数观察家认为，实际增长数还要更大。资金周转问题十分严重，许多企业的工人被迫处于领不到工资的状态，有时一连几个月。在外贸方面，进出口差额扩大了，到 1971 年，在五十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赤字竟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打破了以往的记录。同年，出口额降到了进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而在 1965 年则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七，1967 年为百分之七十三点三。尽管无形输出（特别是旅游收入和出国工人的侨汇）在增长，收支差额上的赤字仍然有增无已，1971 年达到四亿三千四百万美元。同时，年轻人仍然以战后最大规模涌入劳动市场，新的就业增长甚至仍不足以制止每年移居海外寻找工作或较好职位的人数的增长，更谈不上吸收侨民归国了。根据官方的数字，西欧的南斯拉夫劳工总数在 1969 年近八十万，接近国内公私企业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尽管侨汇受到欢迎，外流的劳工对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来说，在政治上是难堪的，今后还会引起种种社会问题，并成为本国经济持续繁荣的绊脚石，也会引起侨居国的种族感情问题。

从 1969 年起，就迫切需要并且也在热心寻求有效办法对这种状况进行干预，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办法并非唾手可得

的。削弱中央机构决策大权的工作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以致于在采取或者实行涉及全国利益的措施之前，必须取得大多数或者全体地方领导的同意。同时，环绕干预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情绪，使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难于取得一致意见。

现在实际上已经自治的地区和地方的党政机构的官员们再也无需害怕联邦中央的报复和罢官，但仍然要听命于本共和国的上层公民，或者屈从于他们的压力。在那个就联邦的政策进行讨价还价、并且还有相当部分联邦资金赖以筹措和分配的日益开放的政治交易场上，当官的必须忠实地代表（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代表）选民的利益，这一点显得比以前更为重要了。与此同时，如果他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表明本地群众的支持，那末他们在谈判上述问题时腰杆也就更硬了。在动员和运用这种支持时，官员们往往情不自禁地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这从来就是最容易激起群众热情的办法，同时含蓄地威胁谈判对手说，假如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一来，地区领导人总是越来越急切地、不顾后果地摆出民族领袖的架势，去维护“他们”民族的利益，免得别人对他们的民族进行剥削或统治，同时接受他们认定是“温和的”或“无害的”党内外民族主义分子所提供的帮助。那种近在 1967 年因为过分放肆地宣扬民族主义而被撤销公职或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卷土重来了。他们厚颜无耻地发表声明，印发材料，指责联邦政府歧视他们的民族语言，给予他们共和国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或者分派给他们共和国的干部在党政军中的比例或劳动就业的比例太低。他们这种有时公道但多半不负

责任的指控，博得了一片喝彩声。

在这种气氛中，想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取得一致（一种事实上的否决权使得非取得地方领导的一致同意不可），或者要在除了种族和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基础上统一意见，那就越来越难了。

举例说，1970年克罗地亚领导人打算提议对金融、外贸和外汇体制实行改革，但是至少有四个联邦成员的当局表示不能接受。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提出了一项防止通货膨胀、稳定币值的一揽子方案，但是克罗地亚领导横加阻挠。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实际上得到贯彻执行的唯一的重大措施，就是无可避免的第纳尔贬值（1971年1月）。由于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来支持这次贬值，贬值所应取得的任何积极成果尽付东流。出口停滞了，进口却急剧增加。尽管物价已规定冻结，可是通货膨胀仍然如故。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没有效果说明联邦政府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差不多同样无效的是克罗地亚带头的另一场持续的运动。它要求对一些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声名狼藉的外贸联合企业的垄断行为加以限制。他们说，这些联合企业正在把“克罗地亚经济买下来”。只是在搞这个运动的克罗地亚发言人于1971年底下台之后，一些塞尔维亚领导人才承认，他们也深受这些垄断企业之苦。但是，“只要克罗地亚人把这个问题弄成一个民族问题”，他们也就有苦难言。

在共和国一级处理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便某个问题按理可以在那一级得到解决。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机构的政治地位虽然有所提高，却缺乏与之相称的经济权力。金融和财政手段以及两项主要税收（流通税和资本税）仍

然掌握在死板的联邦政府之手。投资基金总额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仍归设在联邦首都的、部分由联邦控制的几家前“联邦”银行所掌握。这样一来，地区当局的权力几乎仍然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拥有否决权，但却无法实行自己的决策，而这些政策对本地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形势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一点早在 1969 年就是众所公认的，可是在对策问题上却不能达成协议。争论的焦点大体上仍然是，将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社会政策的权力主要应该放在哪里。权力问题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在提出来的几种解决方案的背后，就个人以及地区-种族集团的基本阵营来说，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新鲜的是现在这个权力应该归哪一级来掌握。过去，权力曾经属于一个限定的范围，归联邦党政机构执掌。争论的问题是，让权力继续保持在那里呢，还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分散。现在，由于权力分散主义者取得了一系列不完全的胜利，从而大体上破坏了那些权力中心，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规定由什么机构来继承这个权力。结果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出现了处处无权而又处处有权，有些地方权力大、有些地方权力小的局面，形成了决策权分散、责任也随之减小(因为令无所出也就责无所归)的大家都可以捞一把的半无政府状态。不管改革派是多么恳切地否认或承认，自 1965 年以来明确无误的一点是，“自治势力”(据说目前处于“某种停滞状态”)还不能独自把全部权力抓起来。

其他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三种。一种是给联邦中央恢复无需取得一致就能作出(无论是独断独行地作出，还是在某种多数通过的基础上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权力。另一种是把破坏联邦中央的活动做到底，把剩下的那些在经济政

策上自行其是的机构移交给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成立一个对全国性的问题采取因地制宜的解决办法的松散的邦联。第三种是寻求新的模式，以使用共和国之间协商一致的办法作出有效的决策。

由于僵局打不开，暗中支持第一种选择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支持第一种选择但不愿公开亮相的人增加了。但是这种办法对于改革派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共和国或自治省的利益来说，仍然是受诅咒的东西；而且改革派已把反对中央集权当作正式的偶像敬奉起来，以致眼下谁也不敢公开主张加强联邦机构。因此，这种办法只能在出现了无计可施的事件时，作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来强迫实施。这种考虑使得一班喜欢危言耸听的人在咖啡馆里大谈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出现苏联对付捷克斯洛伐克那种类型的干涉，以便在南斯拉夫“拯救社会主义”。

有些改革派人士寻求第二种办法，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前两年的策略采取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态度。还有些人寻求第三种办法。不管通过这两种办法中的哪一种，南斯拉夫党内改革派完成了把自己的基本政治准则即自治与民族解放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的演变，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有部分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各共和国的党阀们在1965—1966年的胜利联合中所居的突出地位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颠倒，并且已经开始得到1967年和1968年的宪法修正案的认可。它的主要特征是从一种权力分散的概念和聚合的原则逐步过渡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原则。前者设想通过基本上是工团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机构，由按经济的和社会的职能结合起来的“劳动人民”代表来实行决策多元化。后者设想在各民族聚居区的

基础上实现决策多元化。自治这种政治准则已经在 1963 年宪法中得到最明确的体现，民族解放的准则是通过宪法修正案逐渐表面化的。有一段时间，这两种概念的界线模糊了。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两种概念的拥护者在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一元化”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这在六十年代最为典型；另一个是，各个参加者心目中目标不清的程度，同他们的动机不纯一样严重。有人已经指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真的把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主权”看成“自治”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证（不论把自治理解为经理管理还是真的由工人管理，这两者之间也还是有着重大的差别的），而不是把“主权”看做一种办法和最后的结果。不过，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主权”看来日趋加强的体制性变化，标志着“官僚集权主义”这个敌人正在败退。

1968—1969年的党代大会

1969 年 3 月 11 日开始的一个星期里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南共联盟“九大”，不准备象“八大”那样再开成一次妥协的大会。这次会上的辩论要比历届都自由，决议草案要空前广泛地听取修改意见，有些意见还将是实质性的。在表决这些决议草案时，确实会意见分歧，有时则是比较接近的歧异。人们公开承认，某些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的措词和老生常谈式的概括，可以正确无误地解释为缺乏共同语言和未能达成具体协议。不过，对于自从 1964 年举行的上届大会以后就已出现的主张对经济政治进行自由化改革的人物和观点来说，这次大会总的说来还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这次大会不同于“八大”而与 1948 年以来的历届代表大

会相同的一点是,除罗马尼亚以外,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都没有与会。俄国人和参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受到了邀请,但是它们对于南斯拉夫党带头非难那个行动,而且长期坚持(虽然逐渐有所缓和),仍然耿耿于怀。形式上仍由杜布切克掌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本身,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参加了这次抵制活动。捷共忘恩负义,连在细小问题上也不敢顶撞俄国人,没有同罗马尼亚人联袂到贝尔格莱德去,因而受到国内和南斯拉夫的批评。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南斯拉夫加强了对国防和意识形态的重视,并且寻求国内的团结因素。此举产生了一个附带的结果,即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党组织里的地位提高了,它在党的高级机构里代表名额也增加了。恰好在1968年8月苏军侵捷之前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将向“九大”建议在党的主席团中包括军方代表,军队的党员也应该单独召开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党组织平行的和同等级别的代表大会。1969年2月,南共联盟的南斯拉夫人民军首次代表会议正好赶在各地区的党代会先后开完之后召开。

就象反对中央集权的人们在安排共和国、自治省和军队的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先开的时候所预期的那样,这些在1968年11月和1969年2月之间举行的会议破天荒第一次比联邦党代表大会本身还值得重视,因为联邦党代表大会只做了一件关系重大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各个地区的会议指定了组成新的联邦党中央机构的人选,只等联邦党代表大会予以正式认可就行。这些地区性会议有时还提出了互相冲突的意见,随后召开的全联邦会议只是对这些意见加以协调和批准,或者不声不响地不了了之,听任分歧存在。此外,这些党

的地区性会议还首创了一种政治上的新做法，这在 1969 年的议会选举中略经变动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改革派在议会选举中寻找他们特有的办法来调和那些自相矛盾的原则——既要更大的自由，又要使自己所处的控制地位安然无恙。

这种政治上的新做法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开的、比较自由的辩论和批评的气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大加渲染，说什么现在的南共联盟已经面貌一新了。然而同是这班人所玩弄的做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各共和国的党代大会自由选择候选人的真正自由。如果真的让它们自由选择候选人，其结果会把现在居于要津的自由派所企求的一致支持和不受约束的委任弄得不可收拾。为了控制选举，他们煞费苦心采取了特别的而且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主要是求助于 1964 年正式采用过的但是以后被忘怀的轮流当选法，以防过多的“知名的革命老战士”重新当选。这些人被怀疑为“保守分子”，但是为数惊人的基层党组织却竭力主张推选他们。

结果，几乎各级领导班子的人员都进行了调整，其规模之大是令人惊讶的，好象是为了过去二十年变动实在太少而来一次补课。首先，在参加地区会议的人员中，平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平生第一次参加党代大会（马其顿的情况尤为突出，足有百分之九十七点八）。由各地区代表推选为六个共和国党中央委员的二百九十七人当中，百分之六十九是新的。人员的调整也就是两代人的更替：这些新的中央委员中，年龄在四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其中百分之十五不到三十岁。

联邦党的各个机构的新人员的任命和地区党的新主席、新书记的选举中出现的格局，表明在三十个月前联合把兰科维奇推下台的权势显赫的共和国党阀们的地盘里，政治上几

乎没有什么重要变化；而对于还没有把 1966 年同失势一方有牵连的领导班子彻底改组的地方，则要进一步进行调整。变化最大的是塞尔维亚。在那里，兰科维奇下台以后的改组工作现在终于完成了。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是尼凯集奇，此人从 1952 年起当外交官，1966 年起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迄今为止从未登上党的领导岗位。1933 年出生的佩罗维奇成了塞尔维亚执行委员会书记。至于大多数老革命，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参加反对兰科维奇联盟的已被送进联邦党的新主席团，其余则被降为可能是不大重要的联邦党务会议的常务委员。门的内哥罗人毫不含糊地指出，为了“保证革命的连续性”，这个机构是给老革命安排的合适去处。

各共和国的党代会还提醒人们，落后地区仍然是不甘心被忽视的。有些发言人抱怨“统一市场的某些个别措施和形成的关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要求“给予补偿”。这在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的党代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问题都纳入决议草案提交联邦党代会批准，或者纳入拟议的修正案里提交上去。这样一来，对不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都适用的投资和发展规划中那些尚待解决的以及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统统提交给联邦的党代会了。在那里，这些问题和类似的或者互相冲突的建议成了最严重的最本质的论战的焦点，也成了大部分拉票战的焦点。这种争吵活跃了“九大”的气氛。

尽管这样的意见交流足以表明 1969 年的“九大”特有的比较开放的气氛和某些领域里出现的仍未解决的重大争端，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批准（在一个至关重要之点上则是修改）该党自 1966 年 7 月以来在机构、人事和性质方

面所发生的变化。

1967年7月中央全会对基层党组织的结构方面所作的临时变更得到新党章的进一步肯定。联邦党中央各机构的改组也是这样(它们曾得到1968年7月举行的中央全会的同意),而各共和国及自治省一级的代表大会则先期选举了参加中央机构的代表。南共联盟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被取消了,代之以两个新设的机构。第一个是新的主席团,在举行地区代表大会时每个共和国要选出五名代表,每个自治省三名,外加军队三名,作为主席团成员,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则是这个主席团的当然成员。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主席团正式向另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负责,这就是由二百八十名代表组成的年度代表会议。这二百八十名成员中,四分之一由地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经联邦党代大会批准,任期到下届代表大会为止;其余二百一十名由“公社的和其他适当的代表会议”选出,参加当选那年的年度代表会议。

新的党中央利用这种组织形式显示出三点新的重要特征。第一,废除了地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比例代表制原则,它的每个机构都由各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派出数目相同的代表组成(两个自治省则相应少派一些),而不考虑人口和党员的多寡。这可能(而且一般也是)被解释成进一步承认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联邦化”。这一原则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政府机构,而后来在合适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做了。第二,南斯拉夫人民军由于在向党的主席团派出代表方面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平起平坐,意味深长地被正式承认为联邦的第九个伙伴,而从民族归属上讲,它是唯一不属于特定民族而属于整个“南斯拉夫”的。第三,仿佛是最先批准了从“联邦化”到“邦联

化”的过程，联邦党中央也许除了铁托这个南共联盟主席坐镇之外，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执行机构了。

进一步思考之后就会觉得，这最后一点至少在铁托本人看来实属过分，于是导致了“九大”的一件关系重大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有关这件事的意见，在印发的铁托对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场白里并没有写明，而是后来附加的。铁托宣称，“各共和国领导人”协商之后，一致同意在党的主席团之上成立执行局，执行局应包括“所有六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主席和书记或其他领导同志，以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核心”。它将由十五人组成：每个共和国各二名，每个自治省各一名，“当然还有我本人”。这些人中应包括“一些较为年轻的同志……以保证连续性，[因为]我们中间有些人年事已高”。

象党的其他发言人会做的那样，铁托坚持认为，执行局并非某些人所想的那种朝着传统而专制的政治局倒退一步。他说，民主化和权力分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足以防止发生那种危险。与此相反，恰恰是由于分散作出决定和民主作风已达到的高度水平，所以要求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作用，以协调各个自治单位的利益，务使民主达成的决议得以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以防各行其是。

从铁托的意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方式，就是现任的地区党主席和书记们应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去，繁忙的事务也需要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贝尔格莱德。太阳王把他的公侯们宣召进宫，把他们调离地方权力基地。在铁托眼里，他们现在已经尾大不掉，简直已经达到要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危险程度。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无需对本共

和国的党直接负责，从而把共同关心南斯拉夫全国作为自身的任务。铁托明确希望他们对于这一安排会取得一致看法；并且希望，至少在有名望的新的地区领袖出现之前，各地区的党应服从他们。

为了避免把各共和国党代会为联邦党的各个机构指定人选的工作搞乱，执行局将由其中产生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的人数扩大到四十五名，包括每个共和国六名代表（原先只五名），同时各共和国党中央主席作为当然成员。在这些最后一分钟的变化中，各个地区是怎样解开抢座位游戏之谜的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在“九大”幕后匆匆作出的某些人事变动，对南斯拉夫的未来政治发展会产生重大的无法预料的影响。

派遣党的主席和书记到贝尔格莱德的只有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这样，克罗地亚的巴卡里奇和特里帕洛来了；他们在萨格勒布的位置由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皮尔凯尔接替。前者四十六岁，经济学家，1967年以来一直当克罗地亚政府首脑，也是欧洲第一个女总理；后者四十二岁，1963年到1967年任萨格勒布市长。这样一来，巴卡里奇干了以前总不愿干的事情，从天天抓住克罗地亚政治活动不放的岗位上调开了。但是，特里帕洛仍然作为能力较弱的达布切维奇-库查尔的伙伴和对手，继续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萨格勒布。从此，克罗地亚被三位执政的符咒镇住了。这三巨头过去都是巴卡里奇的门徒，不过不如他们的师傅那样干练而稳健罢了。

马其顿人派去了党中央主席茨尔文科夫斯基，他的职位由党的书记切尔梅尔斯基所取代。该共和国参加执行局的另一成员是格利戈罗夫，他的全部经历都在联邦党中央机关，是

那里的经济改革设计师之一。

另一方面，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斯洛文尼亚则把新近选出来的党主席和书记都留住不放，部分借口是别的同志比他们更有权威。这样一来，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尼凯集奇和佩罗维奇继续负责塞尔维亚。在那里，他们的领导地位可以证明同萨格勒布的三巨头一样关系重大，尽管原因不同。这三个共和国派到执行局去的六名代表中，有五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同联邦上层机构的交情很深，并有反对集权制的“进步”记录。托多罗维奇和佩丘伊利奇（1929年出生）代表塞尔维亚，而门的内哥罗则挑选了弗拉霍维奇和绍什基奇（1925年出生）——这两组人选都是完全符合铁托的标准，一个是党内自由派老战士出身的领导人员，另一个则是从年青一代中选拔出来的最有前途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斯洛文尼亚人送去的卡德尔甚至更为卓越，但是他们送去的第二个人却是出人意外的。担任共和国总理又是政界要人的卡夫契奇是合乎逻辑的众望所归的候选人，但是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他不愿意被提升到新成立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去（这意味着丢掉他在斯洛文尼亚的地盘），从而激怒了铁托（尽管只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场两个小时的个人顶撞）。代他去给卡德尔陪伴的是多兰茨，此人当时四十三岁。多兰茨是属于“少年游击队员”（特里帕洛、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绍什基奇也属于这一辈）这一批中年干部中的另一人，他是在大战临近结束的1944年入党并参加人民军的。从1960年起，他是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64年起当上了中央委员和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69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实际上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这回到那里竟产生了当时意想不到的重要

后果。

自由化的困境和1969年的选举

“九大”以后的南斯拉夫政局，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同1962年夏天的形势完全相反。当年，聚集在兰科维奇周围的党内托利派仍然在中央集权的党和国家机关中占支配地位，而“忠诚的反对派”则还处在党内辉格派同另一些认为个人前途或本集团的共同利益在于推进权力分散和自由化的人开始结盟的状态。到1969年，同是这些机构（此时权力已经高度分散，多头政治初具规模）已经基本上被辉格派—自由派的联盟所控制，而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托利派则企图在那些自身利益和地位被权力分散和自由化所损害的各种势力有意无意的帮助下重整旗鼓。1962年的统治集团所以垮台的种种因素中，包括他们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和自己内部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1969年的统治者也有可能被他们经济政策上的缺陷及其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搞垮。当然，他们还有别的难题。

1969年4、5月间举行的选举，是1963年以来第一次包括所有立法机构的选举，总共改选六百二十名联邦议员，两千七百七十九名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议员和四万零二百七十九名公社议员。这场选举使自由派联盟面临的严重困境戏剧化了，同时也给二十年来偏离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政治制度拍了一张快照。在选举中，争夺席位和不幸“事件”的公开程度、次数之多和比例之大，都创战后新记录。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这次选举比南斯拉夫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选举（至少是

1929年实行独裁政治以后的选举)都值得予以更多的注意。

无论是选举的程序和结果都呈现出一连串的矛盾。对于大多数席位,选民们有在两三名候选人中选择一名的自由,这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提名的手续比1967年更为复杂,控制也更严密。当局大喊大叫,力图保证只有那些“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人的选择只能限于从一群意识形态上差不多的人中间选出“最能胜任的人”,因为全部候选人都是拥护南盟内部现在的统治集团的纲领的。更有甚者,除克罗地亚之外,公社以上的每个五院制的议会里,仍然只有一个议院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联邦议会里,通过了1968年的妥协修正案之后,直接选举产生的议院的权力比最间接选出的民族院小。即便如此,相当数量“不合需要的”候选人还是设法获得了提名,大部分(但非全部)被提名为那些直接选举的议院的候选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在竞选中无视党和社会主义联盟为了对付他们而发动的强大运动,在联邦一级击败了官方内定的对手而正式当选。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操纵提名程序的方式产生了有趣的、部分是无意的和始料所不及的后果,因为这种方式产生的名单,大体上反映了通常同现行的多元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利益集团的意向。上述提名方式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公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

以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选举条例的制订者对选举要求愈益摇摆不定的结果。除了包括卡德尔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之外,那些目前在联邦和共和国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里居于支配地位的人们,曾一度真正允诺要在人员和“社会主义的各种办法”中间实行更真实的公开选择的原则。但是,在1967年

选举中朝这个方向跨出了第一步、进行了局部试验以后，由于结果不理想，他们又小心翼翼起来了。另一方面，有一些共产党员比较守旧，他们原则上怀疑采纳自由选举、代议制议会和其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残余的必要性。但是，自从1966年失去权力以来，他们这时发现竞争性的普选在控制不严时反而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可望重新当选。

初看之下，这确实是令人吃惊的风向逆转。原先，党内改革派取得当前相对优势的一种办法，是利用1963年宪法所创设的议会机器避开了当时还掌握在兰科维奇以及同他一样守旧的人物手中的党的机构。兰科维奇和这些守旧派一向轻视议会，那时他们认为仍然有理由予以蔑视。为了控制议会，改革派就把“我们的人弄到议会里去”。改革派当时所以这样干，因为那时党委会和社会主义联盟委员会（在这些机关里，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们通常对过去那种毫无意义的议会把戏不感兴趣）仍然是关起门来决定候选人名单，在直接选举公社以上的议会时又几乎总是只提一名候选人。1967年拉扎雷瓦茨事件的教训以及类似的事件使他们认识到，现在为使他们在某些地区的地位更为牢固，进行私下交易要比公开选举更为妥当，因为选民们常常对英雄或“煽动分子”表现出比对“社会主义民主制”（这种思潮有时似乎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时髦、年轻的代表人物更为喜爱的反常心理。

他们的摇摆不定还有别的原因。每当他们显然真诚地谈到一些问题，例如谈到就“社会主义的各种办法”进行“自由的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和真正的竞争性选举的优点时，他们总要赶快补上一句，说什么这种斗争绝不应该降为“争权夺利”或者纯属“自发”的政治行动。在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中，第一

点,即“争权夺利”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而又稚气十足的,它表明南斯拉夫人在模模糊糊地摸索一种通过对话和协商作出决定,但又无谓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冒多数统治的特别风险的理论,并且说不定还在有意无意中触及了一下已被正式摒弃的苏联那套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生活“没有冲突”的概念。第二点,即“自发”的说法,反映了南斯拉夫人除了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同“自发性”水火不相容之外,还表明了一种真正的信念,即这样一种基本上是不明真相、愚昧无知而又态度冷淡的选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会受到那种“非正式团体”的煽动和操纵,而在1967年这种“非正式团体”确曾操纵过许多次选民会议。这样一种制度所产生的代表或政策,未必会比传统政党(一党制或多党制)遭人辱骂的层层过滤法所产生的代表和政策更能关心人民愿望,说不定还要更坏。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贝尔格莱德民意研究所所长季尼奇对批评社会主义联盟利用其在选举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滥用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发表评论。他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在波斯尼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说,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联盟所处的核心地位应被看成是有助于“结束我国长期以来政治上若明若暗、停滞不前的局面的,在那种局面下,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就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干预政治和进行政治活动。现在人们应该能更清楚地看到谁站在最前列,来自什么岗位,带着什么样的具体目标了”。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祖潘契奇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1967年选举的经验教训中有这么几条:即出现了“蛊惑人心的宣传”;以为不明情况、没有组织的选民能够明智地作出决定乃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社盟有义务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对自

治制度或者例如对我国各民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心怀不满的人物”表示反对。

为了解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制订了一个复杂得令人莫名其妙的提名程序。首先是可能被提名的候选人在“提名预备会议”上“登记”。这种会议通常由社会主义联盟召集，按地区或者按组织由那些向各种议会的一个或者几个议院推选代表时有着合乎逻辑的利益的单位召开。这些由村庄、企业、城镇里弄、大学系科、医疗中心、工会分部等等召开的会议，是公开进行的非正式会议，通常是真正无人操纵的。然后在每个选区召开公社的和公社之间的“提名大会”，这是1969年选举办法的主要改革。最后，跟着举行的“选民会议”可以在某种条件下补充候选人。

提名大会的规则极为烦琐，这样搞的用意是专门为了把不合需要的候选人“过滤掉”。在“提名预备会议”上“登记”的名单是必须递交上去的，但是提名大会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名单，它可以照章另提一批。社会主义联盟要求提名大会为每个席位至少提出两名候选人，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可以例外。至于为什么多数提名大会未能照此办理，并且在选举运动的中途就引起了党和联盟总部的显然真实的惊慌失措，其理由是一目了然的。

3月中旬，党和联盟所唱的调子已经改变。尽管祖潘契奇以及其他人一向为之辩解的种种操纵手法都已用上，提名大会却并未按照预期的要求行动。虽然提名大会常常成功地排斥了党不想要的候选人（当地方党组织团结一致时不难做到这一步，但有时看来，这种情况与其说是通例，不如说是例外），却不断违反了其他两项公布于众的原则。这些会议未能

实现官方规定的工人、青年和妇女应占的百分比——这也许表明提名程序真比以前“民主”，更能代表选民的愿望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会上还倾向于给共和国和联邦议会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席位只提一名候选人。当局的反应暗示他们对竞争性选举的要求是真诚的，并申明将在随后的“选民会议”上纠正这些错误。这实际上给更多的“野的”候选人开了方便之门。

贝尔格莱德的《政治报》是最先指出症结所在的报刊之一。它在分析3月19日的初步结果时指出了提名大会为什么不顺从上级指示的原因。根据选举法，每个可能被提名的候选人为了得到提名，必须获得提名大会过半数代表通过。《政治报》注意到，每个代表来到提名大会时都带着自己关于大多数职位的名单，开始时只给自己名单上的那些人投票。这样，谁也无法赢得多数。经过几次徒劳的投票之后，大家开始讨价还价，通常就是“我选你的人到这个职位上，你选我的人到那个职位上”。由于无法大家都上去，在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有些人自动撤回了，有些比较知名的人士开始从那些不再为自家人卖力的代表们那里积累了更多的选票。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最后总得投一次票，结果是一个人（常常只有一个人）取得了难以捉摸的多数。在几个公社联合举行的提名大会上，情况就更为复杂，因为还得按地区和行业“公平”分配席位。假如一个席位同时提出一名以上的候选人，那末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取得的微妙平衡又会打破，除非两人来自同一公社。

提名的过程同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宠儿”候选人^①被各州的代表团抛掉之前的讨价还价有点相似，不过有

^① 即各州最初支持的本州推举的总统候选人。——译者

两点复杂的区别：一是在南斯拉夫的提名大会上，有许多职位要由有不同的专业资格的人来充任，二是要举行秘密投票。这些区别的第一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是上文提到的那种“利益集团”在起作用。提名大会的代表在口袋里藏着的候选人名单就是他所代表的集团提议的（通常也是该集团在政治上“过滤”过的）。这些利益集团包括教师协会、企业、种族共同体、农业合作社、公社里的退伍军人、青年组织，等等。因此，在候选人名单上的最后讨价还价，同时也是各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些利益集团以集体的方式代表了多数公民），尽管公民并不直接参与，而且程度不同地受到党和社会主义联盟“过滤器”的洗刷，但最后产生的名单本身大体上反映了与会代表团之间的相应投票实力，转过来也同公社内这些利益集团在人数上的比例大体相符。

诚然，按照比例在重要利益集团之间分配代表名额，这在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国家总是予以重视的。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大权独揽尚未衰减的时期，他们也注意使各个种族集团、地区、经济部门和党内各种“倾向”之间，根据它们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大体比重（如果不是根据它们在全国的人数比例的话）具有适当的代表名额。同过去做法的区别在于代表名额的分配过程已不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同时也还有私下搞还是公开搞的性质上的差别。在过去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谁该得到什么的问题仍然是由党的统治集团私下决定的，如果它太拙于谋划，疏远了太多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它会遭到被宫廷政变所推翻的惩罚。可是在1969年的南斯拉夫，比例问题是由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们自己在基层（说得确切一点，是刚好在基层上面一点）解决的。他们公然讨价还价，有时简

直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南斯拉夫式的按照职业和地区形成的多元化政治在议会结构以至选举程序上都制度化、合法化了。

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有禁止自己的某些党员竞选公职的公开“黑名单”这样一种离奇的现象，而上了“黑名单”的那些党内外追求公职的人敢于蔑视权威并取得胜利的也并不少见。这是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使选举颇有生气。

党的黑名单的拟定有其使人啼笑皆非的一面。正如《战斗报》社论主要撰写人之一所指出的，这种黑名单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党把它先前强加于选民的人加以否定……而这样做的全部真实含义是，个别党员由于在前几次选举中的肮脏勾当而受到惩罚，被剥夺了当选的权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留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之内。看起来联盟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宽于律己而严于对待选民。

更有甚者，强制执行黑名单的努力往往以党组织的失败而告终，在党委会和公社议会或公社的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则发生公开的分裂，群众违抗党的意志选举了受党批评甚至被党开除的人为市长或议员。那些被党谴责的人受到选民的拥护，或被公社议会的议员选入间接选举产生的议院。

研究一番这类“不合需要的”候选人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例，就可以看出两种基本的、部分交叉的类型。第一类基本上是由于个别人物、集团或追随者组成的派别之间在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所造成的，其间并无明显的意识形态或纲领的分歧，

每一方都企图得到或保持对共同体的政治控制。第二类，也是更重要的一类，涉及那些被称为党内“保守派”、却自称拥有“地下政治力量”支持的人们。“人民英雄”乌罗舍维奇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他在查查克以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七票对两万九千三百四十六票的惊人差距，同1967年一样击败了“官方的”候选人。在象乌罗舍维奇这样的事例里，“地下政治力量”指的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前国家保安部人员和兰科维奇的追随者，前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支持者及其他亲苏分子，前切特尼克分子，以及那些当真相信自治的社会主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忽视不发达地区并且认为南斯拉夫需要(塞尔维亚的)强硬统治使之结成一体的人们。

这样一些人就足以把卡德尔关于这种选举是否合适的问题旧事重提了。在选举的结果公布以前，《共产主义者》周报于1969年4月10日发表的一篇不署名的因而也是权威的社论中，在再次提到“各种色彩的在政治上心怀不满的人已经结成真正的联盟，并对竞选纲领所包含的政治路线散布怀疑”时，预测了从这次选举中可能得出的适当结论：

必须强调指出，许多对立的观点已经表现出来：认为提出几个奉行同样政治纲领的候选人，乃是残留在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观念的反映；从公社到联邦的整座议会金字塔，应当首先从根据民主原则组织的公社建起。

现代化的危机

随着六十年代的结束，南斯拉夫人的情绪和景况同十年

前相比已迥然不同，尤其是在贝尔格莱德。那时乐观主义情绪遍及全国，对五十年代的繁荣即将结束以及德热拉斯下台后的政治休战也将随之结束的警报置之不理。现在，由于放宽了新闻自由，报刊电视上对种种缺点提出了批评，在过去不习惯此种情况的人看来，问题已愈益严重，因而六十年代后期那种动荡不定、变化无常的感觉已经渐渐从普遍的悲观失望发展到惊慌失措；这种感觉开始只是令人觉得多少有些道理，到后来却成为应验的预言了。

从许多方面来说，此时会滋长这种气氛看来有些难以理解。1968年8月以后，曾经使人惶恐不安的苏联威胁，已经再度明显缓和下来，而转为有关铁托身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一种较长远的推测。越南战争看来终将达成某种解决办法，而东西方缓和再次成了热烈谈论的话题。甚至同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自1955年以来也第一次有所改善。^①苏一南之间的报刊论战尽管有时在比1968—1969年较为克制的水平上继续进行着，1970年6月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里比契奇的莫斯科之行似乎表明两国正沿着可以预期的舒坦的道路走向“关系正常化”。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良好关系，由于理查德·尼克松于1970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而实现了。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到南斯拉夫。在其他战线，铁托个人自1968年2月以来始终耐心坚持要举行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终于导致了1970年9月8日至11日的卢萨卡会议。这次会议证明，不结盟运动尽管并不完全健康，但依然存在。8月间，贝尔

^① 1969年中南贸易协定签订之后，接着两国又于1970年5月和8月互派大使，从而结束了外交关系十年破裂的状态。

格莱德和梵蒂冈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全面外交关系，这显然大大改善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时期就已建立的南斯拉夫政权同天主教会的关系。

在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也许莫过于长期追求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缔结一项商业协定的谈判于1970年3月19日取得了结果，在布鲁塞尔签订了协定。10月间，铁托访问了共同体六国中的五国，对比、荷、卢集团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对西德和法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铁托回国时在机场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这是他对西欧涉足最广的一次旅行，它既反映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位，也反映了南斯拉夫重新强调它在欧洲的作用。共同体已经占了南斯拉夫进口额的百分之四十九和全部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南斯拉夫还同共同体签订了约一百八十项特许协议，其中三十项是关于技术和生产的长期合作的。1970年的协定规定了不受歧视的贸易和最惠国待遇，对南斯拉夫出口的小牛肉（在南斯拉夫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而近来又受到威胁的一宗货物）给予特殊优惠，并成立了永久性的南斯拉夫—欧洲经济共同体混合委员会。因此，南斯拉夫对西欧关税保护主义的恐惧（这将不可避免地把南斯拉夫驱向东欧集团的贸易怀抱，并由此牵连到种种经济政治因素）大大减轻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的制度化，至少部分平衡了它的经互会观察员的地位。

在国内，进一步改革南斯拉夫国家体制的热烈讨论，似乎使这个国家继续沿着从联邦到邦联的道路演变。然而，这不过是四年来本已明显的趋势制度化和向前发展而已。虽则这一场讨论既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关系紧张和发生争吵的结果，也是使之进一步激化的原因，但民族关系紧张本身并不是新鲜

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的。至于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过激行为”所已达到的程度，究竟是表明民族关系真正恶化了，还是仅仅表示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扩大了，那还是一个值得平心静气讨论的问题。联邦政府仍然处于瘫痪状态，无力采取措施应付紧急的经济问题。但是在过去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期，南斯拉夫政府终于对付过来而未发生重大骚乱。因此，一旦联邦同各共和国之间职能的划分得以澄清，人们也有理由期望它是能再次度过难关的。

尽管经济上有使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忧心忡忡的充分理由，但是经济问题并没有直接影响平民百姓，也没有引起惶恐不安和政治危机，只有人人受影响的通货膨胀和同部分人有关的银根紧张算是重要的例外。相反，1969年后经济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改革后的长期萧条已成陈迹，至少在大多数部门是如此。更多的人生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更多的人能够买到更多的物品，失业率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有所下降。新闻自由日益广泛，从政治批评和讽刺作品到为维护具体利益而大喊大叫的文章，乃至特别拙劣的色情文学都能刊登，这清楚地反映了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自由程度相当可观，虽然有时受到非难。在政界和经济界，游击队老战士这一代所设置的南斯拉夫特有的干部提升方面的障碍终于失灵，允许新的较年轻的面孔在领导岗位上到处出现，那些在1927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在资历上的限制解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对于现制度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或者至多发点牢骚的人会是大多数，至少在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社会”的人们中间，持这种态度的人越来越多；而在那些所处地位符合参加政治活动条件的南斯拉夫人

中，属于这一类的占大部分。因此，大量党外的或者不关心政治的人们的一种论调颇有诱惑力，他们在令人沮丧的第一个冬天争辩说，当时在发展着的危机气氛多半是人为的，是那些不发生危机就混不下去的政客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这些政客把这种气氛视为保持权力和地位，使自己免于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累赘的唯一出路。不过，值得忧虑的问题还是有的，其中有些是难于对付但说得明白的，另一些则是比较好办但难于衡量的，而这两类问题都是同样真实的。

随着铁托年事日高，接班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面前，而这种紧迫性谁也无法说是杞人忧天。因为有这个问题存在，凑在一起的其他麻烦也就显得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为严重了。诸如当前的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种族问题，中央机构的瘫痪，对于一度由中央掌握的权力的长期争夺和国外的压力与阴谋（也是在国内动荡的时刻，外界认为继承问题的危机即将来临所引起的）等等。这些事情如果相继发生的话，或许能够比较从容地加以处理。不巧的是，几件事情凑在一起，而且还有继承问题在那里，这就令人更为惊恐了。

南斯拉夫的普通群众对他们的眼前处境虽然忧虑重重，但更使他们坐立不安的却是那种局面可能产生的不能预料、无法断言的后果。这种忧虑部分来自政局的动荡不定和对政治前途的失望，即使这种失望大都涉及按理应当受到他们中许多人或多数人欢迎的变革。

外国观察家在考察 1970—1972 年的南斯拉夫的情况时，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既感到惊讶不止，也觉得几分有趣。例如，他们发现竟有那么多非党的甚至反共的南斯拉夫友人抱怨说，当前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混乱和放任自流现象，公开的政

治对抗，这在兰科维奇当权时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进行局部非斯大林化可是仍然有所控制的时候，是不许可发生的。这种人显然未能领会在犯罪的界限和惩罚的条款明确之后政治上的异教徒所得到的保障。另外一些人，包括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某些较老的党员和知识分子在内，则由于另一种失望而感到焦急或气愤。他们需要理想和目标远大的制度。南共联盟原先提供过这些东西，至少他们自己觉得南共联盟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他们只看到露骨的实用主义，看到除了他们中间最可敬佩的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和真正笃信自己信念的人之外，大家都想在信仰上改弦易辙了。

还有一些人，包括政治上不大活跃的阶层在内，他们的某些具体的个人愿望也遭到类似的挫折。现制度比西方福利国家更明确、更集中地许诺人们都有工作可做，而且机会均等。可是，国家工作人员此刻公开坦率地告诫说，对许多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来说，要在称心的地方找个合适的工作，前景是颇为暗淡的；同时，机会均等正如小孩有社会地位及文化水平的天赋平等权一样是句空话，不过偶尔略胜一筹而已。现行的社会体制按说是社会主义的，因而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经理和技术人员们却苦于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物价波动，慢性的资金周转困难，国家过多的而又前后矛盾的干预以及总是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的局面。

此外，人人都被“自治的民主”弄得灰心丧气。这种民主就是在数不胜数的机构里反复举行会议，花费没完没了的时间进行无休无止的讨论，并作出无穷无尽的决议，但是有效的行动却是微乎其微。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决策机关太多，互相合作以及有条不紊地解决各种矛盾的情况太少，议程

太长（用于讨论应否给新任副书记安装电话机之类的问题所费的时间，比讨论重大投资的决议还多）。这最后一类现象（有时是安排议程的人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向人们说明了现存社会体制之所以办事效率低和到处碰壁的原因。这类事情也表明了（并且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治团体的成员通常缺乏教养和积极性，也没有余暇来对自治的理论与组织形式所要求作出的那种决定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上述情况的实际认识（尽管意识形态是不容许这样来看问题的）和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社会分工”的一套办法，这两者在把实际决策权从自治团体本身转归他人掌握的策略演变过程中，往往比人们通常归咎的个人对权力的追求要重要得多。于是实际决策权起先在党阀和官僚手中，现在则往往落入更有本领的经理和技术人员之手，在大银行和大企业里情况尤其如此。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同是这个为意识形态所不容的认识，使人对杰出人物并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发生了兴趣。这些理论家也就惹恼了实际在推行这种理论的人，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希望自治这个皇帝赤身露体的模样被人指出或以这样的论调使之合理化。与此同时，在一个影响许多人命运的领域里理论和实践互不协调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令人感到不快。因为对千百万被迫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常常是毫无意义的自治仪式的人以及对那些当真把自治看成愿望（尽管还没有视为现实）的人来说，这同样（虽则原因不同）是令人痛苦的。

最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情况，包括普遍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内，凡是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人都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对于日益扩大的自由予以利用并且慎加保护的宣传工具，

现在是什么都说，或者几乎什么都说，这也成为意想不到的使人气馁的部分原因。不难设想，所有这些扰乱人心的事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不是现在把过去的事情说出来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社会对于那种急剧的社会变革积累起来的影响以及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新性质（新近发生的事件似乎使得这种新性质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产生的心理反应。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人受到影响的难以名状而又无所不在的不舒服感和不安全感，乃是现代化和过渡时期的特殊危机所引起的一种反映。急剧得令人迷惑不解的社会变革到处产生了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从人们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身分的变化、衣食住行的前景的变化以及同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结构（从家庭开始，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的关系的变化开始的。这种感觉很容易影响到似乎已经晕头转向的政权，也容易影响到充满着惶恐不安和离经叛道的外部世界，这种惶恐不安和离经叛道则是由分为两极的冷战世界向着某种迄今为止还不明确的别的什么世界过渡所引起的。与此同时，古老的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自由和人类职责的幻想有可能在突然之间以出乎意料的规模成为现实；对此南斯拉夫人缺乏充分的准备，因而也带来了恐惧和不安的因素。

战后的南斯拉夫已经沿着一条新的道路走得很远了，其内容包括“现代化”（不论用按人计算的平均产值还是用国民总产值来衡量）、工业化、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改变、职业与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既倡导自治又体现统一和人人有份的社会机构的多元化。同时，联邦的党和国家机关独揽大权的局面解体之后出现的政治僵局（这是建

立在种族猜忌基础上的地区分权主义占了上风的产物),意味着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没有能力对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权力再分配的多元化倾向进行煞车……除非通过政变或者采取别的暴力办法来改变力量均势。这样那样的多元论不仅没有受到反对,反而得到地区的政治领导和强大的经济势力的真正支持,因为它们唯恐失掉日见成效的自治并且也有能力保卫它。多元论还受到联邦一级现在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鼓励,他们起了分散手中权力的带头作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管是否真正出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主要因为他们是地区或部门利益的真正代理人,地区与部门为他们充当了实力后盾;或者是因为他们就党的自由主义思想路线说了多年空话之后,无可奈何,不得不这样做。

这几方面的事态发展汇聚一处产生了难得的良机,必须顺水推舟,以免这一伟大实验搁浅(即便不致遭殃)。就在先前的政治权力垄断中心瓦解而重新引起未来的公共决策机构究应设置何处的问题的同时,允许群众享有更广泛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以便作出或参与作出范围更广的有效的公共(和个人)选择的前提已经创造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最低限度的思想上、体制上和经济上的前提。此外,最高层领导的政治处境虽然并不稳定,但对当时发动和推动这样一种参政活动来说还是有利的。

然而,公众和政治组织的第一个反应却是自卫性的和排外性的地方民族主义复发,为确实存在的和子虚乌有的问题或迫害寻找替罪羊(通常到别的种族集团中去找),并且试图在共和国和自治省一级重建传统的国家,以执行传统的职能并给民众以有控制、有限度的参政权来取代已经瓦解的中央

集权的国家机器。这种反应包括三种因素，即不合理的因素，合理的怀疑因素和明知有害却情愿如此的因素。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反映出真实的和虚构的历史以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南斯拉夫的历史教训是，人们现在体验到的害处比他们过去经历过的害处——兄弟阋墙，国家分裂，外国统治以及企图互相进行种族灭绝——确实要轻。可以想象，如果包含在战后体制中的种种保证与体制本身一同被取消的话，这些祸害可能就会死灰复燃。推而广之，传统看法的诀窍是，已知的是坏的，未知的差不多肯定更坏。在比较精于世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浅的人们当中，这一点变成了一种狡猾的警觉性。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学会在现制度下对付，并且过得不错，不论这个制度的缺陷怎样；而在一个未知的即使在理论上较为可取的制度下，人们很可能会迷失道路，处境更糟。

鉴于南斯拉夫的历史，对变革的严峻考验作出这样的反应并对自由采取回避态度的这种非常不合理的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到1970年，使许多甚至多数南斯拉夫人焦虑不安和缺乏信心的情况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年轻人中间宗教狂热的明显增长（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对外国人和自己人相互之间的日益猜疑。日常生活和报刊杂志上流露出一种要在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寻找替罪羊的本能倾向，目标是：别的企业、别的分支机构或者外国的竞争；大银行、大进出口公司或者“好大喜功的”投资；经济上的自由经营或国家干预的后果；党、青年或者知识分子；“情报局分子”、“中央集权主义分子”或“沙文主义分子”；同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勾结的苏联特务和（或者）西方反共分子；以及常常是（而

且尤其是)南斯拉夫国内的某个(或者某些)别的种族集团。

这最后一项乃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也是日益频繁地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前途发出警报的主要来由。在一种互相猜疑和互不容忍不断升级的气氛中，有着不祥的历史含义的大帽子互相扣来扣去，而且越来越频繁，甚至还扣到各个地区的党的领导头上。克罗地亚人被指责为沙文主义者、分裂主义者、而最毒的是给扣上留恋乌斯塔沙的帽子。塞尔维亚人被指控为中央集权主义者、大民族沙文主义者、甚至被指控为情报局分子和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每一方都怀疑对方同苏联调情，寻求支持。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同塞尔维亚族之间，整个 1969 年示威游行时断时续，有时演成流血惨剧。同年夏天，斯洛文尼亚人以虽非暴力然而直言无讳的方式促成了那年的重大政治危机。他们以一系列的激烈的群众游行和对所谓的种族歧视的公开抗议，几乎把当时斯洛文尼亚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联邦政府搞垮。引起这一危机的导火线是世界银行用来建设南斯拉夫第一批高速公路的贷款。在分配这笔贷款时，联邦执行委员会对斯洛文尼亚地区急需改善的新戈里察——卢布尔雅那的干线根本没有给予优先照顾，而把贷款用在并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建设计划上面。抗议者清楚暗示，这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串通起来干的，是无视人数较少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典型做法。

把所有其他问题和冲突统统归之于民族问题，对每个问题作简单化的解释，这种倾向使人回想起旧南斯拉夫以及在此以前的哈布斯堡王朝。本来，这种倾向就一直是新南斯拉夫的重要课题，而现在再度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就造成了

一种感情用事的气氛和紧张局面。每当把一切不满、各种冤情和每次感到受委屈、受压迫或者相对地受到剥夺都牵连到民族争端上去的时候，这种情绪就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了。

克罗地亚的新策略

上述现象之所以在克罗地亚表现得特别尖锐，这有几个原因。千余年来，克罗地亚人总是在异族统治下沦为二等公民，加上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以及这一意识向该民族聚居的各个地区广泛传播所作的充分的政治和社会动员都比较早，因此这些因素使现在这一代克罗地亚人产生一种集体的民族偏执狂。谁想“瓦解他们的民族”并使之陷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他们就要坚决抵抗。接连不断的历史经验，包括1849年和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及马扎儿人的出卖和随后“切香肠式的”马扎儿化，1918年的联邦主义理想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王国的统治，以及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头二十年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事事教育他们提高警觉，即使对他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损犯一丝一毫，他们也不放过，并且注意防患于未然。此外，同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相比，克罗地亚的人口、幅员和资源也经常提醒克罗地亚人，如果他们选择独立单干的道路，并且情况许可的话，他们是有所作为的。最后，他们那个邦国也是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多民族共和国，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多半来自民族杂居特别突出的地区或共同体，这一趋势在1970—1971年再度引人注目。

另外还有一个在兰科维奇倒台之后由于克罗地亚和塞尔

维亚在民族情感方面的不同地位和不同想法引起的纯属临时性质的原因。如所周知,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应果然不出所料,并且采取了“地下政治力量”的形式。这个“地下政治力量”被说成兰科维奇的追随者(兰科维奇本人始终忠于铁托,下台以后未闻有什么政治活动)、前斯大林主义分子及情报局分子、“新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以前的切特尼克保皇党人结成的并不神圣的同盟。有一段时间,“塞尔维亚问题”似乎取代“克罗地亚问题”而成为南斯拉夫最紧迫的民族问题了。这一危险之所以终于没有酿成大祸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并给同时期克罗地亚事态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对照。由于只有塞尔维亚民族问题被认为同兰科维奇、“南斯拉夫一体化”、保守共产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是一回事,所以大多数被正确地或错误地怀疑为公开的或隐蔽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人,从1966年7月之后就被逐渐解除领导职务。1968年党代表大会之后新上台的塞尔维亚党的领导成员,是同他们的克罗地亚地位相等的人们一样年轻又一样“自由主义的”。他们也是更加精明的政界人物,由于不断清除而没有沾染传统形式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种传统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通常是“霸权主义的”,因而也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主义的。在这里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塞尔维亚党的新领导在施展政治手腕和运用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论战”(这被设想为新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对付敌手时的唯一合法武器)方面大显身手,使灰心丧气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至少暂时处于瓦解状态,无力行动。

克罗地亚的局面完全不同。在那里,克罗地亚的民族情绪和合法抱怨曾大大加强了对“中央集权主义”的抵抗,并且

终于把它打倒。新近发生的种种事件根本没有影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信誉。更有甚者，许多克罗地亚人发现一种新的有说服力的说法来支持这样一种情绪，即塞尔维亚人毕竟胜利了（还有一些塞尔维亚人也抱同样见解，这是他们同新形势和解的又一原因）。在战前的南斯拉夫和战后的头十年，常常有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争辩说，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权来抵消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所操纵的经济大权。现在，贝尔格莱德那个“中央集权的”政权的倒台似乎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① 因为战后的中央集权留下的永久性的遗产，其中包括压倒一切的经济大权已以大银行、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总公司以及资金最足、实力最强的商业企业的形式从萨格勒布转移到贝尔格莱德了。

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克罗地亚的领导对 1967 年 3 月的“宣言”和同年 10 月清洗霍列瓦茨一事作出反应之后，看起来他们愿意而且能够在口头上和实践上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反对他们认为存在于内部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贝尔格莱德的“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残余”。联邦中央那个旷日持久的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僵持局面以及这种局面引起的后果之一，即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经济“集权主义”的顽固性，导致了克罗地亚改变策略，从而也改变了萨格勒布的力量平衡。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巴卡里奇，付之实施的是他那些精明程度稍逊一筹的门徒，而其领导则是特里帕洛、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皮尔凯尔这三巨头。事实证明，这一结合对于克罗地亚的策

^① 皮洛士系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 280 年率兵渡亚得里亚海与罗马交战。最初虽在赫拉克里亚和奥斯库伦两地获胜，但损失大批有生力量，此即所谓“皮洛士式的胜利”的由来。——译者

略乃至兰科维奇下台以后的整个南斯拉夫都是命运攸关的。

联邦中央的僵持局面还在继续。新设的党的执行局并不等于一度是全能而又独裁的、许多人望而生畏的政治局，不过是那些共和国巨头之间又一个议而不决的论坛而已。那些巨头仍然认为自己肩负的主要责任是照顾本地区（因而也就是本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全南斯拉夫的利益。经济和社会问题继续存在，有时规模还在扩大。现存的社会体制显然无力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这就扩大了不满者的行列，振奋了这个政权的党内外反对派的士气。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势力趋向于分化为两个极端：民族排外主义或者新的中央集权主义。因为两头着火，克罗地亚领导于1969年下半年决定集中力量去对付他们认为更加危险的一头。

1969年12月13日，巴卡里奇在向克罗地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所作的一次讲话中亲自阐明了这个抉择的基本原理，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他甚至用更为清楚的语言作了说明。这两件事标志着克罗地亚政治新阶段的公开发端。

巴卡里奇对共和国党中央会议说，他希望就克罗地亚的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党的路线的危害问题进行讨论。克罗地亚的集权主义的根子在于这一事实：克罗地亚共产党的所有创始人（铁托本人除外）年轻时都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他们入党后仍然抱着那个传家宝不放。他们的集权主义思想后来由于战争期间伪政权乌斯塔沙的残杀、1948—1953年间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和战后共产党统治的集中制而增强了。战后时期中央集权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为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条件。因此，克罗地亚

共产党内的中央集权主义分子代表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势力，其中的许多人就在拥有决策大权的最高党政机关内部或其周围。但是，他们只有凭借外界的支持才得以重新掌权，他们的力量存在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和共产党情报局势力”。

另一方面，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从未在克罗地亚党内成为一种“持久的倾向”，尽管个别民族主义分子常常钻进党内。那么，民族主义分子能够组成一个政府吗？不能，他们过于分裂，过于混乱，被乌斯塔沙这一变种搞得过于声名狼藉。由于前途不明，传统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就象过去那样钻到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在南斯拉夫的批评讲坛上指手划脚寻找差错。这完全是消极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只能搞点“破坏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积极的“真正的思想或纲领”，在其他方面倒也没有危险。

12月会议和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1970年1月15日—17日)开会之时，正是著名的克罗地亚政治家让科在《战斗报》(克罗地亚领导认为该报是拥护中央集权并反对克罗地亚的联邦报纸)上就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之日。文章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日益增长的活动提出了详尽的有文件为根据的分析。并且暗示克罗地亚党的领导对他们除了口头上说说而外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措施。陷得特别深的是文化组织“克罗地亚母亲社”，它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十年的“斯拉夫觉醒”和艰苦的国际斗争期间，对于发展克罗地亚的民族意识发挥了卓越的推进作用。据《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描绘，“母亲社”现已落入民族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手中，他们把它改变为同共产主义者联盟竞争的政治组织。

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公开批判让科，“因为(他的)观点和行动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方针、路线相对立”。他的文章被说成用心险恶地指责克罗地亚党的领导对民族主义心慈手软，企图把它搞臭，从而把它推翻。由于克罗地亚共产党人和克罗地亚公众对现领导充分信任，要推翻它只能通过外来干涉，因此让科必然有意无意地充当这种干涉者的代理人。巴卡里奇在12月16日的演说中就已指出这样的干涉者隐藏的地方，那就是“塞尔维亚的‘查尔希亚’”(“查尔希亚”一词是对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政治的贬称)。他具体地指出，“塞尔维亚的‘查尔希亚’不是指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而是指“联邦部分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企图维护自己的权力，为此目的“竟向公众隐瞒国家所面临的困难的性质”。

这次会议后来成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图腾和“进步”观点的试金石，具备了这些观点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都可以参与克罗地亚的政治。根据后来的解释，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的第一项原则是全力以赴地同被他们看成民主社会主义和克罗地亚民族利益的主要威胁的中央集权主义及其拥护者作斗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在性质确实并指明了具体所在的情况下，也被斥为异己的和危险的，但在眼前却被认为是次要的威胁。以民主的名义同这些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只能使用“思想政治的”和间接的武器，展开辩论并采取积极行动以解决经济问题，根除民族主义赖以滋长的“官僚集权主义”对克罗地亚的剥削。为了达到根除“官僚集权主义”的目的，同盟军是必要的，而且应当发动群众去寻找。在这里，“自治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当然必须坚持。同盟军还可以包括非党人士，甚至包括被这样的纲领争取过来的原先

的民族主义分子，还可以到别的共和国去物色。“让科事件”揭露了主要的敌人的面貌，也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敌人在克罗地亚内外都有。因此，压倒一切的任务应是建立坚如磐石的克罗地亚统一战线，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办法在内部实行政治整顿；“克罗地亚划一化”一词迅速成了人们爱说的政治用语。

巴卡里奇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计划看来是回避党中央和联邦中央出现的僵局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自治方面的“停滞”——这些情况正在给以民族主义形式和新集权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对派帮忙。由于各共和国之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陷于僵持状态，联邦中央已经不能有所作为。共和国的党和政府则不会受到这种拖累，不过仍然需要拥有赖以行动的足够的经济手段(或“物质手段”)，忠实支持的选民，干部之间的坚强团结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样武装起来的并且在巴卡里奇培育出来的进步领导集团指导下的克罗地亚，能够为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提供一个成功的、新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榜样。这个策略的新鲜之处是，暂时放弃了在联邦一级对现制度进行改革的努力，也就是说，可以在一个共和国建成现代的社会主义。

如果这个策略的目标果真如此，那末这一策略有四个弱点：

1. 根据克罗地亚的历史背景，势必要争取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在共产党眼里是危险的同盟者)提供帮助。巴卡里奇承认这一点，但是硬说民族主义分子四分五裂，没有组织，也没有积极的纲领，结果是打错了算盘，低估了危险。

2. 由于民族情绪和在异族统治下长达千年的屈辱感在

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心里是一触即发的，因此用一个民族的纲领来号召有政治觉悟的阶层简直易如反掌，令人跃跃欲试。而多年来在自治问题上看起来不着边际的言论，使南斯拉夫人对自治到底是否可行并无坚强信心（说来奇怪，只有寥寥无几的政界高级人士是例外）。因而如果改在“阶级”或“自治”的基础上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那将是困难的。

3. 由于提高了共和国党政机构的权力和威望，并且把共和国领导人当做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这个策略在倾向上（如果不是在概念上）是“反对自治”的。这一点可能并没有使巴卡里奇忧心忡忡。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在被迫表示自治制度切实可行毋需居间人物的信念时是否表里不一，这一点几乎是始终无法说清楚的。然而，除了—定从中获利的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也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策略在这一方面的妙处。经理们以及克罗地亚新兴“中产阶级”（在此时前后，这个称呼多少带有勉强使用的味道）的其他成员，对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央集权及其包含的一切全无好感；但是，对于拘泥死板地实行自治理论而不要居间人物也同样兴味索然。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样一种制度即便不是荒诞不经，也是效能低下的。他们的本能和历史经验也向他们暗示，一个既尊重并支持他们的作用，又被群众拥护——爱戴就更好——为民族中坚的坚强领导，乃是免受集权之害又摆脱自治之患的最好保障。

4. 为了避免用妥协的办法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为了顶住用取巧的办法去争取群众支持的诱惑，并且避免成为中产阶级“专家政治”的工具和后台，党的领导需要有高度的政

治手腕、卓越的智慧、冷静的头脑、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特别是一个在斗争中受到同盟军的烦扰而又需要同盟军帮助的领导,更需要这些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才能顶住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的坚决反对,顽强推行克罗地亚对联邦机构的权力和权限的观点以及进一步实施经济改革的观点。三巨头及其朋友们深信,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是绰绰有余的,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的自信心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月份会证明他们并非如此。

有一段时间,联邦一级的政治形势继续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1970年4月,即克罗地亚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之后三个月,南斯拉夫党的主席团通过决议承认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主权”,并且规定把南斯拉夫联邦作为“各共和国之间进行协调和推动合作的机构”。联邦的权限必须限于外交、国防以及为了保证单一市场和经济制度以及民族平等所必需的职能。联邦政府和联邦军队在人事政策上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遵循“民族钥匙”的原则(在各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实行严格的比例代表制)。党还任命了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各种委员会。10月间,塞尔维亚政府和塞尔维亚议会主席团赞同克罗地亚的观点,主张把联邦政府在提供资金(通过设置额外预算帐目)方面的残存职能一劳永逸地予以废除。此后,塞尔维亚政权同萨格勒布一样有力地坚持在联邦预算方面应当“帐目清楚”。

朝着邦联发展

继承问题是铁托本人于1970年9月21日在萨格勒布召

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故意装成并不在意的样子特意提出来的。铁托说：国内特别是国外纷纷猜测，当他一旦逝世，不再能象征并保证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时，南斯拉夫会出现什么局面，这种猜测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因此，为了煞住这股猜测风，并从现在起就逐渐过渡，他建议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建立一个取代他这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它的成员由来自六个共和国的人数相等的“杰出人物”组成，两个自治省也应占有适当的比例。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提议不过是“九大”为党设立的执行局在国家机器方面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各共和国一律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联邦一级的国家机构，以符合“九大”给联邦一级党的机构所作的决议，这一点本来已在考虑之中。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提议的含义又超出了这一点。它公开把继承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使之成为当前这个紧张的南斯拉夫方程式中所有其他变数的关键。在其他变数中，这个提议把共和国关系中越来越敏感的问题，也就是民族问题，放在最前面。通过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为其他互有关联的制度变革，从而也为广大公众讨论联邦本身的性质问题，敞开了大门。

现在已经七十八岁高龄的铁托，仍然享有比他的年龄要年轻得多的人的身心健康。这从他在以后几个月中再度频繁而有力地公开过问国内政治，以及在卢萨卡会议（这次会议紧接萨格勒布会见，会议之后又马上出访一系列西欧国家）上显然毫无倦色，就表现得很清楚。看起来，因死亡或不能工作而离开政治舞台的日子，对他来说尚未逼近。因此，从时机的选择来讲，他所提出的继承问题可以被视为人为的危机。这场危

机是由一位领袖深思熟虑地挑动起来的，他年事虽高却并未使他那敏锐的政治本能和冒险习性有所减色。他大胆地决定，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按照自己规定的条件，当着有朝一日会酿成祸害的因素还控制得住的时候，趁着他还能亲自处理这些因素的时日去迎战未来。暴风雨的阴云已经集结了一些时候了。铁托决定象他故乡扎戈列的农民那样采取行动，那里的人在真正带雹的雷雨云砧袭来之前就燃放火箭，使暴风雨加速到来，免得冰雹越凝越大以致毁坏他们的葡萄园。

在萨格勒布会见之前，铁托于8月28日和29日访问斯普利特和扎达尔期间，就已直言不讳地谈到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党所面临的困难局势，这种坦率态度使人联想起1962年他在斯普利特所作的演说。他说，错误多半由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守纪律，也由于对民主和党的任务理解不当，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952年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他对各个地区为了寻求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施加的“政治压力”特别感到担心。所谓“政治压力”，看来他是指前一年夏天的斯洛文尼亚“高速公路危机”、克罗地亚党中央的第十次会议以及其他未经宣布的事情。

铁托谈到党的“六大”、共和国的“压力”以及他自己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解时所作的暗示，到下一年就发展成越来越明显的威胁。不过，与此同时，他在9月间关于设立国家主席团的建议表明，他仍然愿意沿着1966年以来所探索的道路再试一番。

10月召开的南共“九大”后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会议的结论恭顺地赞同了铁托的建议，并且把他的建议放在范围更广的背景上，使之同前一年春天通过的

党的主席团的决议协调起来。结论写道：“进一步改造联邦，使之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发挥协调各共和国地位和主权以及各自治省自治权的作用，乃是当务之急。”就在10月底，成立了联邦议会各院的联席委员会，以起草1963年宪法的第三批修正案。这是要一举完成两项互相矛盾的目标的又一次努力：用一服剂量更大的仁慈之药扑灭主张各自为政的地方民族主义，同时通过地区之间协调一致的办法设立新的决策机构，以了结联邦中央的瘫痪状态。在担任主席的卡德尔领导之下，这个联席委员会下属的几个小组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都是在共和国和自治省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组成的。

在宪法修正案上取得协议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经历的困难也较预期的为多。铁托提出的继承问题的答案所促成的风暴，其雷电交加的猛烈程度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希望驱散的紧张气氛和“种种猜测”愈演愈烈，而不是日趋缓和。联邦行政机关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对此，政府成员予以谅解，因为广泛深入的宪法变革正在讨论，现在它已经成了半身不遂的机构，不应采取积极措施，以免束缚来年上台的新的权力结构的当权者的手脚；不过议会的议员们却攻击它们无所作为而不予谅解。由于讨论中的宪法变革幅度甚大，也由于地区头目们在几乎所有关键问题（包括联邦保留的权力、地区与联邦的关系以及新的联邦结构内部的权力分配）上都无法达成协议，政权空白期一延再延。

现已达到的“民主化”的水平所产生的副作用，使各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加深了。意义重大的体制变革（改变联邦的性质）并不是上面强制下面执行，大家只要对既定方案讨论一

番，虚应故事，而是在办法草拟出来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公开争论，进行笔战，这在战后的南斯拉夫还是第一次。对于这种程序，无论观众还是参加者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政界领导人在演说和文章里亮出他们的观点，提出讨价还价的初步条件，使用那种在党的高级会议进行幕后斗争时所惯用的激烈调门。有派性的地方报刊杂志，用报界那种激烈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断章取义地引用“反对派”的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大战以来的亚得里亚海东岸也是闻所未闻的。广大公众对于这种要求已久的场面一时还不习惯，不免大惊小怪，流露了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的领导人中有些人受了这种新型政治把戏的刺激，也大搞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被人视为民族主义的煽风点火。

一连几个月，严阵以待的各民族领导一心想着进行顽强的讨价还价，对群众中日益强烈的惊恐的喧嚷充耳不闻，对放肆的“沙文主义越轨行动”的潜在危险熟视无睹。与这些同群众联系较为直接、看来愿意也能够接近群众的代表人物相比，还是铁托再次表明了他更为关心人民的心情。4月间，他又到农村进行不知疲劳的周期性的访问，同当地领导人和普通公民谈话。这一回是到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南部和科索沃，其中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是民族问题特别敏感的民族杂居地区。随着视察的继续进行，他对所见所闻感到愈来愈恼火是一清二楚的。最后，在布里斯蒂那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人当着他的面发了一通民族主义言论，于是他怒不可遏地说道：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整个事业赖以发展的思想政治源泉。可是，共产主

义者联盟内部的行为不检点，我不满意。我得说，这种情况叫我很伤心。你们知道，我长期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盟，但是我想，到现在为止，事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糟过。……可是只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只要广大群众拥护我，我就得努力把共产主义者联盟整顿好。

他说，如果情况不见好转，就得诉诸行政手段：“我知道，会有人大喊大叫反对不民主的程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当行为成了问题，尤其是共产党人也这样干，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更切中要害地说，他要召开一次党的主席团“和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及自治省的最重要的负责人”的特别会议，“除非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否则我们就不散会。”

与此同时，在这次大发雷霆之前六个星期，关于联邦的未来形式的日益尖锐刻薄的公开辩论，终于取得了若干比较集中的意见。宪法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小组委员会于1971年初在布里俄尼岛“禁闭”了一个月，以使它的成员与众隔绝，并摆脱选民的日常压力。在此期间，他们终于草拟了一个包含十九条的修正草案。该草案经党的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之后，于3月初为宪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所通过，从而开始进入宪法规定的正式的公众讨论阶段。这一批修正案（经过若干修改，还补充了两条修正条款）到联邦议会夏令休会前夕的6月30日才最后通过并公诸于众。

那些最重要的角色即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辩论期间所采取的态度只能加以揣测。他们在“秘密会议”上讨论宪法修正案的记录至今秘而不宣，这同当时流行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从公开的讨论和已发表的讨论情况来看，塞尔维

亚的部分论点和克罗地亚的部分论点中间存在着对立则是可以断言的。前者的极端意见以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教授和讲师的三天辩论为代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直言不讳地把修正案谴责为南斯拉夫毁灭的开始，另一些人则关心居住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外的塞尔维亚族人的命运。在克罗地亚也有一种相对应的极端意见。据称，宪法修正案只是完全实现克罗地亚“民族愿望”的第一步，这种“民族愿望”具体地表现在“克罗地亚母亲社”新办的“文化”期刊《克罗地亚周报》之中，它的发行量迅速超过了《信使报》。在联邦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结束之后，《克罗地亚周报》又以同样的热情着手提出“克罗地亚母亲社”关于相应修改克罗地亚宪法的详细意见。一项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要求是给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下个直截了当的定义，把它叫做“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国家”。对此，特里帕洛代表克罗地亚党的领导的回答是，克罗地亚“不仅仅是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国家，那是不在话下的，克罗地亚还是居住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族的国家，也是居住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家”。

6月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最后文本对这类批评意见不加理采，却从南斯拉夫社会制度中更为正统的方面，包括工会联合会和4月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社会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吸取了技术性的和实质性的建议。工会和萨拉热窝会议的代表们对修正案中的三条（即后来以“工人修正案”著称的第二十一条到第二十三条）特别感兴趣，而这三条却没有涉及联邦的组成问题。“工人修正案”的用词异常晦涩，即便同本已晦涩的南斯拉夫宪法本身相比也是如此。当时人们不大明白其中含义，而且一般说来也无人注意。直到后来人们才清楚，这

些条款在原先 1963 年宪法中阐述的社会自治的管理原则同 1974 年宪法中新形式的管理原则之间，构成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和哲理性的联系。这些条款标志着一种新概念——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初次正式出现，也标志着利益共同体以及自治协议和社会合同的进一步发挥，成为南斯拉夫社会进一步取消国家控制的主要手段。卡德尔和联邦议会主席 M·波波维奇在他们评论修正案的权威性言论中说，这三条是进一步变革的先兆；而当时人们期望这种变革会采取另一批修正案的形式在 1973 年完成。在那民族问题正在风头上的时期，它们也代表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保持着的第二次“自治”潮流。

修正案第二十条提出了余下十八条修正案的基本思想，其中多数条款在略加变动后纳入 1974 年宪法。它同 1963 年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相反，除明确规定赋与联邦的权力之外，把重要的主权和其他一切权力都划归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留给联邦的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几乎仅限于外交、国防和为了保证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统一的货币与外贸政策以及“政治制度的原则”和民族与个人的权利所必需的若干措施。^①

即使在这些领域，也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序之后才能作出决定。这些程序旨在保证各地区之间意见一致，从而实际上承认了联邦的每个组成部分在涉及同它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时拥有否决权。宪法具体规定的联邦议会必须在“同有关共和国和自治省取得协议的基础上”才能行动

^① 此外，只有“当经济上有必要防止或消除重大的混乱时，或者出于国防的或其他非常情势的需要时”，联邦机构可以对共和国和公社的征税权施加临时性限制，或者不准企业、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使用某些基金（修正案第二十八条）。

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包括共和国之间常常发生纠葛的一切方面。^①此外，联邦预算中唯一的直接收入只有关税和国家印花税；其余收入则来自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所征收的流通税的回扣，而其最高限额还需经过共和国和自治省认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平等权（或称“民族钥匙”）不仅提供了新成立的国家主席团的基础，也提供了构成其余大部分重要的联邦机构和组织的基础，这包括联邦执行委员会，联邦议会中权力最大的民族院（该院本已按此原则组成），宪法法院以及各部的人事安排。根据1969年的国防法建立起来并置于共和国指挥下的地方民兵也得到宪法的承认。

根据宪法，南斯拉夫国家主席团由每个共和国派三名代表，每个自治省派两名代表组成，而不是每个共和国两名，每个自治省一名，这在铁托提出建议时似乎已经想到了。代表名额之所以需要增加，是民族杂居的各共和国内部民族问题敏感的另一标志。当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认为两名代表不敷分配，为了保证共和国三大种族集团各有一名代表，它需要三个名额。结果主席团势必成为一个臃肿不堪、效率低下的机构，这从1974年宪法把它从二十三人压缩到九人（铁托仍包括在内）这一点可以说明。

有关机构设置的这些规定，实行了还不到三年，就有一部分被1974年的新宪法所废弃。注意这些规定实际作用的演变，要比详细考察这些机构形式上的权力和相互关系更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因为修正案预作规定的不过是这一时期实际

^① 条文上列有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外汇和外贸体制，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现在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必须同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新设的国家银行一道作出这方面的决定），流通税收入的分配，以及联邦预算。

起决策作用的机构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些明文规定的机构是国家主席团、联邦执行委员会(现在也是正式按照地区平等的原则组成的,其成员再度兼任部长)和联邦议会。事实上,这些机构与部分或完全未经宪法规定的机构、特别是共和国之间的五个专门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相比,政务要清闲些,效率也差一些。这些专门委员会或协调委员会是谁也没有预见到的,却成了所有政府机构中最重要的单位。

只是出于偶然而由修正案准予设置的五个专门委员会,是在留给联邦的五项重要权限的基础上建立的。每个委员会都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指派的一名代表,由联邦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当这九个人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时,专门委员会就把问题提交完全未经宪法规定的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八名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八名委员,外加其他特定的政界头面人物组成。如果在协调委员会还不能达成协议,理论上还可以把问题提交国家主席团,返回宪法规定的渠道上来。但是,这一着几乎是从来用不着的。有个汇编材料指出,实行新制度的头半年,在一百二十四项^①有争议的问题中,九十二项在共和国之间的专门委员会内部得到解决,剩下的三十二项在协调委员会里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种办法的一个附带后果是把议会和政府重新变成了共产党专政初期那种盖橡皮图章的机构,从而结束了南斯拉夫议会在施政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而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的立法机构史上,南斯拉夫议会所曾起过的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道理很简单,在整个施政过程中地区否决权就象

^① 原文数字如此,与下文似有出入。——译者

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一样，共和国之间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立法性的或规章性的提案，代表了一个长期而又棘手的争吵、互让乃至退回八个地区首府(明确地提交共和国或自治省的政府，因而不能提高地区议会的权力)再议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执行委员会(它正式把这些提案提交联邦议会)和联邦议会各院(它们必须对这些提案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处于不能辩论、不得修改的巨大压力之下，否则，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妥协办法的某些细节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如果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话，那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制度毕竟能够有所作为。六个月里解决的一百三十四项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是在1971年12月到1972年3月之间处理的。其中，包括诸如对外贸易和外汇制度、物价政策以及本应在1970年通过的五年计划这样一些重要的、易动感情的问题。这比前两年中所解决的争端大致要多一百三十项。想把上述变化归因于根据修正案所作的调整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修正案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了邦联的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否决权(它从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使中央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并把它们制度化了。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在变。

1971年最后几个月的一连串事件是把那些对近几年来联邦中央陷于瘫痪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撤掉。同是这些事件提醒其余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对近来扩大地区自治与伴随而来的更为自由、更为多元化和分享决策权的现象持赞赏态度的人，使他们认识到，南斯拉夫的最高主宰者仍然有力量也有决心取消(至少是限制)那种在他看来是滥用的权利。同时，公众的反对对他们也起一种提醒的作用，使他们明白，有许多在中

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统治下尝过捆住手脚之苦的人健忘得很，他们会随声附和那个主宰者对滥用一词所下的定义，拍手欢迎他所投的烈性药剂，尽管事后也许会懊悔。那些察觉到自己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政治立场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包括至少四个共和国的大多数党政领导人，对使现有制度得以运行突然热心起来，而不管这个制度究竟怎么样了。

可是已经晚了。1972年，那个四分五裂、士气低落并在一个地区里已判处政治死刑的自由派联盟终于大难临头，铁托支持的大恐怖向他们袭来了。从克罗地亚开始的危机震撼了整个制度。

通向卡拉乔尔杰沃之路

铁托在布里斯蒂那提出的党的主席团和其他“负责人”的会议，于1971年4月底及时举行了。会议是在他的亚得里亚海休养地布里俄尼岛召开的。这次历时三天的会议作为党的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载入党史。会后发表了一个特别平淡的公报。会上的讲话不曾发表，这同党的通常做法不一致，不过铁托在“五一”讲话中为此进行了辩解。他认为会议开始时分歧很尖锐，公布那些讲话只会加剧紧张气氛。铁托说，重要的是他们在休会前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公报列举了协议的内容：宪法修正案已经充分讨论，应当予以通过，并毫不拖延地加以实施；民族主义和那些分裂的领导班子是不可取的，其他一切有争议的事项是可以协商的。

会议期间还发表了另一个文件，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这不是党的文件而是政府文件，按照常规它是应该在贝尔格莱德

发表的。眼下这样做是打算把当时在克罗地亚展开的政治剧中迄今为止最为神秘的一章作一了结。

三个星期以前，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异乎寻常的声明，指责“某些联邦机构”编造克罗地亚党领导同流亡西欧的乌斯塔沙互相勾结的罪证，“阴谋”诽谤克罗地亚党的领导。提出这个指责的背景是人们对这些流亡团体以及它们在克罗地亚的出国劳工中吸收新成员感到越来越关切。4月7日两个侨居国外的克罗地亚青年工人窜进南斯拉夫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开枪把大使打伤在地。三天之后，当大使奄奄一息的时候，西欧最有影响的克罗地亚分裂主义组织（其首领最近宣称他们得到苏联的支持）在慕尼黑举行了一次挑衅性集会，纪念1941年建立的法西斯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三十周年。

现在看来，克罗地亚领导人关于有人“阴谋”反对他们的指责曾于2月或3月在联邦一级党的会议上讨论过。会议同意在党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之前不公开宣布。此后，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在一次不寻常的秘密会议之后，由于仍然难以揣摩的原因，决定违反协议，把指责加以公布。事情既已发生，指责又这样严重，涉及政府机构，于是有必要任命一个联邦执行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同已在进行的党的调查同时并举。在布里俄尼发表的就是这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不过报告发表之后事情变得更加令人莫测高深。报告毫不动摇地为迄未指名的联邦机构①开脱，说它并未从

① 尽管一般推测是国家保安部干的，但当时有个传闻指出军事情报局是嫌疑犯。很久以后，巴卡里奇于1974年在萨格勒布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好象暗示外交部中的克罗地亚中央集权主义者应对此负责。

事无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不正当活动。不过报告也承认并深表遗憾：国外（出处和人物都没有说明）确有诽谤克罗地亚领导的阴谋活动，硬说他们同流亡者有联系，其实并无其事。这一事件及其拙劣的处理方法说明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互通声气的破裂，并且搞得到处神经紧张，克罗地亚首都尤其如此。

后来透露的消息也证实，克罗地亚领导在布里俄尼会议上由于别的和涉及面更广的原因受到申斥，申斥他们的主要是铁托本人。据报道，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代表们企图把争端公开，斯洛文尼亚人建议（但未坚持）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之间存在着必须以某种方式予以重视的严重分歧”。可是铁托并不同意。他的态度与众不同，宁可把争端作为党内最高层的一件私事，并且自我安慰地相信人人都已吸取教训，因为大家都恭顺地说，他们已经吸取教训并且要改过自新，弥合分歧。所以谁也不想说出或者暗示哪个共和国的领导受到了指名批评。

这项政策又被铁托执拗地坚持了七个月。他所以宁愿这样做，是因为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出于自身的考虑（尽管在别的任何问题上不再一致）也在施展同样的策略，这就是对克罗地亚和全南斯拉夫舆论（包括铁托在内）隐瞒他们的内部分歧，愈来愈不顾一切地想避免克罗地亚危机“南斯拉夫化”。上述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及其对党内关系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势必使正在出现的危机日益加深并且延长，直到铁托认为只能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加以收场。这样一来，也就改变了整个南斯拉夫的权力平衡。

1971年初，即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一年

之后，它所确定的策略是成败交织，得失并见。这种后果的性质和成败的比重，使特里帕洛、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及其一班人确信：他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并分清了敌友的界线。联邦的改组及其权限的缩小正沿着符合他们愿望的大方向继续发展。克罗地亚处在南斯拉夫建立以来史无前例的“民族幸福热”（这正在成为克罗地亚领导的惯用语）的旋涡之中。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特里帕洛颇孚众望，可以同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春天的杜布切克相比。也象杜布切克一样，这种令人陶醉的名望使他们日益自信，更不妥协，并且迅速（至少是部分地）成为他们大批听众的激昂情绪的俘虏。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里，他们至今未能贯彻他们认为是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其中包括改革银行和外汇制度，对殷实的贝尔格莱德各进出口公司予以约束，并重新分配原属联邦的资产和债务。在这里，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的错误，其后果将遍及各个方面。这就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以不妥协的激烈态度强调自己的立场，使人感到他们的全部要求都是根本不能讨价还价的。

采取这样一种姿态有好几个理由。首先，这些问题涉及那些必要的经济手段。没有这些经济手段，克罗地亚的政治经济自主的目标就难以完满有效地实现。没有这些经济手段，根据宪法修正案把经济计划和管理职责移交共和国的规定仍将是空话一句。因而，即使在铁托去世后出现真正的议会民主，要使发达的北方（包括克罗地亚在内）不再遭受数量占优势、经济不发达的南方的“剥削”，也还缺乏充分的保证。其次，如果认为在最近几场斗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所引起的自

我陶醉助长了领导的强硬态度，那末这样的猜测也不无道理。最后的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克罗地亚领导在以下问题上确实第一次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们在以民族纲领动员群众方面颇有成就，在默许那些不受党的群众组织系统的纪律约束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包括施加压力和进行批评的权利）方面颇为得计。他们越是坚持认为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的立场代表了克罗地亚的重大利益，那末要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就越不可能。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失去了克罗地亚境外的盟友。自从1965年改革和兰科维奇垮台以来，在克罗地亚同贝尔格莱德的每一场斗争中，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支持特别重要。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人曾一度显得是反对中央集权的最不妥协的力量；1969年的“高速公路危机”即其一例。然而从那以后，他们就软化下来了。使他们警觉起来的因素显然有两个：首先是，对于一个严重依赖较不发达地区、要在那里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并从那里取得原料的工业化地区来说，实行共和国经济自给自足、闭关自守是否可取；其次是，感到了那些受激进的反中央集权主义所吸引的民族主义同路人的危险性，这些要不得的盟友日益增长的势力，可能导致分裂主义，也可能引起中央集权主义的反扑。相对说来满足于地方分权的现有水平，又被克罗地亚形势发展的含义所惊醒的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领导人，正愈来愈准备讨价还价和实行妥协，以便达成一些协议，从而使已够软弱的联邦机构可以重新开动起来。就这样，克罗地亚代表团发现自己在各共和国之间的谈判中常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孤立的状态对克罗地亚领导人及其策略至少有三重影

响。首先,使他们愈益感到必须具备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否决权),以保护每个共和国在联邦中不致被投票所压倒。这一观点在1971年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公众辩论期间被越益强调地表达出来。其次,对领导人来说,孤立状态还增加了克罗地亚共和国内部的群众对其支持的相对重要性,并使他们更加依赖群众的继续支持及其团结一致。“克罗地亚划一化”(既意味着动员非党人员,又意味着要使党内怀疑派和反对派改变主意或者把他们的嘴巴封住)占有比以前更为优先的地位。第三,既然在联邦中处境孤立并自称得到全体克罗地亚人的广泛支持,那末按其“内在逻辑”就得强调他们首先是民族领袖,然后才是共产党的或“阶级”的领袖,这就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作风,而且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也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形象。

最后结果只是在1971年年中和联邦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才具体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修正案为通过谈判解决共和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手段和程序。克罗地亚人的孤立意味着,如果不实行妥协,克罗地亚的观点根本无法在这样的谈判中取胜,而萨格勒布领导人所推行的对内政策又使他们越来越难于接受这种妥协。预料到的僵局难以打开,实行妥协在政治上也不明智,他们只得冒着风险在克罗地亚鼓励或至少容许施加超出宪法规定的压力以支持他们的谈判地位。

克罗地亚党中央第十次会议在进步的、有民族感的克罗地亚共产主义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之间划出的“清晰界线”开始泯灭。克罗地亚领导人在群众面前都反复强调,他们在有效地保卫克罗地亚的民族利益(仍然同整个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提并论,但是由于丧失了在其他共和国的盟友,这

一说法的说服力已经减弱),这就使他们自己容易遭到民族主义者的责难,指责他们在确定或保卫民族利益方面警惕不够或者成效不大。为了在口头上和行动上作出反应,他们把自己置于令人难以理解的地位。他们虽然并非有意,实际上却把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合法化了,使民族主义成了忠于他们自己发动的“民族运动”的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在当前,“民族运动”对克罗地亚领导自己的合法地位和讨价还价的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抓住这面大旗,他们只有比民族主义走得更远,舍此别无他法。

克罗地亚的孤立处境以及那个被看成保卫民族利益的领导班子的成功和失败,使得“民族幸福热”变得更加强烈。同大部分关心政治的克罗地亚城市居民的任何一次交谈中,至少通常占第二位的题目——民族问题,现在毫无例外地成了首屈一指的着了迷似的话题。这种变化的气氛是咄咄逼人的,而且愈演愈烈。人们在谈论的真真假假的受委屈的情况愈来愈多,次数愈来愈频繁,内容也愈来愈详细。这些委屈涉及各种类型的经济剥削或有多少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的企业里当头头,在克罗地亚部队里当指挥官,以及在克罗地亚的工厂中、铁路上或萨格勒布的警察局里占了位置。

“民族主义分子的过火行为”日益频繁:从臂章上印有克罗地亚民族标志(一种红白两色方格图案)的一伙青年半夜破坏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一块广告牌,到高举克罗地亚旗帜、身穿没有必不可少的红星的军装游行示威;从发动一场政治斗争赶走企业里的塞尔维亚族经理,到足球赛中打败了一个塞尔维亚队而大哄犬闹,或者在民族杂居区的街头巷尾吵架等等。尽管多数事件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但是这些事件足以

煽起摆脱内战灾祸才三十年的民族感情。

这时，克罗地亚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了。

关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及其对党的战略的影响，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在1971年2月共和国领导人的内部会议上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以达布切维奇-库查尔、特里帕洛和皮尔凯尔为首的一派坚持认为：“民族主义的过火行为”是支流，而“民族幸福热”是社会主义的，就其本质和方向而言是积极的，也符合党的纲领和目标。他们认为，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所制订的策略应当继续执行。他们辩解说，他们同“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审慎联合，能加强克罗地亚党讨价还价的地位，促进党面向群众，还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行，让更多党外的、本质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分子参加政治活动，从而孤立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使之无法兴风作浪。但是另一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包括执行委员会九个成员中的七个）则争辩说，自从共和国党中央第十次会议以来民族主义逐步升级，因此对党的策略应当来一次彻底的重新审议。

后一集团的成员在危机后所做的解释之所以较为全面和准确，是因为他们是基于下列两方面的观察提出最初的异议的：第一，克罗地亚党容忍民族主义“过火行为”，不管它是否是支流，正在引起全国其他地区 and 克罗地亚境内非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的恐慌。这会使克罗地亚领导集团陷于孤立，并削弱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甚至会招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个“更大的危险”。第二，它触及一个心照不宣的根本原则，即持不同政见甚至持反对意见，只要不组织起来，就可予以容忍，甚至还能做出积极贡献。这是党在日益多元化

的南斯拉夫政体中一直可以要求保持最高政治权力的基础。他们注意到，在“民族幸福热”中，那些“不是我们一边的人”正在取得进展，被党和群众当作正统的发言人和居间人。因而这个集团感到上述原则已经受到侵犯，并认为这样下去是会使巴卡里奇站到他们一边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人”，是什么人呢？看来，这些人是一股不受党的控制、要跟共产主义者联盟较量的有组织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正在一个一个地抢走他们已经在群众组织中所占的地盘，建立这股势力自己的组织网。这样的怀疑日益加深，证据越来越多。在共产党人的脑子里，即使象南斯拉夫这样比较开放的共产党异端的脑子里，这样一股势力的存在，必然会被先验地怀疑为反社会主义的，是在搞阴谋和反革命。了解这一点，对于弄清 1971 年 12 月 1 日在卡拉乔尔杰沃以及后来所作的那些谴责的性质和严重性是至关紧要的。

后一个集团虽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但其地位远较前者软弱。前一集团包括克罗地亚党内最显要和最有声望的政界人物——特里帕洛和达布切维奇-库查尔。他们的正式职务也使之（和再次因病暂时脱离的巴卡里奇一起）成为克罗地亚最有权威的发言人。这个集团还包括皮尔凯尔，他是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这个地位使三巨头得以垄断同整个共和国下属党组织的联络渠道。另外还包括科普尔特拉，他是执行委员会中负责“干部政策”的成员，管理干部的任命和提升，当年兰科维奇大权在握秘密也就在这里。

“克罗地亚母亲社”的活动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内部产生最初那些分歧的主要焦点。在 1970 年 11 月的年会上，“母亲社”掀起了发展会员运动，并制订了一个新纲领，声称关心政治和

经济问题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1971年8月，“母亲社”的新刊物《克罗地亚周报》第一期发行了。它主要是一个政治性刊物，从它所阐述的观点来看，要是在早先多党制的社会里，就会被贴上“民族自由党”机关报的标签。过了几个星期，《克罗地亚经济论坛》也出来了。它主要阐述“母亲社”在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上的观点。几个月以后，《克罗地亚周报》发行量增加到十万份以上。“母亲社”会员由1970年11月的三十个支部、二千三百二十三人，一跃而为五十五个支部、四万一千人，以十六个“专门委员会”、三十三个“基层委员会”的形式进行垂直领导，总部设在萨格勒布。这确实开始象个半合法的政党，正如当年的南共一样。

1971年4月，它打响了后果重大的第一炮，在克罗地亚拿下了共产党机构的一个堡垒。这是通过一个有组织政治运动实现的，其主要注意力是在这个共产党机构之外从意识形态上与之竞争，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是进行无懈可击的有计划的造反活动；反对萨格勒布大学学生联合会和共和国大学生联合会的现领导。党的领导居然承认了这次造反行动，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被认为是三巨头所犯的第一个严重的终于也是致命的错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完全驾驭局势。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大学生联合会非党的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新领导人布迪沙和帕拉季克还计划组织学生罢课，致使这场危机在七个月之后戏剧性地收了场。布迪沙来自贫瘠的达尔马提亚内地德尔尼什，帕拉季克来自黑塞哥维那，两地都是种族杂居地区，传统上就是激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滋生地。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

联邦党的主席团布里俄尼会议以及当时周围的气氛，使共和国之间暂时出现一种乐观情绪和虚假和平。在党的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星期，铁托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五一节在伊斯的利亚的拉宾；另一次是5月8日在萨拉热窝的自治者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象布里俄尼公报一样，讲话的内容还不及讲话的方式和影响来得重要。

特别在萨拉热窝，铁托情绪激昂。部分原因也许是自治者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未受民族问题偏见的影响，对企业以及经济组织和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然而萨拉热窝《解放报》的讽刺漫画却称这次会议只是“经理代表大会”而不是“自治者代表大会”。铁托极其尖锐地讲到国内的批评家们并不是那些生活困难的工人和领养老金的人（他们有权批评），而是那些有巨额收入的领养老金的人（包括“一些将军——我指的是退休的而不是现役的将军”）。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发牢骚，搞阴谋，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当共和国总统或至少是部长的狂妄野心”。铁托说，在布里俄尼已经取得团结一致，包括保证采取行动，反对

我们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也讲民主。但是我想我们在那里第一次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民主如果被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滥用，则会对社会主义造成何等的危害。

他接着说，在伊斯的利亚讲话之后，他看到一篇西方报刊的评论，说这些话都是老调重弹，“铁托曾威胁过多次，现在又来吓唬人了。这不过是放空炮，事过境迁，一切将依然如故。但是，这次可不是放空炮，我们有足够的弹药。”从文字上看，这

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但是那大众化的甚至富有魔力的语言技巧和精力充沛的表演，却对萨拉热窝和电视的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细节对于了解此后发生的事件至关重要。参加萨拉热窝会议的外国观察家之一，铁托的英文传记作者菲里斯·奥蒂当即反应说：“老魔术师从帽子里又变出一样东西来了。”此后几星期南斯拉夫的气氛真可说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但是政治现实却基本照旧。报纸和政界人物用一种新调子说话，贝尔格莱德的公众情绪一时从危言耸听的悲观主义跳到了言过其实的乐观主义。总之，看来好象最糟的危机已经过去。长期以来共和国之间争执不下的几个细小问题取得了一致。

克罗地亚领导集团也尽了自己一份力量。他们情愿向公众说是毫无损失地从布里俄尼归来了，并把进一步修改宪法的决定视为他们个人的胜利，当作对他们的基本方针的赞同。反过来，他们也知道自已得为创造一个较为安定的气氛做出贡献，使中央政府在其残存的权限和职责范围内能够有所作为。这也就要求他们表明愿意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妥协，并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克罗地亚领导人谈到现在已赢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体制和共和国的“主权”，因此需要证明这样做是行得通的。5月14日，特里帕洛对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说，“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现在）已是一个国家，因此应当象国家领导人那样行事。”

他是在克罗地亚第二十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这话的。这次会议是为讨论贯彻布里俄尼会议的决定而召开的。委员们接二连三地起来谴责各种各样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还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集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的官场

劣迹。但是不久之后，这次会议就被《克罗地亚周报》以及包括某些地区的党的领导人在内的人们斥之为中央委员会里“保守势力”的一次胜利。“克罗地亚母亲社”的发言人和出版物开始提议，必须召开一次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特别会议来清洗这些保守分子，把一些具有克罗地亚感情的“真正的代表”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也是后来党的一些领导人所发出的威胁。

确实，第二十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各个发言的重点显著不同，并且象往常一样，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报纸所作的报道，重点也显著不同。有人要求向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发动全面的政治攻势。有些人则希望慎重地把“分裂主义分子”、“沙文主义分子”和有点“民族幸福热”的人区别开来，后者可以而且正在被引导到对于“自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联盟路线”的群众性支持的轨道上来。有的人讨论了大批发展新党员的问题——许多人坚持要求这样做，认为这是开展称之为“民族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有些人担心没有“思想政治的准备”和预备期的考查是很危险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只适用于早期革命年代，现在早成了老一套保守思想的反映。有些人谴责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没有看到党为了克罗地亚的利益做了多少工作；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党按照这条路线行事，强调民族利益超过了阶级利益，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特里帕洛本着当前这种“群众运动”的基本立论作出了回答。他说：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回事，因为民族和阶级已经融合为一体。

与此同时，三巨头明白表示，在任何基本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在共和国党中央第二十次会议上，特里帕洛又打起克罗

地亚要求彻底改革南斯拉夫外汇制度的旗帜。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竟成为克罗地亚人的主要要求，领导集团对此毫不退让，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跟“母亲社”和别的“民族群众运动”分子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如果说他们所受的委屈是真实的，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简直完全不切实际。

这是一个老问题。有一个时期，萨格勒布商会曾会同其他的主要出口中心（包括卢布尔雅那、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在内）的商会，对联邦政府采取共同方针，要求提高留成部分。而现在，克罗地亚领导集团实际上却在谋求建立各自为政的共和国外汇制度，他们主张各共和国赚多少或汇到多少就留多少，在全南斯拉夫（事实上是在各共和国之间）的货币市场上可以根据需要自由买卖。反对这一建议的主要理由是：这样一来，统一的南斯拉夫商品和服务市场变得毫无意义，同时必然会引起许多同样有理由的补充要求，从而形成双重货币制度，否则就行不通；而双重货币制则无比麻烦，比现行制度更不公平合理。如果实行这套制度，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比如，达尔马提亚的饭店供应外国旅游者食品，“赚”的是外汇，那末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企业卖肉和蔬菜给这些饭店时，又怎能不准它们要求以外币付款？或者其他共和国的一个钢铁厂供应克罗地亚造船厂钢铁时，因为船厂造的油轮卖给了日本，也很难不让钢铁厂要求外币付款吧？这样干起来，事情还有个完吗？^①

克罗地亚领导集团无法回答。争论不久演变到象征性的

^①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提高“留成率”，一般的经济部门留百分之七左右到百分之二十，旅游业留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个办法是在克罗地亚领导辞职从而中止了克罗地亚的否决权恰恰十五天之后通过的。

和感情用事的地步，而不是为了切实可行。这场争论后来还成了学生罢课的借口，并最终导致铁托的反击。

尽管克罗地亚党内战线已经分明，但除内圈人物外，外界只有极少人和一个一贯消息灵通的“克罗地亚母亲社”的执委会知道此事，所以依然有转换立场的时间和余地。以后几个月的政治斗争集中在三条相互关联的战线上。第一条是三巨头及其朋友们跟“母亲社”及其外围组织之间的竞争，为的是保持党对“民族群众运动”的控制，防止可能发生的“过火行为”。第二条是党的领导集团的所有成员力图找到一个关于“群众运动”的定义和解释，以及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和实行的一致的行动纲领，以避免他们队伍的彻底分裂和为最高领导权而你争我夺。第三条战线涉及所有有关各方，他们都想把要解决的问题局限在克罗地亚范围之内，为排除外来的影响和干预而斗争。因为外界干预会削弱他们新近赢得的“主权”和邦联制的原则。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把克罗地亚危机“南斯拉夫化”的斗争。

到11月，三条战线的发展都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第一条战线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事实上已成为三巨头和“母亲社”共有共管的东西。三巨头尽管竭力想保持其唯我独尊的治理权，但渐渐被排挤为次要角色。在第二条战线上，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寻求团结的努力已予放弃。三巨头集团中的一些人或全体成员，都在准备公开较量和展开一场政治决斗，以便排除执行委员会中“宗派主义的”多数派及其伙伴。三巨头的反对派深知自己的弱点，则准备请求外部帮助，向铁托发出呼吁。

恰如其分地理解“斗争”这个词，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样，由于在一个要害问题上无法解决政治策略方面当初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后来便演变成各自试图把这一种或另一种策略方针强加于对方的权力之争；而这种政治斗争又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使得本来就不稳定的平衡增加了新的活动因素。在领导层内部，三巨头集团对于各种警告日益充耳不闻，其实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本来应当听得进去的，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事情正是他们自己也说过和想过的东西。他们的对手则盯住一件事，这就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老看到“群众运动”的消极作用和危险性，并把它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领会民族主义是一个比官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更为强大的发动群众的动力。

在第二和第三条战线上出现的情况是，召开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和议而不决的会议，发表各种各样的内容空洞、无法执行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只有一个例外）。第一条战线上（以及第二条战线上的第二阶段）的战斗遍及整个共和国，但最激烈的是在达尔马提亚、斯拉沃尼亚和萨格勒布本身。它包括大张旗鼓地成立“母亲社”新支部，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以纪念克罗地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事件，争夺党组织和市政府的控制权，以及在经济企业单位为雇用人员和争夺控制权而引起的一些“事件”。另外，在种族杂居地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关系日益紧张，都指责对方在武装自己，准备决斗。

专门分析警察部门、政府机关、党的机构和某些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民族成分，甚至分析某些企业的工人中的民族成分的文章愈来愈多。分析的结果总是发现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所占的比例不足。按“民族钥匙”的准则分

配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名额，原则上是被接受了，可是由于到处套用这个原则，弄得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特别神经过敏和“危机”重重。往往由于历史上和人口统计上的种种原因，这些部门的塞尔维亚人所占的比例比他们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百分之十五要多些。

在这种气氛中，党的领导集团不断开会，展开辩论，并且各持己见。7月4日，愤怒异常的铁托亲临克罗地亚首都，召集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开会。按照处理克罗地亚危机的典型作法，报刊上绝口不提这次会议，也不透露什么情况，因而一般公众只能依赖道听途说，而克罗地亚各级党组织也只能从最高领导层的个别使者那里得知一二。这些说法往往互相矛盾，因而在后来几个月里使农村党组织更加混乱不堪。

1972年5月9日，全国各大报终于发表了铁托于1971年7月4日在这次会上的讲话。这个文本看来象是一个记录稿，其实是根据一些参加会议的人（不用说反对三巨头集团的成员）的回忆和笔记重新整理的，因为看来没有逐字逐句的记录。虽然发表的文本被认为不过是一个相当接近实际讲话的材料，但仍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件。

据称，铁托是这样开头的：“这次，我要先讲话。你们知道，我很生气。所以我把你们都召来开会。会议将不会很长。”他说，克罗地亚的形势不好。民族主义十分放肆。所采取的唯一反措施只是无用的口头谴责。“在‘民族利益’的掩盖下，各种坏蛋……甚至反革命都聚集到一起。”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关系很坏。“有些村庄，由于神经紧张，塞尔维亚人正在受训和武装起来……难道我们还要重演1941年的事件吗？”

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铁托讲话中三次提到国际形势。第三次显然证实了早先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传闻，即铁托在4月布里俄尼会议上曾告诉克罗地亚人，勃列日涅夫曾打电话来表示，如果情况需要，苏联愿意提供“兄弟援助”。铁托说：

别人在盯着我们。你们是否意识到，一旦出现混乱，别人马上会开进来？可是我宁愿迅速用自己的军队来恢复秩序，不让他人插手。……我们在国外已丧失威信，很难挽回。他们在盘算，“铁托死后，一切将土崩瓦解”。有些人正郑重其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内部敌人得到来自外部的大量支持。超级大国将利用一切魔鬼为他们效劳，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各种说法都有。据说你们当中，现在竟有人认为我捏造了跟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来吓唬你们，为的是迫使你们团结。

铁托特别批评了在工厂里按民族成分计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人数（“我们决不允许这样做，我要公开这样说”），还特别批评了容忍“‘母亲社’转为政治组织，以致使他们变得比你们还强大，达到难以驾驭的程度”。此外，他还特别批评了大学的情况。他说：“现在，我要采取坚决行动。”

会议结束时，铁托又变得抱和解的态度了。他对作了如此尖锐的批评表示歉意，并且说他很高兴听到他们接受了批评，愿意按照他所要求的路线采取一致行动。他本想发表公开声明阐述自己的观点，但现在看来不需要了。布里俄尼会议之后，外部世界期望“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能够刹车，而如

果事情到了他非说不可时，那南斯拉夫就不可救药了。

所以对铁托的观点，广大公众和其他共和国还不了解。克罗地亚领导集团内部的危机和分裂继续存在，“母亲社”的活动也依然如故。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派满以为整个领导集团将履行对铁托的承诺。这种设想后来被认为过于“天真”，但当时也许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三巨头及其朋友们都照旧按他们所定的方针办事。于是萨格勒布党的司令部里形成了“两条路线和两套指示”。这只能增加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混乱，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政治上保护自己，在斗争中能站在胜利的一方，而从共和国党的领导核心那里下来的指示如此矛盾百出，说明形势紧急。他们之中多数人认为，三巨头有“群众运动”作后盾，科普尔特拉控制着党的干部任命权，再加上在“母亲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党”的组织力量，地位比较牢靠。他们作此选择，还由于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即除了“死硬的保守派”，诸如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巴卡里奇以外，^①似乎整个克罗地亚党都效忠于特里帕洛和达布切维奇-库查尔。

在这场动乱的酝酿期间，铁托又到农村进行周期性的巡视，先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地区视察，然后又到克罗地亚一系列地区，从萨格勒布出发，又回到萨格勒布。铁托由克罗地亚领导人陪同，到处受到比平常更加热烈的欢迎，似乎证实了克罗地亚三巨头对“群众运动”的存在及其性质的论点。9月6日，铁托在萨格勒布受到对于来访的外国元首般的接待，当地宣

^① 巴卡里奇对他过去的门徒第一次公开表示异议，见之于9月下旬的一次讲话。他警告说，“民族群众运动”的概念和把克罗地亚说成是“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定义，在思想上是含混的，政治上是危险的（引自1971年10月1日的《政治报》）。

布放假一天，据《信使报》报道，有三十万萨格勒布市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铁托回到那里时兴致勃勃，在旅程的最后一晚，他举杯为主人祝贺。

他说，他所看到的热情使他回忆起战时民族解放斗争中和战后最初年月里的游击战士精神，有这种精神的人是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在这种热情的气氛中，他看不出有什么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于是他得出结论：所谓“民族主义过火行为”笼罩着克罗地亚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他对所见所闻以及跟他谈话人的态度深表满意。

从那些要求对民族主义实行强硬路线的人们的观点看来，铁托举杯祝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此后十个星期，每当他们在这方面想采取什么行动时，三巨头、《信使报》和《星期三信使报》以及大学生和“母亲社”的报刊，便立刻用“可是，铁托说……”来堵住他们的嘴。

执行委员会多数派中有两个人，普拉宁茨和戴罗西-别拉亚茨，后来对总统当时给他们造成的麻烦和困境作了解释。他们说，根据7月间对他所作的承诺，铁托为了使克罗地亚党的任务更容易完成，对他们表示了充分信任，同时尽力阻止全国其他地区对他们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民族主义分子辩护。执行委员会中一位一向直言不讳的非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加日可不接受这套轻飘飘的说法。他在12月份说：“我们全都对铁托撒了谎，说什么对他的方针我们全体领导人完全一致”，其实他们明知事情并非如此。有些西方评论家暗示：铁托在勃列日涅夫前来访问（此事在萨格勒布祝酒后仅八天）后也许就改变了主意；或者是他在11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由于得知美国对南斯拉夫的自由经济

改革追加财政援助已经无望而改变主意的。

铁托明显地赞同三巨头及其政策使党的领导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大为沮丧，暂时使他们失去活动余地，并且简直使那些针对他们的公开攻击合法化了。过了一个秋季，领导集团的分歧终于公开化了，虽然双方发言人都声称分歧既不严重、也不涉及根本问题。

整个共和国的情绪，三巨头自命为克罗地亚群众和全南斯拉夫进步力量的领导，以及由于克罗地亚的孤立和不妥协的否决权而使联邦继续陷于瘫痪（联邦党的主席团由于看到当时的困境，干脆三个月不开会），这一切都要求采取行动和取得成效。但是朝什么方向呢？克罗地亚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现在包括巴卡里奇、共和国议会主席布拉热维奇以及党的其他“老卫士”，坚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清算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从而恢复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的好名声，结束共和国所处的孤立状态。而“群众运动”正如“母亲社”报刊和紧跟在后面附和的党报所宣扬的那样，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要求：清除“保守主义分子”和“集权主义分子”，从而使划一化的克罗地亚民族具有统一的纲领，其中民族和阶级是可以等同起来的，而民族主义的“过火行为”只是并不重要的支流。

危机愈益具有纯粹的政治性质，变成各派为政治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乱作一团的情况下，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细微分歧、对民族主义及其倡导者的评价、强调民族-国家还是强调阶级，以及引起两极分化的策略方针等问题，几乎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尽管共和国三巨头及其伙伴们在群众中颇有声望，但奇

怪的是，他们孤立无援，没有一个政治机构他们可以把握称作是自己的，并可指望听从他们的吩咐。三巨头作为党和“群众运动”的名义上的领袖，入春以来一直在为同时保持和扩大对两者的控制权而斗争。但结果由于容忍非党分子在“群众运动”里愈益开展其活动，纯粹民族的象征和要求愈占优势，从而造成了党的分裂。作为政治组织来看，尽管彼此成员从基层到上层(三巨头)交叉重叠，但现在确实存在目标和纲领迥异的两个不同的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共管的，三巨头在这两个运动中跟不同的人分享权力，但这些人的行动方式和要求截然相反，因此双方很难相容。最近的事件使从前没有站队的党员及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克罗地亚人的立场进一步两极分化，中立的余地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他们被迫面临如下选择：或者跟着执行委员会反对“母亲社”和别的“民族主义温床”，或者跟着“母亲社”反对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派、巴卡里奇和老卫士。

根据许多证据来看，有许多因素促使他们勉强选择第二条路。首先，对特里帕洛这样有能力的人来说，在权衡力量对比时决不会忽视这样简单明了的情况。跟着执行委员会和老卫士走是无法恢复他们的信任的，因为这种信任早已丧失殆尽。而且，这样做还得承认三巨头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群众运动”所持的态度和评价犯了严重错误。在政治生活中，这样承认错误除非承认者处于无懈可击的地位，否则是危险的，而三巨头的地位并不这样牢固。此外，他们还看到科普尔特拉的人事方针同“母亲社”的组织工作和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结合起来获得成功的程度。结果象在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等关键地区，党政机关都掌握在“民族群众运动分子”手中。

这些地区碰巧也是三巨头核心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大本营。三巨头想必也意识到，如果他们断绝同“母亲社”的盟友们的关系，而跟“集权主义分子”合流，就会象巴卡里奇一样被“母亲社”扣上“克罗地亚民族叛徒”的帽子，这时“民族群众运动分子”就不会效忠他们而效忠“母亲社”了。因而，若是跟执行委员会走，那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明显孤立和注定失败，这场戏也就得到此收场。

另一条路显然也要冒可怕的风险。如果铁托加入反对他们的行列（他在春天和7月间的态度表明有这种可能性），那他们几乎肯定也要完蛋。即使铁托不反对他们，因而取得胜利，事情也很容易使他们在跟“母亲社”的联盟中屈居小伙伴的地位，到那时“母亲社”将成为他们主要的或唯一的支柱了。但是，至少还有一点希望。铁托9月间的举动令人鼓舞。而且根据萨格勒布的许多可靠目击者说，尤其是特里帕洛依然深信自己高出“母亲社”领导人一筹，并能驾驭他们。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集团中的两派还打算作最后一次努力，以避免三巨头所处的灾难性的进退两难的困境。

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自5月以来只开过一次会。11月5日，它在萨格勒布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会议。达布切维奇-库查尔的开场白有两万六千字，长达三小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讨论“民族群众运动”的那一部分，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是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报告说，这个运动无疑有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方向”，它是此刻整个南斯拉夫“积极的政治气候”在克罗地亚的特定反映。这个运动扎根于第十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次大会“锤炼了民族和党的团结，并茁壮地发展成长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但是有些同志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并

提出批评。达布切维奇-库查尔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为了保持某种抽象的革命“纯洁性”，我们应当对这种群众支持持保留态度，甚至抵制它。这种革命“纯洁性”，照我看，无非是宗派主义和害怕动员群众的表现而已。……仿佛我们的纲领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应是政策的积极制订者一事，只能是一纸空文，而不该考虑把它变为生活的现实。或者，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好象是一个封闭的宗派，把社会和劳动人民看做是为我们而存在，而不是我们为他们而存在。

经过七十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两天辩论之后，最后一致通过这个讲话的全文作为大会的“结论”。事后表明，它违反了原来跟巴卡里奇和执行委员会多数派达成的明确协议。先前约定：只有报告的结论部分，不包括有争论的谈及“群众运动”的部分，可以付诸表决，作为正式文件。主席还破坏了另一项商定的协议，即中央委员会应当审议执行委员会8月2日草拟的一项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和反“母亲社”的“行动纲领”。当这项纲领没有列入议程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比利奇试图提请讨论，但被裁定不合程序而不予考虑。另外，克罗地亚执行委员会塞尔维亚族副书记德拉戈萨瓦茨站出来激烈抨击民族主义和某些“民族运动”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在攻击达布切维奇-库查尔的讲话。比利奇仍然决定避免公开冲突，这一回插进来说他同事的发言“于事无补”。同时在一般辩论中，会议特别强调克罗地亚公众舆论再不能容忍进一步拖延外汇制度的改革了。

执行委员会曾同意，维持表面的团结一致，结果却导致这

样一次完全照三巨头希望的路线行事的会议，于是在事实上推翻了不到半年前第二十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立场。这样一来，也使反三巨头集团的人正式受到三巨头路线的约束。如果他们今后继续批评“群众运动”或克罗地亚人在诸如外汇制度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就很容易被指责为搞宗派活动和破坏民主集中制。到那时把他们清洗出去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据巴卡里奇作证，直到此时，他和克罗地亚反三巨头的其他领导人才决定在铁托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归来时去找他。巴卡里奇说，当他们去找总统时，他们发现总统已经“读过报纸，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决定采取行动。

事态一下进入高潮。甚至正当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还在开会期间，《克罗地亚周报》就发表了“母亲社”建议的克罗地亚宪法修正草案的最后文本，并且发动了一场全共和国规模的争取通过这个草案的运动。这些建议包括：直截了当地把克罗地亚定为“克罗地亚民族的主权民族国家”（这个公式当天在中央委员会的辩论中就受到批评），这种主权基于“包括脱离权在内的自决权”；克罗地亚语应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行政当局对于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各种税收实行完全控制（只在共和国之间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志愿”给联邦上缴部分“捐款”）；克罗地亚应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和发行银行；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克罗地亚征的新兵一般应限于在本共和国服役；此外还应有一支克罗地亚自己的地方军。一星期以后，同一杂志开始公开攻击德拉戈萨瓦茨和比利奇。在“母亲社”和大学学生的集会上，还讨论了诸如克罗地亚应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南斯拉夫军队真正“联邦化”的问题，在损害黑塞

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的情况下修改共和国边界问题，以及另定对外政策等问题。在克罗地亚侨民杂志上，象在7月间和9月间那样，出现各种谣言和文章，谈到大学生罢课、甚至总罢工等等，表面上自然是为了支持被包围的三巨头。

铁托在11月8日回到南斯拉夫。自从9月访问萨格勒布以及那次带来灾难的举杯祝酒以后不久，他有七个星期几乎一直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上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在外国。9月底，他在贝尔格莱德接待了勃列日涅夫，接着在克罗地亚的卡尔洛瓦茨附近检阅了第一次“全民防御大演习”。从10月中旬以来，他先到波斯波利斯，利用伊朗庆祝建国二千五百周年的机会，同前来的其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开展了一连串紧张的会谈，然后到新德里、开罗、北美进行国事访问，此后又去伦敦访问。在出访东西方之间，只在贝尔格莱德呆了一个长长的周末。铁托利用最高级会谈进行外交活动是事出有因的。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攻势和西方大国的反应，使欧洲趋向缓和而中东和东地中海形势则仍然紧张，这种情况看来使通常称为近东(巴尔干国家)的中间地带处于一种不安全的地狱边缘。铁托力图廓清局势，寻求老朋友的支持，并且重申南斯拉夫反对大国利用小国作为赌博游戏中的工具。他的使命并非与他暂置一旁的国内危机无关，因为在南斯拉夫依然传说纷纭，谈到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插手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的政治局势，其中有些还是相当有根据的。

铁托回国后三天，即11月11日，报纸宣布总统到西波斯尼亚一个偏僻地区布戈伊诺去休假打猎。11月15日到那里去拜访他的人当中有德拉戈萨瓦茨，他是巴卡里奇和克罗地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派的密使。铁托听取了德拉戈萨瓦

茨或者其他身份不明的来访者^①的汇报后，同意会见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下一天晚上，在萨格勒布，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布迪沙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克罗地亚母亲社”的两个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这个演说指名攻击巴卡里奇，并对三巨头发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布迪沙宣称：“如果他们看不到现在正在幕后玩弄的使他们同克罗地亚人民分开的肮脏把戏，他们就会丧失民族的信任”。^②

11月17日，铁托回到贝尔格莱德。22日晚他又到罗马尼亚巴纳特的蒂米什瓦拉跟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事先宣布的会晤。几小时前，约两千名萨格勒布大学学生参加了由布迪沙和大学生联合会召集的群众大会，慷慨激昂地欢呼赞同第二天早晨为外汇问题举行罢课的提议。罢课组织得很好，规定必要时阻止教授和学生进入教室。克罗地亚大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号召把它扩大到整个共和国，并派代表到各地方大学和萨格勒布地区各工厂进行游说，还扬言要进行总罢课、总罢工。

大学生行动所选择的时间出人意外。因为根据谣传和流亡者报刊预言，罢课罢工将在圣诞节以后举行——那时，估计受到克罗地亚流亡者的组织和宣传影响的成千上万侨居国外

^① 没有任何情况被透露过，只有一位美国作家、南斯拉夫及其元帅的老朋友普里比切维奇1972年5月12日会见铁托后，写了一篇祝贺南斯拉夫总统八十寿辰的文章（载1972年5月25日《纽约时报》）。其中写道：“[1971年]11月，在波斯尼亚布戈伊诺的一次秘密会见席上，南斯拉夫军队领导人给铁托看了一部被查禁的克罗地亚共产党群众集会的电视片，在这次集会上只有克罗地亚旗帜，以及克罗地亚民族的和反铁托的标语、歌曲、口号和标记。至此铁托决定干了。”

^② 1971年11月17日《政治报》引用了布迪沙的讲话，以重申大学生和“母亲社”最近提出的最高要求（如成为联合国成员，拥有独自の军队等等），并补充说，即使接受了所有这些要求，也“决不意味着为争取克罗地亚的完全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已真正取得胜利和就此结束”。

的工人也回国过节了。当群众还一无所闻时，消息灵通的“母亲社”和大学领袖们显然得知党内反民族主义派别已经采取行动，并向铁托求援了。时间紧迫，事不宜迟，因为此刻铁托又出国去了。他们打算孤注一掷，逼迫三巨头及其朋友们毫不含糊地公开表态，而在这以前他们是还未认真表态的。三巨头摇摆不定，意见不一，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并准备对执行委员会中的对手采取行动，但他们又力图寻找一个中间立场，以避免站在一方进行前途难以逆料的决战，因为不管事态如何发展，结局几乎肯定是凶多吉少的。罢课是一场疯狂的赌博。罢课的人原以为只要有几个工厂响应，三巨头和他们的党内追随者就不得不卷进去。那时如果铁托招来军队，就会面临一场内战。但是工人没有行动，这是铁托称为“万幸”的事。

亮相的时刻到来了。混乱之中，许多党的官员各自发表了观点暧昧的声明，看来是赞许或者至少宽容学生的行动的。但是三巨头已经得知铁托要召集他们开会的意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众所周知的亲三巨头的党组织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谴责罢课是“一种反对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方针政策的行径”。罢课开始时，特里帕洛在达尔马提亚，他急急忙忙在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会议上参加反罢课大合唱，但大学生们依然故我，不为所动。11月29日是南斯拉夫国庆日，特里帕洛发表演说，扬言为了改变共和国政策，“要在克罗地亚撤换一千个领导”。达布切维奇-库查尔也在电视里呼吁大学生结束罢课。虽然全国听众中很少人知道此中奥妙，可是召她到卡拉乔尔杰沃去的命令想必已在她的口袋之中。她比在三个半星期前的第二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看来老了十岁。

第八章 统率一切的核心

卡拉乔尔杰沃及以后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接见了萨格勒布国民议会代表团——这个国民议会是哈布斯堡王朝衰亡时期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实际上的政府。他们对他们要求迅速实现统一的迫切愿望表示响应，当着他们的面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来改称南斯拉夫。在1971年12月1日的黎明，即宣布成立王国五十三周年的那一天，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国王的克罗地亚共产党继承人在昔日的皇家狩猎小屋（这个屋子至今还用塞尔维亚皇家的名字命名）^①会见了另外一个实际上的萨格勒布政府。他告诉他们：他们的政策和活动正危害着国家的统一；对此，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在铁托与克罗地亚领导人密谈二十小时之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在这座小屋里集会，正式召开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会上，铁托宣布了所要采取的措施。他终于要把他在4月和7月所提出

^① 因此在这里召开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被称为卡拉乔尔杰沃会议。——译者

的警告付诸行动了。他否定了克罗地亚党组织所推行的那些政策以及制订这些政策的领导人。他是公开宣布这一点的：第二天下午，当卡拉乔尔杰沃会议正要结束的时候，南斯拉夫电台多次中断原定节目（这是一种偶然采取的极不平常的做法），广播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铁托说，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怂恿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在日益发展的“反革命”活动面前，表现出“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承认，他们有关经济体制的牢骚大部分是正当的，特别是对外汇制度的不满以及对银行和大企业中的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夺走”工人收入和自治权的不满。但是，不允许把这些问题当做民族问题；而且，既然宪法的修订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符合宪法的办法，就不能鼓励示威活动和其他越出合法范围施加压力的行动。铁托在会见克罗地亚领导人时还表示，同样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人，甚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都无权干涉共和国党的事务。铁托在结束语中说，党“就是有权在全南斯拉夫的组织机构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他还尖锐地指出，克罗地亚所发生的事件的主要错误不在于当地领导人的思想动机，而是“大大倒退了的”党组织内部的思想危机；并且指出在大多数共和国中也存在着这种危机，以及领导人偏离中央路线的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所以会产生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年来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容忍了中学和大学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是亲西方的”教师，而年轻的党的干部和新一代中的其他人恰恰来自这些学校。所以，所有地区都要从萨格勒布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铁托还说理

在就要靠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自己进行整顿，根据党的路线重新达到团结。

克罗地亚三巨头经过一个星期挽救他们个人地位的微弱努力之后，分别通知铁托他们提出辞职。尽管如此，一直拖到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于12月12日召开会议时才公开宣布，以便这期间先在共和国中举行各种集会，造成一种要求他们离职的巨大声势。开会的那天，军队的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头戴防暴盔的警察部署在要害地点。布迪沙和他的同事在清晨被逮捕。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宣布开会后，让出主席的位置，并宣读她和皮尔凯尔的辞呈。会上也宣读了特里帕洛写给铁托的信，他辞去在执行局和国家主席团（他没有担任共和国的职务）担任的职务。巴卡里奇和弗尔霍韦茨（后者将代替皮尔凯尔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要求发言，称赞“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因而迅速解决了地方上发生的这些问题”。他们还要求在批评那些提出辞职的人的过错的同时，应该对他们过去所做的贡献作出适当的评价。这次会议是一切有关的人一次庄严的表演，整个场面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有如推迟宣布这几个人的辞职的做法一样；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是为了缓和派出军用直升飞机和进行预防性逮捕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以保证事情能顺利过渡。对克罗地亚的“清洗”已经开始了。

“民族群众运动”垮台之快以及垮台之彻底，正如巴卡里奇和其他人后来承认的，真是一件令人高兴而又出乎意料的事情。在萨格勒布，以后几个晚上每晚都发生过零星的游行示威。在这些示威活动中，有五百五十人被捕或临时拘留，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但除此之外，竟没有一个人起来护卫倒台的领导人及其干将，到1月中旬，他们之中有四百多人辞职

或被罢官；也没有一个人起来抗议查禁文化组织克罗地亚母亲社和逮捕其领导人。1972年5月，克罗地亚三巨头被开除出党。虽然许多普通的克罗地亚人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感到阴郁和不满，但大多数党员在“清洗”运动之后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至少显示这些事与他们毫无瓜葛。

如果说，那些在12月12日盘旋于中央委员会大厦上空的军用直升飞机，或者铁托那种仍然令人畏惧的权威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的话，那末另外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在党的中下级官员的支配下而产生的一种党的特性，这种特性并非克罗地亚所独有。12月10日，普拉宁茨——三天之后她接替达布切维奇-库查尔担任克罗地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卡拉乔尔杰沃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三巨头当初显然得到群众的支持时，认为令人不解的是“在有些地方，几乎可以说整个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站出来为那些篡夺党权的人喝彩”。她所做的回答无意中说明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还是那些人在同一个星期之内接受了她和新班子的领导，有时甚至毫不知耻地向他们欢呼，而且还要求进一步使他们原先崇拜的偶像名誉扫地，甚至投入监狱。这也就在无意中触到了与民族主义一起干扰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心问题。她说：

他们的行为就象追求有钱女子的恶少和野心家。……这些野心家，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要说，主要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却是实现野心的一张牌。不幸的是，大多数党员都这么干，因为我们已经把奴性十足的小职员思想带进了党内，没有把那些肯动脑筋、肯探索继续革命的人吸收入

党，而吸收了那些善于谄媚奉承的小职员。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不把这样的人清除出党，我们就不能适应这一将要持续到铁托身后而始终要按铁托路线前进的革命阶段的需要。因为我们曾按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把胆小怕事的思想 and 机会主义的思想带进了党内，而在某些部门，正直的人简直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

由于一些紧急的、战术上的原因，普拉宁茨试图说明党只是近来才具有大多数党员都成了“谄媚小职员”这样的特点，但在全国各地这种抱怨由来已久，已是老生常谈，所作的分析解释更是千篇一律。显然，这种老一套的议论今后也会听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前谴责克罗地亚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控制党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实际上一一直是标准的工作方法，也是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她所描绘的党组织的特性并非克罗地亚最近一代领导人的新创造，而是列宁、斯大林、铁托以及他们所搞的革命运动本身的创造，而且构成了目前稳定因素的主要部分。它对南斯拉夫进行大胆的实验，以求最终实现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没有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来说，正构成极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铁托还详细阐述他采取有力行动的原因。他在12月中旬对工会联合会说，萨格勒布以及“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

假如我们现在不进行斗争，予以制止，……那末，也许在半年之内就可能打起来，变成一场内战。你们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作为国家元首和南

斯拉夫共产党主席，怎么能允许别人来恢复秩序和和平。我曾说过，我永远也不允许这样，我宁愿采取最后的手段，而你们知道这些手段指的是什么。

许多南斯拉夫人，包括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和相当多的昔日支持三巨头的克罗地亚人，愿意接受这样那样证明在克罗地亚采取严厉措施是正确的说法，但是他们担心这种严厉措施会产生广泛的后果。这些人也认为，克罗地亚原先的局面及其在其他地区产生的不利影响，确实严重地威胁着现有的社会制度的稳定，威胁着民族之间的和睦，甚至威胁着国家的统一。但他们还感到一种危险，即那些早已采取或正想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单单在克罗地亚，甚至在全国将会引起无可改变的倒退。在实行权力分散和群众参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能重新丧失，一个中央集权的、等级森严的、独裁主义的党的“强硬”统治又会卷土重来，以往历史上人所共知的那些缺陷，如效率低、不诚实、麻木不仁和不给民众以自由等将再度出现。

党的机构中的大部分老资格的领导人，包括克罗地亚的新领导人和塞尔维亚的现领导人，对于这些恐惧特别敏感。他们反复发出警告，不要再让“强硬统治”卷土重来，不要与“被击败的中央集权主义、新斯大林主义或新的共产党情报局主义的力量”结成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虽然这些力量正在援助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警告的措词和内容毋庸置疑都是心里话。

铁托本人却是明显的例外，尽管他也说在克罗地亚不应搞“政治迫害”。一直在为萨格勒布的清洗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而焦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发现，铁托在清洗以后发表的措

词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中，令人惊讶地反复强调，党自1952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就已开始腐败，而且他本人向来就讨厌那次代表大会。他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正如《新闻周报》在报道1971年1月26日的讲话时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敢于提醒读者的（这篇文章无疑反映了当时塞尔维亚领导的观点和关切），正是南共联盟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首次宣布了党的作用的改变，认为党将从一个统治国家和社会的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由“进步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在“社会主义民主”中只发挥影响，不行使权力。即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第六次党代会的精神和理想至少为近年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的权力分散和多元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于那些从1966年以来统治党的组织机构的人来说，如果对那次党代会表示怀疑的话，就无异于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绝大部分差别表示怀疑。

几个月以来，各种预兆错综复杂。高级领导层虽然保证决不会倒退，但是与这一保证相矛盾的是，克罗地亚的清洗不断扩大，对于被清洗的人的指责不断升级，并逮捕非党的“民族群众运动分子”，以及广泛使用使人一下就想到过去时代的那些方法和语言。其他共和国的自由主义领导人无论怎样强烈地公开表明他们并不同意克罗地亚领导人在1971年所执行政策，他们的地位还是因为克罗地亚领导人的倒台和他们自己与“腐朽的自由主义的”（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思想牵连而被削弱。这些领导人中有些人在那年年底以前就已经受到压力，如马其顿的茨尔文科夫斯基和斯洛文尼亚的卡夫契奇。这两个人都受到同乡头面人物的批评：茨尔文科夫斯基

(未被具体点名)是受到他的老对手科利舍夫斯基的批评,说他“对于在克罗地亚煽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起了不小的作用”;卡夫契奇是受到卡德尔的批评,指责他想搞“人民资本主义”,因为他曾主张企业把股份卖给南斯拉夫公民——股票持有者无权参加企业决策的表决,但可视企业的盈亏领取股息或分摊损失。据可靠消息,卡夫契奇、尼凯集奇和佩罗维奇在铁托的黑名单上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最初曾反对过卡拉乔尔杰沃会议的决定,不同意公开谴责克罗地亚领导人和强迫他们辞职,只主张给予最后警告。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看到什么后果。1972年,根据国家主席团轮值的规定,茨尔文科夫斯基当上了南斯拉夫的副主席,尽管他在1月份失去了党执行局的职务,借口是一人不能兼任这两种职务。卡夫契奇在1972年2月7日重新当选斯洛文尼亚政府的主席。在克罗地亚,新的领导继续支持克罗地亚人以前对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观点,只是去掉了那些流露民族和地区偏见的论点。三巨头辞职两个星期以后,还宣布外汇“保留限额”可以增加原来的三倍以上,这只是这些领导人倒台后在他们过去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中第一个(至少是部分地)得到满足的要求。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于1972年1月25日至27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九大”后第二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唯一重要的组织变动是改变了执行局的规模和成员。其成员从十四人(再加铁托)减少到八人,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一人。有三个共和国换了新人:塞尔维亚是阿弗拉莫维奇,克罗地亚是比利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则为库尔托维奇。原执行局的九名成员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去掉了。这九个人是:

巴卡里奇(住院,而且病情恶化)和特里帕洛(早已辞职),米亚托维奇和迪兹达雷维奇(后者任命为驻巴黎大使),佩丘伊利奇和托多罗维奇,卡德尔,茨尔文科夫斯基和弗拉霍维奇。执行局设一名书记,每年轮换,但是这个职务比原执行局每月一换的主席有权。斯洛文尼亚的多兰茨在任执行局每月一换的主席时,曾巧妙地解决了十二月危机,给铁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被提名为第一任书记。但后来违反了轮流的规定,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74年召开第十次党代大会将这个职务定为永久性职位。

所有因主张共和国的党自主而享有声誉的人都被排除出执行局。另一方面,除克罗地亚新的主要发言人比利奇、权力日益增大的经济学家格利戈罗夫以及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长期代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霍贾以外,执行局现在由二流的政治人物组成。这些改变显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一面是铁托多次表示希望有一个真正有力的新的联邦党中央,一面是塞尔维亚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决心尽可能维护党的权力分散局面。铁托本人在代表会议的闭幕词中谈到了这种抵制,特别是塞尔维亚的抵制。他还提到,“在讨论过程中,还有一些事情使我有些不放心。”比如“这次竟没有人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不知为什么,许多人总想避开这个问题,就象以前他们避开民主集中制一样。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存在。”

这次会议的讨论和文件中主要包含两个明显矛盾的主题:一个是加强党的控制和加强党中央,另一个是加强自治。^①弗拉霍维奇在向大会做的论政治和思想形势的主要报告中,强调了这两点,并坚持说这两点是可以调和的。他说,第

一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前提，因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能发挥政治作用的党才能保卫自治者，反对那些经常想通过个人的或阶级的野心或者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篡夺工人的权利和权力的人。另外，1971年的“工人修正案”必须全部、迅速地执行。这些修正案还应进一步修正扩大，通过强调公社的重要性和取消议会制度代之以卡德尔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代表团制度”，从而“变间接民主为直接民主”。弗拉霍维奇说，这些即将实现的变革，“肯定会扫除目前仍到处存在的恐惧心理”。他说，卡拉乔尔杰沃会议以来的发展进程，将是“一种沿着自治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方向发展的转变”。

这两个主题以及调和它们的尝试在此后两年中左右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直到1974年春包括各种妥协方案的综合理论在新宪法中规定下来并在第十次党代大会上得到确认为止。其间，南斯拉夫政治制度中的各派力量重新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克罗地亚前领导人下台后政治均势遭到了破坏的缘故，因为这些前领导人曾是1965年至1968年进行自由化和权力分散改革最主要的和最有力的倡导者。可是，重新调整也表明了一种对于利益和价值准则的新认识，以及一种对于这些利益和价值准则在哪些方面与其他人的利益和价值准则相一致的新认识。

这种新的认识明显地表现为不再从民族的观点而从“阶

① 格利戈罗夫在积极地维护市场经济原则的继续有效性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引伸出来的议题，即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而间接的控制和计划，并提出企业之间的“自治协议”日益扩大其作用以代替国家计划。关于十五个月后南共“十大”所采取的与他相同的路线，见下文。

级的”或“自治的”观点来攻击大企业、大银行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僭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因此也就不再把联邦党和国家机构而把“管理—技术骨干”作为主要的弄权者来看待。从“阶级”或“自治”的观点进行批判，曾是1967年至1968年的意识形态辩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后来卡德尔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所讨论的一个主题，但是由于这场辩论先集中在中央机构所保留的权力问题上，后来又把所有问题都作为民族问题来讨论，于是这种批判就被忽视了。然而，现在已经没有阻碍，因为当局认为这种批判是当前一条更为紧迫的战线上的斗争。但从实质上来说，这种批判又是某些更为复杂的问题的焦点，而且是从理论上对这些复杂问题的阐述。现在认为一个中央更为集权的党加强控制，就更能实现而不是削弱经济的和社会的自治，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可以和谐共存的关系，甚至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论点对各种不同的人和社会力量揭示了令人感兴趣而又各不相同的前景。

首先，这种理论是一种重新恢复中央集权制和党的权威的理论，它认为这样做同作为南斯拉夫第二根不可动摇的支柱即自治制度并无矛盾。正因为这样，它对那些怀念近年来丧失了(或降低了)作为党的头头的权力、威望和特权享受的人，以及(或者)怀念传统的共产主义价值准则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些人从表面上看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老资格的党的保守派和中央集权派，认为南斯拉夫革命在资产阶级化因而感到厌恶的年轻人，以及一些原先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他们也发现，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党的权力大比权力小好的观点毕竟是正确的。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的派别，他

们一心只想对决策多元化、市场经济代替指令经济以及公民和企业自由已达到的水平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侵蚀加以限制。对他们来说，这种新的二元论提供了两种十分不同的潜在的有利因素。首先是为“加强自治”所采取的新措施的合法化必然会造成有空子可钻的机会，1959年以后再次进行自由化也就是从钻空子开始的。其次是给本来居于守势地位的人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纲创造了条件，根据这种政纲，这些人可以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并自诩为保卫无产阶级利益和真正自治的勇士。这样，他们就能重新接触工人阶级及其机构中有政治觉悟的人，同中央集权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派中的温和派建立新的联盟，这种温和派至少是同他们一样担心直截了当地恢复1965年以前的制度的。以这种观点为团结的基础特别能吸引老的改革派联盟中党内辉格派的许多高、中级干部，也特别能吸引许多社会主义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都想尽力挽救过去十年中的可以挽救的东西。

最后，新的政治原则还为那些真正从更加严格的字面意义来解释自治的理论家和利益集团提出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这些人也是六十年代改革联盟中的成员，但如人们所知道的，他们早在1966年就和其他一些人有些分歧。现在所有一度合伙过的人看来都已背叛他们。这一点在克罗地亚由民族的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向民族自由主义、甚至可能向某种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就如当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那样，是一种维护中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和变了质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但是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管理—技术骨干”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他们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建立“大规模体制”，这就导致他们

维护少数工商企业对市场的控制，维护不受“社会控制”地把资本集中于大银行，以及维护由受过训练并熟知业务的专业干部集中掌握决策权。所有这些都好象是在嘲弄让工人及其组织有效地参加管理的任何想法。根据上述这些考虑，在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或者从个人或集团的利害关系出发，真心想使党政官僚和管理官僚以外的人们来制订政策的人中，必然会有许多人属意于新的、哪怕是冒险性的理论的。

这一派中至少有少数人是自 1949 年以来在南斯拉夫发展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的真诚信奉者。他们信奉新二元论中所包含的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在矛盾中统一”的理论，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冒险性的权宜之计，或者只是一种投合实用的政治策略。新的二元论也代表了期待社会主义和民主同时都能很好地发展的一线希望，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而且“应再一次申明，是在这样一个属于欧洲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社会和国家集体中”。根据他们的观点，如果放弃真正的多中心政治，取消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的作法和市场经济的话，民主不过是一种神话和嘲弄。同时地方民族主义和“管理—技术骨干”晚近的上升，也可以很好地提醒人们，无指导的、“自发的”民主会危害社会所有制和普通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且只要金钱分配、教育程度、见识水平和政治积极性的调动方面存在不均，就总是会起到这种危害作用。他们现在认为，这种不均必然会导致权力集中，从而会反复地、“自发地”造成新的“反对阶级”。

因此，通过恰当地结合第二次代表会议所宣布的两项原则，也许终究会找到一条出路：即保持多元而自主的决策机构、保留市场经济、坚持让人民大众参与政治，同时把党重新

建成“一个统率一切的核心”。在一个多民族的邦联里，在多种利益的复杂关系中，这个核心该是团结的唯一保证，而且它还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砝码，有力量向每一个新出现的其他“反对阶级”挑战。从根本上说，这些人所见到的是（尽管他们不能或不愿意这样明白地讲）：党的机构和技术骨干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新阶级”在争夺唯我独尊的导师地位的过程中僵持不下。这样的僵局当初还不可能出现，因为党在建立政权的早期具有大得多的力量。1966年以后，由于党方向不明、发生分裂和放弃了部分权力，才使这两个“新阶级”先后占据了统治的地位。现在，如果说党的权力的恢复能够局限于创造上述这种平衡而不是再次打破这种平衡，那末党的机构和技术骨干想要支配越来越成熟的自治机构及其代表人物的意愿可能会双双遭到挫败。南斯拉夫理论所设想的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到那时才会畅通。^①

新的政治原则拥有形形色色的支持者，目的也多种多样，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南斯拉夫人和外界的观察家于1972年底做出的预言目前还不能实现。这些预言料想南斯拉夫将很快恢复五十年代的制度，或许会变得类似当前那出自苏联模式的罗马尼亚变种。一些新的提法风行，诸如“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新中产阶级（或阶级）”取代了“（暂时）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力

^① 参见卡德尔的论述 [见卡德尔：《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因和方向》（贝尔格莱德，1973年版），第15页，第17页]：“在处置种种社会资本基金方面的任何垄断，也必然包含着工人与掌握这些垄断权的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的因素。……而且，……如果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经济控制制度失败的话，我国的专家治国就会成为一种比中央集权国家所有制的或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家治国更为强大的因素。因为在上述两种社会制度中，专家治国多少处于一种附属的和依赖的地位”，管理者必须对“资本所有者，不管是国家所有，还是私人所有”，作出交代。

量”，成为反对无产阶级和自治的“反对阶级”，甚至还有“自治民主是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表面上看起来象是奥威尔^①式的新提法。这样一些口号比粗看起来具有更深广的含义。它们有时以其字面的意义，有时则以其比喻的暗示，给正在兴起的新联盟(与旧联盟一样，由各种成员组成，而且也一样不稳定)的所有成员提供了表示各种不同观点、希望和战略的象征说法。

随之产生的政治纲领中包括许多当初由两股势力提出的批评、要求和口号，而这两股势力本身当前却被政纲列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敌人，不仅与“腐朽的自由主义”相提并论，甚至有可能被视为头号敌人。这还仅仅是许多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例之一。这些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敌人，有被废黜的克罗地亚领导人(他们的批评和要求现在从“阶级”的角度来加以认识，还抽掉了希望实现党的“联邦化”的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教授们和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大学中的“极左派”学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获得荣誉，诸如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要小心民族主义复活，他们同现在遭到或即将遭到清洗的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不断发生冲突。同时，他们对“社会差别”、自由放任的经济、党的社会结构和不充分的自治进行的批评的中心内容，实际上被新的政纲所接受，但却没有说明是他们的观点。铁托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党的领导人一直讨厌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批评中的另一个要点是攻击党继续实行专政，攻击党的思想中“斯大林教条主义”在复活。他们昔日在具有

^①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作家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1950)的化名，他的作品全都涉及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特别强调人类的自由。——译者

自由思想的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保护者和批评者已所剩无多，而这些剩下来的处于困境的人对他们也已不感兴趣。这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痛感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的过火的批判不过是一种应验的不祥预言，对于造成当前新列宁主义(且不说新斯大林主义)的回潮有很大关系。也是由铁托在卡拉乔尔杰沃会议上提出的必须将那些恼人的教授们撤职的要求，在下一年中又几次被提了出来。可是，党为把他们清除出大学所做的努力好久没有成功。直到1975年初，贝尔格莱德哲学院的八名教授才终于被停职——这是根据塞尔维亚议会的一项从宪法上看有点暧昧的法令作出的决定——而《实践》杂志则是在经历了风波迭起的十一年之后才被迫停刊的。

十月的塞尔维亚

在克罗地亚发生的危机也波及其他的共和国，使清洗的范围扩大。但结束这场危机的第二篇章，延至1972年秋季才开始。其部分原因是，党的主席团和其他有关机构中还充斥着这些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者，还因为新的调整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且事实上这一新的调整即使在当时也还远没有完成。然而，还有一部分原因，即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尼凯集奇和佩罗维奇，他们一贯坚持反民族主义的立场，通常能有效地运用“现代化”的党的手法(如通过他们的活动、操纵以及严肃对待党和社会主义联盟之外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来造成“影响”)，从而使别人不能轻易地攻击他们。他们总是把不同的意见局限于无害的安全阀门之内，使

之成为有益的批评和新思想，而不需经常求助于“行政措施”，从而含蓄地回答了铁托的观点：“革命武器”现在是实现团结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

对共和国领导人的攻击开始时，包括铁托、卡德尔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对外交政策和外贸政策的一些考虑，很可能对这一攻击的时间选择和攻击的某些意向也有影响。

接连两年获得丰收之后，1972年成了经济上、特别是外贸上的好年头。出口价值增加百分之二十，进口降低百分之十二，出口的价值再一次支付了进口帐目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无形收入达到十五亿六千万美元的记录，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在这一总数中，八亿七千万美元来自在西欧工作的南斯拉夫劳工的汇款，四亿七千万美元来自旅游业。最后结算是收支平衡，大约还盈余两亿五千万美元，除1965年略为盈余过两千三百万美元以外，这还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有较大的盈余。

南斯拉夫出口的质的变化，证明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和战后工业化的成功。1961年，原料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在其后的十年中，又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半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也从百分之三十七点六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一一点八，同时南斯拉夫统计数字中规定为高级制成品的比例已从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主要出口商品的品种和主要买主的情况。1971年，南斯拉夫出口以造船业占首位（目前占世界第十位），英国和苏联是南斯拉夫出口船只的主要买主。1971年的其他出口商品按照价值排列是：铜和锌产品（美国、意大利和苏联是主要买主），机械和电气设备（主要向经互

会、埃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出口), 鲜肉和罐头肉(鲜肉主要向意大利出口, 罐头肉主要向英国和美国出口), 鞋和外衣, 铁路和公路车辆以及设备(向各国市场销售), 还有电缆、电线和钢产品。塞尔维亚生产的电视机在西德市场上销路也很好。

南斯拉夫出口商品的品种已不再局限于农产品和原料, 同时其销售市场之广也使人对南斯拉夫的工业产品只在苏联集团和不发达国家中有竞争力的这种说法产生某种怀疑。外贸的发展与以下两方面因素有关, 即 1971 年第纳尔两次贬值(1月贬值百分之十六点八, 没有见效, 12月又贬值百分之十八点七), 以及联邦执委会在 10 月份曾为稳定币值重新作出了努力。因此, 尽管外贸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可能是暂时的, 但是这些和其他的经济迹象看来表明, 1965 年改革中强制实行的调整所造成的痛苦现在终于得到收益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开始变得慌张起来。1972 年, 企业界和政界的一些领导人物私下或公开宣称, 南斯拉夫永远不能在经济上并入发达世界的“国际分工”行列, 而这原是六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他们说, 应当放弃这种努力, 应当使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重新转向需求量较小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市场。卡德尔在 1972 年 9 月对他的斯洛文尼亚乡亲们的警告特别重要。当时斯洛文尼亚人已接近实现这一目标。卡德尔警告说:

那些认为解决办法是与西欧或巴伐利亚进行单一联系的人, 以及打着“我们在西欧的地位”的旗号而散布类似思想的人, 根本无视这一现实: 即尽管取得了经济进步, 这种经济关系却会使斯洛文尼亚变成一个受西欧资本主义剥削的省份。试问,

这种解决办法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依赖性？东欧国家对这种分裂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卡德尔是在苏联自 1948 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南斯拉夫出口商品的头号市场一年之后发出这种警告的。购买南斯拉夫出口商品次于苏联的有意大利和西德(两个最大的传统主顾,而且仍然是南斯拉夫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经互会在南斯拉夫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随之增长,1971 年占南斯拉夫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进口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与此同时,西欧则占南斯拉夫出口额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进口额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美国在南斯拉夫进出口总额中均占百分之六。

象往常一样,与经互会的贸易额的增长反映出南斯拉夫与苏联集团关系的改善。医治好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造成的创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当勃列日涅夫于 1971 年 9 月访问南斯拉夫,并在南斯拉夫的压力下重申 1955 年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和 1956 年的莫斯科宣言的时候,这一创伤似乎已经治愈了。1972 年 6 月,铁托回访勃列日涅夫,这是他从 1967 年阿一以战争时到苏联磋商以来第一次去莫斯科。7 月,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成为参加经互会会议的第一个南斯拉夫总理。很显然,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已经廓清。9 月,正当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讲话和铁托开始攻击塞尔维亚领导人的时候,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即将结束向苏联寻求高达十三亿美元的巨额贷款的谈判,以便在南斯拉夫建设新工业。11 月 2 日,清洗运动开始以后,双方签订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第一批五亿四千万

美元的贷款的补充协定。

西方报刊和其他的观察家们迅速地察觉到这些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清洗运动是对苏联贷款的政治报答。自然,南斯拉夫发言人否认这种联系,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说的是假话。相反,如果国际关系的考虑是铁托采取行动恢复一个中央集权的党对于南斯拉夫政治生活的控制的重要因素的话,从他自己的经历和最近的声明以及新政权的历史来看,他和他的同僚们所关心的,倒很可能是不让严重的不团结、内部宗派或明显背离他们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解释的作法成为外国在他去世后为“拯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而进行干涉的借口。然而,这并不是说俄国人对前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尼凯集奇及其继承者特帕瓦茨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伙伴们的倒台不如对南斯拉夫党从“反列宁主义”观点后退那么高兴,也不是说铁托和其他搞清洗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想加以利用。^①同样,这也不是说南斯拉夫重新调整外贸使其面向较易进入的东欧市场的愿望是不真诚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胆量干下去,再加上担心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保护贸易的措施以及稍后西方出现经济危机的初步迹象,是产生这种愿望的基础。当时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都反复声明要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南斯拉夫经济上也需要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对南斯拉夫人来说无论如何也难于拒绝一项表面上看来很慷慨的援助。

铁托和其他领导人在前一段时期和当时的公开讲话事实上说明了(而且可以充分地解说)铁托所要走的道路。这些讲话

^① 早在1972年春,在贝尔格莱德的苏联代表就曾毫不客气地、公开地将尼凯集奇称为“臭名昭著的畏惧和憎恨苏联的人”。

中最重要的，亦即预示最后了结这场危机的步骤的，是多兰茨于9月19日在斯普利特与地区党领导人的谈话，铁托于10月7日对《信使报》记者的谈话和他10月16日对“塞尔维亚社会政治组织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后来提交给铁托和多兰茨、并由他们在9月18日（就是多兰茨在斯普利特讲话的前一天）代表党的执行局签署的一封著名的信件。这封信在10月2日发至所有党的组织，但在10月18日才发表。

所有这些和随后的声明以及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要向全党传达的中心意思（这次大会推迟到1974年5月才召开，以便党有时间考虑接受这个意见），既简单又明了，即一个重新团结起来、再度集权、重整纪律的因而也是经过彻底清洗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须而且将要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重新进行有效的控制。控制的办法是恢复它的“领导作用”；制订坚定的、具有一贯性的原则，在政府机构和经济部门的“干部政策”中重新发挥决定性作用，并采取坚决行动，包括“行政措施”（撤职或监禁），来对付所有被党定为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敌人”的人。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维护它的国际声望和信誉，特别是要保障自治的前途和发展。

此刻认为，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和会后传播了不少“不正确的观点”，同时又产生了政治上不现实和意识形态上无法接受的一些推论（这种推论正被尖刻地称为“无政府自由主义的”，有时就简单地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和推论破坏了党的团结，使党迷失了方向。据说由于这个缘故，党实际上放弃了领导作用。这些理论产生的根源是“片面地”为斯大林主义和“官僚的国家集权主义”所造成的威胁担

忧(虽然当初这种忧虑曾有其正确的一面)。这些理论往后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些共和国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塞尔维亚领导人所接受。用1972年10月所提出的、后来又得到“经过清洗变得纯洁”的新生的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控告书中的话来说,这些犯错误的领导人曾认为,如果南斯拉夫要实现真正的“没有政治中介的直接的社会主义民主”,那末现在社会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就可以而且也应该具有更为“自发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因此可以和应该不断减少党的政治作用和“干涉”行为。在这种民主之下,“自治者们”和他们委派的代表将自由地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作出其他公众事务的抉择。因此,他们忽视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特别表现在他们认为南斯拉夫这样一个还没有消灭阶级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可以等同于全体南斯拉夫人(他们喜欢把工人阶级称为“劳动人民”,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模糊说法,后来又有点小心翼翼地推给了卡德尔)。他们一错再错,甚至认为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及“社会觉悟”足以支持和保证“自发的”民主和真正的自治,用不着一个强大和发挥积极作用的党加以保护了。

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党只能提出警告和劝告而不能干涉自治,党中央也不再有权对下级党的机构发布命令,因而就允许并鼓励了离心的或霸权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复活,并促成了“技术—管理骨干”的兴起,这班人控制着经济部门并通过“集团所有制”使经济部门再度私有化。所以,党逐渐放松强有力的控制,逐渐放松中央集权的党的纪律,不仅没有进一步扩大自治,反而导致权力被大多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的地方政客夺走，被那些羡慕西方管理技术而瞧不起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工商业和银行业中的“专家治国论者”所夺走。“自由派”支持上述事态发展泄露了他们与“主张专家治国的官僚”这一新的“反对阶级”之间的联系；他们正自觉或不自觉地、甚至是蓄意促进恢复隐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多党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党的“联邦化”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失效，使那些据说是集中在共和国一级的、而很少是再低级的党的官员，能够阻挠执行明确宣布过的、一致接受的党的原则和行动纲领。近几个月中，“工人修正案”未能贯彻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修正案”打算把那些仍然臭名昭著的商业联合企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专横跋扈的财力，以及它们的业务伙伴和投资者的影响，置于“社会控制”之下。

铁托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僭取财经权力的中心”绝大部分都在贝尔格莱德。这就是暗示，狡猾的塞尔维亚人正在寻求经济霸权，以替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瓦解时他们所丧失的政治霸权。这样的考虑肯定会影响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态度，甚至也会影响他们之中的自由派的态度。这是个有力的论据。接近贝尔格莱德领导人的塞尔维亚报纸也承认，现在企图把那些银行和企业的领导人赶下台的人，并没有夸大它们所拥有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所带来的权力。南斯拉夫的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前三家和第六家都在贝尔格莱德。它们与塞尔维亚的其他银行一起，控制了全国银行总资产的百分之六十三，而克罗地亚的银行只占百分之十七（克罗地亚共和国当时的生产占南斯拉夫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十家最

大的外贸企业中，也有四家在贝尔格莱德。当时这四家外贸企业的年交易总额达二百三十五亿第纳尔（萨格勒布的一家大外贸公司的年交易额是二十亿第纳尔）。这四家企业所以有这么高的年交易总额，是因为它们占有南斯拉夫外贸交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

现在该怎么办同样是很清楚的。多兰茨说，没有必要再做什么“分析、声明、宣言、报告，等等”，因为已经记录在案的那些东西是正确的，并提供了完全可以立即采取行动的步骤；也没有必要再对那些阻挠这种行动的人发出警告。进行革命的突破需要革命的政党，这个党在搞革命突破时希望在国内和党内得到一致的支持，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即便在全国，甚至在党内暂时缺乏多数的支持时，也不会抑制它采取行动。有权力就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南斯拉夫人多年来没有听到官员说这样的话了，而他们现在听到铁托和多兰茨在这样说话，并且说得是那么响亮和明确。他们两人和卡德尔认为，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把那些持异议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然后再从党的组织中清除出去。

然而，采取这一步骤暂时比十个月之前作为序幕的撤销克罗地亚领导人的职务还要困难。铁托看起来不愿意在解决塞尔维亚领导人的问题之前召集党的主席团和至今还被认为自由派的大多数主席团成员。正如铁托在10月16日对塞尔维亚领导人说过的那样，当前他们的态度和他们在联邦中控制了人数最多的党和最大的民族，使得他们对整个形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铁托在塞尔维亚人面前被迫处于前所未有的软弱的地位。由于没有主席团的支持（他曾经在卡拉乔尔杰沃会议上发动主席团来反对克罗地亚人）；他

就没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只能靠他自己的威望和执行局9月18日的那封信所赋予他的权力。而那封信在技术上可以说是违反了党章规定，因为根据党章，执行局在这么重要的政策问题上要对主席团负责。铁托在召集塞尔维亚领导人开会时采取了他力所能及的各种预防措施，特别是让很多级别较低的共和国官员和贝尔格莱德市的官员参加会议（多兰茨和格利戈罗夫陪同他参加会议），他预料这些人比接近尼凯集奇圈子的人更愿意支持他。

结果这一措施不灵。会议从10月9日开始，开了四天后暂停，因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宣布支持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反对铁托——这是南斯拉夫战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例。当会议于10月16日重新召开时，铁托本人在会上用震惊的、忿懑的和威胁的措词谈到所发生的事情：

我想在这里说明，讨论一个党的路线、成绩和缺点时，赞成或反对某一观点的人数，在根据革命需要对党将走的道路和采取的措施作出选择和评价方面，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从一开始就看到会议讨论的方向与我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我本来认为，会议应该对我在会前和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作出反应。……但从我听到的很多同志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人（我主要指的是领导人）缺乏象自我批评精神这样一些美德。……

我在这个会上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问题不是怎样清除在贯彻总路线时妨碍思想和行动统一的东西，而是到底谁清除谁。甚至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贝尔格莱德就开始在传说那些被批评的人胜利了，而不是那些提出批评的人成功了，还

说这些情况需要认真对待……我认为，南共联盟和塞尔维亚共盟的大多数党员所希望于我们的恰恰与此相反。……

铁托的讲话两天以后发表了，第三天又发表了铁托和多兰茨 9 月 18 日的信，这标志着铁托把危机不可避免地升级了。他实际上已公开向尼凯集奇、佩罗维奇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发出命令，明确告诉他们他希望他们怎么干。由于这一简单的行动，铁托终于胜利了，而这可能是在 10 月 13 日至 15 日休会期间所进行的秘密磋商和至今尚未透露的相互让步的结果。铁托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在他的 10 月 16 日的讲话中惊讶地承认：“（在塞尔维亚党内）不但对我个人和我的人格发表了一些令人不快和不能容忍的评论，而且不把我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主席、不把我自从 1937 年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的事实放在眼里。”尽管如此，当问题被这样明白无误地摆了出来之后，就难以想象再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反对他了。这一点迄今仍然是确定无疑的。另外，不管他这次是否明确地威胁要动用军队，但人们还记忆犹新，他在克罗地亚危机中就曾扬言要这么干的。

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于 10 月 21 日如期开会，接受和批准尼凯集奇和佩罗维奇辞职。与克罗地亚人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不同，会议是秘密地、不公开地举行的。会议的公告过了三天才发表，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伊丽莎白二世在大批外国新闻记者和战时派到游击队中去的英国使团首长们的陪同下在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中央委员会于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选举新的领导人。它的新主席将由弗拉什卡利奇担任，年四十九岁，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受人尊敬的经济学

教授，也是1965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在搞政治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继佩罗维奇任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是佩特罗尼奇，年三十七岁，他原来是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在1971年7月被选入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他在一年之内就被免职，据说只是因为能力太低。

在这以后，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一些领导人相继辞职，联邦党的主席团终于在10月30日开会，恭顺地通过了9月18日铁托—多兰茨的信，继即授予它的执行局以广泛的新的权力。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一直到11月的第二个星期才举行了两次公开会议，为期四天。在会上，再一次接受了尼凯集奇和其他人的辞呈，同时批判了他们的错误。

在10月份的最后几天和以后的几个月内，宣布辞职的重要领导人包括卢布尔雅那的卡夫契奇，斯科普里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米洛萨夫莱夫斯基（茨尔文科夫斯基的门徒），《政治报》和《新闻周报》的主编和一些编辑，外交部的特帕瓦茨，他在伏伊伏丁那党的继任者和同事以及他们的亲密支持者中的许多人。更令人惊奇而且完全出乎预料的是，令人敬畏的K·波波维奇辞去他在国家主席团中的职务。他并没有遭到攻击或公开受到牵连，也从未被列为“自由派”或“保守派”。他辞职的动机仍然不清楚，但是尼凯集奇曾是他在外交部的副手和选定的继承人，又是他在塞尔维亚党内的门徒。其他一些做出较大让步的领导人勉勉强强地任职到期满，他们已不能再起重要作用，但也没有受到谴责，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仍然是党内有地位的党员。

与此同时，党现在已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以便发动执行局和铁托主席在信中所宣布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和政

治攻势”。

1974年的宪法

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一年里，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为通过一部新宪法和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准备，此外则是前一时期的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一片异乎寻常的平静。新宪法草案和党的“十大”所要通过的决议草案，在1973年已准备好，并已发表、讨论和修订过。这些草案和“十大”本身总结了亚伊策会议三十周年时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状况。亚伊策会议标志着新南斯拉夫的诞生，标志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权的诞生和共产主义世界老前辈铁托统治的开始。铁托在“十大”前夕庆祝了他自己的八十二岁寿辰。

这些草案也标志着战后南斯拉夫历史上一个特点分明的时期的结束，这段时期恰好是南斯拉夫重建后的第三个十年。这十年以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试验，以期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开始，而以种种严重的经济问题和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使铁托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告终。铁托不得不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去反对西方称之为“铁托主义”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宪法和党代大会对铁托的这种答案稍作修改，即予批准，并在法律上确定下来，从而结束了南斯拉夫历史上的这一篇章，同时也再一次把这一社会制度所反复宣布的“真理的时刻”的到来推迟到渺茫的将来，而未能使之成为既成事实。西方的批评家和东方的朋友们一直密切注视着党代大会的公告和铁托的这次突然袭击，他们预测南斯拉夫将会出现新斯大

林主义或至少是列宁主义的复辟。与此相反，南斯拉夫领导人却宣称这是向以广泛的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事实上，新的历史篇章的前几段就已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处于对立统一、矛盾交错的动荡之中。

1974年2月21日颁布的宪法是南斯拉夫不到三十年内的第四部宪法。南斯拉夫人总喜欢争“第一”，这部宪法终于满足了他们的这种愿望，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宪法，不但条款最多，而且字数也不少于以前的记录保持者——印度宪法。它不但篇幅长，而且非常复杂，甚至大部分南斯拉夫律师最初都对它感到困惑和怀疑。它同1963年的宪法一样，既是联邦的最高法典，也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但更为详尽。它既要为经济和政治制度、权力分配和联邦组织制订原则，又要为各种社会组织、自治、甚至还要为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些方面立下法规。在南斯拉夫人可以自诩为这部宪法创先规定的内容中，就包括父母有权计划生育孩子的数目和时间，以及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清洁、健康的环境，因而使这两条从理论上讲也需要按照法律严加执行。

这部宪法中所作的绝大部分改动反映出官方从最近的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反映出这些事件中所包含的矛盾。宪法增添了字数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词语，重新规定了党的作用和责任。这些话比以往南斯拉夫的任何宪法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宪法都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① 宪法还特别说明，党的主席将是南斯拉夫国家主席团的当然成员，同时把国家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减少到八人，每一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一名。卡德尔解释了国家主席团里为什么要包括

党的主席，

我们把这规定为宪法的原则，事实上是为了承认我们社会的现实，即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是保持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的基本因素。

他说，人们一定要问，既然党在宪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早已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还要把这一条写进宪法。是的，党的确早已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把这一条写进宪法，“还有一个新的道理”——在实现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这正是新宪法所要促进的），“一些新的反动分子或顽固的保守分子已经出现，妄图在国家权力系统中起领导作用，想使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力量靠边……”

新宪法中有关党的主席是国家主席团当然成员的条款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它使宪法中其他规定的意图受到损害，而在南斯拉夫官方看来，这一条是宪法的根本保证。除这一条以外，宪法中大部分其他的改动则反映出从最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这样一个基本内容。这就是精心拟订一些办法，防止政治或经济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处或几处，以便打破寡头政治铁律（用现代南斯拉夫的习语来说，叫做旧的或新

① 新党章规定，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的理想和利益的有觉悟的先锋队……应是政治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以便保卫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特别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觉悟和社会主义的民主觉悟，因此必须负起责任”。社会主义联盟的定义同样也阐述得更详细了，它的政治作用不但加强，而且被规定得更加明确了，其中还指出党在这个群众性组织中的“领导作用”。

的“反对阶级”的挑战)。这样，宪法中所阐述的这个制度不过是美国宪法中“牵制与平衡”的翻版，但它比美国宪法中的“牵制与平衡”更为复杂，内容也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但其总的基础还是公社，卡德尔现在把公社解释为：

一个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劳动人民……已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特征也不再是抽象规定的特征，而是非常具体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劳动组织和地方共同体、在其他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中，联合并组织起来，成为自治者。

在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方面进行的改动和修正，主要焦点是帕西奇一篇评论里所说的“公有制的基本难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难题：谁来控制以公共财产和社会资本为形式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在南斯拉夫，这个难题涉及两个附带的问题：第一是怎样不使国家控制这种经济力量，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早已由工人自治解决；第二是当第一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之后，怎样使自治不至于因为其专职干部甚至参加管理的工人滥用其实际的所有权而使“社会财产”沦为“集团财产”。

新宪法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它明确地规定了“社会财产”和滥用这种“社会财产”的意义，并制订规章制度，以免企业内部的信贷、企业之间的信贷或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贷成为控制其他企业部门当前或“过去”的劳

动收入的渠道。经济单位之间订立的“自治协议”或与这些单位有关的“社会合同”，“利益自治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都能在某些方面代替国家的各级机构通过立法，征收和分配收入；宪法中扩大了这一权限的范围，从而也就扩大了“取消国家控制”的范围。还将设立“自治法庭”，接替普通（国家的）法庭有关公法和私法的许多方面的职能。不过，这些自治法庭的最后裁决权在宪法里还未明确规定，就连起草有关条款的南斯拉夫法律专家们也不清楚。具有潜在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新的法规实际上取消了自1950年以来就存在的企业，完成了从五十年代末建立的“劳动联合单位”（自1971年以来称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逐步向经济制度的核心的法定实体的过渡。然而，企业仍然作为根据合同结合在一起的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出现在市场时的通常形式；或者在其他对外联系中代表这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但是只能在独立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授权范围内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所有净收入现在都算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由各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控制的这些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也几乎没有有什么限制，而企业则根本没有自己的收入。^①

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企业内部，新宪法还禁止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选进工人委员会，以便缩小他们的权力，把技术管理与制订政策分开。在反对“技术—管理官僚”的权力的运动中，还有两项涉及企业经理人员的改变也很说明问题。其一，再度摒弃“资本主义”的术语；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对企业经理任命的政治控制。他们现在已不再被称为经理，

^① 宪法只字未提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可因未及时达成协议而退出企业。

官方称之为“个人管理机构”(在新的语汇中,这只是许许多多转弯抹角的意识形态名称中最突出的一例)。他们还是由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举一次,具体办法是由企业代表和公社议会指定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双方人数相等)向工人委员会提出一至三个候选人。这最后一点实际上是恢复了1964年以前的制度。1964年,公社被禁止参与提名委员会的工作,因为这种做法当时被指责为对工人权利的不正当的政治干涉。

此外还进行了类似的努力,以期控制(即便不是取消)其他屡遭批判的“垄断的”或“专家治国型的”经济权力的各种形式。对银行制度的又一次改革也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根据新宪法有关规定的要求,银行终于要真正对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企业负责。这样,在理论上也就是对那些创造价值的工人负责,而不是对那些管理这些价值的人负责,这是意识形态上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是所有新的控制的出发点。银行的信贷委员会的成员中不包括银行雇员,它和银行代表大会一样,将由“股东”们的代表组成。同样,这些银行信贷委员会中也不再包括“社会政治共同体”(政府机构),现在要求“社会政治共同体”把它们的基金存入地区的或中央的国家银行,以结束它们对商业银行的合法权力。同时,银行在其业务活动中赚得的所有资金,在扣除了佣金以支付银行的工资和业务基金之后,将分配给“股东”们,这样也就最后解决了由银行管理的、任何人无权过问的“无名资本”的问题。对保险公司也准备进行同样的控制,而商业企业则被迫要与其生产上的业务伙伴分享收入,并分担它们业务活动中的风险,因为商业企业经营的是这些业务伙伴的产品。

1971年的“工人修正案”早已预料到这些改变中的许多内容，但“工人修正案”的大部分内容尚未实施，因而在新宪法颁布之前就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斗争，这从下列事实可见一斑：1972年年中到1974年年中的两年间，仅在贝尔格莱德就约有二百名企业经理被撤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撤职前已被开除出党。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以及宪法颁布之后，不同的意见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有关银行系统和商业企业的改革问题。宪法中有关商业企业的条款一直到1974年底还迟迟不能实施，因为克罗地亚发言人希望把商业企业定为“服务机构”，而不是生产企业的伙伴，以便使商业企业更加彻底地附属于生产企业。

在政治领域本身，1971年修正案创立的国家邦联体制仍然保留了下来，尽管自卡拉乔尔杰沃会议以来，有些人不愿意保留这种体制。这种体制承认共和国的主权，几乎把联邦完全降为共和国之间的协商机构。现在，联邦的立法和执行机构只保留了1971年所赋予的极为有限的职权范围，其中包括所有八个地区必须事先取得意见一致的那些老问题。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机构在职权范围之内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提高了。同时，这种新结构的一个目的和现在成为两院制的联邦议会（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的基点是消除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共和国之间的协调委员会半公开地决定政策的尴尬现象，并消除共和国之间的协调委员会无意中授予共和国一级和自治省一级执行委员会的特殊权力。由于根据地区平等和“代表制度”设立了议会的两院，而且代表们不是对他们的执行机构负责，而是明确地对地区议会负责，因此可以认为现在的议会体现了协调委员会自1971年以

来占用过的谈判权力。^①

在政治领域里讨论得最多、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却被人们持怀疑态度接受下来的变革，是在从公社至联邦的各级议会机构中推行“代表团和代表制度”。以前，这个制度迟迟未能推行，而现在得以实行也还是作了某些让步的结果。这个新制度规定的三级选举在1974年4月和5月首次举行，这有助于澄清新制度制订者的想法，也使那些还记得1969年相对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的南斯拉夫人对此更感怀疑。

在第一轮选举中，大约六万五千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综合农业合作社，其他劳动集体和部队单位等选举产生由十人至三十人组成的许多“代表团”。用宪法中的词句来说，候选人“由社会主义联盟推荐和决定”。同时，所有参加选举的人选出代表南斯拉夫最小地域单位即一万二千个“地方共同体”的与上述相似的许多代表团。宪法进一步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代表团的组成“必须符合有关的基层自治组织或共同体的社会组成情况”。于是大约有一百万南斯拉夫人，或者每十四个达到选举年龄的人中就有一人成为这两种代表团之一的成员，而且从法律上保证这两种代表团的成员中普通老百姓要占大多数。这些代表团又选举“代表”进入他们各自的公社议会。在公社议会中，第一种代表团的代表组成联合劳动院，而第二种代表团的代表组成地方共同院。在公社议会中还有一个与上述两院相对的第三院即社会政治院，它是由“社会政治组织”（党、社会主义联盟、工会、青年联盟等组织）

^① 1971年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专门委员会仍留下来在不太重要的方面发挥同以前一样的协调地方观点的作用，在这些次要的领域中，联邦执行委员会有权不经过议会的许可就采取行动。

选出的代表所组成。这有力地说明党及其打头阵的群众组织网又开始直接而不加掩饰地发挥其政治作用了。

在第二轮选举中，从公社议院再选出代表参加现在同样是三个院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的相应的议院。最后在第三轮选举中，由各共和国选出三十名代表、各自治省选出二十名代表，参加南斯拉夫两院制议会的联邦院。这些代表由上述三种类型的基层代表团根据社会主义联盟推荐的名单提名，然后由公社议会选举产生；此外，各共和国议会要选出十二名代表、各自治省议会选出八名代表，参加南斯拉夫议会的共和国和自治省院，这些代表则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

联邦议会的这两院中，各地区之间是平等的，选民在各级选举中所起作用的间接程度比代表团所起作用的间接程度还要来得大，而且社会主义联盟（在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则由党组织）控制着各轮选举。除此以外，这种选举制度还体现出另外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代表们对他们的代表团负有（理论上）直接的、日常性的责任，而代表团又对选举它们的地方或“劳动共同体”负有直接的、日常性的责任。这个特点正是卡德尔区别“代表制”和“代议制”的关键所在。宪法明确规定，举行一次会议之前，代表们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团预先讨论议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尽管他们在与代表团成员协商时，不一定非得有特定的立场或必须投谁的票，但他们必须在这样的会议上极力探索一种大家都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再一个特点是要求议会各级代表必须“非职业化”，在任职期间继续从事本职工作。这个新的制度保证了各院（社会政治院除外）不致象 1963 年以后的议会那样，易为“管理—技术骨干”或职

业政界人物所操纵。这种安排被描绘成一种进一步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措施,但也可以认为是党的头头进一步进行控制的办法。所以采取这个办法,是因为在旧议会的各社团性议院中,那些经常发表意见的、有政治才能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使党的工作遇到许多令人不快的麻烦。现在,由于这些立法机构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没有经验的、工作繁忙的兼职议员,他们显然没有能力在工作之余来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这样一来,岂不就确保了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支配地位?另外,如果真的根据这个制度的规定召开各种会议并不断进行磋商的话,那人们就要问一问,南斯拉夫夫人究竟还有没有时间工作和娱乐?

新宪法对1972年以后党的政治原则中的两个要点同等重视——一是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的决策体制和决策中心,使它们加强牵制,更趋平衡;一是大力加强党的作用,以成为统率一切的核心。于是,党的成分和精神气质及其团结的程度和统治的决心,比起1966年以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党的“十大”

两年多来,南共联盟的领导人和政策上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于是在1974年5月底,它召开了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是全面检查和批准上述各种变化的结果,并通告《政治报》在1971年称之为“南斯拉夫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政权制度稳定,并再度回到了仍然与众不同但已调整了方向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开会的场面与这次会议本身一样，在某些方面与以前同类的会议既同又不同。在大会停车场上还是停满了一排排发亮的本茨汽车，大部分是黑色的，而且差不多都是新车。这种场面至少在前述最后四次党代会开会时一直是这样的。外国观察家们对此不是冷笑就是皱眉，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按照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或谨慎作风，怎么可以这么讲究排场。然而，第十次党代会连会址也是新的。它不再选在位于贝尔格莱德闹市区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外表庄严肃穆的“早期社会主义的”工会大厦（战后在联邦首都召开的历届党代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却在潘切沃桥附近的一个极为现代化的体育运动中心召开。这个体育运动中心是一个用预制结构组装起来的色彩瑰丽的现代化建筑，是1973年为举行世界拳击锦标赛而兴建的。在这样一个地点召开党代会是否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只能让人去猜测，但是报纸的发言人解释说，因为这个体育运动中心有比较大的停车场。这次开会期间停车场上的本茨汽车真是明显地比往常多。

参加这次党代会的代表和往常一样，有踌躇满志的职业政治家（大城市的政治家和地方的政治家很容易区别），妄自尊大的知识分子和经理，以及态度不那么自然的工人阶级的成员，还有六名左右只是奉命前来参加会议的农民代表，他们身着土布衬衫，穿一种名叫“奥潘凯”的鞋尖翘起的传统的塞尔维亚鞋子。然而，公开发表的大会代表社会成分的统计数字骄傲地表明，参加这次大会的社会主义阶层中，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以及经理的代表减少了，而工人和农民代表增加了。有些人认为，参加这次党代会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人比以往各次大会都多，这说明军队在政治上的作用更加明

确了。这次党代会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和上述新宪法都正在使军队在政治上的作用正式肯定下来。

大会的程序采用传统形式。大会一开始，铁托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正式入场，代表们热烈鼓掌，频频高呼“铁托——党”，并齐唱《国际歌》（有两个青年合唱队伴唱）。接着举行全体代表参加的开幕式，然后分组讨论。这次大会规定分组讨论两天。在划分小组时，很审慎地注意到把基层来的代表与有权威的发言人混合编组。会上，基层代表们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政治和经济情况，甚至批评党的政策中的某些细节，但从未涉及政策的原则问题。大会的最后一天总是照例举行另一次礼仪性的全体会议，会上听取和批准各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决议，选举新的“领导机构”——都是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在1974年这一次一律不再作进一步讨论。大会程序的最后一项是铁托再次当选为党的主席，这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代表们高唱宣誓忠于铁托及其思想的战时歌曲。铁托这次当选党的主席是“无限期任职”（即终身任职）。两个星期以前，他再次当选国家总统时就已开了这样的先例。

铁托在整整四天的会议期间一直精力充沛，这有力地回答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地回答了）不久前在西方报刊上流传的谣言，铁托中风，病情严重，现已半瘫痪，不久即将弃世。大会的第一天，他宣读长篇主旨讲话时，对摆在讲台旁边的凳子不屑一顾，接着他一直坐了八个小时，直到全体会议的例行程序和讨论结束。他一边仔细地听别人发言，一边抽着细细的雪茄烟，以前他总是爱用烟斗形的烟嘴抽香烟，这种烟斗曾一度成为他的标志。在以后的两天中，他接连不断地接见比较重要的外国代表团，到星期四，他又回来参加大会，一

直坚持到大会闭幕式结束，精力显未减退。

第十次党代大会有一些新奇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所有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大会，这在南斯拉夫党战后历史上是仅有的第二次。以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九十八个代表团的名单中名列第一，并受到热烈欢迎，而这种热烈的欢迎本来是只给予智利和葡萄牙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铁托和其他发言的人都直率地提醒俄国客人说，南斯拉夫党迫切希望与苏联建立同志式的关系依然是有条件的，即相互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相互尊重每个党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的独立性，相互尊重持不同意见的权利和互不干涉。

因此，这次党代会在外交政策上的基调是原封不动地继续其传统的不结盟政策，不固定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在不断批评“帝国主义”（意指美国）的同时，也同样地批评“霸权主义”，以谨慎地保持平衡。“霸权主义”这个词是南斯拉夫用来特指苏联对于其他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的。尽管铁托说世界正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但是最近在南斯拉夫报刊和外交部对国际事务的评论中重新复活起来的那种“四面楚歌”的偏执劲头暂时平息下去了。只是当南斯拉夫重又怀疑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移居国外的流亡者中的活动，以及1974年9月对一个主要由门的内哥罗人组成的集团进行一次广为宣传的审判时，这种偏执劲头才又发作起来。那个集团被指控组织了一次亲苏的地下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秘密代表大会，并受居住在苏联和西欧的属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移民的领导。这种偏执气氛也表现在第十次党代大会召开之前出现的一股示威游行和官方提出抗议的

浪潮。这个浪潮是由意大利的一份照会引起的，这份照会似乎又重新提出了前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B 区的问题。1945 年出现而在 1953 年已经了结的的里雅斯特严重危机现在又发出了微弱而又令人奇怪的回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经过一系列艰苦的秘密谈判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而且一劳永逸地从事实上和法律上消除了那个流产的的里雅斯特小国。然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南斯拉夫和奥地利在对待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也重新展开了论战（这个问题自 1960 年以来一直没有怎么提起过），同时和向来被称为苏联霸权主义走狗的保加利亚在从来没有平息过的马其顿问题上也展开了论战。如果说现在外部世界的威胁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还以此作为一种激励国内团结的手段），但“十大”却力图暂时减少这样的忧虑。

这次党代大会的另外一件新奇的事，是到处都是铁托的肖像（甚至在大会文件以及领章上都有铁托像），到处都是有关他的口号，而且经常偶像崇拜似地讴歌他个人和他的业绩。诚然，铁托一直是被“个人迷信”所包围的，因为他既是革命的缔造者，又是团结和国家与社会制度继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有时显然是唯一的保证。然而至少自五十年代初以来，铁托的神话和形象从来没有象在 1974 年那样被夸张，那样无所不在，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这次党代大会上。对于这种情况有多种解释，而且可能都是真实的。其中包括为了取悦这位老人而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因为铁托最近显示出他仍然有能力处决触犯他的那些朝臣；或者是故意树立起这样一个南斯拉夫和党的团结的主要象征，作为当前重新强调统一和放弃邦联做法的运动的部分内容。他们这样宣传铁托，也可能是不自觉

地又在乞灵于魔法，即不断宣扬偶像永存及其神化的保护力量，并且把偶像幻变为团结和稳定的化身，借以吓退制造分裂的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多元化和外国阴谋这些魔鬼。

如果铁托不论是作为真人还是作为偶像而无所不在，那末过去十年中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的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的面孔即将从大会结束时所选举出来的或确认的“领导机构”中消失，虽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会作为代表坐在代表席上，或者偶尔在辩论时出现在讲台上。根据提交给大会的统计数字，在全体党员中，大约有十四万三千七百五十六人在1968年12月至1973年12月之间被开除出党，或者被“从档案上除名”。“十大”之前的四年中，党员总数减少了三万五千名，而剩下一百零七万六千七百一十一名。上层中的清洗也很激烈。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十二名党的主席团成员中，有二十一名到“十大”召开时已不再是主席团的成员。两人已去世；八人因严重背离党的路线遭到攻击而辞职，其中七人丧失党籍。剩下的十一名成员因其他原因离开了党的主席团，其一是根据1972年1月的决定，国家主席团的成员不能同时又是党的主席团成员——这种规定的改变影响到这十一名成员中的六名。这十一人中，没有一个人正式遭贬，他们中的不少人肯定仍然受宠。不过，制度的改变的确为清除象茨尔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提供了方便的借口，这种人因某种原因并不够清洗条件，而只是因为让他们占据当权的位置已经不合适了。

接替被解职的领导人的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的背景、年龄、迄今为人所知的思想政治立场和能力都各不相同。只有在两方面有共同之处。第一，他们迄今所表现的政治才能的平均水平要比他们的前任低，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

作为专家颇具才能，例如在经济学方面。第二，几乎所有这些人，包括其中最具有才干的人，都被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看成是扈从（或者按英语习惯来说即“佣工”），而不是自治权力基地的“自己人”，而这些人前任则通常是被看作“自己人”的。按年龄和经历，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年轻人。一般来说，都是首次接触联邦政治，或刚刚踏上高级决策岗位。第二类是象斯塔姆博利奇和科利舍夫斯基这样的五十五岁以上的老革命（这两人都在不久前被选入九人组成的新的国家主席团）——他们在1968—1969年隐退之后，人们曾认为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由十二人组成的新执行委员会，其成员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一岁，最年轻的是四十岁，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其中有三个人没有参加过1941—1945年的游击战争，只有四人在1941年是党员和游击队员，这曾是一种能在党和政府机构的最高阶层中谋求职位的“会员证”。多兰茨不是“41俱乐部”的成员，他在第十次党代大会上又当选为重新恢复原来名称的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而他在新任职的这批人中显然地位最高。

此外，在会上遭到冷遇的人中，有些人虽未正式遭贬，但已失去当权的职位。这一批人包括那些与自由主义的政策（这次党代大会正在批评这些政策）略有牵连的人，他们以托多罗维奇为代表。他原是联邦议会的主席，在“十大”召开前十二天，任期刚满，在“十大”最后批准的新主席团产生之前，他一直是党的主席团成员。他被指派参加由多兰茨领导的准备决议草案的委员会，但没有预计他会在这次大会批准的新的领导机构中得到任何职位，结果也确实如此。茨尔文科夫斯基在大会上只是一个不发言的一般代表，他代表那些政治上受

牵连较严重的人；而伏克曼诺维奇则作为一般代表在会上作了例行公事式的发言，他代表那些在1968—1969年政治上销声匿迹，而在1972年以后仍未活跃起来的人。一些以前在党内地位较高的党员（其中还包括K·波波维奇和其他一些人）所处的地位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他们象1969年的斯塔姆博利奇和科利舍夫斯基等人那样，如果政局再度变化时，可以不必经过重新恢复名誉这种麻烦和困难重返政治舞台。而不象那些“自由派”和“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自从1971年以来一直遭到强烈谴责，并已被开除党籍。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在过去十年参与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伟大实验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现在都成了局外人，或次要角色。事实上，人们通常认为在自由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卡德尔和巴卡里奇，目前仍然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们既是党的主席团成员，又是国家主席团成员（1972年颁布的不能同时兼任这两种职务的禁令现已撤销），而且在最近的公开场合上，他们两人与铁托的关系比起其他领导人来（除了多兰茨）显得特别亲密。由三十九人组成的新的党的主席团中的某些其他成员，包括S·克拉伊盖尔（他本应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国家首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和格利戈罗夫（他本应是托多罗维奇的继承人，担任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在策划和执行六十年代的改革中显然都非常积极，起了重要作用。

正如新宪法一样，这次党代大会的宣言清楚地描绘了新路线的基本轮廓。一个重新实行中央集权的、经过纪律整肃的党，将更加严格地控制南斯拉夫。并且，明确重申了党有权“干预”企业和共同体政策的制订和领导人选的确立（许多1971年以来被清洗的人一直不承认这种权力，并称之为过时

的和有害的)。在党内,不管有没有“来自基层的人”真正参加制订政策,也不管党组织中有没有真正的工人参加各级领导工作(这两点都一再许诺过),“民主集中制”通常更强调的“集中”这一方面(无条件地接受和积极地执行上一级党的机构所规定的政策和所作的指示)将严格地予以加强,消极怠工象拒不执行一样都应受到惩罚。“自由主义”、“放任自流”、“多中心”和“党的联邦化”,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人们现在对一种几乎不加控制的市场经济的优点(在六十年代末期曾毫无批判地接受,以致很象十九世纪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批判地重新加以评价。国家可能会继续“消亡”,因为通过“联合劳动组织”与“自治利益共同体”相结合,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所谓“直接社会自治”的部门,但是党不会消亡。简言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将继续以自主的企业和公社以及“社会自治”为基础,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经济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次党代大会上,以及在大会之前的几个月中,曾多次提到列宁的名字,而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不经常提及了。用一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党有意识地 and 明确地试图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恢复党组织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关于党的作用的列宁主义的学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句关键性的话,最近发生的事件已赋予它一种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更旧的——而且更加严格的意义。

然而,这种新的路线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企业家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清楚。在这次党代大会上发言的权威人士和大会文件继续强调过去由于党的绝对独裁、中央集权主义和指令经济所造成的痛苦岁

月将一去不复返。据说，恢复过去的这一切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因为恢复党的统治的基本理论和目的是实现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治——而且在目前也绝无这种可能性，因为南斯拉夫目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地方分权制订政策相对来说都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尽管铁托及其新的副手们以及这次代表大会可能会提出这样做的建议，但能否行得通取决于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力量的平衡，甚至党内也不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想要显示的那样，在进行适当干预的程度和性质方面能取得统一的意见。

党代表大会上的辩论，特别是格利戈罗夫在他对社会经济关系委员会所作的主要发言中为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优点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之后引起的辩论，以及党的新领导机构在成员组成上的混杂情况，都进一步说明有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仍未解决。如果认为，在党内再次实行权力集中，并且再次宣称它在各方面都具有“领导作用”，必将意味着南斯拉夫的仍然高度分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决策权彻底中央集权化，那末得出这种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因此，问题在于铁托和党代表大会批准的领导集团，在重申党的权威时打算做到什么程度和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因此能解决那些导致铁托突然反击的问题，还是仅仅把这些问题压制下来，甚至使其恶化。

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党代表大会前的文件、讲话和决议都清楚地宣称，决不会恢复中央集权的党的独裁，甚至也不会恢复五十年代的准中央集权的党的独裁。当然，人们可以怀疑这是花言巧语，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是自我欺骗，或者是如意算盘。在当时的气氛中，有迹象表明，中央集权的党的独裁可

能会恢复,或者已经开始恢复。迹象之一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论点又意味深长地再度流行,而且不断地重复使用,并有一定的倾向性。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它们向来是用来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因而近年来南斯拉夫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总是故意回避它们或者对它们作出不同的解释,或者很少引用,即使引用也只是出于礼仪上的需要。现在甚至南斯拉夫自己的斯大林时代,即1945年至1950年,也被称为“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是比“行政管理时期”更为从正面加以肯定的称呼。另外,尽管政治风格的改变和干部的调动一般只影响到党员和党内生活,但有其他迹象表明,要推行一条影响全体公民的更强硬的路线是确有其事。一家自1971年以来非常活跃并可相当自由地发表观点的报刊被封闭,这只不过是个信号。此外还逮捕了一些积极进行活动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强迫大学委员会解雇那些被控宣传反对党的路线的思想的教授们,并且下达指示,要纯洁各级教员的思想。报纸上还以赞成的口气报道了地方党委会如何成功地干预了工厂经理的罢免,或者企业政策的改变;而在三年前,报纸在报道这样的消息时,肯定是会持不赞成的态度的。

这种趋势是铁托的突然袭击所引起的。他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他认为,当时的制度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所造成的后果,与官方或社会上公认的准则和期望相差太远,与制度本身正统化的神话也不一致,而且对保住铁托自己和党的权威来说也已忍无可忍。而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当他晚年看到自己反复提到的最伟大的业绩遭到损坏时的那种显然真诚的悲痛心情。每当他谈起来,总是调子低沉,充满怨气。这

伟大的业绩不是他专门在比较正式的讲话或演讲中谈到的社会主义或南斯拉夫独特的自治经验，而是游击战争时期的伟大口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统一”。多年来，他一直软硬兼施，要人们注意，随着他的年事日高，随着民族问题可能搞垮他的制度的迹象愈益明显，他的伟大业绩遭到损坏的紧迫性正日益增长。然而在1971年出现无法克服的政治僵局和民族问题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以前，他一直没有动手。但局势的发展，最后使铁托和其他一些人确信，如果铁托要改变大政方针，只有通过一次突然袭击才能实现。

于是铁托采取行动了。然而并不是说他现在拿出来的解决办法必然特别妥当，或者这个办法会象他所期待的那样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铁托的解决办法失之简单，他不过是想重新恢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纯洁性，并恢复这样一个陈旧的神话：马列主义政党家长制的、开明的专制主义能象占卜者一样，正确地卜出反革命并使他们的阴谋破产，而且它还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统一的最终的牢靠保护人。

然而其他一些人却为这个过于简单的解决办法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它复杂起来。这些人中有那些制订新宪法的人，他们把南斯拉夫辩证法中民主“自治”这个方面加以新的发展和调整而纳入新宪法之中。这些人不同意铁托对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原则的看法，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工人大多数”的名义）重又提出党内必须有各种不同社会成分和“思想意识”这个论点。还可以察觉这些人的手也伸进修订党章的工作，用比历来更为强硬和更加明确的词句要求党的上级机构必须响应来自下面的主动性。

这并不是说，办法越复杂就越能解决问题，或者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纲领和宪法比信奉其他主义的政党或政治家们的纲领和宪法有更重大的意义。但这似乎确实意味着重新组成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中的一些人出于某些实用主义的原因，有保留地接受了铁托以党的名义搞的突然袭击，可是现在这些人的权力已大到能够把他们的观点塞到党的最有权威的宣言中去，并使大会批准通过。他们所以同意铁托的行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摆脱困境和由此产生的危机风险最小的办法。这种困境和危机正威胁着制度的稳定和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威胁着至少一些老资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看来真心诚意地信仰的那些政治的或社会主义的准则。因此，清洗以后建立起来的班子显然仍分成两派：一派把重申等级纪律和党的“领导作用”视为那些永久有效的原则的恢复；另一派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做法，但必须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防止成为一种永久性的东西。这两派人所持的态度，都受到他们认为与各自有最密切关系的利益和任务的影响，受制于他们猜度某些社会阶层、有组织的势力和个人所能接受的是什么。在这两种人看来，这些阶层、有组织的势力和个人，哪怕只是给予他们起码的消极支持，对于他们自己和制度的生存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另外，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也影响他们的态度。

南斯拉夫历届党代表大会并不对某些有争执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也不从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中，或从代表不同倾向、不同社会势力和党内派系的个人中选举领导干部。但是，党代表大会确实为进行另外形式的辩论和作出决定规定期限。党代表大会必须拿出政策和人选来以供批准，这些政策和

人选在今后几年中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也是有重大影响的。另外，党与那些不断进行包围和渗透的“阶级敌人”和“异端邪说”展开持续的无情斗争的神话，使得从过去革命斗争时期继承下来并加以保持的党的规矩和传统要求南共在朋友和敌人都在注目的情况下，能在党代大会上公开显示出党的磐石般的团结，如果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实际上是如此当然更好。假如党的领导集团中有意见分歧，在举行党代大会之前就必须尽快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可能是一部分人（或一个联盟）及其观点得胜，而失败的人则要保持沉默，或被革职，以免在党代大会上出现不团结或无法作出决议的尴尬局面。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是，如果在举行大会之前仍然没有一种观点能占上风，那末出于团结和作出决定的迫切要求，也会制订出一个纲领和干部候选人名单，但是有经验的观察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种妥协，有时只不过是欲盖弥彰地掩饰继续存在的分歧而已。大体上来说，1969年举行的第九次党代大会采用了第一种解决办法，当时曾明白无误地批准通过自由派的政策，而在1964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大会则采用了第二种解决办法。

乍一看来，第十次党代大会与第八次党代大会很相似。从宣言上看，这次大会是经过以往三年的创伤、危机和清洗之后的一次“安定团结的大会”，但实际上在开会期间仍然存在分歧，并达成了又一次的妥协。就如1964年所发生的那样，这次党代大会在哪些问题上意见一致、在哪些问题上有所争执，到底有哪些人代表不同意见、他们的阵容如何，以及因此而达成的妥协所造成的后果如何等等，这些暂时都还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力量的均势已发生了变化。第十次党代大会与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区别在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力量均势的变化有利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辉格派，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则使得党内托利派处于远为强有力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展开的政治篇章已随着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表态而宣告结束。

第九章 结 论

历史上真正的恶棍寥寥无几，但是蠢人蠢事不少，而在道义上不敢坚持真理、思想理论上动摇不定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同时，这个世界在传播消息时，传闻失实，歪曲真相，甚或出钱收买弄虚作假的情况比比皆是。另外，想以善良的愿望闯出一条新路，结果却是走入绝境的多，取得成功的少。上述情况，对本书所描述的南斯拉夫的历史来说，也在所难免。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小国，具体说来象 1940 年的南共这样一个小小的革命政党，竟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领导人，而且相对地说来睿智卓越、勇于献身、富于想象、善于总结经验、灵活机变而不失其基本信念。这不禁使人联想起美国革命史上卓越的第一代。那时候，正在崛起的美国比南斯拉夫还要小，也造就了一批数目上多得颇不相称的领导人，他们同样是远见卓识、才干出众、正直过人。然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所继承的精神财富和自然财富（这一切又都受到这些领袖人物和追随者们头脑里的历史观念和神话这种精神包袱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理想和才干，使他们在实践中备受严峻的考验。

铁托周围的人是以列宁主义政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起家的，这样的政党适合于在南斯拉夫的社会环境中实现革命的突破。但是，这样的政党对于按照他们自己的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最基本的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来巩固

革命成果却是不合适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力求从中得出与那些原则协调一致的结论，这使他们在南斯拉夫历史上而且也在世界历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尽管尚未成功，但他们敢于大胆地去解决（为了强调这并非共产党革命所特有的）不妨称之为阿塔土耳其克^①的难题。这种难题并不陌生，只要这种革命建筑在实现解放、现代化和民主这些自由神话的基础之上，而进行革命的又是少数激进派，他们尽管已经取得对一个大体上仍然因循守旧的社会实行“暂时”专政的权力，但在这个社会里却缺乏对革命准则的一致支持。如果一个少数人的政权有充分理由担心，让公民自由选择领导人或作出其他有关公众事务的抉择，结果会危及其他的价值准则和政策并危及对完成革命目标至关重要的干部的话，那末它怎么能够让公民在这些方面发挥真正的积极作用呢？但是，这个政权的纲领和原则中包含给人民以民主参政权，并反复声明要这样做，而在实践过程中又迟疑不决或畏缩不前，再加上它所建立的各种体制慢慢地给人民和企业一定的自由，以及人民在政治上慢慢地老练起来，等等，这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已经把“（人民）对权力的幻觉转变为幻觉的权力，而这种幻觉的权力又已逐渐成为自下而上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让公民在选择领导人和作出决策方面发挥真正的积极的作用，这又能拖延多久呢？

1970年以后面临极为严峻的困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再一次抛弃了他们之中那些态度过分妥协或思想过分刻板以致在变化中无法适应形势的人，并找到了另一种办法，试图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

^① 意即“土耳其之父”，指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基马尔。——译者

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描述的他们设计的解决方案，包含新、旧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进行种种妥协，这种做法看起来几乎肯定还不是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它还是留下了种种演变的余地。笔者在1971年曾写道：“南斯拉夫独特的、永远是试验性的社会主义以及多民族的联邦制度得出结论的真理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过去很多其他的观察家常常过早地宣布了这个时刻的到来，结果笔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南斯拉夫自1972年以来从西方政治传统称之为个人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立场可悲地大幅度后退了。但是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历史仍然不失其惊险故事的特色。这是一部不断变革以求现代化的社会史话。在这个社会中，各种机构、制度以及管理人员正在以有助于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和他们所颂扬的自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原则的方式来适应变化中的形势。但是，他们的前途仍然成败参半。

因而，南斯拉夫自1949年开始实验其“独特的道路”以来，它这二十五年的历史实际上只“证明”了南斯拉夫人从领导者到被领导者都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都具有一种别人往往难以理解的乐于和急于实验的看来是百折不挠的精神。然而，人们都极大地关注着这样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即所有的社会和制度都是不同的，其中一些不同于另一些，但唯有南斯拉夫几乎同绝大多数的社会和制度都不同。正因为这样，南斯拉夫的这段历史确实提出了一些可能值得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一些正在迅速推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加以实验的结论或假设。其中有两类问题出于笔者自己的兴趣在前面的章节中特别予以重视。不过，在一本叙事的历史书中，特别是力求对

事件进行综合性分析而不是从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历史书中，这两类问题往往是阐述得比较含蓄的。

首先，一种折衷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从来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归根到底是站不住脚的。它想要通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因循守旧的“指令经济”中掺入一些市场经济的成份，使南斯拉夫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手段和灵活性；即采取重视利润的方针，使基本上仍由国家管理的价格较能反映价值规律，并使企业具有若干独立确定经营方针的权力。尽管这种经济模式可以避免纯粹的指令经济的某些比较严重的弊病，并在短期内行之有效，但这往往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没有一个机构有能力做出完全合理的，哪怕是接近于合理的分配物资、资金的决定。企业管理人员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就他们的权限来说，对投资决定权充其量仍然只能沾一点边，而且仍然存在的行政控制，再加上这类控制和价格所依据的混杂的理论依据，使市场情报大为失真，以致企业管理人员无法从宏观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选择。计划人员也同样无法做出合理的分配物资、资金的决定，因为他们无法掌握供求之间的若干关键性的可变因素，而且同企业管理人员一样，必须依靠那些混杂的、自相矛盾的、使人误解的经济情报来工作。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从以下两种办法中作一抉择：再度实行格罗斯曼称之为“逐步的、几乎不被察觉的、但积累起来却有重大影响”的中央集权制（可理解为在南斯拉夫这种地方分权的政治制度下在多中心的基础上重新实行中央集权），或是来一次大胆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冒风险的突破，即实行根本不要计划或只有象征性计划的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果选择了这一突破，并走“自由社会主义”的极端，如在

南斯拉夫曾出现过的情况那样(还要加上一种复杂的情况,即残存的控制还不少,既杂乱无章且不合理,超出了这样一种市场的需要),那末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很可能会发觉自己面临自由资本主义由来已久的绝大部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诸如垄断集团及其人所共知的后果,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以及未必反映个人能力和勤奋这类固有差异的其他种种不平等现象。如果这个政权感到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利益或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来说,这些现象日益成为不能容忍时,它就会采用政府干预的形式来左右自由企业的经营方式。这是仿效很多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付诸实施的办法,尽管对解决这些问题来说仍感力不从心,但是也算上策了。如果“指令经济”阶段的政治势力和心理状态依然具有很强大的力量或者再度抬头,那末这样做在政治上可能要冒一定的风险。

其次,把南斯拉夫的情况作为典型事例来剖析,再一次向从事这种研究的人突出地表明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亦即要研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四种关键的可变因素相关联的“反馈结构”。这四个可变因素是:第一,经过周密计划的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具体思想以及所采取的相应的形式;第二,根据这种思想和做法所进行的现代化的具体特点和阶段性;第三,现代化的这种具体特点和阶段性对经济体制及其设计者所提出的种类和范围发生了变化的要求;第四,这种经济体制的设计者对这些要求的反应。

南斯拉夫经济上实行自由化,政治上谨慎地取消中央集权,这一系列改革和社会现代化使得它在六十年代所形成的制度从道理上讲已不能再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制度,甚至不能称之为—党专政的制度。根据自治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在体制

上合法化的各种力量，数目已经相当可观。它们代表各不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代表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社会阶层以及政治上最活跃的南斯拉夫人。这些南斯拉夫人由于在基本思想意识方面持不同看法，曾宣布不放弃选择权，但现在他们一起参与下至公社上至联邦的各级政权，为公共事务作出抉择。本书将这种结果称之为拥有一个骨干网的多中心的多头政治。一般来说，人人都有机会跻身于这个行列，只有个别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文化上的隔阂，本身或外部造成的种族上或思想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算是例外。这种多头政治的出现及其进一步演变，为研究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同样发展真正的政治民主以及可能发展到的程度，提供了一个富有意味和启发性的实例。

这种政治上的结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南斯拉夫政权所选择的并间断地加以修改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和体制的必然结果。但是，本书最后几章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样一个多中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定会（或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完全民主——不管这种民主的含义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还是南斯拉夫理论家们所论述的那种广义的、无拘束的社会自治。当南斯拉夫国家和政权开始进入第四个十年的时候，谨慎地向这样一个理想的目标靠近仍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看来另一种可能性却要来得大一些，这种可能性就是南斯拉夫将变成只不过是又一个实行寡头政治的、统治集团内部进行权力斗争的、拖拖拉拉、效率不高、压迫性也不太强的准集权主义国家；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人是自由和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许多人则不是这样，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